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張水木博士

The seal of Donghai University is a circular emblem with a scalloped outer edge. It features the university's name in Chinese characters '東海大學' at the top and 'DONGHAI UNIVERSITY' in English around the bottom. The year '1955' is inscribed at the very bottom. In the center, there is a smaller circular design with a cross-like symbol.

冷戰後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東  
南亞權力結構變遷中的競爭  
與發展

碩士班研究生：蕭煜霖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日

# 摘要

中國大陸崛起是國際關係領域中重要的議題，尤其是中國崛起將如何影響國際秩序，以及周遭國家如何面對中國大陸的重新崛起，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許多研究者批評肯尼思·華滋(Kenneth Waltz)國際政治理論中認為國家傾向對權力或崛起國家進行平衡，而主張國家可能採取「扈從」(bandwagoning)、「適應」(accommodation)或「避險」(hedging)的選項，據此認為東南亞國家對北京將避免採取制衡。

然而，批評者認為上述主張根據歷史經驗作為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而忽視美國在此地區的角色，他們認為將美國納入東亞國際關係作觀察，有助於研究者獲得更客觀的看法。另外，主張避險行為者，試圖對東南亞個別國家面對華盛頓與北京的態度作更清楚的分類，可是在缺乏共同標準的前提下，國家採取制衡或扈從的強弱程度隨著研究者採用標準的不同而時有差異；同時，此一研究時常以國家外交政策作為分析，而忽視國際體系中大國間國家能力分配所產生的影響。

因此，本文針對冷戰結束後，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地區的互動進行分析，尤其是彼此在此地區國家利益目標重疊下，雙方如何進行制衡與反制衡的政策，以及兩國的互動又如何對東南國家的行為選擇造成影響。



#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11
第三節 章節安排.....	14
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理論分析.....	17
第一節 文獻探討.....	17
第二節 理論分析.....	31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38
第三章 冷戰後美國與東南亞六國關係之變遷與挑戰.....	41
第一節 美國布希政府的亞太政策.....	42
第二節 美國柯林頓政府的亞太政策.....	49
第三節 美國小布希政府的亞太政策.....	57
第四節 冷戰後美國與東南亞六國關係之挑戰.....	67
第四章 冷戰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六國關係之變遷與挑戰.....	85
第一節 冷戰後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六國外交政策的轉變.....	86
第二節 從「中國威脅論」到「中國機會論」.....	112
第三節 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六國雙邊關係之發展.....	120
第四節 冷戰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六國關係之挑戰.....	131
第五章 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東南亞的競逐與勢力消長.....	137
第一節 美國與中國大陸經濟與軍事實力比較.....	137
第二節 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東南亞的經貿與軍事力量消長.....	146

第三節 美國歐巴馬政府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	162
第六章 結論.....	175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75
第二節 研究結論.....	180
參考書目.....	189
附錄.....	215

# 圖目錄

圖1-1：東協國家回應中國大陸的重新崛起：從制衡到扞從.....	10
圖1-2：研究架構.....	14
圖3-1：美國政府預算赤字佔GDP比重概況圖.....	45
圖3-2：全世界與六大地區經濟成長率走勢圖(1986-1992).....	49
圖5-1：美國與中國大陸逐年經濟成長率.....	138
圖5-2：美國與中國大陸全國購買力指數圖.....	139
圖5-3：美國與中國大陸全國購買力指數佔世界比重.....	140
圖5-4：美國與中國大陸人均購買力指數.....	141
圖5-5：美國與中國大陸軍費支出.....	142
圖5-6：美國與中國大陸軍費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比重.....	143
圖5-7：美國與中國大陸政府負債佔國內生產總額比重.....	145
圖5-8：美國與中國大陸佔印尼對外貿易比重.....	149
圖5-9：美國與中國大陸佔菲律賓對外貿易比重.....	149
圖5-10：美國與中國大陸佔馬來西亞對外貿易比重.....	150
圖5-11：美國與中國大陸佔新加坡對外貿易比重.....	150
圖5-12：美國與中國大陸佔泰國對外貿易比重.....	151
圖5-13：美國與中國大陸佔越南對外貿易比重.....	151
圖5-14：美國對東南亞六國貿易平衡圖.....	153
圖5-15：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六國貿易平衡圖.....	153
圖5-16：美國對東南亞六國直接投資變化圖.....	155
圖5-17：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六國直接投資變化圖.....	155
圖5-18：美國與東國大陸對東南亞六國直接投資變化圖.....	156
圖5-19：東南亞六國軍事支出概況.....	158
圖5-20：東南亞六國軍事支出佔國內生產總額比重.....	159
圖5-21：東南亞六國軍事武器進口逐年變化圖.....	160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 壹、研究動機

美國不斷歷經民主黨與共和黨政府的輪流執政，兩者對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總是具備一貫性，但是彼此間又存在著某些細部的差異，如柯林頓(William Clinton)政府時期與中國大陸建立戰略夥伴的關係，至小布希(George Bush)政府則稱中國大陸為戰略競爭者。柯林頓政府對中國大陸採行「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ship)與「全面交往」的政策，希望中國大陸逐漸融入國際社會，及促進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甚至期望中國大陸扮演國際社會中建設性的角色，最終促使其成為一個民主國家。<sup>1</sup>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約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認為中國大陸崛起並不會導致以美國為首的單極體系走向瓦解，<sup>2</sup>在他的重要著作《大戰勝利之後—制度、戰略術語戰後秩序重建》一書，說明一八一五年、一九一九年和一九四五年三次戰後世界秩序的安排，並且發現領導國越來越傾向使用制度戰略來建立，並說明一九四五年以來在美國領導下建立的制度秩序所具備的穩定性；同時，此一制度對中國大陸這種崛起國家而言，透過參與美國所建立的制度所能獲取的利益，遠較它以武力方式改變現狀來的大，即參與現在的國際制度對參與國而言能獲得高度的回報。<sup>3</sup>另外，透過加強雙邊貿易讓中國大陸對世界經濟產生依賴，使它在面對某些問題時可以思考

---

<sup>1</sup> Barry R. Posen, 2001/2002,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Grand Strategy, Strategy, and Tac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p. 51.

<sup>2</sup> G. John Ikenberry, 2008,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Issue 1, pp. 23-24.

<sup>3</sup> 門洪華譯，約翰·伊肯伯里原著(G. John Ikenberry)，2008，《大戰勝利之後—制度、戰略術與戰後秩序重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頁 12。

經濟上的得失，採取和平與理性的態度透過現有的途徑尋求轉變，避免中國大陸以極端的方式謀取自身利益與滿足國家目標；此外，期盼中國大陸在開放的過程中，除加深與世界依賴之外，也可能促進國內民主的發展，使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與國際社會將是和平而非往衝突方向發展。<sup>4</sup>

然而，柯林頓政府八年執政的結果是，中國大陸國內體制並未轉變，且華府似乎較北京更在意彼此間的貿易關係與貿易對國內經濟的負面影響。<sup>5</sup>中國問題專家大衛·藍普頓(David M. Lampton)曾指出歷史上美國曾兩度低估北京的實力而付出代價或陷於難堪的境地，其中一次便是柯林頓政府威脅北京限期改善人權紀錄，否則將予以中止關稅最惠國待遇；但是，北京強硬的態度迫使柯林頓政府政策轉向，最後將人權議題與最惠國待遇作切割。據此，他提醒我們不該錯誤估算中國大陸的實力。<sup>6</sup>

美國除以交往為主要政策外，在亞太地區依然保持冷戰時期所建立的聯盟關係，以應對此地區任何可能的威脅，而一般亦認為此一緊密的軍事合作關係是針對中國大陸而來，此一發展更在一九九〇年代掀起一波「新圍堵」的討論。<sup>7</sup>然而，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周邊國家紛紛主動調整他們和北京之間的關係，甚至尋求北京扮演一個區域領導者的角色，周邊國家也紛紛將中國大陸的利益與關注列入他們決策時的考量，尤其是美國並未參與東亞地區中許多由區域內國家所倡議的機制或制度安排，反倒是中國

---

<sup>4</sup> Christopher Layne, 2004, "China's Rol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artner, Regional Power, or Great Power Rival?" in Jim Rolfe ed., *The Asia-Pacific: A Region in Transition*, Honolulu: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p. 71.

<sup>5</sup> Ibid., pp. 74-75.

<sup>6</sup> David M. Lampton, 2007, "Th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1, pp. 115-116. 第一次是韓戰爆發時以為北京將不會介入美國對朝鮮的軍事行為，後來正是中共參與戰爭導致雙方龐大的死傷人數。

<sup>7</sup> 向駿，1996，〈「中國威脅論」及「新圍堵」〉，《美歐月刊》，第11卷，第5期，頁25-38。李文志，1996，〈「中國威脅」與美國的對策：介入？圍堵？〉，《國家政策雙周刊》，第129期，頁12-16。



大陸積極參與的態度與主動的外交行為，可能逐漸轉變美國在此區域的角色，以及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與聯盟國家之間的關係。<sup>8</sup>西澳大學教授(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馬克·畢森(Mark Besson)認為北京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的外交政策極為成功，一面與周邊國家改善關係，並在多邊組織中極力排除美國的參與，包含東協高峰會以及北京所領導的上海合作組織等，使北京較過去更具影響力。<sup>9</sup>馬克·里歐納德(Mark Leonard)亦指出中國大陸崛起顛覆全球化中「多邊主義」與國家主權稀釋有關的概念，因為「多邊主義」到了中國大陸卻成為國力投射的工具，即北京透過國際組織參與國際事務並沒有削弱國家主權與國家影響力，反而使北京獲取更多的國際威望與國際影響力。<sup>10</sup>

對於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提升以及後冷戰時期外交政策的努力，學界掀起一波中國大陸是否改變現狀的爭論，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大國的政治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開始便直指：「國際體系中沒有維持現狀的國家，大國很少對眼前的權力分配狀態感到滿意；相反地，它們無時無刻都在找尋機會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當改變現狀的成本效益過高時，它們將保持現狀等待有利的形勢來臨，但是獲取權力的欲望並沒有消失，而這種權力欲望直到該國家得到霸權(Hegemony)地位才會滿足。」<sup>11</sup>由於國家永遠無法掌握其他國家的意圖，而且國家隨著能力轉變可能連帶影響其意圖之轉變，所以對於其他國家的意圖必須作出最壞的打算。<sup>12</sup>因此，北京未來將朝著成為區域霸權而努力，所以美國與中國大陸

---

<sup>8</sup> David Shambaugh, 2004/2005,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pp. 64-65.

<sup>9</sup> Mark Beeson, 2006, "American Hegemony and Regionalism: The Rise of East Asia and the End of the Asia-Pacific," *Geopolitics*, Vol. 11, Issue 4, pp. 541-560.

<sup>10</sup> 林雨菁譯，馬克·里歐納德原著，2008，《中國怎麼想？》。台北市：行人出版社，頁 121。

<sup>11</sup> John J. Mearsheimer,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p. 2.

<sup>12</sup> *Ibid.*, p. 46.

之間的衝突將無法避免。<sup>13</sup>前澳洲外交部長現為澳洲國立大學教授的斯圖爾特·哈里斯(Stuart Harris)便表示，中國大陸現在擁有多少能力是一回事，而它究竟有多大的意圖才是我們需要關切的。但是，他也認為這並不存在明確的答案，因為隨著北京的利益越趨廣泛，北京所追求的目標也越來越多元；然而，基於維持一個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的良好形象，限制北京像傳統霸權一樣斷然地使用權力以滿足自身利益。但是，他也指出現在亞太國家在作出決策時不僅要考慮現在北京如何回應，更要考慮未來更強大的中國大陸將如何回應，<sup>14</sup>顯示北京在此區域的影響力已越來越大。

此一情勢發展，使華府在九〇年代對中國大陸外交政策強調交往為主軸線的戰略，在美國內部引來許多批評聲浪，他們認為：第一、美國必須採取強硬的態度；第二、國際制度並沒有對中國大陸構成限制，反而成為中國大陸增加權力的一環；第三、中國大陸的崛起可能改變設定的目標，朝著區域霸權邁進；第四、美國必須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聯繫，否則形勢將漸趨對美國不利。

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小布希便曾於競選期間，發表一篇將中國大陸視為是戰略競爭者的文章。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爆發前，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演練確實頻繁，而且在參與成員上亦有所增加，使得華府與北京在東南亞地區的關係再度受大家矚目，惟恐怖攻擊事件後影響華雙方在此地區的戰略布局。對華府而言，一方面是美國需要北京在區域與全球層次上針對反恐議題提供幫助，使得小布希政府成為二次戰後以來，改變對華政策最迅速的美國總統；二方面是九一一事件以及東南亞國家遭受一連

---

<sup>13</sup> John J. Mearsheimer, 2006, "China's Un-peaceful Rice," *Current History*, Vol. 105, No. 60, pp. 160-162.

<sup>14</sup> Stuart Harris, 2005, "China's regional policies: how much hegemon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9, No. 4, pp. 490-491.

串的恐怖攻擊行為，東南亞國家才願意與美國針對打擊恐怖主義進行合作，使得美國與東南亞國家走出九七金融風暴以來的陰霾，尤其是美國與印尼改善九〇年代末以來冰凍的外交關係。但是，小布希政府將重心置於反恐議題上，忽視東協國家亦希望在經貿議題上能加強雙邊關係；同時，小布希執政期間更是屢屢在東協重要的會議中缺席，包含二〇〇七年小布希缺席美國與東協建立對話夥伴關係三十周年的美國東協高峰會，因而受到東協國家的批評。對北京而言，一方面趁著美國將重心擺在中東時，延續九〇年代與周邊國家建立友好關係的路徑，並加緊與東協之間的發展；二方面北京對於美國在東南亞尋求港口作為軍事基地以及雙邊加強軍事方面的連結感到憂心。但是，美中關係整體上依舊維持以交往為主軸的外交關係，尤其是雙方自二〇〇六展開定期舉行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使雙邊關係更往前邁進。

然而，歐巴馬上台後，美國再度將焦點轉移至東亞地區，尤其是國務卿希拉蕊上台後立即展開亞洲行，一改過去國務卿上任首先訪問歐洲或中東的傳統；緊接著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發布的「在新亞洲中的美國」報告書，主張美國應積極參與亞洲地區的活動，而歐巴馬亦於二〇〇九年末訪問亞洲時稱美國為「太平洋國家」，表明美國將比過去更加重視亞洲；<sup>15</sup>另外，歐巴馬總統於新加坡參加亞太經合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非正式會議期間，參加於新加坡香格里拉(Shangrila)酒店舉行的東協高峰會，成為首位參與東協高峰會的美國總統。從美國一連串的外交作為中，可以觀察到歐巴馬政府更加重視與東南亞國家間的關係，這是否影響到中國大陸與東協間過去十年所建立的緊密關係？本文以（新）現實主義為理論基礎探討美國與中國大陸在

---

<sup>15</sup> 中國評論新聞，2010.01.13，〈美國「重返東南亞」中國不必擔心〉，<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9/6/2/101196263.html?coluid=70&kindid=1850&docid=101196263&mdate=0113000955>。

東南亞地區的競爭關係，並透過對東南亞國家「避險」(hedge)行為更細微的劃分，以觀察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地區各佔據何種優勢與劣勢。

## 貳、研究目的

國內學者陳亮智在「尋找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驅動力量：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移？」一文中提出一個問題：什麼是形塑美國與中國大陸進行戰略競爭的驅動力量？有哪些國際關係理論有助於我們瞭解這強權競爭與國際秩序重構背後的驅動力量？他在細究「安全困境」、「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後，認為權力轉移才是真正重塑美中兩國走向戰略競爭的主要力量，並將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視為次要力量。<sup>16</sup>權力轉移理論中，對於國家權力的衡量相當廣泛，一般以經濟與軍事兩個面向觀察兩國的變化：在經濟指標方面，包含每年經濟成長率(Gross domestic product, constant prices, National currency)的幅度呈現中國大陸持續穩定攀升、而美國成長緩慢的趨勢；美國與中國大陸兩國購買力指數(Gross domestic product based on purchasing-power-parity, valuation of country GDP)的變化；觀察購買力指數占全世界百分比(Gross domestic product based on purchasing-power-parity, share of world total)的變化等。在軍事指標方面，以國防軍事支出為觀察重點，以及軍事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等。

權力轉移一般將分析焦點放在體系中行為者的身上，觀察兩者過去到現在實力相對強弱的變化，儘管權力轉移理論建立一套觀察的指標，但是在研究上並無法清楚瞭解雙方是否存在敵意或

---

<sup>16</sup> 陳亮智，2009，〈尋找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驅動力量：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移？〉，《中國大陸研究》，第52卷，第1期，頁87-128。

互視為競爭者的關係，以及他們和體系中其他國家互動的意義；同時，他們將研究焦點置於國家間何時爆發衝突。然而，本文將焦點置於美國、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的交往上所代表的意涵，以探究兩國與東南亞國家間的互動與發展，以及如何牽動此地區未來東南亞安全。

一般研究區域的選擇上以東亞地區或東北亞地區為主，本文改以東南亞地區為研究焦點，主要因素是此地區與中國大陸無論在經濟上或安全上（主要集中於非傳統安全層面），皆是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但是他們之間卻受南中國海主權問題所阻礙。同時，東南亞地區對美國而言，最重要的意義來自於航道的安全與自由航行：全球貿易中有高達三分之一的產品通過東南亞地區，其中百分之六十六為石油與天然氣，此一數額佔據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而通過麻六甲海峽的能源運輸量是蘇伊士運河的三倍、巴拿馬運河的十五倍。<sup>17</sup>如果美國在東南亞地區逐漸失去優勢，不僅美國以及傳統盟邦日本與南韓在經貿方面暴露於風險之中，亦將讓美國更處於劣勢。然而，美國在九〇年代僅關注自身實力之維繫與航運安全，而忽視東南亞國家其他安全的需求與利益考量，反而讓北京在東南亞地區的聲望逐漸提高。

曾任職美國國防部的政策分析家維尼·伯特(Wayne Bert)在《熟者勝出：美國與中國在東南亞之爭》一書中，指出如果中國大陸的經濟持續成長，且被認為足以對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構成威脅，那麼中國大陸的發展動向以及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因應策

---

<sup>17</sup> Tommy Koh, 2008,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 in C. Raja Mohan, Tommy Koh & Ambassador Han Sung-Joo eds., *America's Role in Asia: Asian and American Views*. San Francisco, CA: The Asia Foundation, p. 40.  
[http://www.lkyspp.nus.edu.sg/ips/docs/pub/pa\\_tk\\_United%20States%20and%20Southeast%20Asia\\_2008.pdf](http://www.lkyspp.nus.edu.sg/ips/docs/pub/pa_tk_United%20States%20and%20Southeast%20Asia_2008.pdf).

略，將成為未來五十年最熱烈討論的外交議題。<sup>18</sup>而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擁有廣泛的利益，東南亞國家自一九四〇年代末期以來因獨立而引發的民族主義衝突、意識形態的分歧以及權力爭奪，也因冷戰的結束而平息，使得東南亞整體相較於冷戰時期更不容易爆發大規模暴力事件。然而，東南亞地區是美中互動的重要舞台，而且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仍存在著一項重大的爭議，即南中國海領土管轄權的紛爭以及海上航權的潛在爭議。儘管華府與北京走向合作將有助於解決東南亞的諸多問題，但是權力轉移的憂慮下，將推動雙方在此區域進行權力競爭與權力平衡，即美國努力維持對他有利的「權力不平衡」狀態，中國大陸則試圖將「權力不平衡」狀態轉為「平衡狀態」。<sup>19</sup>政治大學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張雅君亦曾撰文表示，後冷戰時期北京外交策略一方面確保美中雙方關係穩定，並從此一環境獲益；二方面透過強化睦鄰友好關係，縮小美國採取圍堵政策的空間，藉此分裂美國國內及亞太國家對中國大陸角色的認知。<sup>20</sup>

其次，許多文獻與理論將研究焦點置於「如何對一個崛起國家作出反應？」這些研究批評華茲(Kenneth Waltz)國際政治理論中認為國家必然對權力或崛起國家進行平衡，反而認為國家將採取「扈從」(bandwagoning)或「適應」(accommodation)的外交政策，主要理由分為三個方面：一、小國無法負荷龐大的軍事支出，使他們放棄對崛起國家進行制衡；二、國家並不總是對權力進行平衡，國家通常對威脅進行制衡，而且崛起國家並不必然構成威脅；三、小國出自於自利的考量，認為採取「追隨」、「扈從」或「適

---

<sup>18</sup> 林芳燕翻譯，維尼·伯特(Wayne Bert)著，2003，《孰者勝出一美國與中國在東南亞之爭》(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A Changing of the Guard?)。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頁 i (作者序)。

<sup>19</sup> 同註 16，頁 91。

<sup>20</sup> 張雅君，1997，〈中共對美國的戰略思維與行動：圍堵與反圍堵〉，《中國大陸研究》，第 40 卷，第 5 期，頁 19。

應」將能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sup>21</sup>據此，部分學者認為東南亞國家對北京將避免採取制衡；同時，認為「追隨」、「扈從」或「適應」才是最佳的選擇。然而，這些學者沒有清楚說明在實際案例裡一東南亞國家為什麼在後冷戰時代積極進行軍備現代化，並與美國加強關係甚至是軍事安全面向上的連結，這些行為具備何種意涵？因此，一般將「避險」作為答案。由此可見，存在一個更大的國家對崛起國家進行制衡，小國可以透過聯盟增加己方之權力而毋須透過增加軍備使自己更安全；同時，威脅的來源並非永遠來自單一國家，國家在不同時刻所認定的威脅來源也不一樣，故國家不願立即作出選擇。因此，本文將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納入研究範圍中，觀察美國對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關係有何影響。

再次，「避險」概念的提出並沒有滿足所有研究者求知的欲望，部份研究者更進一步對東南亞國家的避險策略進行細部的劃分，試圖對東南亞個別國家面對華府與北京的態度作更清楚的區隔。例如檀香山東西方研究中心研究員丹尼·羅伊(Denny Roy)將東南亞國家按照制衡到扈從的程度不同而依序排列，第一組有菲律賓與新加坡，第二組有越南、馬來西亞與印尼，第三組有泰國、寮國、柬埔寨與緬甸。<sup>22</sup>但是，馬來西亞國民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助理教授郭清水(Kuik cheng chwee)認為一般對於「避險」一詞的使用過於模糊，因此將國家面對一個崛起

---

<sup>21</sup> David Kang, 2003,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63-189. Jonathan Kirshner, 2003, "States, Markets, and Great Power Relations in the Pacific: Some Realist Expectations,"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273-278. Robert S. Ross, 2006,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p. 356. Denny Roy, 2005,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 2, p. 305.

<sup>22</sup> Denny Roy, 2005,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 2, p. 305.

強國的行為——「制衡」或「扈從」——視為一段光譜（圖 1-1），<sup>23</sup>並研究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對中國大陸崛起之政策，將「避險」作更細微與清晰的劃分，並解釋他們為什麼採取「避險」的策略。然而，他的研究僅分析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避險策略，同時他將「一個中國」視為檢驗的標準，這個標準在「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間可能適用，但是將美國拉進研究範圍裡則變成阻礙。因此，本文以郭清水所建立的光譜為基礎，以一致的觀查標準作為參考，據此用來觀察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地區中的權力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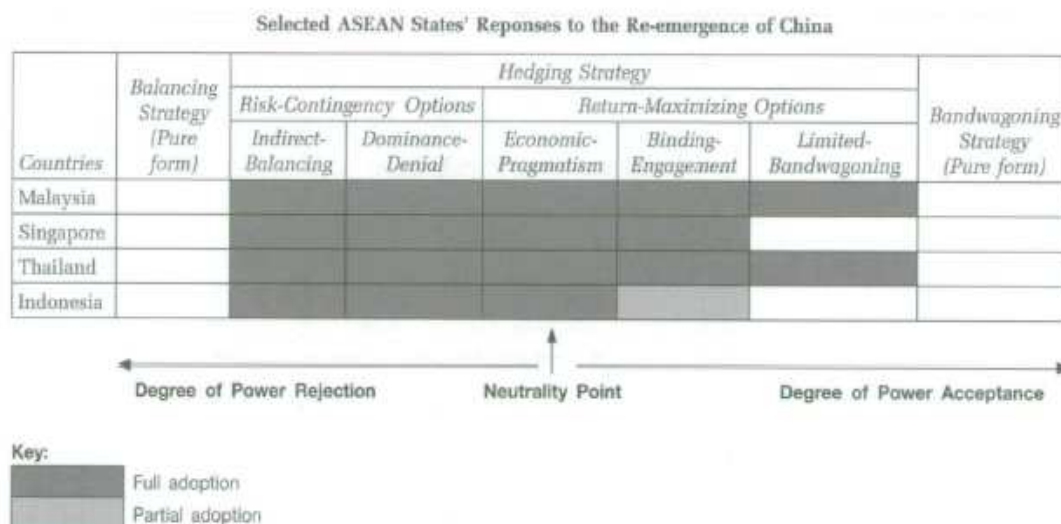


圖 1-1：東協國家回應中國大陸的重新崛起：從制衡到扈從

資料來源：Kuik, cheng chwee, 2008,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2, p. 166.

總而言之，本文認為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地區擁有國家利益目標的前提下，同時存在部分的利益衝突，使得他們積極擴展自己的權力，並希望自己擁有相對於對方較高的權力。同時，

<sup>23</sup> Kuik, cheng chwee, 2008,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2, p.166.



援引郭清水在其文中對於避險行為中制衡與扈從視為一套光譜，透過對美中的相互認知與互動、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互動、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的互動，藉此獲得東南亞國家對美中態度的差異，以及發生動態變化的因素。

##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 壹、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比較研究方法，下文中說明兩研究方法的內容，以及對本文在研究上的影響與貢獻。

####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係透過各種既存的文本、史料、官方文獻等資料，來找出事情的真相或印證對某一事件主觀的看法。而本文也將蒐集研究主題相關的各種重要文獻、書籍、期刊、論文等資料，並做有系統的整理分析，以探求本文欲解釋的答案。

文獻的種類主要可以分成正規紀錄、專題報告、側面報導、統計數據、二手報導、非紀錄性資料、期刊論文、網路資料等，都為分析的素材。本文文獻資料的主要來源為美國與中國大陸官方資訊，包含官方網站所公佈的訊息、政府出版的官方報告、各國領導人與政府閣員談話等，亦包含國內外書籍、中英文期刊與報紙新聞等，作為本文研究的研究基礎。

#### 二、比較研究法

就本文所採用比較研究方法而言，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研究者們紛紛研究其崛起對東亞國際關係造成何種影響，不僅國外研究文獻豐富，國內學術期刊及學術論文亦汗牛充棟。但是，許多文獻將焦點置於中國大陸與東亞國家的關係，並據此探究其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然而，這些文獻囿於各種限制而忽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角色，使其結論的基礎備受質疑。哥倫比亞大學尼古拉斯(Nicholas Khoo)教授與學者麥克·史密斯(Michael L. R. Smith)便撰文批評沈大衛的文章缺乏比較基礎，該文僅就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間冷戰前後的關係做比較；他們認為若能將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對照美國與此區域中各國家關係的發展與變化做一比較將使得文章更具說服力。<sup>24</sup>

另外，以比較方式作觀察，有助於研究者從中觀察一國應對另外兩個國家在態度上是否存在差異，從中瞭解三方的關係。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曾以小布希與胡錦濤先後訪問澳洲為例，觀察澳洲政府對兩國領導人到訪態度的差異：

「布希總統於二〇〇三年十月至澳洲訪問時，在短暫的兩天停留期間，布希總統在議會的演說獲得相當冷淡的回應，而且沒有安排任何記者會。一個星期之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澳洲行卻備受禮遇，他不僅被安排到各地旅遊、親吻嬰兒、簽訂大宗貿易協定，他在議會的演說更獲得如英雄般的歡迎。不知情的人還以為，胡錦濤所代表的國家是澳洲長期的盟友，而布希的國家則是澳洲的威脅。」<sup>25</sup>

---

<sup>24</sup> Nicholas Khoo、Michael L. R. Smith & David Shambaugh, 2005, "China Engages Asia? Caveat Lect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pp. 196-213. 沈大衛的文章詳見 David Shambaugh, 2004/2005,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pp. 64-99.

<sup>25</sup> 陳俐雯譯，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原著(Clyde Prestowitz)，2006，《全球經濟新霸主—30億人正在創造經濟強權新勢力》。台北：商智文化，頁275。

但是，此一研究方式亦存在某些問題，是研究者必須謹慎處理之處。再以普雷斯托維茨的觀察為例，他緊接著談到「澳洲外交部長唐納(Alexander Downer)表示，一旦台海爆發衝突，澳洲是否追隨美國進行協防台灣的任務，澳洲政府將採取極為保留的態度，如同美國出兵攻打伊拉克時，澳洲也採取了同樣的作法。」<sup>26</sup>由此顯示，澳洲在安全層面上對中國大陸的態度便保守許多，所以研究者應避免使用某一層面的結果作為結論；相對地，此一案例亦說明國家行為與國家互動很難以一段話作全面性的說明，這是研究者的重要挑戰。基於上述理由，本文在採用指標上傾向採取「美國與東南亞六國」及「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六國」間存在共同的事件或事實作為觀察指標，避免採用的指標在某一方關係並不存在而造成研究的困境與錯誤的比較。

因此，本文亦採用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Approach)，藉由上述資料的蒐集，首先，比較美國與中國大陸對東南亞政策的演變，藉此觀察雙邊關係的發展；其次，美國與中國大陸雙方在現階段軍事與經濟力量的實力對比；再次，美國與東南亞六國、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六國之間的關係變化；最後，回到理論觀察兩大強權權力基礎的變化與雙方的差異，以及對東南亞地區的發展具備何種意義。

## 貳、研究架構

後冷戰時期裡，儘管安全觀念已經有所轉變，且全球化時代下國家間頻密互動，並未完全改變現實主義所主張的無政府狀態。國家間依然對傳統國家安全感到擔憂，即便安全範圍日趨廣泛，卻沒有減少國家對安全的追求，甚至隨著安全層面的延展，

---

<sup>26</sup> 同上註，頁 275-276。

使得國家必須具備綜合實力來維護與滿足多元的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在此一背景下，筆者認為三者的互動如圖 1-2，美國認為中國大陸的崛起將持續挑戰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國家利益，而中國大陸對美國在冷戰時期所建立的同盟與友邦關係感到威脅，促使雙方在東南亞地區採取制衡與反制衡的外交政策。同時，權力結構的要素亦有異於冷戰時代的發展，由過去強調軍事武力轉而強調國家綜合實力，各國尤其重視經貿發展與互動。因此，本文便觀察在權力結構要素的變動下，美國霸權與崛起中的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地區的互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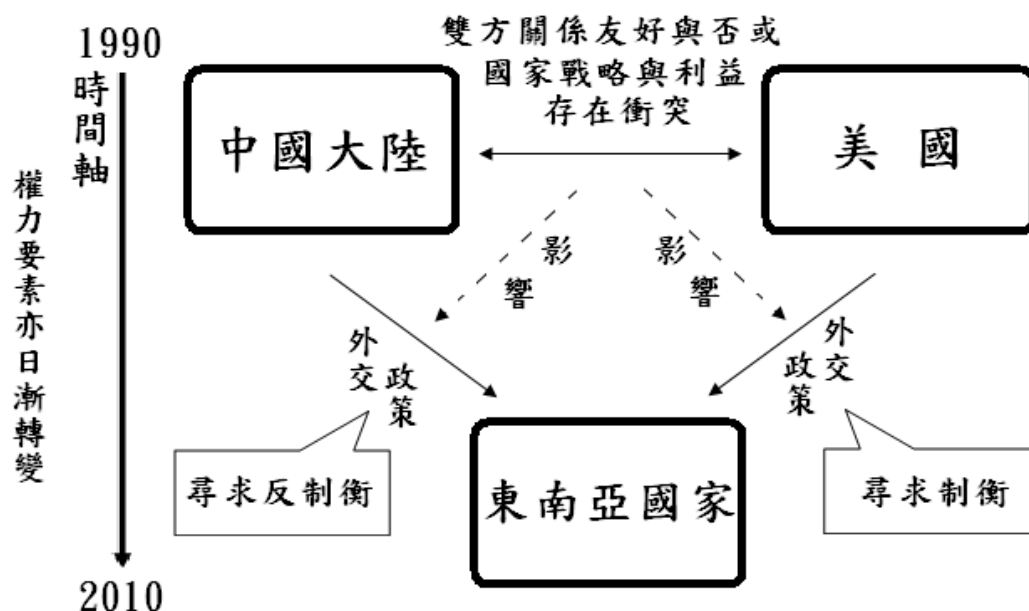


圖 1-2：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 第三節 章節安排

本文的章節安排一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即針對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研究範圍與限制等作一說明。

第二章則透過文獻回顧對目前研究現況作一瞭解，同時吸取前者研究經驗並找出其中的問題，作為本文所要探討問題的基礎，即清楚說明本文將研究什麼？(What)為什麼做這個研究？(Why)以及如何研究？(How)；<sup>27</sup>其次，是本文的理論基礎，對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作探討，一面整理出整個理論框架，又一面拉出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中平時受人忽視的內容，以作為本文理論基礎。

第三章將回顧美國後冷戰初期的亞太政策，從冷戰結束初期，東南亞國家要求美國軍隊退出東南亞地區，直至東南亞國家面臨安全面向上諸多挑戰，東南亞國家希冀美國可以扮演一個穩定該區域秩序的角色。九一一事件爆發後，使美國有藉口再度加強雙邊的軍事交流與軍事演習。但是，小布希政府並未善用此一優勢，由於過度專注於反恐的議題，而忽視東南亞國家所重視的問題，使得該時期美國與東協關係相較於中國大陸與東協的關係呈現不穩定、屈居劣勢的情況。

第四章探討中國大陸在冷戰結束後對美國亞太政策的回應，以及推動哪些政策來化解「中國威脅論」的論調，藉以抹除東南亞國家存在冷戰期間共產黨對各國家企圖顛覆政權記憶；其次，對「中國威脅論」與「中國機會論」作一探討；再次，整理過去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關係之改善與加強的過程。最後，整理出中國與東協雙邊外交關係的拓展過程中，所存在的歧異與未來可能的爭端。

第五章透過蒐集相關數據，首先觀察美國與中國大陸過去二十年來軍事與經濟力量的變化；其次，藉由郭清水對避險研究中

---

<sup>27</sup> 閻學通、孫學峰，2007，《國際關係研究實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43-46。

所界定的範圍與概念，觀察美國與東南亞六國、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六國各方面關係的演進；第三，則是將歐巴馬上台後的東南亞政策作為起始點，他比過去的小布希與柯林頓政府更重視美國參與亞太地區的發展，故本文在末節中亦蒐集資料作一探討，觀察未來三者關係可能的變化與發展。第六章為本文結論。

## 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理論分析

此一章節針對相關文獻作回顧與探討，首先是中國大陸崛起對東亞國際關係的影響作觀察，尤其是美國如何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而此一回應可能攸關未來東亞國際關係的發展。同時，本文回顧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中尋求解釋，並汲取各專家學者的觀點，歸納出強權的權力競爭及其影響作為研究的基礎。

### 第一節 文獻探討

#### 壹、中國大陸崛起及其影響

沈大衛(David Shambaugh)指出亞洲的現況與發展上存在幾個重要特徵，並以此預測亞洲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在特徵上：首先，短期內由美國領導的安全系統將持續在亞洲區域安全中佔據重要位置；第二，由於中國大陸的崛起，使得亞洲各國在外交上必須有所調整；第三，區域秩序的建立端視華府與北京關係發展而定等。根據以上特徵，沈大衛指出未來亞洲秩序的七種可能性：一是霸權系統；二是權力平衡；三是結構的不對稱與不可避免的衝突；四是強權間的相互協調，由三到五個區域強權透過協定與合作主導此區域；五是強權間的共有管轄，由兩個最有權力的國家共同合作以主導區域的穩定與合作；六是階層體系；七是形成區域的集體安全網絡。<sup>28</sup>而本文即觀察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地區的關係與發展。

---

<sup>28</sup> 沈大衛所指出的特徵有五項，由於本文研究範圍之故，所以本文中僅提及上述三項特徵，其他還包含：第四，中日關係呈現經濟熱、政治冷的現象將持續；第五，區域共同體和多邊結構的出現，這些都是建立在共同的規範與價值上。David Shambaugh, 2006, "Asia in Transition: The Evolving Regional Order," *Current History*, Vol. 105, No. 690, pp. 153-159.

未來亞洲是否能持續穩定發展？前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湯瑪斯·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表示東亞的發展存在正向發展(positive-sum perspective)與零合困境(zero-sum perspective)的兩面性；<sup>29</sup>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特約研究員約書亞·科蘭茲克(Joshua Kurlantzick)，亦同樣以東亞地區的兩面性作為研究起點。<sup>30</sup>在樂觀面向上：他們指出許多國家在冷戰期間並未建立外交關係，冷戰後彼此之間相較於以往已經建立更頻密的關係；二方面是中國大陸自冷戰後期，便逐漸放棄過去企圖顛覆此一區域安全的意圖，甚至有意願幫忙調停區域內衝突的問題，以提升周邊國家對它的信賴；重要的是周邊國家中幾位重要的領導人，包含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地(Mahathir Mohamad)與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皆對中國大陸的崛起感到樂觀，而不認為它是一個威脅。

然而，亞洲的發展亦存在悲觀的面向：亞洲國家過去存在的國內問題大多已解決，使得這些國家可以將重心由國家內部問題轉向國家的外部環境，而過去的歷史記憶以及國家之間的矛盾便成為國家之間的不安因素，甚至東亞國家面臨中國大陸崛起過程中，令人驚嘆的不只是經濟成長，還包括軍事預算的增加速度，使東亞地區在邁向整合的路途上步履蹣跚。另一方面，美國加強與日本、澳洲的安全合作關係，甚至尋求將軍事層面的關係延伸到印度、印尼、越南與新加坡等國家，作為美國對中國大陸崛起的回應；在經濟議題上則取代過去鼓勵區域經濟的整合，而是嘗試著開啟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包含新加坡、馬來西亞與泰國。可見在中國大陸崛起的背景下，東亞地區未來是否持續和平

---

<sup>29</sup> Thomas J. Christensen, 2006,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pp. 81-126.

<sup>30</sup> Joshua Kurlantzick, 2010, "The New Schizophrenia Asia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Isolation," *Current History*, Vol. 109, Issue 723, pp. 24-30.



與穩定仍舊充滿變數。

## 一、對未來感到悲觀

東亞地區未來是否持續和平與穩定？米爾斯海默認為體系中並不存在維持現狀的國家，此新興國家除伺機獲取最大利益外，亦朝向區域霸權的目標邁進，使新興崛起強權與現存霸權國家間的衝突無法避免。<sup>31</sup>馬克·畢森在其文章裡指出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東亞地區的霸權競爭和權力轉移已無法避免，文中比較美中兩國在東南亞的區政治、經濟與戰略優勢的轉變，並觀察兩國在東亞地區影響力的強化與弱化作一分析。<sup>32</sup>儘管北京越來越佔優勢，但是他提醒讀者，一國佔據物質力量並不必然使該國成為霸權，他認為美國依舊佔據一些中國大陸所沒有的優勢。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阿隆·佛瑞柏格(Aaron L. Friedberg)認為過去衝突與大戰源頭的歐洲，將是亞洲未來的圖像。一方面是歐洲國家普遍較過去民主，並揚棄狹隘的民族主義；二方面是歐洲國家間的連結性較過去更強，經濟相互依賴可能無法直接創造和平，但可以減少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最後是成本效益的考量，歐洲國家瞭解透過合作所獲得的利益遠大於透過戰爭所取得的利益。<sup>33</sup>由此可見，無論是新自由主義者或是新現實主義者，皆有學者對東亞地區未來發展感到擔憂，並分別提出避免爆發戰爭的處方。然而，基於本文立足現實主義的立場，在此對佛瑞柏格的主張提出批評。東亞地區自冷戰結束至今，儘管經歷數次危機，卻皆安然朝著和平的方向邁進而不是衝突，顯然這與佛瑞柏格的想法不同。由於此篇文章撰於一九九三年，後來東亞地區的發展透

---

<sup>31</sup> John J. Mearsheimer, op. cit., p. 2.

<sup>32</sup> Mark Beeson, 2009, "Hegemonic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pow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No. 1, pp. 95-112.

<sup>33</sup> Aaron L. Friedberg, 1993/94,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pp. 5-33.

過經濟聯結不斷擴大與強化，可能是危機避免擴大成衝突的重要因素。但是，九〇年代中國大陸所涉及的危機裡，以台海危機與南中國海主權問題等諸多爭議為例，卻沒有引發大規模衝突，而當時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各國經濟依賴明顯低於現在，那麼主要原因是什麼？顯然地，由這兩個案例可以看見美國在其中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

## 二、對未來感到樂觀

相較於上述對東亞地區未來感到悲觀的言論，有一派學者主張中國大陸的崛起並不必然帶來衝突，甚至有可能成為東亞地區穩定的關鍵。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教授康燦雄(David Kang)觀察一三〇〇到一九〇〇年東亞地區主要行為者的互動，認為現實主義中權力平衡的觀點並不適用於亞洲。<sup>34</sup>因為，東亞國家與中國大陸享有同樣的中華文化傳統，而且中國制度與影響力的普及，深入到周遭國家的內部，加上各國盼望能分食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利益，故康燦雄主張中國大陸的崛起並不會造成亞洲秩序的混亂。<sup>35</sup>康燦雄在另外一篇文章裡，批評華茲國際政治理論中認為「國家面對強權崛起時，其他國家傾向採取制衡」的主張，他以南韓與越南為例：這兩個國家在歷史上皆曾受到中國的入侵，但是他們現在面對中國大陸時卻沒有採取

---

<sup>34</sup> Stephen M. Walt 指出國家不完全對權力進行平衡，對威脅進行平衡反而更常見，但是，當國家無法透過自身力量或聯盟的支援進行制衡，則國家可能採行扈從。詳見 Stephen M. Walt, 1990,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andall L. Schweller 則是修正 Waltz 與 Walt 對制衡與扈從的定義，同時他指出面對崛起強權的行為選擇包含預防性戰爭、制衡 / 圍堵、扈從、束縛(binding)、交往、推卸責任(distancing/buckpassing)，詳見 Randall L. Schweller, 1999,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p. 7-21 .

<sup>35</sup> David Kang , 2007, "Power, Interest, and Identify in the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00 to 1900," in David Kang ed., *China Rising-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8-49. Randall L. Schweller 認為國家並非完全將安全目標作為聯盟的考量，國家亦存在以利益為動機的行為考量，詳見 Randall L. Schweller,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pp. 72-107.

制衡。另外，與其說他們想從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中獲取利益，倒不如說他們不想去刺激中國大陸，而且選擇制衡的成本過於高昂。<sup>36</sup> 羅伯特·羅斯坦(Robert L. Rothstein)也認為大國之間擁有發動戰爭的能力，因此在軍事武力作為後盾下，它們有能力採取平衡的行為；但是，那些較小的國家由於沒有能力維持龐大的軍事力量，所以它們無法對大國採取平衡的行為。<sup>37</sup> 因此，周遭國家將隨著中國大陸崛起採取扈從(bandwagoning)，此一關係將使東亞地區形成一個階層體系(hierarchy System)，而此一體系的建立亦有助於亞洲秩序趨於穩定。

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教授吳翠玲(Evelyn Goh)較康燦雄更進一步，將美國這個角色納入整個階層體系的架構中。她認為東南亞國家希望維持一個穩定的東亞現況，故現有秩序不應該被劇烈的改變，所以她強調階層制的建構以美國為首，透過經貿的交流與其他外交途徑，將中國大陸引入現有的秩序框架中，讓中國大陸置於美國之後的位置，則秩序即不會有太大變動。<sup>38</sup> 而東南亞各國、美國與中國大陸間的關係，亦不能解釋為東南亞國家和美國聯合起制衡中國大陸，東南亞國家是靜靜地看北京如何應對，所以東南亞國家一面維繫與美國軍事安全層面的聯繫，避免北京以非和平方式破壞現有的安全秩序，以免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受到衝擊。<sup>39</sup>

---

<sup>36</sup> David Kang, 2003,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63-189.

<sup>37</sup> Robert L. Rothstein, 1968,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29.

<sup>38</sup> Evelyn Goh, 2007/08,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 pp. 113-157.

<sup>39</sup> 另外一種主張認為，東南亞國家所採取的政策並不是傳統的軍事的平衡。學者孔源峰(Yuen Foong Khong)在文章中指出東南亞國家對冷戰後諸多不確定因素感到憂心，深怕東南亞的獨立自主受到干預和威脅，儘管各個國家內部對於美國駐軍問題普遍反對，可是周遭存在著潛在的威脅者，為了整體和自身的安全利益考量，東南亞國家傾向和美國站在一邊，因應中國大陸和東協間日益頻繁的經貿交流作為一個平衡點，也避免中國影響到東南亞國家的自主性和安全。因此，他認為東南亞的平衡是一個「軟平衡」關係，因為他們缺乏準同盟與正式的軍事關係。詳見 Yuen Foong Khong, 2004, "Coping with Strategic Uncertainty: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and Soft Balancing in Southeast Asia's

關於中國大陸崛起帶動亞洲朝向階層制發展的可能性，多由賓下武志所著的《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一書作為起始。<sup>40</sup>這本書是探討朝貢體系概念與中國和周遭國家的經濟關係，而它也被許多相關的文章所引用，<sup>41</sup>尤其是大陸學者在談論朝貢體系時，一定談到這本書。賓下武志認為朝貢體系主要是由貢使攜帶貢物來朝覲皇帝，中國並對貢物做出等值的賞賜，這對中國而言是滿足中國天朝觀念的傳統觀念；但是，對周遭國家而言，則是藉由朝貢盼獲得中國官方許可在邊界或沿海做貿易。而買賣價格以中國市場的價格為基礎換算，並且使用中國的紙幣作為交易媒介，這種以中國貨幣做買賣的方式，使中國貨幣廣為流通，形成一個亞洲的貿易體系。但是，賓下武志所探討的時間點為近代的亞洲，時間可以回溯到十五世紀，一直延續到清代，所以書中並沒有討論現在亞洲的現象與觀念。

在大陸的文獻資料裡，也沒有以「階層制」作為未來東亞地區秩序發展的可能性，關於類似的問題與討論，反而多用「朝貢制」進行討論。同時，大陸學者論及的朝貢制是近似於賓下武志所提到的朝貢概念，在朝貢制的時間點上，同樣是設立在近代，所以對於現在或未來亞洲是否存在「朝貢制」，大陸學者是否認的。因為朝貢制是以前中國和周遭國家所建立的關係，過去華尊夷卑、交往的不平等關係、中國賜予貢品等，這種關係在現在是不相符合的，故現在不可能和亞洲國家建立這種關係。更有學者

---

Post-Cold War Strategy,” in J. J. Suh, Peter J. Katzenstein & Allen Carlson eds.,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72-208.

<sup>40</sup> 朱蔭貴、歐陽菲、虞和平等譯，濱下武志著，1999，《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制度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sup>41</sup> 國內文獻包含陳欣之，2007，〈國際體系層級的建構與霸權統治〉，《問題與研究》，第46卷，第2期，頁23-52。陳威之、石之瑜，2009，〈從亞洲認識中國：濱下武志研究「朝貢體系」之研究〉，《政治科學論叢》，第39期，頁55-84。中國大陸文獻包含喻常森，2000，〈試論朝貢制度的演變〉，《南洋問題研究》，第1期，頁數55-65。莊國土，2005，〈略論朝貢制度的虛幻：以古代中國與東南亞的朝貢關係為例〉，第3期（總第123期），頁數1-8。王大虎，2006，〈中國學者對中國古代朝貢體系研究回顧〉，《徐州教育學院學報》，第21卷，第1期，頁66-68。郭良品，2008，〈華夷體系與集體安全體系的比較〉，《哈爾濱學院學報》，第1期，頁數41-44。

直接否認過去的朝貢制，因為朝貢體系是中國人的一廂情願，事實上根本不存在，而是中國過去的諸多心理因素所塑造出四海一家、中國居首的概念<sup>42</sup>。從上述學者的對話發現，就理論層面而言，康燦雄與吳翠玲所提出的看法存在可行性，但是東亞國家是否接受此一看法，以及美國是否願意讓中國大陸在區域或全球層次裡享有更大的權力，而且這種以歷史經驗為基礎並對未來做出相似性預測在大陸則是受到批評與挑戰。

另外一種研究的途徑是強調經濟與貿易的依賴關係，可能促使小國與大國之間建立更緊密的關係為基礎。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教授喬納森·科什納(Jonathan Kirshner)引述亞伯特·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觀察德國在兩次大戰期間，充分利用德國與東南歐的經濟關係為例，由於德國與東南歐國家之間的貿易關係呈現劇烈的不均衡，使得德國對這些國家擁有較高的影響力。<sup>43</sup>簡言之，赫緒曼的核心觀念：國際經濟的關係會影響到國家政策的方向。例如：當一個自由貿易的世界裡面，存在一個大國和一個小國，小國對大國的貿易可能占小國對外貿易的大部分，迫使小國在許多的談判上必須將大部分的資源和力量放在與大國的談判上，使得大國對小國的影響力大為提昇；然而，大國與小國的貿易關係可能只占大國的微小部份，所以大國自然不易受到牽絆，同時可以對小國提出較多的要求以滿足自身的利益。因此，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逐漸提升，其對區域或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亦將持續擴大。

波斯頓大學教授陸伯彬(Robert S. Ross)亦批評現實主義忽視

---

<sup>42</sup> 莊國土，2005，〈略論朝貢制度的虛幻：以古代中國與東南亞的朝貢關係為例〉，第3期（總第123期），頁數1-8。

<sup>43</sup> Jonathan Kirshner, 2003, "States, Markets, and Great Power Relations in the Pacific: Some Realist Expectations,"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273-278.

次級國家和崛起大國間可能存在軍事力量差距懸殊的問題，並認為他們可能採取適應(accommodation)大國的崛起而非平衡。<sup>44</sup>然而，陸伯彬認為如果小國和大國間僅存在貿易上依賴關係，並不足以構成雙方邁向聯盟的條件，亦不足以迫使中等國家適應大國的崛起。<sup>45</sup>除此之外，陸伯彬與上述部分作者存在一個差異是，他認為僅南韓與台灣對北京採取適應，而日本與東協國家則採制衡。

綜觀上述文獻，大部分的學者在觀察中國大陸崛起時，常見的問題是「為什麼東南亞國家未如現實主義所預測對一個大國採取權力平衡？」因而諸多學者一方面針對現實主義提出批評，一方面又提出「搭順風車」或「適應」等概念作為補充。但是，本文認為這些文章忽略了現狀霸權國家如何對崛起國家的回應，同時此一霸權國家對崛起國家的政策又如何牽動對周邊國家的關係？即體系中的次級國家或中小國家在現狀大國與崛起大國間如何選擇？喬治·利斯卡(George Liska)即強調大國與小國間能力落差將對小國欲採用平衡行為產生限制，而在一個地區裡要達到均衡，除非存在其他大國對此一大國進行平衡。<sup>46</sup>因此，本文認為華茲的國際政治理論依舊可以提供解釋與說明；但是，批評者認為無論是美中之間或是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之間，並沒有明顯符合「制衡」行為發生，因而批評華茲的國際政治理論。對此，本者認為下文中柯慶生的看法能夠提供解釋。

## 貳、美國中國大陸雙邊關係如何定位 - 圍堵與反圍堵

---

<sup>44</sup> Robert S. Ross, 2006,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p. 356.

<sup>45</sup> Ibid., p. 366. 另外，參考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抉擇（上）」〉，《問題與研究》，第36卷，第2期，頁1-32。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抉擇（下）」〉，《問題與研究》，第36卷，第3期，頁61-80。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台北：正中。於下文中有更完整討論。

<sup>46</sup> George Liska, 1968,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 27.

「美國是否存在圍堵中國大陸的戰略？」柯慶生回答：「如果以冷戰時期美國圍堵蘇聯的政策與情勢相比，顯然美國沒有圍堵中國大陸，美國只是尋求持續作為一個亞太地區的霸權或是佔有領導地位。」<sup>47</sup>因此，美中之間依舊存在頻繁與密集的來往，而不同於與蘇聯之間幾乎沒有往來的情況。然而，這並代表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崛起沒有感到擔憂，他指出美國對中國大陸在貿易方面設有科技轉移的限制、與歐洲國家合作限制對中國大陸的武器出口、美國持續出售武器給台灣、美國在關島與東亞地區的駐軍以及東南亞國家間每年固定的軍事演練等。另外，根據大陸學者的分析，美國的主要目標是預防任何強權的崛起挑戰美國全球霸權的地位，而中國大陸是未來最有可能成為具備此一能力的國家，使美國將軍隊重新部署到整個亞太地區，並與這些國家提升軍事合作的關係，使其在有必要時可對台海或是南中國海爭端中作出軍事干預。<sup>48</sup>而在南中國海主權問題上，大陸學者認為美國的南中國海政策亦存在三項目標：第一，南海爭端已成為圍堵中國大陸戰略的一部分；第二，華盛頓企圖利用南中國海的爭端離間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間的關係；第三，美國利用南中國海爭端企圖加強它在此區域軍事地位，以維繫美國霸權地位。<sup>49</sup>基於上述因素，上海科學院副院長黃仁偉(Huang Ren wei)認為，美國顯然將軍事圍堵中國大陸的戰略埋藏在整個交往戰略之下。<sup>50</sup>

---

<sup>47</sup> Thomas J. Christensen, op, cit., pp. 108-110.

<sup>48</sup> Li Mingjiang, 2008,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s Balancing Act and New Regional Dynamics,"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Singapore), p. 11.  
<https://dr.ntu.edu.sg/bitstream/handle/10220/5934/rsisc005-08.pdf?sequence=1>.

<sup>49</sup> Ibid., p. 12.

<sup>50</sup> Yang Liqun, "U.S.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in Militarily Containing China: PRC Scholar on U.S.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in Militarily Containing China," *Jiefang Ribao* (Shanghai, internet version), in Chinese, June 28, 2005, FBIS, DOC. Cpp20050714000030. 轉引自 Thomas J. Christensen, 2006,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p. 109.

此外，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AND)東亞國際政治的專家麥艾文(Evan S. Medeiros)也指出中國大陸崛起對美國決策上產生幾個疑問：第一，中國大陸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a revisionist state) 或是一個目標有限的修正主義國家(a limited aims rising state)? 而中國大陸實力逐漸增加後，如果是在現有體系之下尋求滿足自己的利益，而美國本身的容忍程度在哪裡？第二，如果中國大陸現在是一個目標有限的修正主義國家，他在追求自身目標時，將對區域或全球構成何種挑戰？<sup>51</sup>而中國大陸亦對美國感到憂慮：第一，美國鼓勵中國大陸民主化，企圖透過國內的變革達到和平演變的目的；第二，中國大陸進入現有的國際秩序裡，對任何國際制度的參與必然受到美國劇烈的影響；第三，美國與許多亞洲國家建立緊密的關係，作為遏制中國大陸的崛起；第四，美國企圖讓日本重新武裝，明顯針對中國大陸而來。因此，北京的外交政策軸心便是減少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嚇制能力。<sup>52</sup>由於彼此間存在著疑慮，但是為避免步入戰爭的狀態，所以在交往過程中雙方仍對彼此有所防範因而形成「避險」(hedging)。

### 參、美國與中國大陸權力競爭下的東南亞

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曾表示，目前整體環境對中國大陸的成長是有利的，但最大的問題根源是周邊國家的不信任，故北京在外交上必須採取低姿態方式與周邊國家進行交往，避免這些周邊國家將中國大陸視為威脅。<sup>53</sup>面對此一挑戰，大陸外交學院秦亞青教授將中國大陸與鄰國的關係比擬成《格列佛遊記》中的巨人與

---

<sup>51</sup> Evan S. Medeiros, 2005,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 pp. 147-148.

<sup>52</sup> *Ibid.*, p. 154.

<sup>53</sup> George Yeo (楊榮文), Oct. 22.2007, "Can China Emerge Peacefully?" *Straits Times*, [http://www.viet-studies.info/kinhte/can\\_china\\_emerge\\_peacefully.htm](http://www.viet-studies.info/kinhte/can_china_emerge_peacefully.htm).



侏儒，他主張亞洲需要上演同樣的劇碼，「與其等待亞洲的小國主導，中國需要將自己把自己網綁起來，以免讓人猜忌中供有意成為區域惡霸。而東亞整合正是中國用一連串規範與規則自縛的最好方式，這些規則和規範不僅讓中國看起來不那麼具有威脅性，也會減少中國威脅他國的意願。」<sup>54</sup>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學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李明江教授(Li Ming jiang)便認為在南海問題上，北京透過簽署條約或文件公開地、正式地接受責任與承諾，即是向東協展示北京自我設限的最佳範例。<sup>55</sup>

然而，喬治城大學教授羅伯特·沙特(Robert Sutter)對於北京的「格列佛戰略」(Gulliver Strategy)提出美國方面的擔憂。北京透過一連串外交與經濟的倡議使其受到東亞國家普遍的歡迎，並從中顯示中國大陸與美國不同之處，即北京願意透過多邊的管道異於華府重視雙邊管道的差異。而北京格列佛戰略的成功，使得美國在尋找一同合作對中國大陸進行圍堵上產生極大的困難。<sup>56</sup>由此可見，美國力圖在此地區維繫其霸權地位的不均衡狀態；中國大陸企圖降低美國在此地區的影響力以及領導地位，除降低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威脅外，亦將東南亞地區由不均衡轉為均衡狀態。<sup>57</sup>因此，美中任一方之行為必然對另一方造成影響，而此一結果又對彼此未來決策造成影響，可見兩者在東南亞地區呈現競爭的態勢，

面對美中兩國競爭態勢下，東南亞國家又如何看待？丹尼·羅伊(Denny Roy)指出小國或中等國家面對一個潛在區域霸權能採

---

<sup>54</sup> 同註 10，頁 133。

<sup>55</sup> Li Mingjiang, op. cit., p. 14.

<sup>56</sup> Robert Sutter, 2004, "Asia in the Balance: America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 *Current History*, Vol. 103, Issue 674, p. 287.

<sup>57</sup> Ibid., p. 284.

取的回應有制衡、扈從、避險與交往等四種策略。<sup>58</sup>而他將「避險」視為一種低度的制衡，即該國家一面與華盛頓採取同樣的策略制衡北京，又一面努力與北京維持穩定與友好的關係；扈從一方面是指國家站在贏的那一方，而另一方面為利基於未來經濟機會的考量，而康燦雄便據此認為東南亞國家在經濟面向上對北京採取扈從。然而，此一研究存在一些問題，即安全面向上便無法提供合理的解釋；同時，經濟的依賴或是互賴在未來是否擴展到政治或安全層面的合作與依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阿米塔·阿查亞(Amitav Acharya)亦曾表示，經濟合作的行為並不能據此預期雙方在政治上能結盟，即使貿易關係緊密，雙邊亦可能存在政治上的緊張關係；<sup>59</sup>即不能就此斷定新自由主義者的論調或是經濟依賴或互賴是有效的，甚至認為北京在九〇年代的睦鄰外交是善意行為獲得善意回應的驗證。羅伊也認為無論是間接平衡或是避險策略，都得存在一個強而有力的外部國家，以作為小國尋求外部結盟與合作的選項。上述文獻顯示，即使東南亞國家尋求與北京改善外交關係，但是美國在此過程中依舊扮演關鍵性角色。

無論是理論或是國際政治的現實中，美國在東南亞的角色與意義為何？吳玉山教授在《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抉擇》一文能夠給提供一些線索。<sup>60</sup>該文以俄羅斯與前蘇聯共和國的關係作為分析案例，由於俄羅斯與前蘇聯共和國之間存在權力不對等(power asymmetry)和主權衝突(conflicting sovereignty claims)，故這些前蘇聯國家在蘇聯瓦解後如何應對俄羅斯便是研究的問題。文

---

<sup>58</sup> Denny Roy, op. cit., p. 306. 交往是指透過社會化的方式使崛起中或對現狀不滿的國家，接受現有的規則和制度安排。蘭德爾·施韋勒(Randall L. Schweller)則認為回應強國崛起的政策有六種，分別是預防性戰爭、制衡及圍堵、追隨(bandwagoning)、束縛(binding)、交往、推卸責任(distancing or buckpassing)。詳見 Randall L. Schweller, op. cit., pp. 8-17.

<sup>59</sup> Amitav Acharya, 2003/04,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pp. 149-164.

<sup>60</sup> 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抉擇（上）」〉，《問題與研究》，第36卷，第2期，頁1-32。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抉擇（下）」〉，《問題與研究》，第36卷，第3期，頁61-80。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台北：正中。

中以各國的經濟差距、西方的接納程度、宣布獨立的時間與三個次要因素（國力大小與國力強弱、俄裔人口比重、文化差距與歷史仇恨），檢驗從愛沙尼亞到塔吉克等十四個國家對俄政策之間的關聯。研究結果顯示三個次要因素與國家選擇抗衡或扈從沒有絕對關係，<sup>61</sup>而三個影響國家採取抗衡或扈從的重要因素：第一，各國的經濟差距：文中以國內生產毛額（購買力平價指數計算）作為比較基礎，結果顯示位於西北的共和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較高，越向東和向南則發展程度越低。同時，這和各國對莫斯科採取抗衡或是扈從的實際情況相符合。<sup>62</sup>第二，西方的接納程度：越偏西北的國家在傳統上與西方互動較多，而且獨立後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市場體制的程度也越深，也因此越受西方所接納。而此一結果亦顯示西方的接納程度影響這些國家對俄羅斯採取抗衡或扈從的態度。<sup>63</sup>第三，宣布獨立的時間：對於急於想從蘇聯脫離的國家而言，當莫斯科的統治力量逐漸減弱之後，無不儘快宣布獨立；而對於仍想留在蘇聯之內的國家而言，宣布獨立是不得已之舉。在蘇聯瓦解之前便想獨立的國家，在蘇聯面臨瓦解之際立即宣布獨立，則其與俄羅斯的關係在後冷戰時期裡較偏向制衡；而先前未有獨立意圖的國家，將持續與俄羅斯維持緊密的關係。在此一影響因素中，又以各國經濟發展程度與自身經濟需求而影響獨立與否的決定。<sup>64</sup>

---

<sup>61</sup> 一、國力大小與國力強弱方面，他以人口總額與生產毛額為基礎，在各個歐亞新興國家當中，不僅大國未必抗衡俄羅斯，小國也未必扈從俄羅斯；二、俄裔人口比重方面，吳玉山教授認為過去便有許多俄羅斯人移居到這些周邊國家，站在莫斯科的立場，對於這些俄羅斯人的命運自然非常關心，所以俄裔人口比重越大，越可能和莫斯科之間的關係越趨緊張，但是結果卻顯示俄裔人口的比重與各國對俄政策沒有絕對的關聯；三、文化差距與歷史仇恨方面，原先假設一個和俄國文化差異極大，而在力使上又飽受俄國欺凌的國家會在獨立之後對俄羅斯採取抗衡的政策；而一個和俄羅斯同文同種，且彼此在力使尚無深仇大恨的新興國家則較有可能和莫斯科和睦相處，或採取扈從的態度。但是，此一假設在這些國家裡依舊沒有得到與假設一致的結果。詳見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抉擇（上）」〉，《問題與研究》，第36卷，第2期，頁1-32。

<sup>62</sup> 同上註，頁8-10。

<sup>63</sup> 同上註，頁10-12。

<sup>64</sup> 同上註，頁12-16。

另外，吳玉山教授特別指出「經濟發展程度」與「經濟依賴」的差別，前蘇聯共和國在獨立後仍舊在經濟依賴俄羅斯的國家中，他們面對俄羅斯採取抗衡或扈從的政策間為負相關。當然，經濟依賴可以被俄羅斯或任何大國當作籌碼來迫使小國就範，而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關係中可以看到此一工具被發揮到極致。盛產石油的亞塞拜然與盛產天然氣的土庫曼是能源輸出國，而波羅的海三國的能源則完全依賴俄羅斯供應；然而，前者採扈從、後者採抗衡的政策，顯然結果與預測呈顯分歧。對那些經濟發展程度高的國家而言，由於生產技術和產業組織都較為成熟，本國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也較強，因此轉移貿易夥伴以減少依賴的能力也較大。<sup>65</sup>同時，他還指出歐美國家的支持對這些國家對俄羅斯採取抗衡佔據了重要的因素。當然，俄羅斯與周邊新興國家的關係模式並不能完全適用到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上，如他們雙方沒有國家主權的要求，但是他的研究依舊本文提供啟發，包含經濟依賴程度或經濟差距、美國的接納程度及是否支持東南亞國家等。因此，對照上一段文獻，經濟依賴是否擴散至政治或安全層面的依賴，其實並不具備充分的關係。

郭清水的文章在第一章已提過，此處針對「避險」(圖 1-1)做清楚的說明。首先，他指出小國對大國採取避險主要存在三個因素，包含缺乏立即性的威脅、缺乏以意識形態為聯盟的考量、缺乏大國間激烈的競爭關係(要求小國必須立即選邊站)。<sup>66</sup>其次，針對避險中各項指標意義作以下說明：經濟層面的考量(economic-pragmatism)：各國透過直接貿易、直接投資與北京建立緊密的經貿關係，即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但是，雙邊可能存在一些政治上的歧見。束縛與交往(binding- engagement)：束縛是指透過建

<sup>65</sup> 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抉擇（下）」〉，《問題與研究》，第36卷，第3期，頁77-78。

<sup>66</sup> Kuik Cheng-Chwee, op, cit., p. 165.

立正式的制度，使雙邊關係建立在一個有束縛力的基礎上；交往是企圖與北京建立一個溝通的管道，以影響北京的政策選擇。有限度的扈從(limited- bandwagoning)：扈從(pure- bandwagoning)又與有限的扈從存在差異：第一，如果兩者的關係為扈從，則兩者間一定存在某一形式的政治或軍事結盟，然而有限制的扈從則是指雙邊可能僅是政治夥伴的關係，例如：對某些特定議題採取相互的政策協調；第二，扈從指大國雙方關係為零和遊戲，即小國對一國採扈從則對另一方為疏遠，有限的扈從則是小國對崛起大國採取交往，同時維持與現存霸權的關係；第三，扈從是指接受超強的支配和安全上的守護，而有限的扈從則是指國家保持自身的自主性。拒絕受支配(dominance- denial)：具體策略為促使其他強權涉入此地區的事務，同時加強自身與其他強權的連結，以對崛起國家的關係保持彈性。此一策略又與制衡(pure- balance)存在差異，前者主要是平衡政治上的力量，後者則是平衡軍事上的力量。間接的平衡(indirect- balacing)：主要策略是加強自身軍事武力，同時與其他國家共同促進安全防禦的合作。本文運用避險策略中，經濟層面的考量、有限度的扈從、間接的平衡三項指標作為本文的指標，觀察美國、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六國的關係演變過程。

## 第二節 理論分析

本文採用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為理論分析基礎，透過摩根索、華爾滋與吉爾平等著作，理出強權的權力競爭及其影響的因素，作為觀察美中在東南亞地區權力的競爭與發展提供解釋。本文在理論部份集中於學者觀點異同之分析，待下文各章節針對現勢的發展作詳細討論後，於本文結論再將理論與本文所研究的內容作綜合討論。

## 壹、現實主義

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 1904-1980)對權力政治的系統性闡述使權力政治理論成為現實主義的代名詞，權力政治的核心內容是現實主義的六大原則：第一，政治受到植根於人性的客觀法則的支配；第二，用權力界定利益是現實主義研究國際政治的主要標誌；第三，被界定為權力的利益這一關鍵概念是普遍適用的客觀範疇，但並不是永恆不變的；第四，政治即追求權力，採取成功與有效政策的本身才是國家生存的道德原則；第五，政治現實主義否認存在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道德原則；第六，權力政治的範圍是獨立於其他人類的活動領域之外。<sup>67</sup>

而根據摩根索列出的六大原則，現實主義(Realism)一般具備以下的核心內容：一、國家是國際體系中主要的行為體；二、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的權力鬥爭，使衝突成為國際政治的本質，而國家要依靠實力來確保生存；三、各國擁有合法主權，但因實力的大小不同而有強國和弱國之分；四是國家是統一的行為體，對外政策獨立於國內政治；五、國家是根據國家利益進行決策的理性行為體；六、權力是解釋和預測國家行為的最重要概念。

另外，《國家間政治：權力的追求與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一書裡，亦羅列出衡量國家權力的要素，包含：<sup>68</sup>地裡因素、自然資源、工業能力、軍事準備、人口、民族性格、國民士氣、外交質量與政府質量等觀察指標。<sup>69</sup>關於權力的要素其實學者們的主張存在許多分歧，筆者亦

---

<sup>67</sup> Hans J. Morgenthau, 1967,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pp. 4-14.

<sup>68</sup> Ibid., pp. 106-139(Chapter 9).

<sup>69</sup> Robert Gilpin,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1. 這在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書裡，借用經濟學中無異曲線與邊際替代率的概念作說明。

觀察到隨著時間的更迭，國家的權力要素可能有所轉變。如過去強調船堅砲利等硬權力，如今更強調軟權力的重要性。筆者對於美國與中國大陸雙方權力的要素與觀察僅集中於七個項目作分析，詳細內容留待第五章一併討論。

除此之外，摩根索在談到權力平衡的模式中，對本文有所助益的地方分別是他對「直接對抗模式」與「競爭模式」的區別。在直接對抗模式裡，A 國可能對 B 國採行帝國主義政策，B 國對此可採現狀政策或針對 A 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回應；而競爭模式則是指，A 國也可能對 C 國採行帝國主義政策，C 國可採對抗亦可接受此一政策。然而，一旦 B 國反對 A 國的政策，B 國將採取行動使 C 國維持現狀或由 B 對 C 國採取帝國主義政策。一旦 A 國與 B 國的競爭形成均勢，則使 C 國維持獨立的地位。小國的獨立地位總是依靠權力均衡，或者依賴於某強國的保護。<sup>70</sup>筆者認為摩根索書中競爭模式有助於本文的分析，即美中在東南亞地區的競爭關係，尤其是這段論述亦隱含另一項研究的旨趣與意義，便是弱小國家在兩強下又將採取哪些外交政策的選項？筆者認為正是此一模式，使小國可能擺脫制衡或扈從二分法的政策選擇。

## 貳、新現實主義

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 或稱結構現實主義 (Structure Realism)，代表人物有肯尼思·華茲 (Kenneth N. Waltz) 與羅伯特·

---

在資源條件一定時，假設國家針對軍事與經濟目標作平衡和選擇，每當取較多的資源發展經濟時，則軍事目標必然減少，反之亦然。此外，吉爾平藉此一概念作為分析進而歸納出以下結論：第一，每個國家無異曲線的斜率皆不同，端視國內統治者的特殊利益與國際環境（這裡提到地緣因素，當領土相接壤時則國家重視安全目標，當國家是島國而沒有領土接壤的國家則重視經濟利益。）；第二，每個國家無異曲線斜率的變化，可能因為國際或國內的變化而移動；第三，每個國家所選擇的無異曲線皆不同，代表著國家能力的差異。

<sup>70</sup> Hans J. Morgenthau, op. cit., p.75. 翁明賢，2003，《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台北：創世文化事業出版社，頁 65-68。

吉爾平(Robert Gilpin)等人，他們由國際體系與國際結構來觀察國家行為，並認為主權國家是國際體系最重要的組成要素，而國際結構為一無政府的狀態，國家在此一狀態下將安全視為最重要的追求目標。華茲的國際結構由三個層次組成：一是單元（國家）的組織和排列秩序：國家內部的社會是層級節制的，而國際社會則是一個無政府狀態；二是各單元間的功能及其差異：研究各國政府的學者關切的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型態究竟是總統制或內閣制，而國際政治學者關切的是一個國際政治系統中到底有幾個主要國家，以及構成員之間的權力分配狀況對國際權力結構的影響<sup>71</sup>；三是單元間的能力分配：即國際體權力結構，是兩極體系還是多極格局。華茲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國際政治系統是一個自助的系統，國家的政策至少要能維持自身的生存，最好是能主宰整個世界。為達上述目標，國家可以動員的資源來自於兩方面：一種是國內資源，增加國內資源方法大致有發展經濟、擴張軍力和採取適當策略幾種；另一種是國外資源，增加國外資源的方法則包括增加盟邦的數量、加強同盟的實力或削弱敵對同盟實力等等。<sup>72</sup>

由上述整理可以看出新現實主義與現實主義間存在部分差異：第一，摩根索認為行為者追求權力的本質來自於人性，他認為國際政治同人們之間的行為一樣，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當每個行為者都採取此一行動時，便陷入一個相互競爭的循環中；然而，華茲認為國家處於一個無政府狀態中，使行為者對自身的安全感到擔憂，而正是此一憂慮促使國家採取自保的行為，或者透過外部方式以保障自身的安全。第二，摩根索認為行為者追求權力的主要誘因來自於：戰爭的勝利所能獲得的可觀利益、

---

<sup>71</sup> 胡祖慶，1989，《國際政治理論解析》。台北：五南，頁122。

<sup>72</sup> 同上註，頁149。



對戰爭失敗的恐懼、虛弱國家或地區引起其他國家控制的權力欲望。因此，追求權力除滿足自身利益外，亦可保障自身的安全，因此國家必須將追求權力視為第一要務；華茲則認為國家並不總是追求權力，國家的最大利益應該將安全目標置於最重要的位置，而權力只是一個幫助獲致安全保障的手段。第三，在國家行為制約因素上，摩根索認為權力平衡是決策者以及專業的外交官透過精心設計與操控，使得體系維持一個均衡狀態，如果他們沒有對一個權力進行制衡，則體系均衡即被打破；但是，華茲認為權力平衡的動力源自於國際體系與結構所造成，國家自然而然對一個權力進行平衡。

摩根索和華茲兩者共同的特點包含：行為者均為主權國家、國家處於無政府狀態之下、權力與安全是國際政治中最重要議題。據此，兩者認為權力平衡將是常態，而吉爾平則將此歸類為國際政治變革中的系統性變革。對於國際政治的變革，他認為有下三種類型：<sup>73</sup>第一，體系的轉變(systems change)：體系的變革最重要是指國際體系本身的特徵發生變化，即構成體系結構成員的性質發生轉變。歷史從遠古發展至今，就是由部落發展到國家的過程，甚至是新自由主義者所謂的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然而，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儘管受到其他行為者的挑戰，但是仍舊無法超過國家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因此國家依舊是最重要的行為者；第二，系統性轉變(systemic change)：指體系內佔據支配地位國家的變遷過程，即華茲理論中關於國家能力分配的變化。如同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探討國家興衰過程與變化，亦是摩根索對於權力均衡被打破與重新建立的過程，皆屬於此一類型；第三，互動的轉變(interaction change)：羅斯克蘭斯的《世界政治中的作用與反作用》一書中，

---

<sup>73</sup> Robert Gilpin, op, cit., pp. 39-43.

分析一七四〇年以來歐洲外交變化的原因，其中包含許多聯盟的形成和政權的變革，尤其跨國關係也被他們置於系統內部的互動層次上。而本文探討問題的主軸同樣圍繞在系統性變革的基礎上。

吉爾平一般被認為是新現實主義者，甚至將他列入進攻現實主義等派別中。他在《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一書，涵蓋摩根索現實主義與華茲國際政治理論的許多概念，同時也對許多地方做修正。首先是吉爾平本書立論的五大假定(assumption)：第一，如果體系中沒有國家相信改變國際體系是有利可圖時，體系將是穩定的；第二，如果國家改變體系的預期利益大於預期成本時，該國家將改變這個體系；第三，該國家將透過領土、政治和經濟擴張的方法來謀求國際體系的轉變；第四，一旦國家為進一步改變體系或擴張所付出的成本和所得到的利益之間達到平衡後，接下來維持現狀的經濟成本增加的速度將遠超過支撐現狀經濟能力的增加速度；<sup>74</sup>第五，如果國際體系中失衡的狀況沒有獲得解決，則體系將發生變革。<sup>75</sup>據此，吉爾平對華茲的國際政治理論提出以下三點批評：第一，華茲認為當一國崛起時，其他國家一定會對該國家進行權力平衡，然而歷史上卻存在著許多採取扈從的案例；第二，華茲認為兩極體系比多極體系穩固，但是的吉爾平的看法卻相反，他認為多極體系中有多個行為者可以對其中一個擁有較多權力的國家進行平衡，因此多極體系較兩極體系穩定；第三，任何體系中最大的挑戰來自於新興強權的崛起對體系穩定的威脅。

吉爾平認為權力並非華茲所描繪的是一個靜態的分配，國家

---

<sup>74</sup> 吉爾平引用經濟理論中最適規模定理。隨著國家的擴張，邊際收益將越來越低，甚至成本可能漸漸高過收益，使得國家遭遇到內部的離心力量與分裂，因此在最適規模的假設下，國家不可能過度擴張，即使過度擴張也將遭受到這個反作用力的干擾。

<sup>75</sup> Robert Gilpin, op, cit., Chapter 2-5.

間權力分配是一個動態的平衡。由於國家間存在著力量成長的差異與距離，使某些國家企圖改變這個體系，以牟取更大的自身利益。<sup>76</sup>隨著國家實力的增加，這個國家將受到誘惑而產生加強對周邊環境進行控制的企圖。但是，吾人並不能據此論斷吉爾平所接受的是摩根索的現實主義—追求權力是最重要的動力來源；在吉爾平對華茲的第三點批評中，可以看見無政府狀態依舊扮演重要的角色，即國家只有在安全獲得滿足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拓展權力。另外，吉爾平在文中亦提及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政策的意義：第一，相互依賴的決策；第二，一國家的外部行為者對其他國家產生應想。同時，他認為難以預料國家之間行為互動的結果，即無法得知國家意圖的情況下，國家必須盡可能地保留廣泛的抉擇和取捨餘地。<sup>77</sup>

根據上述，新興強權隨著實力的增加將尋求改變現狀，以改變勢力範圍的劃分。當支配國（現狀霸權國家）受到新興大國的挑戰時，支配國家該怎麼辦？第一種選項，消除增加成本的原因—削弱或摧毀新興的挑戰者，吉爾平認為當衰落國家還擁有軍事優勢時，它將對新興國家發動防禦性戰爭來消滅挑戰者；第二種選項，是尋求更大的擴張以減少成本的負擔；最後的選項是減少國際義務的負擔，為保持現有支配地位的成本與資源之間的平衡，這個支配國將透過政治、領土或經濟上的收縮，以減少維持國際地位的成本。在最後的選項裡，還可以延伸出三個選擇：支配國家片面放棄支配國的地位；與威脅較少的國家結盟或尋求和睦關係；最後是對新興國家退讓並對其野心進行綏靖。<sup>78</sup>但是，支配國家很少主動對新興國家採行退讓的選項，然而一旦支配國家遭遇到非自願性的力量收縮時，將意味著聲望和與外交實力的削

---

<sup>76</sup> Ibid., p. 93.

<sup>77</sup> Ibid., p. 87.

<sup>78</sup> Ibid., pp. 186-194.

弱。在此一情況下，原支配國的盟國將加入勝利的一方，使對手優勢更加顯著。<sup>79</sup>

批評者認為新現實主義對於東亞國際政治現勢沒能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但是由上述文獻來看，摩根索與華爾滋的主張中存有許多過往研究忽視之處，尤其是吉爾平的理論中，存在許多前提假設與國家行為類型的分析，提供吾人觀察與研究的視角。本文便以上述理論為基礎，觀察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地區權力競爭。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壹、研究範圍

首先，必須針對「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作一釐清。第二次世界大戰剛落幕，美國原計畫期待國民黨政府成為中國大陸的合法代表，但卻因國共內戰爆發後由共產黨取得優勢，美國政府一面推卸丟掉中國大陸的責任，又一面尋求與共產黨接觸。然而，雙方關係卻因艾奇遜擔心遭受美國國內的批評而躊躇不前。隨後，因韓戰爆發美國對華政策由宣告塵埃落定，轉為支持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但是，美國為面對蘇聯此一頭號敵人，加上美國發現中國共產黨與蘇聯間存在許多矛盾與衝突，故尋求與中國共產黨恢復外交關係。美國此一舉動，影響我國在聯合國代表權的席位，我國於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中，在會議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進行表決前，便先行宣佈推出聯合國。美國與中國大陸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發佈建交公報，同意隔年(1979)一月一

---

<sup>79</sup> Ibid., pp. 194-195.

日起雙互相互承認並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因此，本文探討時間為後冷戰時期，文中所謂「中國」即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次，本文選定東南亞地區為本文探討之地域，而東南亞國家主要是目前的東南亞國協成員國，此一組織建立於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當時創始會員國包含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與泰國，除汶萊為一九八四年加入外，其他國家皆是冷戰結束之後才加入此一組織。然而，囿於範圍廣泛，所以在實際觀察國家裡，以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與越南作為研究對象，其他國家僅針對議題在必要時進行討論。

再次，自二戰結束以來，此地區的發展一直無法脫離大國政治的陰影，冷戰時期東南亞地區面臨中國大陸共產主義的顛覆行動，以及一個受到蘇聯支持的越南擴張主義，使得泰國、印尼、新加坡、菲律賓與馬來西亞等國皆與美國建立緊密的關係。然而，冷戰結束後蘇聯的瓦解以及它從越南金蘭灣的撤退，並沒有就此減輕東南亞國家對於「安全」面向上的擔憂，一方面是後冷戰時期強調的國家安全層面更加廣闊，二方面是面臨中國大陸崛起取代蘇聯成為東南亞地區重要行為者，以及美國在此區域軍事力量的持續存在，使得東南亞地區無論是經濟或安全的發展，始終脫離不了美國、中國大陸的關係。故本文僅就美國對東南亞六國、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六國之政策與成果作探討與研究。

同時，本文並非認為涉及東南亞地區事務的大國僅上述兩國家，其他亦包含日本、俄羅斯、印度與澳洲等，但是這些行為者中美國目前將中國大陸視為主要的潛在的挑戰者，而北京亦尋求建立一個排除美國參與的地區經濟與安全架構；另一方面，在現實主義中將地區強權國家的崛起是對霸權國家的挑戰，因此兩國

追求權力的欲望與過程即構成競爭的關係。

最後，在時間的選擇上主要是貫穿整個後冷戰時期，即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九年止，探討此一時間裡三者的關係甚至是未來可能發展。

## 貳、研究限制

儘管存在以上諸多考量，但是本文依然存在許多研究限制：第一，就研究範圍而言，對象僅有東南亞六個國家，而未將所有東南亞國家皆列入考量；第二，本文亦未觀察其他亞太大國與此地區的互動與外交政策，此舉可能模糊本文部份的研究成果，如本文觀察東南亞六國軍事層面中的新加坡為例，該國軍事安全層面的需求與危機感可能來自於周邊國家的威脅而非來自於中國大陸，但是在本文研究國家的選定與範圍上，使結果未考慮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第三，就研究指標而言，包含美中之間的實力對比，以及「美國與東南亞六國」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六國」關係比較上，其實依然存在許多可作為研究的指標，包含本文第二章摩根索在書中提到的觀察指標，但是這些指標並沒有數據可以參考。因此，本文僅就過去這十年來各方所關注的焦點作為指標，包含本文付梓之際，國際貨幣基金根據購買力平價指標觀察美中兩國數據後，首度提出中國大陸在二〇一六年全國購買力指數佔世界比重將超越美國，而本文在第五章中便已蒐集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九年此一指標數據的變化以及意義。第四，本文存在將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混為一談的疑慮，故筆者必須強調本文的目的在於引出強權的權力競爭及其影響，而未針對彼此間的差異進行探討。

### 第三章 冷戰後美國與東南亞六國關係之變遷與挑戰

蘇聯瓦解最重要的意義乃是國際安全環境的劇變，然此一轉變對亞太國家所處的環境而言，並沒有完全排除軍事安全的威脅，反而是危機四伏：一方面對美國撤軍計畫產生安全疑慮；二方面對中國大陸重新崛起以及日本可能重新武裝等而感到擔憂。同時，國家安全的範圍已由過去傳統軍事安全拓展到非軍事安全，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經濟安全普遍受到重視，在涉及外部環境的經濟安全議題中，包含領土與資源等有形物質的分配，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影響可能致使國家間陷入緊張的狀態甚至是戰爭，這不僅危及當事國的安全還對其周遭各國的安全造成影響；而在涉及內部環境的經濟安全議題中，則包含經濟發展遲緩、分配不均、新殖民主義等，造成社會失序與政治不穩定，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影響包含缺乏凝聚力與政權合法性受到威脅等，可能導致國內產生分離主義運動，甚至國家內部陷入武裝衝突等。<sup>80</sup>因此，冷戰結束並沒有使亞太國家在安全層面上獲得改善，反而使他們對安全需求更加迫切，也使得亞太地區安全或經濟事務的整合受到阻礙。

對美國而言，它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逐漸加深，但此一關係乃建立於不平衡的貿易關係上，使得美國在積極加強貿易關係時，又一面要求東南亞國家開放國內市場、加強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等，期望藉此改善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但是，無論是經濟或是安全方面的整合，東南亞國家更期待以東協作為發展亞太經濟合作與安全合作的基礎；然而，這與美國的目標大相逕庭，九〇

<sup>80</sup> 李瓊莉，1999，〈經濟安全概念在亞太地區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2期，頁42。

年代期間雙方常因民主、人權與經濟開放等議題產生摩擦，加上亞洲金融風暴美國亦未及時提供援助，使得東南亞國家對美國感到失望。但是，即便東南亞國家對美國推行的政策感到不滿，美國依然是此區域最具影響力的國家；直至北京積極參與和合作的背景下，無論是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或是東協等組織，皆使美國擔心失去領導地位與優是而逐漸改善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因此，本章節透過政府政策、政要官員談話內容及諸多學者整理的文獻，觀察冷戰後美國亞太政策的變化與發展，以及美國與中國大陸、東南亞國家自冷戰結束以來關係變動過程，並觀察美國與東南亞國家間未來的可能挑戰。

## 第一節 美國布希政府的亞太政策

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總統上任一個多月便因參加日本天皇葬禮而出訪亞洲，由布希總統訪問亞洲時的談話來看，可以窺見美國當局對亞太地區所關注的議題集中在：如何順利結束柬埔寨戰爭，並防止赤柬再起；如何保持朝鮮半島的平靜及促使雙方和解；如何使台峽兩岸在穩定及有秩序的步調下，和平解決其相互爭執；如何使中蘇共重新正常化黨政關係，不致危害及威脅到美國及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sup>81</sup>其它還包含：一、亞太地區的經濟成長快速，同時也是美國對外貿易中最重要地區，但雙方存在巨額的貿易逆差，所以美國將一面加強雙邊的經貿關係，並改善貿易逆差的問題；二、在經濟上與美關係最緊密的日本，及在政治上美國最關注的中國大陸皆位於亞太地區，一旦兩地情勢發生變化，將對美國產生直接影響。從上述談話可以觀察到儘管當時美國面臨國內經濟的考驗，以及冷戰後軍事安全戰略佈置

---

<sup>81</sup> 聯合知識庫，1989.03.08，〈美新任亞太助卿及其歷史性任務〉，<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的調整，但是這些安全上的疑慮使美國將持續關注亞太地區情勢之發展，並積極參與此地區軍事安全與經濟雙面向的合作。故下文將探討美國冷戰後各政府重要的亞太政策，以及美國與中國大陸、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係變化。

## 壹、布希政府在亞洲太平洋區域的戰略架構

美國國防部於一九九〇年與一九九二年公佈的兩份「亞太地區戰略架構」(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Pacific Rim)報告，是布希政府中亞太戰略裡的重要報告。一九九〇年四月第一次發表「亞洲太平洋區域戰略架構：展望二十一世紀」的報告中，表示美國將大幅刪減國防預算以減輕經濟的負擔，並預計分十年三階段裁減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十三萬五千名駐軍。<sup>82</sup>然而，此份以撤軍為目標的報告並沒有明確表示裁減軍隊數目的目標，顯示美國依然對亞太地區的安全存有疑慮，即便蘇聯已經瓦解，但是它在東北亞地區依然存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且亞太國家軍事武器的需求亦未隨著冷戰結束而畫下休止符，此地區甚至成為各國軍火商的重要市場。

因此，布希政府一面減輕國防負擔，但是在報告中又引入「權力真空」(security vacuum)與誠實的中間人(honest broker)的訴求，表達美國仍有意在亞太地區扮演維護秩序與和平的角色。<sup>83</sup>當時的國防部長錢尼(Richard Bruce Cheney)在日本全國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說時，表示「美國無意減弱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而美國考慮裁減亞太駐軍的行動，絕非美國自亞洲『撤退的第一步』」。<sup>84</sup>

<sup>82</sup> 周煦，1999，《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生智出版社，頁45。

<sup>83</sup> 李文志，1997，《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從扇形戰略到新太平洋共同體》。台北：憬藝出版，頁55。

<sup>84</sup> 聯合知識庫，1990.02.24，〈美國國防部長首度公開證實 考慮裁減駐亞太 12000 名美軍〉，<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同時，「如果我們撤出部署在亞太地區的前置武力，必將造成真空，導致一連串的地區性武器競賽，使緊張情勢升高，甚至可能引發衝突。」<sup>85</sup>當時美國國防部對國會所提出的報告中指出：「儘管亞太地區面臨的軍事威脅已減低，但是亞洲的『大國』—蘇聯與中國大陸均面臨艱難的轉型期；柬埔寨和菲律賓面臨國內的動盪與不安；<sup>86</sup>北韓仍然是國際間最危險、最魯莽的一個角色」，使美國必須顧慮未來十年亞太地區可能發生的不穩定。<sup>87</sup>由此可見，美國瞭解到一旦貿然裁撤所有駐軍將引發危機，且對美國自身的安全造成負面的影響，故布希政府在此一考量與國內經濟壓力下，採取階段性撤軍的計畫。

一九九二年美國國防部公佈布希政府第兩份「亞太地區戰略架構」(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Pacific Rim)報告，繼一九九〇年報告中所提及的裁軍問題，到了一九九二年七月的第二份戰略報告中，顯示出美國減緩裁軍的速度。該文指出：「美國應與亞太國家持續交往；維持冷戰時期的雙邊安全體系；在盟邦維持前置部署軍事力量；亞洲盟邦對自身安全應負更大責任；建立互補的防禦合作等。」<sup>88</sup>據此，有效維繫太平洋、印度洋、東海與南中國海貿易航線的暢通，以確保亞太地區之繁榮，才能使美國本土以及亞太盟邦的安全將獲得保障。國內學者李文志就貝克所提出的亞太戰略以及此份戰略報告，他認為從地緣戰略的角度

---

<sup>85</sup> 同上註。

<sup>86</sup> 柬埔寨原為法國殖民地，柬埔寨於一九五三年獨立。柬埔寨獨立後，由國王希哈努克任國家元首，在一九七〇時遭到美國所支持的龍諾奪取政權；但是，龍諾政權又於一九七五年遭到支持共產主義的波布所推翻。波布取得政權後（其組織亦稱為「紅色高棉」或「赤柬」），與中國大陸加強關係，並在國內進行共產主義政策，據聯合國調查顯示，其統治期間超過百萬人在此過程中喪命；在外交關係上，由於波布與中國大陸關係友好，使得與蘇聯關係較為親近的越南大為不滿，並於一九七九年一月進攻柬埔寨，扶植一個親越南的橫山林政權。直至蘇聯瓦解，使得越南由柬埔寨撤軍，並預計在一九九三年進行全國大選；但是，各派勢力仍舊明爭暗鬥，內戰與武裝政變頻傳，使得柬埔寨在冷戰結束後以及一九九〇年代裡，國內依然動盪不安。詳見蕭志強，2005，《從地圖看世界紛爭》。台北：世潮出版，頁148-151。

<sup>87</sup> 王景弘，1990-04-21，〈美國防部報告 軍事威脅減低 政治動盪不安 美將削減在亞太兵力〉，《聯合報》，03版。

<sup>88</sup> 同註82。

來看，美國顯然已將中國大陸等社會主義國家設為假想敵。<sup>89</sup>

另一方面，當時在預算（圖 3-1）和外貿雙赤字（附錄一）的壓力下，美國可能降低其協防盟國的承諾，或要求盟國擔負較高的地區防衛成本，而引起美國亞洲盟國的關切。但是，美國政府還是透過其他方式表達美國對亞太地區的重視與關注，如布希政府便曾要求國會，將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分別自一九八九會計年度水準增列 48% 和 26%，其中包含要求國會撥款四億五千八百萬美元予菲律賓，以確保美國在菲律賓的兩個軍事基地，<sup>90</sup> 期望藉此提升美國在該地區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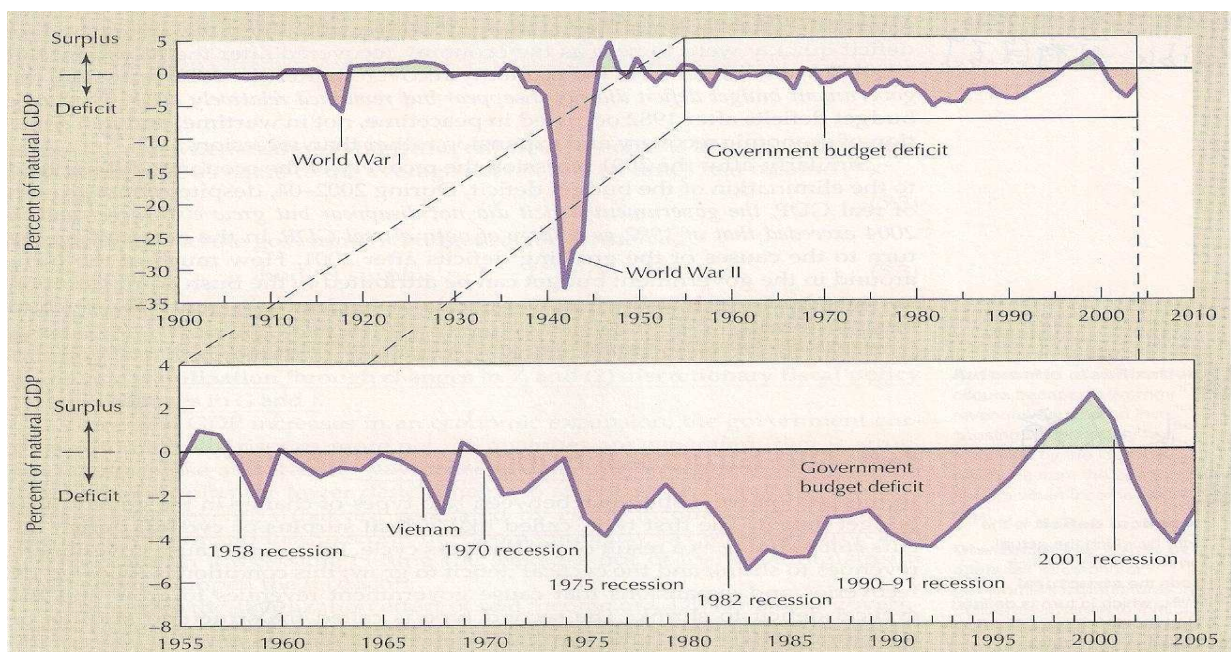


圖 3-1：美國政府預算赤字佔 GDP 比重概況圖

資料來源：Robert J. Gordon, 2006, *Macroeconomics*(Tenth Edition), Boston: Pearson Education, p. 133.

<sup>89</sup> 同註 83，頁 61。

<sup>90</sup> 聯合知識庫，1989.04.13，〈不要落在日本後面 提升美國在亞太地區影響力 國務院促國會增加援助金額〉，<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 貳、尋求建立扇形結構共同體的亞太安全秩序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七日，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暨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索羅門(R. H. Solomon)，發表一篇名為「一九九〇年代的亞洲安全：經濟整合；防衛分歧」(Asian Security in the 1990s: Integration in Economics, Diversity in Defense)的專文，強調美國在亞太的戰略必須以「地緣政治多元化」與「經濟投資整合」為美國戰略的兩大原則。文中表示：「如果美國貿然裁減部署亞太的軍事力量，可能因權力真空而導致其他列強競相填補，反而不利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sup>91</sup>同時，各國對於威脅來源的認知相當分歧，使得亞太地區的國家很難共同合作以解決問題。因此，在後冷戰時代裡，美國依然必須維持與亞太國家在冷戰時期所建立的雙邊安全關係。<sup>92</sup>

而經濟整合上，亞太地區經濟逐步成長，區域經濟並朝著整合的目標邁進，由於美國與亞太國家在雙邊貿易中擁有大幅的逆差，如「美國一九九一年對亞太地區的出口總額為一千三百億美元，而亞太地區對美國的出口總值高達二千一百億美元，成為美國逆差的主要來源。」<sup>93</sup>以著作權問題為例，美國唱片、電影、圖書和電腦業者組成的著作權保護團體表示，由於許多國家未能有效保護美國的著作權，使得美國在經濟上蒙受鉅額損失。據估計，一九八九年光是中國大陸與印度侵害著作權的行為，分別使美國

---

<sup>91</sup> Richard Solomon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1990, "Asian Security in the 1990s: Integration in Economics, Diversity in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1, Issue 10, pp. 243-249.

<sup>92</sup> *Ibid.*, pp. 243-249.

<sup>93</sup> 聯合知識庫，1992.05.24，〈蘇聯解體後 安全問題已遠遜往昔 經濟：美在亞太地區關注焦點〉，<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詳見附錄一，此一圖表包含自一九六〇年起美國對外貿易赤字概況。

業者損失四億一千八百萬美元、一億二千三百萬美元。<sup>94</sup>因此，一九九〇年布希政府送交國會的「總統經濟報告」中，把「繼續引導世界朝向更自由的貿易、更開放的市場」，列為政府今後經濟施政的五大政策之一，<sup>95</sup>在亞太地區便以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作為推動市場經濟的多邊機制，迫使其他地區國家必須重新分配、調整其資本及勞力的流向，使貿易夥伴間能同蒙其利。

一九九一年國務卿貝克(James A. Baker)在《外交事務》期刊上，發表一篇名為「美國在亞洲—浮現中的太平洋區域架構」的文章，文中歸納美國未來的亞太戰略為：「以美國為中心而分別與分布於西太平洋地帶的前緣位置的國家：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及澳洲等簽署安全協定，其中美日雙邊安全協定是美國建構亞太安全架構的主軸；美國與南韓的關係除強調傳統軍事安全的聯盟關係外，南韓亦是美國亞太地區經貿方面的合作夥伴；而東南亞地區與菲律賓和泰國的安全協定是維持美國與東協間良好關係的基礎，而此一由美國延伸出去的北、中、南三線便成為美國亞太戰略的『扇骨』」；<sup>96</sup>另外，「在經貿上輔以亞太經合會逐漸將亞太地區所有國家納入此一體系，並將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等非民主國家皆納入，促使這些國家走向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以此穩定亞太地區的秩序。」<sup>97</sup>藉此，使亞太地區形成一個『扇形結構』的共同體。

其實，早在貝克成為布希政府國務卿提名人時，他便曾向美

---

<sup>94</sup> 一九八四年國會修訂貿易法案時的十個國家是南韓、菲律賓、台灣、巴西、埃及、印尼、泰國、奈及利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而一九八九年時則增加了中國大陸、沙烏地阿拉伯和印度，但排除了新加坡。詳見聯合知識庫，1989.04.21，〈未保護美國著作權 黑名單上再添三國〉，<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sup>95</sup> 劉其筠，1990.02.08，〈布希總統經濟報告 因應亞太邊緣國家出口擴張 可朝向發展專精商品勞務〉，《聯合報》，06版。

<sup>96</sup> James A. Baker, 1991/1992,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pp. 1-17.

<sup>97</sup> *Ibid.*, pp. 1-17.

國參議院表示：

「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政治及戰略利益緊密相關，這些利益因我們在日本、菲律賓及南韓的軍事基地以及我們與這些國家間之密切合作而得保障，所以我們必須強化這些合作，並負起防衛及發展責任；同時，在太平洋邊緣，我們發現令人震驚的成功正在成型，沒有其他地區能在此短暫時間內創造進步的經濟成就可堪比擬。」<sup>98</sup>

如下圖所示，該圖為全世界與六大地區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二年經濟成長率走勢圖，其中以亞洲四小龍、東南亞國協五會員國以及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率最為快速，<sup>99</sup>他們每年的經濟成長率皆高於拉丁美洲國家及已開發國家<sup>100</sup>，而中東歐正面臨著蘇聯瓦解後經濟步入負成長的陣痛期。另外，美國與東亞國家間的貿易在過去十年間成長了兩倍以上，一九八八年達到二千八百億美元，而美國與歐洲的貿易去年僅一千八百億美元。在亞洲的投資已超過三百三十億美元，創造的利潤占美國公司海外盈餘的23%，但美國與太平洋國家的關係網卻遠不如美國與歐洲。<sup>101</sup>因此，貝克認為美國除持續維持在東亞地區的傳統聯盟關係外，更需要加強亞太地區的經貿合作。

---

<sup>98</sup> 聯合知識庫，1989.01.18，〈貝克任命聽證 展望世界經濟 有賴美與太平洋國家合作〉，<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sup>99</sup> 根據 IMF 的分類共有二十六個國家。

<sup>100</sup> 根據 IMF 的分類共有三十三個國家。

<sup>101</sup> 聯合知識庫，1989.11.02，〈亞太經濟組織籌設會議下週召開 象徵太平洋世紀已來臨〉，<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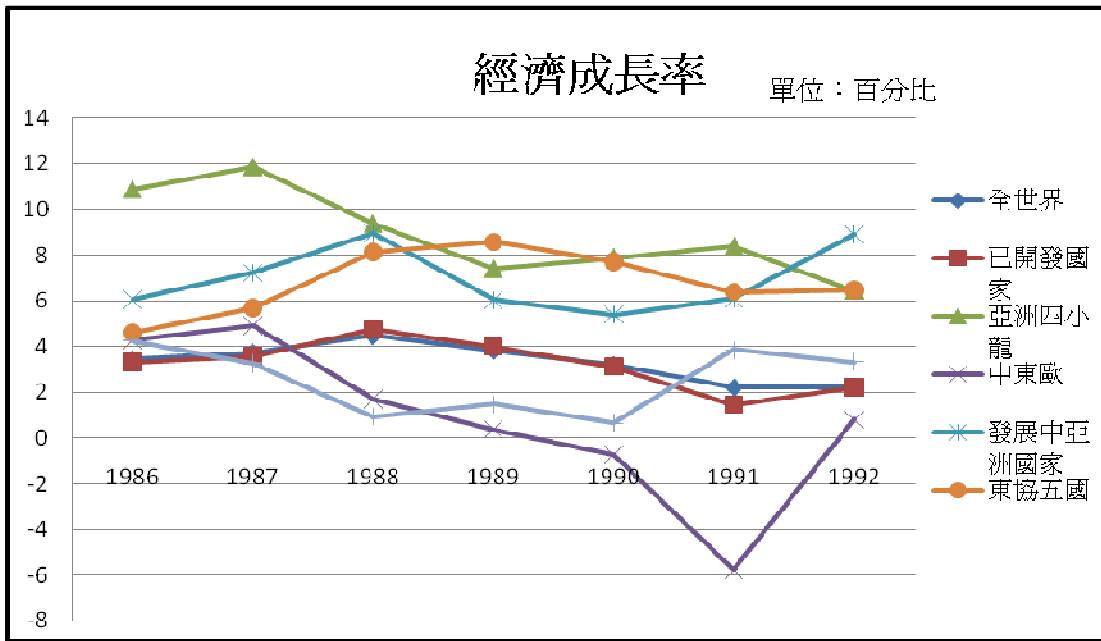


圖 3-2：全世界與六大地區經濟成長率走勢圖(1986-1992)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數據資料庫，<http://www.imf.org/external/index.htm>。

註：此一圖表顯示亞洲四小龍、發展中亞洲國家與東協五國平均經濟成長率遠較其他地區來的快速。圖表為筆者自行繪製。

整體而言，布希政府的亞太戰略一方面維持權力平衡，另一方面則將亞太國家整合為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共同體。學者馬丁·拉薩特(Martin L. Lasater)指出此戰略具備四項特點：「美國雖然裁減亞太駐軍，但對亞太地區的安全承諾不變；美國仍然以雙邊安全關係為重，而不支持多邊區域安排；美國的政策是『經濟整合而防衛分歧』；美國的角色是維持區域的動態平衡。」<sup>102</sup>

## 第二節 美國柯林頓政府的亞太政策

柯林頓上任後提出以「交往與擴大」為基礎的「新太平洋共同體」，學者便認為此一亞太政策與布希政府並無太大差異；同

<sup>102</sup> Martin L. Lasater, 1996, *The New Pacific Community: U.S. Strategic Options in Asia*.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pp. 14-15. 轉引自周煦，1999，《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生智出版社，頁42。

時，兩者皆重視美國與亞太國家間雙邊安全協定，並積極推展民主與市場經濟。然而，布希政府在政策架構延續冷戰軍事圍堵的各個雙邊架構，以推動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配合，在戰略架構上多少維持了冷戰「圍堵政策」的影子；<sup>103</sup>柯林頓政府以擴展市場民主為主，而亞太雙邊防禦條約及多邊安全機制為輔，<sup>104</sup>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雷克(Anthony Lake)便認為「成功的圍堵有賴於成功的擴展，惟有透過擴展市場民主體制，才能使美國更安全世界更和平發展。」<sup>105</sup>當時的國務卿克里斯多福亦表示：「柯林頓政府的亞洲政策將不會有重大改變，美國將繼續維持在韓國及日本的駐軍，並強調『經濟外交』在柯林頓政府下將更顯重要，由於亞洲國家的市場不夠開放，美國必須促進自由貿易的發展以維繫美國與亞洲國家的經濟繁榮。」<sup>106</sup>因此，柯林頓政府與布希政府相比較，最大的不同在於擴展市場民主的多邊貿易機制與雙邊安全機制的主從互換。<sup>107</sup>下文中，說明柯林頓政府的亞太政策，以及柯林頓政府與布希政府政策之不同。

## 壹、柯林頓政府接觸與擴大的國家安全戰略

接觸與擴大的國家安全戰略基礎在於擴大市場、民主社群，同時嚇阻與圍堵對我們國家、盟邦與我們利益的廣泛威脅。<sup>108</sup>由於美國認為更多的民主與政治及經濟的自由化在全世界生根，將

---

<sup>103</sup> 陳治翰，2005，〈後冷戰時代美國「擴展市場民主」的社會建構〉，《2005 中國政治學會暨學術研討會：多元社會、和解政治與共識民主》，頁 12，

<http://capstaipei.org.tw/2005/2005%E8%AD%B0%E7%A8%8B.htm>。最後瀏覽日：2010.10.14。

<sup>104</sup> 同上註。

<sup>105</sup> Anthony Lake, 1993, "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4, No. 39, pp. 658-664.

<sup>106</sup> 王景弘，1993-01-15，〈克里斯多福：亞洲政策 沒有大改變 美將繼續維持韓日駐軍〉，《聯合報》，09 版。

<sup>107</sup> 同註 103，頁 12。

<sup>108</sup> Anthony Lake, op. cit., pp.658-664 .



使美國更加安全與更加繁榮。<sup>109</sup>因此，美國在安全層面上持續維持強大的防衛能力，並促進與盟邦間的安全合作；在經貿層面，鼓勵自由市場機制並促進各國開放市場；在政治層面，鼓勵非民主國家往民主國家邁進。此一目標的實踐不僅對美國國家安全有助益，亦對世界的和平與繁榮有所幫助。

其次，柯林頓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中，亦說明美國維持強大防衛能力所具備的意義，強調美國軍隊承平時期在海外的軍事部署除提供嚇阻的作用外，亦可於危機時立即快速反應與完成前置部署，達到維護美國與友邦國家的安全與穩定。<sup>110</sup>另外，考慮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潛力以及可觀的軍事部隊，即便美國在此一時期並不認為中國大陸將成為區域的安全威脅。但是，美國希望它能走向民主，期望它不要破壞亞洲的力量均衡，並遵守諸如貿易與武器擴散之類的規則，而中國大陸一旦走向民主，便足以消除美國最大的困擾和擔憂。<sup>111</sup>

柯林頓執政初期為改善中國大陸人權問題，所以將人權問題改善與否作為最惠國待遇的延展條件，<sup>112</sup>這與布希政府的態度明顯不同。儘管一九八九年爆發天安門事件，布希總統立即宣布幾項制裁措施，包含暫停武器出口與兩國軍事領導人的互訪、優惠考慮大陸留學生申請延長居留、透過紅十字會對天安門事件受傷人民與以人道與醫藥的援助等應對措施。但是，他卻沒有召會駐北京大使，也未考慮進行全面的經濟制裁，甚至一九九〇、九一與九二年皆面臨國會要求撤銷最惠國待遇或附帶嚴苛條件等要

---

<sup>109</sup> 曹雄源、廖舜右，2008，《柯林頓政府時期：接觸與擴大的國家安全戰略》。桃園：國防大學，頁 13。

<sup>110</sup> 同上註，頁 27-28。

<sup>111</sup> 許綏南譯，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孟儒(Ross H. Munro)原著，1997，《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台北：麥田出版，頁 250-251。

<sup>112</sup> 溫洽溢譯，謝淑麗(Susan Shrink)原著，2008，《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台北：遠流出版，頁 274。

求，布希皆以否決權否決國會要求，顯見布希政府不願將最惠國待遇作為籌碼。<sup>113</sup>然而，柯林頓政府由於大陸方面強硬的態度，最後終於在一九九四年宣布將分開決定最惠國待遇身分以及人權紀錄的反應。<sup>114</sup>同時，只要中國大陸負起必要的責任，美國將促使他們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等國際組織。<sup>115</sup>

## 貳、柯林頓政府東亞與太平洋區域的安全戰略

美國國防部一九九五年二月提出「東亞與太平洋區域安全戰略」報告(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EASR)，此份報告乃是根據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國防部長奈伊(Nye)所提出「奈伊方案」(Nye Initiative)修訂而成，主要任務即針對亞太安全情勢之發展，規劃出新階段美國亞太安全政策。<sup>116</sup>此報告中最令人矚目的便是停止布希政府裁軍計畫，此一政策的轉變乃是為更有效因應亞太安全情勢變遷對美國領導地位的衝擊，這些問題包含：北韓核武問題、美日貿易衝突與雙邊安保關係的維繫與南中國海主權爭端等。因此，柯林頓政府表明美國將改變在冷戰結束初期訂定的撤軍政策，並維持在亞太地區強大的前置軍事力量，避免亞太地區因權力真空而引發軍事衝突。<sup>117</sup>

前美國國防部長培利在報告中，表明此一報告乃根據柯林頓總統所揭櫫的「介入與擴展的戰略」(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原則研擬而成。其內容包含「介入」與「擴展」的策略性意義與功能：前者是指維繫美國位於亞太地區前置基地與友

---

<sup>113</sup> 張亞中、孫國祥，1999，《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台北：生智出版，頁97、109、110。

<sup>114</sup> 同註112。

<sup>115</sup> 同註109，頁83。

<sup>116</sup> 同註83，頁216。

<sup>117</sup>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5,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Asia-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pp. 1-4, <http://www.dod.gov/pubs/easr98/easr98.pdf>.

好國家的關係，透過執行聯合訓練與演習、協調軍事計畫與準備、分享情報、聯合發展新系統與根據共同的標準管制敏感技術的外銷等，確保美國在亞太暨有的戰略架構及政經利益；<sup>118</sup>後者則是將美國的影響力延展至非傳統的領域，增強美國對非友好國家及新區域安全問題的影響，擴展美國在亞太的戰略空間以及汲取更多的利益。<sup>119</sup>同時，此一擴展戰略的對象包含：強化對非傳統友邦的影響力，尤其是積極參與中國大陸國防武力的發展，以瞭解及影響中國大陸的戰略意圖；<sup>120</sup>並解決區域內長期存在與新興的安全問題。

### 參、柯林頓政府大力倡議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柯林頓總統於一九九三年赴東京參加七國高峰會時，在早稻田大學就「亞洲政策」進行演說時強調，日美關係以及泛太平洋各國之間的合作將成為支持新太平洋共同體繁榮的主要因素；因此，以經濟發展為主軸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將扮演關鍵角色。同年(1993)十一月於美國西雅圖所召開的會員大會中，他將召集十五個會員國領袖針對域內如何擴大貿易合作的問題進行討論。<sup>121</sup>這是柯林頓總統首次正式公開表示，要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升級為領袖級會議。顯示美國有意透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使所有成員經濟體朝向貿易及投資自由化的方向邁進，並尋求於二〇〇〇年前全面取消資訊科技產品的關稅。這顯然是透過「多邊主義」包裝「單邊主義」，並取代布希政府的雙邊途徑，透過取得對亞太經濟合作的主導權，而藉多邊體制達成美國單邊利益的政策設計。<sup>122</sup>

---

<sup>118</sup> 同註 83，頁 218-219。

<sup>119</sup> 同上註。

<sup>120</sup> 同上註，頁 222。

<sup>121</sup> 陳世昌、王淑珍，1993.07.08，〈柯林頓在東京呼籲優先建立新太平洋共同體〉，《聯合報》，01版。

<sup>122</sup> 同註 83，頁 88-89。

另一方面，美國除透過亞太經合會實現區域經濟整合外，亦盼望以此作為發展亞太安全組織的基礎。雖然冷戰後經濟問題已成為亞太區域的主軸，但是傳統國家之間的軍事安全問題卻沒有因為經濟的重要性增加而消失或解決。學者吳玲君便指出「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亞太區域各國在經濟快速成長的同時，為求自保而發展包括核武在內的高科技的軍事裝備，使得原本就不安全的區域增添了緊張的氣氛。」<sup>123</sup>而國務卿克里斯多福亦表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是一個經濟性質的區域組織，但它包含了亞太地區絕大部份國家，沒有其他機構比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更適合作為磋商地區安全的媒介。」<sup>124</sup>當時的國防部長培里也表示「美國對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和澳洲均有正式的防衛承諾，但整個亞太地區沒有一個討論區域安全問題的多國會議。一但各國國防首長定期集會及透過個人與官方的接觸，將有助於建立彼此的信任、了解和合作。」<sup>125</sup>而國務卿雷克亦在一場以「美國力量與美國外交」(Use of Force in U.S. Foreign Policy)為題的演講中闡述美國對亞太地區安全合作框架的構想：

「美國對此一亞太集體安全組織的構想是類似歐洲安全會議(CSCE)的結構，但又不必有像北約組織那樣緊密的軍事同盟架構。依美國的構想，在這種集體安全組織中，美國的地位應是：『和平保證者而非支配者』(Assurance Without Dominance)。即美國利益不受到侵害下，美國在其中並不完全主導，但享有相當的影響力。」<sup>126</sup>

---

<sup>123</sup> 吳玲君，1998，〈美國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係〉，《美歐月刊》，第10卷，第7期，頁40-52。

<sup>124</sup> 王景弘，1993.05.20，〈美最終盤算 維持亞太安定 如果柯林頓擴大亞太經合會功能，對台港意義非凡〉，《聯合報》，09版。

<sup>125</sup> 聯合知識庫，1996.02.15，〈培里建議召開亞太國防部長會議 認應定期集會消弭軍事危機 並稱華府盼與中共軍方維持直接對話〉，<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sup>126</sup> 孫揚明，1995.12.15，〈亞太集體安全 美意，不算善意。「亞太經合會應擴張成一個集體安全機構」，美國防部長培里此言表面上正合台北意，然而背後的意義更值得思量〉，《聯合報》，39版。

然而，東協國家對於亞太經合會由經濟層面擴大到安全層面並沒有興趣，甚至表達反對的立場。其實早在提議成立亞太經合會時，東協國家皆表示反對，例如：泰國當時的外長奚地在演說中指出，「有些國家已提出建議，在太平洋邊緣國家之間成立一個組織，進行密切的經濟諮商與合作。」<sup>127</sup>然而，他對此表示：「這些提議雖然值得考慮，但在任何的太平洋國家合作組織中，東協都必須佔有樞紐的地位，因為東協各國之間已經凝聚為一體。」<sup>128</sup>由此可見，東協擔心新的合作組織最後會變成美國、日本和澳洲控制住東協，甚至破壞東協的未來發展與會員國的合作關係。由於各國並不認同美國將亞太經合會由經濟層面擴大至安全層面的構想，使得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在各方壓力下，強調亞太經合會將繼續推動區域經濟合作，而沒有將此一組織的功能進一步擴大的共識。<sup>129</sup>

綜言之，布希與柯林頓所處的國際環境變遷恰逢蘇聯瓦解，面對此一外部環境所採取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具有一致性與連貫性，但是內容依然存在部分差異，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他們意識形態差異所致。柯林頓政府中許多重要的官員都是卡特時期的幕僚，包含克里斯多福和雷克等，而卡特總統可以視為威爾遜之後最提倡理想主義的美國總統。卡特總統雖有理想主義的理念，但卻無「冷戰自由派」的對抗意志，在執行政策上更像是華萊士的「激進理想主義」者，積極與蘇聯尋求裁減軍備的妥協，建立共存的世界。<sup>130</sup>卡特總統對友邦道德的要求似乎比共產國家來的

---

<sup>127</sup> 聯合知識庫，1989.07.04，〈擴大太平洋區經合關係 東協同意美日澳提議〉，

<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sup>128</sup> 同上註。

<sup>129</sup> 吳玲君，1998，〈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與區域安全〉，《問題與研究》，第37卷，第11期，頁1-14。

<sup>130</sup> 同註113，頁45-47。書中提到戰後的思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以理想主義為信念的圍堵政策的「冷戰自由派」，認為不應與蘇聯妥協或尋求合作，共產主義在自由民主世界下自然瓦解；第二類，激進的理想主義者，崇尚道德價值光輝，但因為戰爭的本質邪惡，並不認為美國具有權力在國外進行圍堵；第三類，現實主義學派，他們反對圍堵政策，主張以外交手段為解決世界紛爭；第四類，現實主義派，但是強調圍堵的重要性。

多，其政策不只令蘇聯感受不到壓力，反而令美國的盟友對其政策感到不滿，使卡特的政策並無法有效的執行。<sup>131</sup>

柯林頓政府在外交上重視民主與自由貿易，明顯是採取國際主義的外交政策，但是在人權外交同時具有濃厚「威爾遜主義」的色彩。因此柯林政府時期的美國戰略較布希政府時期，由國際現實主義更偏向國際理想主義。威爾遜主義者強調理想主義，在對外關係上重視法律和道德，認為這種秩序必須建立在民主政府和保護人權的原則上。凡是過於重視理想主義的便被視為威爾遜主義者，而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最好的案例。整體而言，威爾遜主義具備以下三項特徵：第一，威爾遜主義在外交政策上有兩大原則：一是倡導民主，二是防止戰爭。第二，儘管威爾遜主義者渴望和平，但一旦必要，他們就會與漢米頓主義者一起支持對挑戰國際秩序的國家發動戰爭。第三，對改革的堅持往往構成對其他國家主權的挑戰和威脅。<sup>132</sup>而在冷戰結束之後，威爾遜主義者希望達到的目標是：第一，他們希望幫助前蘇聯及歐洲附庸國家向完全而穩定的民主過渡；第二，看到亞洲民主政權的增加；第三，拉丁美洲從軍人政權向民主制度發展。<sup>133</sup>然而，威爾遜主義的政策邏輯使美國陷入許多不得人新的海外干預活動。在九〇年代，對索馬利亞、海地和盧安達的干預問題上，對南斯拉夫的

---

<sup>131</sup> 同上註。

<sup>132</sup> 關中，2005，《意識形態和美國外交政策》。台北：台灣商務，頁98-128（第三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將美國外交政策的態度，依其意識形態分為四大派別。關中在本書裡介紹了四大派別：漢米頓主義(Hamiltonism)重視商業和個人的利益，也特別重視和英國的關係。歷史上知名的漢米頓主義者包括老羅斯福和艾奇遜等人。漢米頓主義者認為商業有助於維持和平，以經濟導向的國際體制能夠避免以安全為基礎體制的「零和問題」。因此，在貿易政策上他們成為自由貿易政策的強力支持者。傑佛遜主義(Jeffersonism)認為美國本身民主和自由的重要性遠大於國外的民主和自由，他們反對中央集權的政府，反對資本集中於大企業，也反對過度介入國際事務，更反對戰爭。此派包含小亞當斯、李普曼和肯南。傑佛遜主義者認為國家可以作為其他國家的模範，而不是強加民主於其他國家，更不必為全球民主事業服務。傑克森主義(Jacksonism)傑克遜主義代表美國人深刻而廣泛的民粹主義大眾文化，崇尚榮譽、勇氣和尚武精神，此派包含華盛頓、哈里遜和艾森豪。傑克遜主義者認為國際社會是混亂無序的，美國外交無須講求仁義道德，有時必須先發制人。同時，傑克遜主義最不尊重國際法和國際慣例。詳見《意識形態和美國外交政策》一書第三章。

<sup>133</sup> 同上註，頁121-122。

政策上，對威爾遜主義者都是失敗和失望的經驗。<sup>134</sup>而柯林頓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標，亦對東南亞國家造成許多困擾，在下文美國與東南亞國家間的雙邊關係裡，將持續介紹。同時，這也是後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小布希在選舉時所大力批評的地方。

### 第三節 美國小布希政府的亞太政策

小布希曾在選舉時將中國大陸視為是美國的「戰略競爭者」，使得小布希當選後讓美中關係陷入一段緊張的氣氛，尤其是美中軍機在南中國海擦撞事件，更讓雙邊關係跌到谷底。然而，九一一事件後小布希將反恐視為要務，急需各方的支持，而北京立即性的善意回應，使得雙邊關係又回到交往的軌跡，亦使小布希成為二次大戰後美國歷任政府上台後政策最快出現轉折的總統。

#### 壹、小布希視中國大陸為戰略競爭者

小布希在競選期間，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在加州前總統雷根圖書館演講以「一個清楚的美國國際主義」(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為題闡述其外交政策，並批評柯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小布希指柯林頓政府對北京當局前後立場不一致，他批評柯林頓對天安門事件譴責為「北京屠夫」(the butchers of Beijing)，<sup>135</sup>其政策稱將使人權作為最惠國待遇的考量，然而柯林頓政府後來卻對北京當局採取讓步，從「人權與最惠國待遇分開處理」到雙邊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完全漠視傳統盟邦的地位與重要性，並對美國利益也構成威脅。小布希認為「美國樂於見到一個自由且繁榮的中國大陸，而且不認為他將成為美國的威脅；但是，

---

<sup>134</sup> 同上註。

<sup>135</sup> George W. Bush, 1999, "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Simi Valley, California. 詳見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bush/wspeech.htm>.

美國卻不知道中國大陸未來的意圖是否隨能力轉變而改變，尤其是北京當局隨著經濟繁榮成長也開始擴展軍事武力，使其他國家也感到擔憂。」<sup>136</sup>而後來小布希政府中的國家安全顧問萊斯(Condoleezza Rice)也認為中國大陸並不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他在等待機會的來臨，一旦時機出現，他將尋求改變亞洲的權力平衡。<sup>137</sup>因此，小布希認為「中國大陸不是戰略夥伴，而是戰略競爭者。」<sup>138</sup>

儘管小布希當選總統後，便不曾在公開場合或是官方文獻中對戰略競爭者的概念作說明，但是在具體行為上確實對柯林頓政府時期的戰略夥伴關係作出調整，由以下案例可以看出此一轉變：「中國大陸副總理錢其琛訪問美國時，行程原定三月十八至二十一日訪問，並於三月十九日會晤布希總統。但是，在美方的堅持之下，布希總統與日本首相森喜朗先於三月十九日會面，再於三月二十二日會見錢其琛。」<sup>139</sup>顯見小布希政府由抑日揚中改變為抑中揚日。另外，學者林正義也表示「小布希政府中要職由日本通取代過去柯林頓政府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陸士達(Stanley Roth)等多位中國通，其中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亦是日本通，他便希望日本能在亞太安全事務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猶如英國在歐洲扮演美國最堅強的盟邦一般。」<sup>140</sup>

另外，小布希政府成立之初，美中關係便因二〇〇一年四月軍機擦撞事件，一度使彼此關係陷入緊張的氣氛。此一事件中，美軍偵察機與中國大陸殲八擦撞使殲八落海、偵察機迫降海南陵

---

<sup>136</sup> 同上註。

<sup>137</sup> Condoleezza Rice,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pp.45-62. 萊斯在小布希的第一個任期裡，擔任國家安全顧問一職，於二〇〇四年十一月獲小布希提名為國務卿，並於二〇〇五年一月獲得國會同意。

<sup>138</sup> 同註 135。

<sup>139</sup> 林正義，2001，〈中美關係進入考驗期〉，《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13 期，頁 110。

<sup>140</sup> 同上註。



水軍機場，偵查機機員遭大陸軍方留置，<sup>141</sup>使雙方僵持長達十一天，使得美中雙方關係陷入低盪。

## 貳、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之轉變

然而，九一一事件爆發後，中國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北京時間九月十二日凌晨便與小布希通話，除譴責恐怖主義事件之外，並向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表示深切的慰問。並主動參與美國的反恐行動，鼓勵巴基斯坦表態支持美國，協助美國順利完成「外交部署」。<sup>142</sup>九一一事件後，兩國關係逐漸升溫，尤其是二〇〇一年十月時，小布希總統飛往上海與江澤民舉行高峰會時，原計停留時間由兩天改為五天，以對北京反恐合作表示重視，<sup>143</sup>並於與江澤民會面後的公開記者會中表示；「中國大陸是一個強權，美國希望與中國大陸建立建設性關係(American wants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使中美兩國朝向「坦承性、建設性、合作性關係」(Candid、Constructive、Cooperative)發展。<sup>144</sup>而江澤民亦於二〇〇二年十月訪問美國，受到美國高規格的接待，而小布希甚至在高峰会中公開指陳中國大陸在反恐上是美國的盟友。<sup>145</sup>針對美中關係的轉變，沈大衛認為九一一事件使美中關係由戰略競爭者回到交往的路線；同時，美中雙方在打擊凱達組織與參與國際反恐怖行動中，使美中關係進入自一九八九年來最穩定的關係。<sup>146</sup>

<sup>141</sup> 毛鑄倫，2001，〈中、美軍機擦撞事件解讀〉，《海峽評論》，第125期，頁16-17。

<sup>142</sup> 于有慧，2004，〈中共外交政策走向與選擇〉，《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1期，頁112。

<sup>143</sup> 陳一新，2002，〈「911」以後中美關係的趨勢與展望〉。宋國誠主編，王瑞琦、耿曙副主編，《21世紀中國（卷二）—全球化與中國之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256。

<sup>144</sup> 胡聲平，2004，〈東亞區域整合與中國之立場及策略研究〉，《全球政治評論》，第7期，頁51。

<sup>145</sup> 同註142。

<sup>146</sup> David Shambaugh, 2002,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September 11: Can the New Stability Last?," *Current History*, Vol. 101, No. 656, pp. 243- 244.

## 參、小布希政府四年國防總檢報告

小布希政府第一份「四年期國防總檢」於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國防部即於九月三十日公布。報告中指出二〇一五年以前並不會出現能力上能與美國並駕齊驅的競爭者，但是某些區域性強權將會發展出足以威脅區域穩定的能力，其中又以亞洲是最有可能出現大規模軍事競賽的地區。<sup>147</sup>據小布希在當選前於雷根圖書館的演說裡，中國大陸與俄羅斯應是亞洲地區最受矚目的國家。<sup>148</sup>

目前許多學者在研究中國崛起的議題上，常常透過分析北京外交政策顯示其無「意圖」挑戰美國霸權的現狀，而且中國大陸在經濟實力、軍事能力與綜合實力中顯示不具備此一能力。然而，此份報告中強調未來美國的建軍基調必須由「威脅導向」轉變為「能力導向」，認為「植基於能力模式-置重點於敵人的作戰方式(how)，而非誰是敵人(who)及戰爭會在何處爆發(when)將擴張吾人的戰略視野」。<sup>149</sup>另外，在二〇〇六年公布的四年國防總檢報告中，延續國防部長倫斯斐 (Ronald Rumsfeld) 在二〇〇五年六月提出的質疑，認為中國大陸目前並沒有面臨其他國家的威脅，但軍事預算上卻節節上升，且軍事設備亦積極進行汰舊換新的現代化，使得區域內其他國家對其感到不安。同時，二〇〇六年公布的《中國軍力報告書》，也認為中國大陸的軍力成長亦可能衝擊整個區域的軍力平衡。<sup>150</sup>

---

<sup>147</sup>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1, *Quadrennial Defense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pp. 3- 4,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qdr2001.pdf>.

<sup>148</sup> 同註 135。

<sup>149</sup> 陳友武、倪耿，2003，〈探索軍備失落的環節：科技建軍、開創新猶〉。《台灣綜合展望》，第7期，頁120。

<sup>150</sup>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p. 10,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cy/dod/qdr-2006-report.pdf>.

綜上所述，顯見美國對中國大陸國家綜合實力的增加感到憂心，但是美國也瞭解在許多國際事務的推動上需要中國大陸的支持。因此，在二〇〇六年國防總檢報告與同年提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皆提出「避險」(hedging)一詞，認為美國必須預先防範其伴隨經濟力量的成長導致軍事力量擴張所可能造成的威脅。<sup>151</sup>具體作為包括：第一，調整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力部署；第二，加強美國與區域盟友間的安保合作關係；第三，強化美軍在關島的兵力部署。<sup>152</sup>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員歐漢隆(Michael O'Hanlon)參與該所「外交政策研究計畫」(Foreign Policy Studies Program)時指出，在亞太地區持續的駐軍能夠維繫美國的影響力，<sup>153</sup>萊斯也指出美國一旦退出亞洲，未來想要重返就得花費更大的力氣，<sup>154</sup>顯示美國瞭解到其在東亞地區的駐軍涵蓋多層面的意義，其中之一便是遏制中國大陸的崛起，一旦美國退出此一區域將代表著降低美國在此地區的影響力，提供中國大陸謀取成為地區霸權的機會。

## 肆、小布希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二〇〇二年小布希政府所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與布希時期以及柯林頓時期的亞太戰略比較，美國在冷戰後的亞太戰略目標並未產生過多的變化，仍然是以安全、繁榮與民主為三大支

---

<sup>151</sup> The White House, 2006,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p. 42.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pp. 29-30.轉引自蔡東杰、洪銘德，2008，〈新世紀以來美國對東南亞軍事戰略之分析〉，《亞太研究論壇》，頁 33-52。該文將“hedging”一詞譯作「防範」。翁知銘，2009，〈話中有劃—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出版，頁 16。該文將“hedging”一詞譯作「避險」。

<sup>152</sup> 蔡明彥，2009，〈美國與中國軍事交流之發展與限制（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七年）〉，《歐美研究》，第 39 卷，第 3 期，頁 533-566。

<sup>153</sup> Robert H. Scales, Jr., Larry M. Wortzel, 1999, *The Future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Asia: Landpower and the Geostrategy of American Commitment*.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p. 1.轉引自謝奕旭，2004，〈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台灣的角色〉，《復興崗學報》，第 80 期，頁 249-272。

<sup>154</sup> Secretary Condoleezza Rice, 27 June, 2008, “Remarks Upon Arrival in Kyoto, Japan,”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8/06/106270.htm>.

柱，透過美軍的軍事存在與安全聯盟關係，形塑有利的戰略環境，維繫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sup>155</sup> 包含萊斯在〈促進國家利益〉一文裡強調的，美國國家利益主要包含：第一，保障美國主權、領土與人民，防止任何威脅美國本土的行為；第二，防止任何區域出現敵對聯盟或是區域霸權國家的出現；第三，確保國際海空航線之安全；第四，若有需要，美國將協助盟國與友邦對付外來的侵略。<sup>156</sup> 雖然冷戰結束後各國關係更加強頻繁與密切，使得目前沒有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但是美國依然維持與亞太地區盟邦與友邦的關係，除面對未來任何可能的威脅之外，中國大陸這一潛在的挑戰者，是美國的防範目標之一。

如同小布希政府在二〇〇二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序言中提到：

「中國大陸領導人已發現經濟自由是國家富強的唯一途徑，小布希政府更認為中國大陸將更進一步發現政治自由是國家強盛的基礎。美國將繼續鼓勵中國大陸推動民主制度與經濟自由，而這也是穩定內政及國際秩序最有力的基石。」<sup>157</sup>

然而，小布希剛上任時便發生軍機擦撞事件，使得美國與中國大陸雙邊關係陷入緊張的狀態，直至九一一事件的爆發後，在雙方擁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礎下，華府與北京的關係不僅獲得改善甚至更為加強。但是，報告中依然強調美國依舊持續關注可能捲土重來的傳統強權競爭，其中又以中國大陸、俄羅斯與印度受到小布希政府的重視。報告中針對中國大陸表示，美國樂於看見一個強大、和平與繁榮的中國大陸出現。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中

<sup>155</sup> 謝奕旭，2004，〈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台灣的角色〉，《復興崗學報》，第80期，頁259。

<sup>156</sup> Condoleezza Rice, *op. cit.*, p. 45.

<sup>157</sup> 曹雄源、黃文啟，2008，《布希政府時期：國家安全戰略》。桃園：國防大學，頁3-4。

國大陸領導人便沒有針對國家的特質，推動另一波根本的改革；<sup>158</sup>同時，中國大陸正積極發展足以威脅亞太地區美國盟邦與友邦的先進軍事力量。這亦是小布希政府對中國大陸未來發展與意圖感到不安之處。小布希政府還認為「時間終會使中國發現，社會和政治自由才是成為泱泱大國的根本之道。」<sup>159</sup>

另外，在二〇〇六年國家安全戰略裡再度談到此一問題，中國大陸領導人強調和平發展的改革道路，避免與其他國家爆發衝突，而這也是美國所樂見的。但是，文中指出美國對其言行不一致感到不滿，華府認為北京：

「在不透明的條件下持續地進行軍事現代化與軍事預算的擴張；在擴展貿易上彷彿是回到過去遭人唾棄的重商主義行徑，中國的行爲似乎要壟斷世界的能源供應，以及尋求管理國家經濟而非使經濟更自由開放；並且支持資源豐富國家，完全無視這些政權在國內所施行的苛政與在國外的惡劣行徑。」<sup>160</sup>

該報告認為，如果中國大陸不改變這些舊世界的思維與行徑，可能導致區域與國際的動盪不安；相反地，若中國大陸持續推動改革，包含國內政治體制民主化的發展，以及經濟由管制走向自由開放，並停止支持這些違反國際人道的政權，將有助於區域與國際安全獲得平和與穩定。

面對此一態勢，小布希上台後不僅加強與日本的關係，並持續增加在關島與亞太其他地區的軍力部署，以有效反制中國大陸

---

<sup>158</sup> 曹雄源，2009，《戰略解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佈局》。台北：五南，頁 216。轉引自 The White House, 2002,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p. 91.

<sup>159</sup> 同上註。

<sup>160</sup> 同上註。

增強的軍力，並嚇阻中國大陸對鄰近國家的武力威脅。<sup>161</sup>同時，還強調美國在承平時期與友邦間的合作，有助於美國在必要情況下立即作出進入的安排。九一一恐怖攻擊後，美國與傳統盟邦間的價值立即展現，它激發美國在亞洲盟邦團結一致的動力並採取聯合的行動，提供空前的大規模後勤支援。<sup>162</sup>這場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證明：美國在亞洲建立的聯盟關係不只是亞洲和平與穩定的基礎，更具備處理未來各種挑戰的彈性與準備。<sup>163</sup>

國內學者金榮勇早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前便在其文章指出，小布希政府將擴大美國對此地區的貿易與投資機會，並透過建構一個有利於美國的亞太權力平衡，以有效反對此區域內出現具有敵意的強權。<sup>164</sup>在此一戰略下，原本被柯林頓政府所忽視的東南亞國家，其戰略及安全角色勢將受到布希政府的重視。

## 伍、美國與中國大陸戰略經濟對話<sup>165</sup>

美國於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當時主管亞洲事務的副國務卿佐利克在中美關係全國委員會中發表一篇題為《中國何處去：從成員到責任》的演說，文中將中國大陸定位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他認為如果沒有北京方面

---

<sup>161</sup> 布蘭登·何奧(Brendan Mark George Howe)，2004，〈小布希與東方巨龍：布希主義之戰略意涵與中國之崛起〉，《國防政策評論》，第4卷，第3期，頁34。

<sup>162</sup> 同註157，頁51。

<sup>163</sup> 同上註。

<sup>164</sup> 金榮勇，2001，〈布希政府的東南亞政策與挑戰〉，《問題與研究》，第40卷，第6期年，頁53、57。

<sup>165</sup> 英文名稱為：US-China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歐巴馬政府上台後，會議名稱加了「與」一字，變成「戰略與經濟對話」。對此轉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表示：「從級別上，以前的戰略經濟對話是雙方各自由一位元首特別代表來主持。中方是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美方是時任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在新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下，兩國元首各任命兩位特別代表分別主持戰略對話和經濟對話，也就是說戰略對話和經濟對話被提升為同樣重要的高度。主持經濟對話的代表，中方是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美方是現任財長蓋特納。主持戰略對話的代表，中方是國務委員戴秉國，美方是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9.04.02，<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gxh/mtb/fyrbt/t555612.htm>。

的合作，將使美國無法持續維持一個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並指出北京在亞洲地區的多邊外交中有益於區域和平與穩定，甚至美國也願意與正在崛起中的中國大陸進行合作。<sup>166</sup>同年十一月，小布希任內第三度造訪中國大陸，並在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共同舉行的記者會上宣布雙方將建立「建設性合作關係」，<sup>167</sup>使雙方展開一段新的關係。

美中戰略對話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小布希總統於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在智利聖地亞哥會晤時達成的重要共識。在二〇〇五年八月，首次美中戰略對話在北京舉行，而二〇〇六年美國財政部長寶森訪問中國大陸時，與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發布《中美關於啟動兩國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的共同聲明》，自此成為雙方定期對話機制，並由美中雙邊輪流舉行。<sup>168</sup>

翁知銘在《話中有劃—美中戰略經濟對話》一書裡，整理了第一次到第四次的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內容與意義的轉變：

首次美中戰略經濟對話於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五、十六日在北京展開，成果為「象徵性大於實質性」；

第二次時間為二〇〇七年五月二、三日，成果為「有爭議，成果限於經貿」；

第三次時間為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二、十三日，成果為「雙方超越對短期經貿爭議問題的關注」；

第四次時間為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七、十八日，成果提升為「收

---

<sup>166</sup> Robert B. Zoellick(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2005,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on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ncuscr.org/files/2005Gala\\_RobertZoellick\\_Whither\\_China1.pdf](http://www.ncuscr.org/files/2005Gala_RobertZoellick_Whither_China1.pdf).

<sup>167</sup> 華夏經緯，11.21.2005，〈外交部：美國總統布希訪華取得重要成果〉，<http://big5.huaxia.com/zt/tbgz/05-095/515796.html>。

<sup>168</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9.20，《中美關於啟動兩國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的共同聲明》，<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mfa.gov.cn/chn/pds/ziliao/1179/t272867.htm>。

獲超越經貿」。<sup>169</sup>

這四次對話主要涵蓋議題與具體成果包含航權、金融與環境等議題。透過美中戰略經濟對話，華府期盼能與經濟實力與綜合實力迅速增加的北京展開多方面的對話與合作，尤其是希望能藉此影響北京在經濟上各領域中的政策。另一方面，北京也期望透過雙邊的對話，緩解美國對中國大陸綜合實力持續提升的疑慮，尤其是在經貿層面裡避免雙方相互提出貿易產品的制裁行動，以維持中國大陸整體經濟環境持續改善與成長。

由此可見，華府對北京的戰略定位尚未完成，彼此未來的關係仍就充滿不確定。當前華府對北京戰略定位建立在美國對目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國際力量格局的評估之上，即雙方關係並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美國對形式發展的認識而變化；<sup>170</sup>換言之，目前雙方關係的穩定並不代表雙方和諧一致，儘管目前雙方關係相對穩定，但是雙方對彼此的防範有增無減，使美中競爭關係加劇。<sup>171</sup>九一一事件提供小布希政府改善與北京關係的契機，但雙方仍舊存在根本的差異，在人權問題、武器擴散、台灣問題與飛彈防禦系統等議題上，美國並未因為尋求中國大陸支持反恐而有所退讓。<sup>172</sup>而北京亦認為其主要威脅來自於美國意圖成為全球性霸權，並阻礙北京在此地區權力與影響力的擴展，尤其是阻礙北京收復國土與戰略目標施行的重要阻礙。<sup>173</sup>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凱利(James A. Kelly)表示，「在某些議題上視北京為夥伴，有些議題則視北京為競爭對手」，以及形容北京「是朋友而非敵人，但

---

<sup>169</sup> 翁知銘，2009，《話中有劃—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出版，頁 36-44。

<sup>170</sup> 同上註，頁 174。

<sup>171</sup> 同上註。

<sup>172</sup> 許志嘉，2004，〈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對中共政策的調整〉，《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頁 79。

<sup>173</sup> 高一中翻譯，威廉·陶(William T. Tow)原著，2003，《亞太戰略關係尋求整合安全》(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頁 42-43。



也非盟邦」。<sup>174</sup>因此，美國與中國大陸雙方皆有合作意願，但是缺乏成為永久夥伴的可能性。<sup>175</sup>

另外，就柯林頓政府與小布希政府外交政策作一比較，柯林頓政府時期，當美國與盟邦擁有一致的利益與主張時，則傾向多邊主義；但是，若觸及美國重要的國家利益時，必要時將不排除單邊行動。小布希政府時期，認為維繫美國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美國必須保持無可匹敵的軍事力量，必要時將採取單邊行動。承平時期，美國對區域與國際問題的解決仍然強調合作共謀才能有效解決問題；但是，此一合作並不全然是新自由主義下的互利合作，而是漠視友邦與區域國家的意見，將可能使區域衝突或危機擴大甚至轉移，進而衝擊美國國家利益與安全，故美國採取合作的目的乃為有效保障其安全與利益而採取的行為。<sup>176</sup>

#### 第四節 冷戰後美國與東南亞六國關係之挑戰

美國在後冷戰時期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並不穩定，柯林頓政府時期美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的最大挑戰來自於人權、民主、經貿與是否在東南亞地區維持軍事力量等議題；小布希政府除緬甸問題採取強硬的態度外，在反恐的大前提下較少在上述問題對東南亞國家提出批評或施加壓力；但是，小布希政府與東南亞國家間反恐的安全考量，並沒有就此在安全層面上對美國採取扈從的政策，反而是衍生出其他的問題。本章第四節便針對美國與東南亞六國關係的變化與未來挑戰作一觀察。

---

<sup>174</sup> 同註 164，頁 61。

<sup>175</sup> Lowell Dittmer, 2008, "American Asia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Election", *Orbis*, Vol. 52, No. 4, pp. 670-688.

<sup>176</sup> 同註 158，頁 65。

## 壹、柯林頓政府與東南亞國家關係之挑戰

### 一、柯林頓政府時期美國與菲律賓之關係

美國與菲律賓在第二次大戰後為圍堵蘇聯，雙方於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日簽署「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冷戰結束後，此條約至今仍舊持續運作；但是，在外部環境缺乏立即性威脅的背景下，使菲律賓國內開始將焦點圍繞在克拉克與蘇比克灣軍事基地歸還事宜。柯拉蓉·艾奎諾(Corazon C. Aquino)在一九九一年宣布停止「美菲軍事基地協定」，<sup>177</sup>撤除美軍蘇比克灣基地與克拉克空軍基地；在內政方面，共產黨的叛亂依舊持續對國內秩序造成破壞，而他們提出美軍撤出菲律賓主張獲得羅慕斯(Fidel Valdez Ramos)的支持<sup>178</sup>，而羅慕斯亦在一九九二年總統選戰中打敗柯拉蓉成為菲律賓第十二任總統。

儘管美菲關係因基地裁撤與否造成雙方意見分歧，但是這一態勢並未持續太久。因為一九九二年中國大陸人民大會通過國家主權法，將整個南中國海劃進其主權範圍之內，使聲稱擁有南中國海部分主權或全部主權的東南亞國家感到憂心；同時，一九九五年中國大陸佔據菲律賓主張擁有主權的美濟礁島(Mischief Reef)，<sup>179</sup>引發北京與馬尼拉關係陷入緊張與國際的關注。

對於美濟礁島事件，菲律賓政府當時表示，如果無法以外交途徑和中國大陸解決美濟礁問題，菲律賓擬援用美菲協防條約，要求美國介入該問題。雖然根據一九五一年簽定的美菲協防條

<sup>177</sup> 任期自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二年止。

<sup>178</sup> 顧長永，1990，〈論美軍在菲律賓的去留〉，《問題與研究》，第29卷，第15期，頁67-86。羅慕斯任期由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八年。

<sup>179</sup> 楊永明，2000，〈亞太安全環境對台灣安全的衝擊〉，《遠景季刊》，第1卷，第2期，頁13。

約，南沙群島並不包括在美軍義務協防區內，但該條約有一款項規定：「如果菲國軍隊遭外國軍隊攻擊時，美軍可以參戰。」<sup>180</sup>對此，時任太平洋美軍指揮部發言人的波伊德上校也表示：「美菲簽署的共同防衛條約中規定締約兩國中一國遭到攻擊時，另一國須伸出援手，現在要看的問題是如何在具體情形下應用條約的規定。」<sup>181</sup>另外，美國眾院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史班斯對南中國海爭議提出警告，「南海地區因南沙群島爭議而致情勢緊張後，美國不會坐視南海的貿易受阻。」<sup>182</sup>「我們的立場是，這些海運航線必須保持暢通供國際使用。對於做出任何可能破壞航運暢通之行為者，我們不會假以辭色。」<sup>182</sup>由此可見，美國特別重視「南中國海的航行自由」，即任何國家都不能阻撓其他國家的船隻通過南海。

整體而言，菲律賓在一九九〇年代開始積極追求外交上的自主性，儘管馬尼拉在美濟礁事件裡積極爭取美方的支持，但是與北京的關係並沒有惡化。當時的總統羅慕斯便表示：「我們與北京的關係並未達到危機點，我們仍然認為中國大陸為其重要而友好的鄰國。」<sup>183</sup>

## 二、柯林頓政府時期美國與新加坡之關係

在安全方面，新加坡是最支持美軍持續存在東南亞的國家，同時也是東南亞國家中在軍事支出上成長最快的國家。<sup>184</sup>新加坡前總

---

<sup>180</sup> 聯合知識庫，1995.02.15，〈美濟礁案若無法經外交途徑解決 菲擬要求美介入南沙問題〉，《聯合報》，<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sup>181</sup> 聯合知識庫，1997.06.19，〈美促確保南海航行自由 太平洋軍總司令表示 若南沙主權之爭波及航行自由 將適當反應〉，<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sup>182</sup> 聯合知識庫，1995.04.20，〈菲駁斥廣角鏡可能衝突報導 美眾院國安委會主席史班斯：美不會坐視南海貿易受阻〉，<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sup>183</sup> 同上註。

<sup>184</sup> 詳見第五章，內容包含軍事支出概況、軍事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比重、武器進口概況等。

理吳作棟曾在國慶演說裡表示，新加坡認為東南亞地區並未因蘇聯瓦解以及北京善意的多邊外交政策而更安全，此地區依然存在許多潛在的危機，包含台海問題、朝鮮半島、南中國海爭議等問題，尤其是美中雙方在這些問題上的看法上存在許多分歧。<sup>185</sup>此段演講內容顯示，新加坡對於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環境依然感到憂慮；因此，正當美菲針對軍事基地撤除或續約時，新加坡主動表達願意提供軍事基地供美國使用，包含允許美國海、空軍擴大使用新加坡巴耶利峇軍用機場及三巴望港，而且美軍使用新加坡設施無須支付租金或費用。

在經貿方面，新加坡是東協國家中經濟發展快速且成熟的國家，由於新加坡並非為一個資源豐富國家，使得它在經貿議題上必須更加積極與主動，否則將使國內經濟陷入困頓。對於東協整合方面，新加坡對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國，屢屢拖延削減入口關稅的承諾感到不滿，對各國配合程度與區域經濟發展也不感到樂觀。<sup>186</sup>以東協曾提出的「東協優惠貿易制度」的構想為例，東協國家無異議通過，但十幾年來各成員國互找理由推拖，如今這項構想等於是胎死腹中，連東協自己也鮮少再提及。<sup>187</sup>因此，新加坡認為應該對加速落實「東協自由貿易區」的事務確實進行。而東協整合速度緩慢亦可能是新加坡對美國提倡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表達支持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政治方面美國與新加坡的關係便無安全與經貿上如此緊密。儘管新加坡為一國會內閣國家，但是國會多數由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所囊括，其他小黨幾乎很難獲得席

---

<sup>185</sup> 聯合知識庫，1995.08.22，〈新加坡總理國慶演說摘錄 冷戰再起？吳作棟的心事〉，<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sup>186</sup> 周嘉川，1993.10.06，〈美仍不支持東亞經濟會議 貿易代表卡西迪表示 不願東亞經濟會議損害亞太經合會議〉，《聯合報》，09版。

<sup>187</sup> 同上註。

次，這與柯林頓政府主張推動民主的發展顯然不同。紐約時報曾以「表彰高壓」為題，指「新加坡是獨裁統治的國家，吳作棟及其前任李光耀代表的是『老式的歐洲極權主義』」。<sup>188</sup>甚至一九九六年新加坡國會選舉時，美國政府公開批評人民行動黨提出的「居者有其屋」與「組屋翻新」計劃是威脅人民投票給予該黨的政策；新加坡則回批美國國務院干預新加坡選舉和內政。不僅在國內政治方面，新加坡對於美國要求北京改善人權與政治民主的要求也感到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這是亞洲國家經濟成長與發展的最佳模式，而且美國的批評可能掀起中國大陸與亞洲國家民族主義情緒。

### 三、柯林頓政府時期美國與印尼之關係

在安全方面，印尼也擔憂美國駐軍迅速撤離可能造成亞太地區陷入真空狀態，所以印尼也和其他幾個東南亞國家一樣，有限度地准許美軍使用其基地。尤其是印尼在泗水的國營造船場與美國簽署一紙保養協定，為美國軍艦提供服務，這是印尼首度准許美國軍艦在印尼進行維修。這紙協定象徵著，印尼支持美國作為亞太地區在冷戰結束後安全秩序的保證者。<sup>189</sup>

在政治方面，雙方在九〇年代於國內政治運動與東帝汶問題，引發雙邊的緊張關係，甚至美國最後關閉軍方與印尼的聯繫窗口。印尼經濟結構及政治結構的不合理，造成經濟危機，但印尼當局為挽救經濟危機，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會財政改革的要求，而觸發國內的示威抗議，繼而引爆雅加達的學生示威，以致

---

<sup>188</sup> 聯合知識庫，1995.07.19，〈反對吳接受麻州威廉斯學院榮譽博士學位〉，<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sup>189</sup> 聯合知識庫，1992.11.10，〈南海風雲 印尼 堅守不結盟組織承諾 有限度准美使用基地〉，<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造成打死學生事件，並爆發暴動及搶劫；加上蘇哈托執政多年以及親戚貪污行徑，使印尼國內爆發一連串的示威行動。對此，美國國內輿論、甚至當時的歐布萊特也在演說中表示，要求蘇哈托總統立即下台。<sup>190</sup>最後，蘇哈托於一九九八年五月下台。

另外，東帝汶問題亦是美印雙方走向低潮的重要事件。東帝汶曾為葡萄牙的殖民地，直至一九七四年實行非殖民化政策後，其殖民地紛紛宣布獨立，而東帝汶亦於一九七五年宣布成立東帝汶民主共和國。然而，東帝汶內部各黨派對東帝汶未來的主張意見相當分歧，其中主張革命的經濟與社會改革計劃的「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在一九七五年的選舉中獲得百分之五十五的選票。<sup>191</sup>印尼對此認為，「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具備共產黨的色彩，因而協助並組織東帝汶國內支持與印尼統一的人士為印尼出兵東帝汶作準備，印尼軍方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七日發動陸海空全面攻擊東帝汶，更對外宣稱是應東帝汶人民要求而出兵恢復秩序，並於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七日宣布東帝汶成為印尼第二十七省。」<sup>192</sup>自此東帝汶內部展開一系列的反抗運動，雙方時而爆發激烈衝突。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原先要到東帝汶參訪的葡萄牙國會議員臨時取消行程，但許多國際媒體已先後抵達東帝汶。而長期抗戰的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臨時決定藉此機會籌辦一場和平遊行，希望將長期被封鎖的島國心聲，透過國際傳媒帶到海外。然而，遊行過程中遊行民眾與印尼軍方爆發衝突，近三百人在此遊行中

---

<sup>190</sup> 聯合知識庫，1998.05.21，〈過程和平 印尼廿萬人示威要求蘇哈托下台〉，<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sup>191</sup> 獨立前，葡萄牙於一九七四年允許東帝汶人民組織政黨，分別有中間偏右的「帝汶民主聯盟」與激進的「帝汶社會民主協會」皆反對東帝汶併入印尼，差別在於前者主張東帝汶保持在葡萄牙的統制下，但是想有漸進的自治權；後者則主張獨立建國，甚至後來又吸收共產主義者，改名為「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以採取革命的經濟與社會改革計畫。而另外一個較小的黨派是「帝汶人民民主協會」則主張東帝汶應併入印尼，但保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詳見莫大華，1997，〈東帝汶獨立運動的緣起與困境〉，《問題與研究》，第36卷，第2期，頁72。

<sup>192</sup> 同上註，頁72-73。

喪生。但是，此一過程由國際媒體所揭露，使得印尼政府受到國際輿論的撻伐。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日，東帝汶在聯合國的支持下舉行決定其前途的公民投票，結果有百分之七十八點五的東帝汶合格選民拒絕印尼政府提出的新自治方案，即東帝汶人民不願再接受印尼統治，而是成立一個獨立自主的新興國家。<sup>193</sup>

冷戰時期，美國與印尼在處理東帝汶的問題上，在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前提下，美國外交政策中少以「人道」或「人權」的名義進行干預，因此美國依舊支持蘇哈托政府。對於東帝汶的問題，美國方面僅要求印尼在軍事行動中不要使用美國的武器裝備。<sup>194</sup>但是，印尼並未有效遵守承諾，甚至軍事暴力行為不曾間段，美國於是在一九九九年九月，宣布終止對印尼一切軍售。<sup>195</sup>而印尼稍早在取消向美國採購 F 十六型戰鬥機的計畫後，不久將購買俄羅斯製造的噴射戰鬥機，儘管印尼外長承認雖在某些問題上與美國有歧見，但是雙方關係依然良好。然而，一般仍舊認為印尼取消採購美國戰機的交易，正是因為美國一再批評印尼人權紀錄之故。<sup>196</sup>

#### 四、柯林頓政府時期美國與泰國之關係

泰國為一君主立憲國家，但是軍隊並未隸屬於政府組織之下，使得泰國時因軍方與內閣政府意見不符時，透過推翻政府重新選舉政府或由當時的軍人任職內閣政府的總理一職。而一九九〇年泰國政府與軍方關係再度受到考驗，儘管隨後和平落幕，並

---

<sup>193</sup> 宋學文、黃子哲，2002，〈從東帝汶獨立運動探討美國的干預主義：一個霸權穩定論的觀點〉，《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3期，頁84。

<sup>194</sup> 同上註，頁98。

<sup>195</sup> 同上註，頁103。

<sup>196</sup> 聯合知識庫，1997.06.27，〈取消採購美 F-16 戰機後 印尼將購俄製噴射戰鬥機〉，<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由獲得國會多數與軍方支持的乃隆爭取總理職位，但是美國國務院卻曾以乃隆實際販毒或涉嫌販毒為由拒絕發給入境簽證，引發泰國國內的反彈，並使乃隆最後放棄爭取總理一職。<sup>197</sup>隨後泰國國會再度重新推舉總理人選，最後由泰國當時三軍最高統帥的蘇清達為第十九任總理（第八位軍人總理）。對於這樣的結果，泰國國內引發一連串的示威抗議運動，因為蘇清達並不具備議員資格卻能當選為總理引發民眾不滿；同時，在一九九二年五月底泰國軍警面對抗議群眾時發生對民眾開槍的憾事，不僅使國內民眾更加不滿，甚至連美國也直接向泰國政府施加壓力，美國駐泰國大使隨即向泰國表示美國對此事的關切，而且柯林頓政府更直接中斷原擬在四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進行的眼鏡蛇演練。<sup>198</sup>

而美泰雙邊時因民主問題而糾纏不清，以及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席捲東南亞國家時，美國政府似乎沒有援助的意願，直至美國擔憂此一危機擴及美國與全球金融市場時才透過世界組織提出援助計畫，但是這些計畫卻提出一連串不合理的要求，令人懷疑美方這是趁火打劫，使泰國這一冷戰時期便與美國相當密切的國家對美國感到非常不滿。但是，儘管雙方關係遭遇波折，美方卻沒有忽視泰國在東南亞地區所佔據的位置與重要意義，例如「泰國遭遇金融危機而無法負擔先前軍事採購的款項時，柯林頓政府對泰國提出一項十七億美元的援助方案，其中包括泰國先前訂購卻無力付款的八架戰機，改由美國國防部以兩億五千萬美元代價購買這八架軍機的一項不尋常安排。」<sup>199</sup>另一方面，泰國亦瞭解發展海上軍事力量達到保護遠洋利益及長達兩千三百公里的海岸線，並非其所能負擔，這亦是泰國與美國維持聯盟關係的因素之

---

<sup>197</sup> 聯合知識庫，1992.04.03，〈涉嫌販毒 無法澄清美方指控 乃隆擬放棄泰總理職位〉，<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包含美國於一九九五年再度批評泰國政界多人涉及毒品走私與買賣問題，以及瓦他納亦因美國的指控最後沒有入閣。

<sup>198</sup> 聯合知識庫，1992.5.20，〈美國暫停與泰軍事演練〉，<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sup>199</sup> 聯合知識庫，1998.03.15，〈美將金援泰國 17 億美元〉，<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 五、柯林頓政府時期美國與越南之關係

蘇聯自戈巴契夫上台，實行改革開放，全面修改其外交政策，其整個對外戰略計畫，也從以往的攻勢戰略，而改採守勢戰略。蘇聯的整個軍事計畫，都以保衛蘇聯本土安全為目標，不再以軍事行動支持外國共產政權，也不再在蘇聯境外與美國作對抗。此一轉變，主要原因是節省軍費，並將政府財政轉向發展國內建設為主。戈巴契夫政府的轉向，對東南亞地區而言，便是柬埔寨問題出現解決的契機。但是，並不是所有東南亞國家對蘇聯外交政策的轉向表示歡迎，尤其是引起中南半島衝突的國家—越南，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顯得特別不安。首先，蘇聯公開表示願意撤出金蘭灣，將使越南失去一到重要的軍事屏障；其次，戈巴契夫強調重建國內經濟為第一要務，使對外援助的支出受到排擠，越南接受的援助將減少；第三，莫斯科與北京握手言和，使越南此一牽制中國大陸的戰略地位受到挑戰。<sup>201</sup>此一變局使得越南的安全受到威脅，使越南被迫向美國政府示好，表達重新建立關係的願望。<sup>202</sup>

一九八九年，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范塞和越南外長阮基石便曾討論改善雙方關係及高棉和平的問題。隔年(1990)十月，美國會談代表提升至國務卿，由貝克與越南外交部長阮基石舉行會談，這是一九七三年巴黎和談以來兩國間的最高層接觸。美國改善與越南關係主要關注議題是解決戰俘與失蹤人員，以及解決高棉問

---

<sup>200</sup> 同註 173，頁 290。

<sup>201</sup> 聯合知識庫，1990.02.01，〈放棄海外最重要基地 蘇軍決撤出金蘭灣〉，  
<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sup>202</sup> 楊振富，1989.01.04，〈蘇聯「老大哥」外交轉向 越南向昔日「美帝」示好〉，《聯合報》，11 版。

題，這是雙邊關係正常化與取消貿易禁運的先決條件。<sup>203</sup>至柯林頓政府時期，「解決戰俘與失蹤人員」依舊是美方的焦點，但是也強調經貿上的考量，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裴爾參議員，便寫信呼籲柯林頓總統「取消美國對越南的貿易禁運」以及「目前，只有美國還對越南實施貿易制裁。」<sup>204</sup>一九九三年一月，「美國參議院以六十二票對三十八票通過國務院授權法案的一項修正案，促請柯林頓政府撤銷自一九七四年起的對越南貿易禁令。該修正案為表達國會意向的『決議案』，對行政部門不具拘束力，但這卻是美國國會首度成功地以立法的方式，回應急待重返越南市場的民間業者的要求。」<sup>205</sup>

一九九四年，美國國務院同意互設聯絡辦事處，而一九九五年柯林頓接獲有關全面清查戰俘與失蹤美軍下落獲得重大進展的報告後，決定與越南關係正常化。同年(1995)八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和越南外長阮孟琴今天簽署兩國的建交公報。對越南而言，越南採行開放政策後，他們期待能取得美國關稅的最惠國待遇，希望獲得美商投資以及開放的美國市場；然而，越南也擔心華盛頓反過來要求越南全面開放市場，以及人權與民主上的改善與轉變，這種和平演變的壓力也是河內對美國既期待又矛盾的心理。<sup>206</sup>

## 六、柯林頓政府時期美國與馬來西亞之關係

馬來西亞對於美國在九〇推行的亞太政策感到最不滿意，由

---

<sup>203</sup> 聯合知識庫，1990.10.01，〈美越十七年來最高層接觸 兩國外長會談 關係解凍〉，<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sup>204</sup> 聯合知識庫，1993.03.28，〈美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稱：美將加速與越關係正常化〉，<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sup>205</sup> 劉其筠，1994.01.29，〈美參院通過決議 促請撤銷對越貿易禁令〉，《聯合報》，09版。

<sup>206</sup> 翁台生，1999.05.17，〈從美國人再見 到再見美國人 越南爭取最惠國待遇，但又害怕資本主義顛覆政權，心態矛盾〉，《聯合報》10版。

馬哈地發表的言論可見一斑。對於美日提倡的亞太經濟會議以及增加「領袖會議」，東協國家普遍反對將亞太經合會提升為貿易談判組織、部長會議提升為高峰會議與正式的地區性經貿組織，而馬哈地更提出東亞經濟及團與「東亞經濟會議」(EAEC)的構想表達反對，<sup>207</sup>而他們的擔憂主要是以下兩個因素：第一，亞太經合會成員國中，已開發國家將在二〇一〇年之前完成自由化的措施，開發中國家則在二〇二〇年之前完成自由化，使許多成員國對此感到擔憂。馬哈地便表示：「我個人並不反對貿易自由化。我關心的是亞太經合會推動市場自由化的方式和步調。」<sup>208</sup>由於亞太經合會會員國開發程度參差不齊，強迫開發程度較低的國家以超過他們能力的方式和速度進行自由化措施是不實際也不公平的。第二，東協國家普遍擔心該組織在經濟上或是安全上將使美國等大國作為支配東南亞的工作，如同馬哈地所表示的「如果亞太經合會議領袖級會議每年定期召開，很可能會削弱東協組織的影響力，因為東協組織的領袖級會議，每三年才舉行一次。」<sup>209</sup>馬哈地認為，亞太經合會應讓發展中國家或落後國家發表意見，強國不應把他們的願望，強加在其成員國身上，否則將失去意義。

在軍事安全上，馬來西亞對於冷戰結束後美國在亞洲駐軍的態度是，認為美國不需要在東南亞部署軍事基地，也反對東南亞國家提供美國軍事基地；對於新加坡提供美國軍事基地，馬來西亞的態度是「希望美國與新加坡所簽署的協議，並非永久提供軍事基地，對於均勢補給與維修則不表反對。」<sup>210</sup>另外，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馬哈地認為中國大陸並非東南亞國家的威脅，並認為

---

<sup>207</sup> 蕭全政，1991，〈亞太經濟合作的發展〉，《政治科學論叢》，第三期，頁 65-82。77

<sup>208</sup> 聯合知識庫，1996.11.26，〈亞太經合會 自由化美景「窮國」無福消受 大國可能挾其科技優勢 入侵 急速開放反而造成農業國家更加弱勢〉，<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sup>209</sup> 程榕寧，1994.11.05，〈馬哈迪反對領袖會議正常化〉，《聯合報》，07版。

<sup>210</sup> 聯合知識庫，1990.11.14，〈美繼續維持在東南亞軍力 李光耀與奎爾在東京簽署協議 美獲允擴大使用星海空基地 馬來西亞:如非永久性使用〉，<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擁有南沙群島主權的六國應該合作解決爭端，<sup>211</sup>以免美國軍力重新進駐東南亞。<sup>212</sup>然而，馬來西亞在九〇年代初期亦積極擴軍，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五年五年計畫的國防預算，比上一次五年計畫的開支增加三倍，<sup>213</sup>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也由 2.6%至 2.8%，增加到 2.8%到 3%之間。<sup>214</sup>

在政治上，馬哈地也批評西方國家企圖以要求馬來西亞實施民主的方式來威脅和控制馬國。他曾在馬來西亞獨立紀念日前夕向全國百姓發表演說稱：「事實上，西方世界要求我們實施的民主制度，勢將導致馬國動盪，進而造成經濟衰退而貧困。如果出現這種結局，他們就可以威脅和控制我們。」<sup>215</sup>而一九九八年柯林頓缺席亞太經合會，由副總統高爾(Albert Arnold Gore)代為出席，但是高爾卻在吉隆坡盛讚馬來西亞人示威抗議馬國總理馬哈迪鎮壓民運，引發馬來西亞及部分亞太經合會成員國反彈。<sup>216</sup>導致後來高爾於二〇〇〇年競選總統時，馬哈地直言如果美國民主黨候選人高爾當選總統，他將感到十分遺憾，更認為馬國與美國的關係可能轉壞。<sup>217</sup>

## 貳、美國重新調整東南亞政策

美國重新調整東南亞外交政策的主要考量源自於外部環境的挑戰，在柯林頓總統的第二任期裡，逐漸感受到其先前對中國大陸採行的政策並沒有完全避免發生危機或衝突的可能性，促使柯

---

<sup>211</sup> 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越南、中華民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汶萊。

<sup>212</sup> 聯合知識庫，1992.07.27，〈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 籲接受中共建議 談判南沙主權 避免美軍介入〉，<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sup>213</sup> 程榕寧，1992.06.20，〈總理不在拒作正面反應 整軍經武展示軍事實力〉，《聯合報》，08版。

<sup>214</sup> 斯德哥爾摩和平中心，<http://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本文第五章附有圖表。

<sup>215</sup> 聯合知識庫，1993.08.31，〈馬國總理批判「西式民主」〉，<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sup>216</sup> 陳奕平，2006，《依賴與抗爭—冷戰後東盟國家對美國戰略》。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195。

<sup>217</sup> 聯合知識庫，2000.11.05，〈高爾若當選「馬美關係將惡化」〉，<http://140.128.103.17:2061/library/>。

林頓政府中現實主義者逐漸贏回外交政策的主導權；小布希政府時期，將中國大陸視為戰略競爭者，而反恐的背景亦使東南亞國家不必擔憂中國大陸的態度下，願意加強與美國在安全層面的合作。

## 一、柯林頓政府末期現實主義逐漸抬頭

此處以美國與印尼關係為例，主要原因乃考量美國與印尼曾因東帝汶獨立問題使雙方關係產生裂痕；但是，在面對中國大陸持續崛起的背景下，印尼為東南亞地區的重要大國，美國為維持此一地區的戰略利益，必須與印尼維持友好穩定的關係，否則將使美國在此一地區的權力平衡受到負面的衝擊和影響。在面對東帝汶獨立問題時，美國曾對印尼進行軍事禁運政策，使印尼軍方在維繫各項軍事作業上面臨困境。如印尼前國防部長朱渥諾(Juwono Sudarsono)便對此表示：「印尼軍隊由於禁運因素使作戰能力約下降百分之五十。」<sup>218</sup>由此可見，印尼在缺乏美國軍事支持下，將使其自身的安全維繫受到打擊，更也可能影響東南亞地區的權力平衡。故美國自二〇〇〇年開始，尋求改善與印尼在軍事上的關係。例如，印尼空軍於二〇〇〇年五月初以觀察員身分參加在泰國舉行的黃金眼鏡蛇演習；同年九月，印尼海軍與美國海軍在巴厘海峽(Bali Strait)與蘇拉巴亞(Surabaya)等地進行一項稱之為「海上戰備及訓練合作」(代號為 CARAT-VI/2000)的海上演習，其主要目的在於訓練部隊進行災難時的各項人道救援任務。<sup>219</sup>這顯示儘管印尼國內問題造成雙邊關係發生挫折，但美國認為印尼所佔據的地理位置與其在東協所扮演的角色是美國亞太戰略中不能輕忽的地位。

---

<sup>218</sup> 楊紫函等翻譯，克里斯多夫·麥納利(Christopher A. McNally)、查理斯·摩利森(Charles E. Morrison)編，2002，《亞太安全觀》。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101。

<sup>219</sup> 同上註，頁 102。

## 二、九一一事件提供美國將軍事力量重返東南亞

儘管九一一事件使美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獲得改善與加強，但是東南亞國家並非一開始便積極參與美國的反恐行動，反而是言辭宣示多於實際行動，直至二〇〇二年十月二日菲律賓南部三寶顏市爆炸案與十月十二日印尼巴厘島爆炸案，並且證實東南亞地區部分恐怖主義團體與回教中極端分子存在關聯後，東南亞國家才由消極轉為積極。包含二〇〇二年十一月，於柬埔寨首都金邊召開的東協第八屆首腦峰會，會中宣示反對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行為，並且將加強實施二〇〇一年在汶萊發表的東盟反恐聯合宣言中所建立的措施，共同預防和打擊恐怖組織在該地區的活動。隨後在二〇〇三年五月十六日在泰國舉辦的金眼鏡蛇聯合軍事演習，重點亦在反恐和維和，這個每年舉行的演習也已轉為以反恐為主的軍事演練活動。

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後與東南亞國家的反恐合作具備多元的意涵：首先，大陸學者陳亦平指出，「九一一發生前，即九〇年代期間，主要是東南亞國家主動要求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對話；九一一事件後，主要是美國主動要求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安全合作。」<sup>220</sup>美國在反恐合作的背景下，積極與東南亞各國簽署軍艦泊港條約，使美國可以進出該國港口停泊與補給；其次，由於各國擔心主權受到削弱，而且東南亞國家不願以東協作為一個整體與美國簽署相關條約，但不反對美國與各國簽署條約；<sup>221</sup>另一方面，美國為避免簽署後勤補給的協定遭受壓力，故其在東南亞的戰略考量也和以往不一樣，淡化「常駐」的軍事佈署、而更加強

---

<sup>220</sup> 同註 216，頁 110。

<sup>221</sup> 李宜倫，2004，《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反恐戰略對東南亞安全的影響》。南投：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頁 58-59。

調「進入」功能，<sup>222</sup>使東南亞國家願意與美國合作；第三，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在東南亞的戰略目標不僅是打擊恐怖主義，就長遠目標考量而言，也可以嚇阻該區域崛起的挑戰者。如同菲律賓總統艾諾育所說的：「九一一事件後，菲律賓與美國的雙邊關係是建立在打擊恐怖主義上，但是在九一一之前，彼此的雙邊關係主要目標是來自於中國。」

九一一事件以及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反恐戰略對東南亞國家亦產生多元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東南亞國家不滿美國對他們國內事務提出批評的行為獲得改善。以馬來西亞為例，二〇〇二年五月馬哈地受布希之邀前往華府訪問時，小布希特地向馬哈地對美國全球反恐的支持表達感激；同時，「美國也將馬哈地當作『一個進步與現代化穆斯林國家的溫和穆斯林領袖』(a moderate Muslim leader of a progressive and modern Muslim state)，美國也把馬來西亞視為『區域穩定的指標』(a beacon of stability in this region)；華府鮮少再去提及安華事件，僅強調安華是政治犯。」由此可見，美國對馬來西亞政策的大幅移轉，由過去強調人權轉而著重於安全議題。<sup>223</sup>同時，美國不僅對馬來西亞如此，對其他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上亦有所改善。

### 參、小布希政府與東南亞國家間的新挑戰

然而，即便美國與東南亞國家面臨恐怖主義的威脅，但是小布希政府時期依然與東南亞國家間存在困難與挑戰。第一，小布希政府將重心置於反恐議題上，包含亞太經合會等組織皆淪為反

---

<sup>222</sup> 同上，頁 114。

<sup>223</sup> 林若霄、吳玲君，2005，〈亦敵亦友？—美國與馬來西亞雙邊關係之研究（1997-2004）〉，《2005 中國政治學會暨學術研討會：多元社會、和解政治與共識民主》，頁 9，<http://capstaipei.org.tw/2005/2005%E8%AD%B0%E7%A8%8B.htm>。

恐的政策宣示與合作的工具，忽視東協國家亦希望在經貿議題上能加強雙邊關係，且經貿方面的進展並無中國大陸與東協間關係進展的快速；而且小布希執政期間更是屢屢在東協重要的會議中缺席，包含二〇〇七年小布希缺席美國與東協建立對話夥伴關係三十周年的美國東協高峰會，因而受到東協國家的批評。另一方面，東協的發展與東協加三合作範圍的廣化與深化，小布希政府的參與強調美國關注的安全議題而非東協國家所關注的經貿議題，可能使美國對此一區域的影響力逐漸下降。<sup>224</sup> 第二，美國與東南亞國家在安全關係上獲得改善與加強，但東南亞國家對美國推行的政策並非照單全收。主要原因包含東南亞地區擁有眾多的回教徒，各國家與美國緊密的合作得面臨國內與其他回教國家的批評；同時，東南亞國家又必須顧慮中國大陸的認知與感受，使得東南亞國家在安全面向上並非完全依賴於美國支援與保護；東南亞國家反而更強調維護國家主權與國家自主性。

據統計數據顯示，二〇〇一年時，亞太地區發生海盜事件共有 170 起，佔全球 335 件中 51%。而海盜事件的發生又多半集中於東南亞地區海域中，包括馬六甲海峽與巽他海峽。<sup>225</sup> 顯然此一區域的海洋安全合作有待加強，但是相較於美國積極爭取合作的意願，東南亞國家則多採保留。以印尼為例：「二〇〇六年六月六日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於印尼軍事會談期間，談到有關協助麻六甲海峽沿岸國家打擊海盜行為時，印尼國防部長蘇達索諾對於美方關切之舉表示歡迎，但也表示在維護麻六甲海峽安全問題上，重申維護海峽航道安全是沿岸國家之主權問題，外國只能提供相關援助，不能以軍事行為介入此一問題。」<sup>226</sup> 國內學者莫大華觀察

---

<sup>224</sup> 同註 164，頁 65-67。

<sup>225</sup> 同註 223，頁 3。

<sup>226</sup> 田漢宇，2008，〈「九一一」後美國與印尼反恐合作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頁 124。



亞太地區三個有關海洋安全合作的美國「自願聯盟」—「防止擴散安全倡議」、「區域海洋安全倡議」與「全球海洋夥伴倡議」，美國企圖以自願加入的方式，邀集「相同想法」、「共同利益」與「共同價值」的國家集體防止與處置共同的跨國威脅。<sup>227</sup>然而，儘管上述合作計劃都是強調由相同想法的國家自願參加，但是各國在各自的利益考量之下亦產生不同的反應，即便這些國家與美國擁有共同利益，但是仍舊不願公開宣示加入美國的自願聯盟。<sup>228</sup>

藉由上述文獻，觀察到在柯林頓政府時期強調交往與接觸的政策，甚至是在經貿上著墨甚深，使吾人以為經貿互賴將使雙方避免衝突，並走向穩定與和平的夥伴關係。但是，一九九六年台海對峙危機，便提醒雙方太注重貿易與人權問題，學者藍普頓更直指：「中美關係首要的是一種有關戰爭與和平的關係。」如果華府與北京都未能將安全問題提升至優先位置，則美中關係的立足點將無法獲得穩固。<sup>229</sup>因此，小布希政府較以往更重視亞太地區，並將軍事武力重新配置，不僅對中國大陸外交政策有所轉變，對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亦然。儘管美中雙邊對話的議題更廣泛，對話的層級亦越來越高，卻同時加強避險的外交政策，加強與中國大陸周邊國家的關係。<sup>230</sup>但是，美國一九九〇年代末亞太地區經濟與安全層面的政策與東南亞國家的目標與計畫存在落差，直至九一一事件後才出現進一步合作的契機；但是，並非所有國家在各個領域中願意與美國合作或加強合作。因此，吾人並不能就此論斷美國與東南亞國家在軍事安全層面上的合作獲得加強，而是必須進一步觀察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才能看清楚美國

---

<sup>227</sup> 莫大華，2010，〈美國亞太區域海洋安全合作的「自願聯盟」—「防止擴散安全倡議」、「區域海洋安全倡議」與「全球海洋夥伴倡議」之比較分析〉，《國際關係學報》，第29期，頁69-100。

<sup>228</sup> 同上註，頁88。

<sup>229</sup> 計秋楓翻譯，藍普頓(David M. Lampton)原著，2003，《同床異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頁34。

<sup>230</sup> Lowell Dittmer, op. cit., pp. 672-673、674.

與東南亞國家關係變化所具備的意義。

## 第四章 冷戰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六國關係之變遷與挑戰

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在五〇至八〇年代裡，由於雙方存在政治對峙、意識形態差異、華人問題及政策方面等問題，使雙邊關係經歷一段相當曲折的發展歷程。在冷戰初期，中國大陸僅與越南、印尼與緬甸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sup>231</sup>其中越南與印尼更只維持短暫的外交關係；除此之外，北京便無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且周邊國家對北京充滿著敵意。然而，美國尼克森總統在七〇年代初訪問中國大陸後，並於一九七五年結束越戰並自南越撤軍，爾後北越進攻南越並揮軍侵略柬埔寨，使得北京與部分東南亞國家在面對越南擴張主義此一共同敵人的背景下，雙方出現合作的基礎和共同的外交目標。此一時期，中國大陸分別與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sup>232</sup>但是，北京當時對東南亞外交關係的主要目標，乃是對抗蘇聯與越南對其自身的圍堵，故戰略考量大於其他層面的考量，雙方依然未出現大規模的交流與互動。直至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間的關係在國際環境持續和平與穩定的背景下，中國大陸陸續與印尼、越南、新加坡與汶萊恢復或建立外交關係，雙方亦積極展開多方面的合作，使雙邊的關係較以往更顯得緊密。本章節便觀察冷戰後中國大陸主要的對外政策，及其為突破美國圍堵或制衡的背景下，在東南亞地區採取哪些政策作為回應，並觀察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間的主要爭議，進而觀察美國在東南亞地區安全層面的角色。

<sup>231</sup> 朱聽昌主編，宋德星、汪偉民副主編，2002，《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與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頁 278-280。

<sup>232</sup> 王良能，2000，《中共崛起的國際戰略環境》。台北：唐山出版社，頁 303。

# 第一節 冷戰後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六國外交政策的轉變

## 壹、冷戰時期中國大陸對外關係之變遷

在毛澤東與周恩來時期，北京外交政策同時兼具現實主義及理想主義為基礎，當時的外交政策中主要原則包含：第一，反對霸權主義原則。霸權主義指大國或強國憑藉其經濟與軍事實力，使用暴力或非暴力手段，以強凌弱、肆意干涉它國內政、任意宰制他國，以達到支配或統治其他國家和地區；<sup>233</sup>北京領導人認為此行為不僅破壞國家的主權獨立，更是世界動盪不安的根源；但是，其所指涉的霸權主義國家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指涉對象，在後冷戰時代裡主要指美國。第二，強調社會主義原則。北京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發達國家對弱小國家的欺凌；因此，北京支持受壓迫民族爭取自由、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的運動。第三，和平是北京外交政策主要的追求目標。北京反對以軍事武力作為解決爭端的手段，更反對大國使用武力維護他們眼中的世界政治與經濟秩序。<sup>234</sup>此一時期在意識形態的考量下，使北京無法與大部份的國家建立友好和平的外交關係。

至鄧小平掌政時期，依舊將上述原則作為北京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則，但是在實際運作上已出現調整。尤其在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後，他認為中國大陸經濟建設是壓倒一切的重要任務，使得上述外交原則的意涵有所轉變：首先，依舊反對霸權主義，但以不阻礙國家發展為原則。如北京反對美國在貿易、軍備擴散和人

<sup>233</sup> 郭耀華，2004，《北京大學中觀天下（上）》。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頁313。

<sup>234</sup> 葉自成，2001，《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外交思想比較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53-55。

權諸問題上，片面地將自己的意願強加至其他國家的作法；<sup>235</sup>但是，鄧小平認為西方發達國家握有國家發展的先進技術與豐沛資金，使得北京必須與他們維持友好關係，尤其是中美關係的穩定將更有助於中國大陸內部的發展，對美關係是北京外交上的重要任務。其次，超越意識形態的原則，正確處理中國大陸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與國際主義問題。冷戰時期北京常以第三世界國家自居，且北京能進入聯合國亦受益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所以北京在政治上強調自己是第三世界國家；然而，鄧小平認為維護國家利益是外交工作最重要的任務，而不應以意識形態定親疏。<sup>236</sup>此一觀念顯示北京瞭解其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交往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顯然有限，北京需要與其他發達國家建立和平友好關係對其發展才有幫助。第三，和平依然是主要的目標。反對以武力解決爭端，並強調國家之間存在共同利益，使彼此間可在若干領域上進行合作，不僅有利於雙方關係的和緩，更有利於雙方的國家發展，藉此創造共存共榮的環境。<sup>237</sup>

藉回顧冷戰時期北京外交政策目標的轉變，顯示隨著中國大陸與蘇聯、美國關係在不同時期的變動，也連帶影響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各國關係的變化。當國民黨政府於一九四九年自南京遷往廣州之際，儘管美國使館隨國民黨政府遷移，但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確滯留北京，嘗試與共產黨代表黃華接觸，期待雙方能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而蘇聯的外交行為與美國恰巧相反，蘇聯使館與大使偕同國民黨政府遷移，顯見蘇聯不願見到一個統一的中國，它擔心統一的中國將成為蘇聯南邊重要的威脅。

---

<sup>235</sup> 何大明譯，黎安友(Andrew J. Nathan)、陸伯彬(Robert S. Ross)著，1998，《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尋求安全的戰略》。台北：麥田出版，頁41。

<sup>236</sup> 張茂明，2000，〈試析鄧小平國家利益觀〉，《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報》，第5期，頁22。

<sup>237</sup> 同註234，頁56-67。

國民黨政府在大陸淪陷後，美國即在所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中將責任推委國民黨政府，並承認大陸共產黨統治大陸之事實，此舉代表美國對華政策之對象以由國民政府轉為大陸共產黨政府。美國也暗示願為大陸共產黨擺脫蘇俄而走迪托路線的後盾，甚至向共產黨傳達美國不會干預大陸共產黨統治大陸之事<sup>238</sup>。然而，當時司徒雷登在南京並沒有代表美國與大陸共產黨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不僅受制於美國國內政治氛圍的制約，也受制於大陸共產黨依然嘗試著與蘇聯接觸而失敗。直至一九五四年韓戰爆發後，北京倒向莫斯科陣營並派軍參與抗美援朝，使南韓、台灣、南越等納入美國的防禦網內，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相互對立的冷戰體系自此確立。

在大陸共產黨一邊倒的宣示下，中蘇共雙方共渡一段關係友好的蜜月期，但是時間一久彼此間存在的矛盾與衝突便一一浮出檯面，包含意識型態的分歧、大陸共產黨與蘇聯領導人不合<sup>239</sup>、莫斯科與北京國家利益分歧、<sup>240</sup>爭奪國際上共產黨的領導權、<sup>241</sup>邊界談判破裂等因素使中蘇共關係走向破裂，<sup>242</sup>尤其是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中共與蘇聯邊境爆發「珍寶島事件」的武裝衝突，此事件是中蘇共公開分裂、鬥爭日益加劇的結果與高潮。<sup>243</sup>但是，

<sup>238</sup> 陳志奇，1993，《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台北：中華日報社，頁40-43。

<sup>239</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初，毛澤東搞個人崇拜以建立權威，此行為乃源自史達林的模式；但是當時蘇聯內部正好是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的高峰，毛澤東認為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批判，是對毛澤東在中國大陸作法的批評；隨後當大躍進成果越來越糟糕時，赫魯雪夫開始大肆批評毛澤東的作法不妥，使雙方關係逐漸惡化。詳見趙豔霞，2003，〈近年我國學術界對中蘇關係惡化原因研究綜述〉，《株洲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8卷，第6期，頁73-74。王昌沛，2007，〈毛澤東、赫魯雪夫的個人衝突與中蘇關係破裂〉，《燕山大學學報》，第8卷，第4期，頁83-86。

<sup>240</sup> 由於蘇聯缺乏良港，在大陸共產黨統一大陸後，莫斯科向北京提議，由雙方共組一支聯合艦隊，以及由雙方合資建立長波電台、雙方共同管理並一同使用。對此，毛澤東則堅持由北京單獨出資建造電台、由北京管理並願意提供莫斯科使用。詳見何一成、黃愛英，2006，〈再論中蘇論戰的歷史原因〉，《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35卷，第4期，頁51-52。

<sup>241</sup> 柳德軍，2007，〈再論中蘇關係惡化之起因〉，《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第9卷，第5期，頁333-334。

<sup>242</sup> 李丹慧，2007，〈政治鬥士與敵手：一九六〇年代中蘇邊界關係一對中蘇邊界問題的歷史考察之二〉，《社會科學》，第2期，頁146-167。

<sup>243</sup> 大陸人將該島稱為「珍寶島」，俄國人稱為「達曼斯基」島，中蘇共雙方都宣稱對該島擁有主權。由於烏蘇里江經常改變水道，位於其間小島的歸屬權，常隨河道變化引起雙方爭執，所以為中蘇共埋下衝突因子。

中蘇共的分裂使得華府有機會與北京修補外交關係，而此時又正值冷戰高峰，對華府而言北京是制衡莫斯科的最佳夥伴。

美國、蘇聯與中國大陸三邊的互動關係亦牽動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各國關係的轉變，由於東南亞地區正面臨蘇聯所支持的越南擴張行徑的威脅，使北京與部分東南亞國家面對共同的威脅下取得合作和交流的基礎，並減緩這些國家冷戰初期對北京施加政權顛覆的恐懼和疑慮。一九七八年鄧小平訪問東南亞諸國時，第一次意識到安全困境的問題，他發現先前北京輸出革命與東南亞海外華人雙重國籍問題，導致許多東南亞國家對北京的戰略意圖感到懷疑。因此，鄧小平認識到一九六〇與七〇年代的安全難題並非完全由外部勢力所造成，而是中國大陸與外部世界之間互動的結果；<sup>244</sup>故北京持續推行睦鄰友好與穩定周邊的戰略，除防止北京與華府關係惡化之外，並降低周邊鄰國與北京之間的安全困境。

冷戰結束後，儘管北京與東南亞全數國家皆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南中國海主權爭端在未能有效解決前，此一問題便成為雙方間潛在的衝突點。尤其是美國一再強調南中國海航行自由為其重要的國家安全利益，並與南中國海周遭國家尋求軍事方面的合作，及在東亞地區部署軍力，防範任何或數個強權聯合控制此一區域，使美國能夠自由進入區域市場或取戰略資源，尤其是經由海路運輸的中東石油。對於北京主張擁有南中國海主權，可能對美國主張的航運自由通行構成挑戰，而美國東南亞地區的盟邦或友邦也主張擁有部分或全部島嶼的主權，一旦爆發衝突美國將如何因應，也是北京擔憂之處。此外，北京的安全評估報告也認為美國計畫利用後冷戰時期無可匹敵的政治與軍事力量，聯合

---

<sup>244</sup> 唐世平，2008，〈從進攻性現實主義到防禦性現實主義：對中國安全戰略的社會進化論詮釋〉。朱鋒、羅伯特·羅斯主編，2008，《中國崛起：理論與政策的視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120-121。

新一代的軍事同盟來圍堵中國大陸。以一九九八年中國大陸國防白皮書為例，文中便直接點出北京對美國的擔憂，包含美國在冷戰後持續加強東亞地區駐軍與聯盟、修訂美日安保條約、計畫部署飛彈防禦系統及出售先進武器給台灣等。<sup>245</sup>因此，美國不僅是解決南中國海主權爭端的重要阻力，更是解放軍戰略裡主要的潛在敵人。

然而，同上文中鄧小平所強調的，冷戰後北京依然將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視為國家發展的首要目標，故北京如何一面維持與美國和平穩定的關係外，如何降低周邊國家「中國威脅論」的恐懼便成為北京外交上的重要考驗。因此，北京強調其綜合國力成長為和平性質，將不會成為改變現狀的國家，並對外表示中國大陸同意後冷戰時代新安全觀念強調參與亞太區域合作的重要性，並針對周邊國家採行睦鄰外交政策，以塑造中國大陸成為一個可以信賴的夥伴與負責任的國家。<sup>246</sup>但是，吾人不能忽視的是，北京期盼著國家統一早日實踐，其所涉及的區域包含台海與南中國海域，使北京積極加強海軍整體作戰實力以有效維護國家主權，使周邊國家對亞太地區安全環境存有疑慮，故下文便針對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作一觀察。

## 貳、中國大陸的海洋戰略與海軍戰略

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與周邊鄰近國家領土爭端多半已獲得解決；但是，西太平洋周邊的島嶼主權紛爭不僅沒有獲得有效解決，反而持續成為中國大陸與涉及主權爭端國家間的潛伏危機。

---

<sup>245</sup> Avery Goldstein, 2003, "An Emerging China's Emerging Grand Strategy- A New-Bismarckian Turn?"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57-106.

<sup>246</sup> Hugo Restall, 2007, China's Bid for Asian Hegemon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70, Issue 4, p. 11, <http://web.rollins.edu/~tlairson/easia/chihegemon.pdf>.



尤其是中國大陸與部分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存在主權爭端；同時，中國大陸的主權主張可能影響美國在此一地區的國家安全利益與戰略安全。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以及它越來越多的資產坐落在沿海地區，可以預料它會進一步在海岸地帶建立起保護自己的能力，<sup>247</sup>加上北京自身也盼能成為一海上強權，其第一步便是需要突破海洋的約束。因此，觀察北京海洋戰略與海軍戰略的轉變實屬必要，尤其是對南中國海主權爭端所具備的意義值得吾人探索。

學者胡清暉指出過去文獻時常將「海洋戰略」(maritime strategy)與「海軍戰略」(naval strategy)混用，然而兩者在範圍與意義上卻有所不同。就「海洋戰略」而言，它屬於國家戰略的範疇，是結合軍事與外交力量用於拓展海權、海洋資源的運用及海上運輸線，以確保國家海洋權益的完整，避免受到其他國家的侵犯；而「海軍戰略」為國家軍事戰略的一環，目的在於建立海軍各期程的戰略構想，以指導海軍戰力整建與運用。<sup>248</sup>這使得部分文獻在探究若干問題時，僅就中國大陸海軍戰略各時期發展與目標作一敘述，但是卻缺乏完整的背景說明及其影響；同時，在實際層面上，一國海洋戰略與海軍戰略之發展，常常導因於大國關係的互動與外在環境發展而轉變，這亦是部分文獻忽視之處。此外，一國可能擁有海洋戰略目標卻尚未具備應有的實力實踐目標時，則觸發海軍戰略的加強與發展；而海軍戰略的加強與發展又為海洋戰略獲得實踐的基礎，並可能使得海洋戰略所涉及的國家利益獲得鞏固與擴展。故以下對中國大陸冷戰時期與冷戰後戰略轉變的背景與影響作探討。

---

<sup>247</sup> 同註 229，頁 109。

<sup>248</sup> 胡清暉，2002，〈中共海軍現代化及其海空戰略的發展〉，《共黨問題研究》，第 28 卷，第 7 期，頁 44。轉引自翟文中，1999，《臺灣生存與海權發展－我國海軍如何因應跨世紀中共海軍擴張》。台北：麥田出版社，頁 21。

在冷戰時期中國大陸受到蘇聯的威脅，使得中國大陸將主要軍事力量皆置於北方，其在海軍實力落後的背景下，其海軍戰略上僅能採取近岸防禦的戰略。毛澤東時期，便將海軍視為陸軍與空軍在沿海地區的助手，故此時期中國大陸海軍活動範圍未曾遠離海岸。然而，由於下述因素使北京海洋戰略發展出現轉折：

第一，一九八〇年代與蘇聯邊界問題的威脅趨緩，而南海主權爭議卻日漸升溫。如中國大陸與越南雙方便於一九七四年一月、一九八八年三月爆發海上衝突，<sup>249</sup>此一戰爭使北京將戰略重心由陸上轉往海上。<sup>250</sup>

第二，一九八二年聯合國制定的《聯合國海洋公約》，將於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生效，此一公約提供中國大陸將近三百萬平方公里海洋國土的法律依據；但是，約一百至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存有爭議、島礁被侵佔、海區被分割及資源被掠奪的問題。因此，北京瞭解到海軍實力必須進行改善與加強才能有效維護其主權主張。

第三，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後，在沿海設立許多經濟特區，估計至二〇二〇年將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口集中在沿海地區生活，沿海地區將發展出約五百個城市的生活圈；<sup>251</sup>同時，在中國大陸本身經濟日益成長的背景下，與世界各國間貿易依存關係更為密切，目前高達 95% 貨物與物資透過海上運輸，尤其是中國大陸日益依賴自海外進口的石油，其中約五分之四的石

---

<sup>249</sup> 一九七四年一月，中共為西沙群島與越南進行過一場海戰，從而控制西沙群島。一九八八年三月，再度與越南在南沙群島中的赤瓜礁發生武裝衝突。

<sup>250</sup> 萬文豪，2004，〈中共海軍戰略演進之研究〉，《國防雜誌》，第 19 卷，第 9 期，頁 61。

<sup>251</sup> 楊念祖，2000，〈中共海軍現代化兵力建設對台海安全的影響〉，《中共研究》，第 34 卷，第 5 期，頁 73-74。

油經過麻六甲海峽運回中國大陸。<sup>252</sup>因此，有必要加強沿海防禦，以免整體經濟因為這些經濟特區受到打擊而受創。

在上述因素影響下，北京冷戰初期以時間換取空間的戰略取向可能衝擊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故海軍戰略必須予以調整，以符合整體國家戰略的配置。

中國大陸海軍戰略轉變的重要人物與推手為一九八二年出任海軍司令員的劉華清，中國大陸海軍自此展開正規化建設，逐步脫離「近岸海軍」的格局。劉華清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八年間曾於蘇聯海軍修習，其海軍戰略思維受到蘇聯當時海軍司令高希可夫的影響，<sup>253</sup>高希可夫認為維護蘇聯海洋利益便必須對海軍加以戰略運用，並脫離陸、海軍一元化的指揮結構，使海軍能獨立完成控制海洋權益的戰略任務。<sup>254</sup>受到此一思維影響的劉華清，其所設定的海軍戰略目標認為中國大陸海軍至少在第一島鏈內擁有絕對的自主權，作戰海域應該到達第二島鏈，以擴大防禦縱深。<sup>255</sup>由此顯示海軍戰略歷經近岸防禦演變到近海防禦階段，規模也由沿岸海軍蛻變到近海海軍甚至朝向遠洋海軍發展。<sup>256</sup>而近海防禦的目標與意義包含：有效覆蓋大陸主權所屬的近海島嶼，有利完成統一祖國的使命；在和平時期可進行各種海洋開發活動，有效維護各種海洋權益；加大海上防禦地幅縱深，由近岸海域前伸，增厚沿海地區防護層，將來犯敵人在大陸沿岸海域予以殲滅或擊潰，而不及於內陸；有效防止和打破敵人海上封鎖，並便於對敵

<sup>252</sup> 潘世勇，2008，〈就地緣戰略看中共海軍未來發展〉，《國防雜誌》，第23卷，第3期，頁108。

<sup>253</sup> 高希可夫的任期為一九五六至一九八五年。

<sup>254</sup> 同註250，頁62。

<sup>255</sup> 同註248，頁46。

<sup>256</sup> 所謂「近海」，乃包括第一島鏈以西的廣闊海域，超過兩百海里的專屬經濟區，並向西太平洋第二島鏈邁進，太平洋第一島鏈包含太平洋西部的阿留申群島、庫頁島、日本列島、琉球群島、台灣群島、菲律賓群島及大巽他群島所構成的一條弧形鎖鏈群島以及海域，第二島鏈則是北起小笠原群島、馬里亞納群島、關島及帛琉群島，是第一島鏈東部外側的另一個縱列弧形群島。詳見陳永康、翟文中，1997，〈中共海軍戰略演進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40卷，第9期，頁15。

戰役後方海上交通現實施積極行動，以削弱其持久作戰能力；可有力保護大陸近岸、近海交通線，並可以重點地掩護遠洋通道；於必要時對敵人戰時為第一島鏈附近的出發基地、前進基地進行襲擊或造成威脅。<sup>257</sup>同時，劉華清認為達到此一戰略必須滿足四項條件：第一，獲致近海海域交通之控制能力；第二，獲致封鎖中國大陸鄰近海域能力；第三，於鄰接中國大陸海域之區域發動一場主要海戰之能力；第四，獲致可靠的核子反擊能力。<sup>258</sup>中國大陸海軍戰略在劉華清以及經濟實力逐漸增強的背景下，積極擴充海軍軍事實力，使得原為陸權國家的中國大陸，逐漸往海權大國的目標邁進。

然而，中國大陸海軍戰略發展不僅在時間上呈現落後，在整體實力水平上也落後其他先進國家，使其海洋戰略的實踐遭到阻礙與挫折。尤其是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海軍戰略持續改善與加強的動力來源包含：

第一，美國海軍的威脅。第一次是在一九九四年十月廿七日至廿九日美國航空母艦小鷹號戰鬥群與中國大陸一艘「漢」級核動力攻擊潛艇在黃海遭遇，使共軍潛艇受困海下三日，其馳援的海航戰機亦受美方驅回，直至美軍中止驅潛行動，共軍潛艇才得以脫身；<sup>259</sup>第二次即一九九六年三月共軍在東海進行對台軍事演習，而美國派遣兩大航空母艦戰鬥群巡弋台海，兩次事件皆顯示中國大陸軍事實力與美國存在大幅度的落差，也帶動共軍海軍實力持續加強的動力。

---

<sup>257</sup> 廖文中，2000，〈中共廿一世紀海軍戰略對亞太區域安全之影響〉，《中共研究》，第34卷，第6期，頁67-68。

<sup>258</sup> 蕭朝琴，1999〈中共發展海權戰略對臺安全之威脅〉，《共黨問題研究》，第25卷，第12期，頁73。

<sup>259</sup> 同註248，頁51。

第二，資源漸趨匱乏以及需求遽增。尤其是大陸對油氣資源需求日益增加，促使北京加速在沿海與專屬經濟區內加速探勘海底油氣資源的企圖心，同時建置海軍力量使其未來能有效維護油氣進口航道的安全。<sup>260</sup>

第三，「促進祖國統一、維護領土完整、確保海洋權益」，為海軍的新任務，尤其是如何將美國阻絕在外，避免美國插手台海問題及南海主權爭議，成為目前大陸海軍的主要任務。

北京除積極更新武器裝備之外，並於一九九六年批准實施《聯合國海洋公約》，以及一九九二年在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顯示北京在維護國家利益的考量下，更加強了提升海軍戰略的決心，使其能有效實踐海洋戰略的目標。

另外，一九九七年十五大中提出「二十一世紀海軍發展戰略」，要求將「近海防禦型海軍」轉向「區域型遠洋海軍」發展。大陸海軍認為二〇〇〇年後將由近海防禦漸次向遠洋作戰發展，除保衛 200 海浬專屬經濟海域外，尚須擔負保衛海上貿易與航道安全，及延伸 1000 多海浬的南海水域，甚至希望在二〇二〇年在其海上安全屏障能向外擴展至 2000 海浬外的太平洋第二島鏈；二〇五〇建立一支泛太平洋區域甚或全球性的海軍強權。<sup>261</sup>目前解放軍兩大海洋軍隊的主力分別是以舟山為中心、北翼以山東青島和南翼以福建三都為兩翼的海戰體系，以及以南海榆林為中心、廣東湛江漢溪砂為前後縱深的海戰體系。<sup>262</sup>其中，南海艦隊在南部海域應當擁有在戰時控制巴士海峽、麻六甲海峽、龍目海峽、

---

<sup>260</sup> 同註 251，頁 73。

<sup>261</sup> 同註 248，頁 64。

<sup>262</sup> 同註 257，頁 71。

巽他海峽和菲律賓群島間諸海峽的能力。<sup>263</sup>

然而，北京積極發展海軍實力並透過遠洋戰略的構想企圖掌控海權，必然碰撞美國在東亞的利益。目前學者們對大陸海軍實力的看法依然分歧：一類認為實現制海權的觀念並非一蹴可及，儘管投入資源大力發展海軍實力，但真正能運用到實務上主導或支配海權，近期內恐怕還是遙不可及。<sup>264</sup>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國防安全政策專家柯布，以及美國前駐北京大使館武官克凡登少將(Rear Admiral Eric A. McVadon)認為中國大陸海軍軍力成長尚不足對東亞安全產生嚴重威脅。<sup>265</sup>另一派的觀點包含美國在一九九二年所召開的「新軍事戰略」研討會中便指出：「中國軍隊的綜合戰力日益強大，將對亞太地區的軍事平衡帶來嚴重影響，美國第七艦隊將鎖定『迅速發展中的中國海軍』為亞太地區對美軍構成重大威脅的假想敵。」<sup>266</sup>我國國防部副部長楊念祖亦曾表示：「我們亦不能低估中共『確保海洋權益』的意圖。雖然發展與建設遠洋海軍存在著許多有待克服的問題與障礙，當前中共海軍的兵力建設仍然持續不斷。」<sup>267</sup>尤其是大陸海軍自一九九〇年代中期開始，不斷地派遣潛艇試探性的從第一島鏈跨越至第二島鏈，並積極的在周邊海域從事海洋調查活動。<sup>268</sup>由此可見，未來中國大陸海軍戰略絕不會以近海防禦為滿足，甚至將突破第二島鏈，這也是中國大陸反制美國新圍堵戰略另一目的。

對東南亞國家而言，由於北京不排除使用武力維護領土主權

---

<sup>263</sup> 同上註，頁 70。

<sup>264</sup> 王崑義，2010，〈三個海洋的戰爭：中共海洋戰略的轉向與美中碰撞〉，《探索與展望》，第 8 卷，第 10 期，頁 9-10。

<sup>265</sup> 青年日報，1996.12.13，〈中共軍力南威脅東亞〉，版 7。轉引自陳永康、翟文中，1997，〈中共海軍戰略演進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 40 卷，第 9 期，頁 8。

<sup>266</sup> 同註 248，頁 43。

<sup>267</sup> 同註 251，頁 84。

<sup>268</sup> 同註 264，頁 7。

與海洋權益，使得解放軍海軍實力的成長便格外受到外界的關注。<sup>269</sup>鄧小平便曾於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針對南沙爭端表示：「一個辦法是我們用武力把這些島通通收回來，一個辦法是把主權爭議擱置起來、共同開發，這就可以消除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sup>270</sup>因此，北京南海戰略所強調「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和平解決，共同開發」的主張，並非承認有關國家強占的合法性，也並非對南海主權爭端做出讓步。但是，北京目前存在其他主要考量因素包含優先發展經濟的考量、化解能源危機的需要、消除「中國威脅論」採取睦鄰外交的需求以及軍事實力仍然有限等條件下，<sup>271</sup>使北京未採取激進的舉動。目前，北京對南海周邊國家採取「和戰兩手」策略，一面強調「擱置主權，共同開發」，並且與周邊國家高層官員互訪頻密，盼以此消除東南亞國家的擔憂；另一方面，北京明訂「領海法」，將整個南海區域及釣魚台納入其領海範圍，並宣稱保留使用武力驅逐侵入者的權力。<sup>272</sup>對此，我國學者楊志恆亦認為：「北京是一面爭取時間進行海軍現代化，試圖拉大其與東協各國軍事力的差距，希望能在柔性的策略背後展現強大的軍事力，威嚇東協使其放棄主權的抗爭。」<sup>273</sup>由此可知，未來北京採取何種姿態面對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海軍力量，以及牽涉南海主權爭議的東南亞各國，便值得吾人持續關注。

## 參、中國大陸的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戰略

一九九七年鄧小平去世後，就外交政策體系結構而言，失去

---

<sup>269</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陸地領土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及其沿海島嶼、台灣及其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附屬各島、澎湖列島、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以及其他一切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島嶼。陸委會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8138&ctNode=5841&mp=4>。

<sup>270</sup> 同註 231，頁 283。

<sup>271</sup> 覃鑄，1995，〈中共對南海主權爭議基本立場剖析〉，《中共研究》，第 29 卷，第 5 期，頁 83-84。

<sup>272</sup> 蕭朝琴，1999，〈後冷戰時期中共對亞太軍事威脅—南沙領土爭議〉，《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2 期，頁 59。

<sup>273</sup> 楊志恆，2004，〈中共東南沿海軍事集結對東亞安全之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第 5 期，頁 81。

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外交政策上可能面臨重大轉折。但是，就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五大中，江澤民在其報告中依舊強調堅持鄧小平的外交思想與理論；<sup>274</sup>同時，新任外交部長唐家璇歸納出北京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一是堅持獨立自主；二是維護世界和平；三是促進共同發展。而在具體實踐方面，唐家璇以五個面向說明北京外交行動：一、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統一和尊嚴；二、加強同擴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三、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新秩序；四、構築大國關係框架；五、積極展開多邊外交，尋求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獨特的建設性作用。<sup>275</sup>由重要領導人重要談話來看，後鄧時期北京外交政策基本上仍維持鄧小平所定下的基調。

然而，江澤民掌權後，儘管重申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方針，卻也同時提出「居安思危、奮發圖強、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戰略方針。<sup>276</sup>另外，透過對北京實際外交行動進行分析，顯示其在外交策略較鄧小平時期已有所調整，包含不結盟外交政策取向擴散為推動「大國外交」與「夥伴外交」，致力於提升與各國間政治與經貿關係的互動。<sup>277</sup>其中，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間領導人與政府高層更是頻頻進行雙邊訪問，北京除與東協整體加強關係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外，亦尋求與個別國家簽署雙邊戰略夥伴關係，推動雙邊關係的穩定與促進合作共同發展。此一轉變，使學者認為北京過去以「韜光養晦」為主的外交戰略，似乎正逐漸轉向為「有所作為」。<sup>278</sup>尤其是九一一事件爆發後，美國迫於反恐戰略佈局之需，使中國大陸的國際政治地位獲得大幅提升；<sup>279</sup>就在各界對「中國崛起」持續關注時，北京陸續發表關於「和平崛起」

---

<sup>274</sup> 許志嘉，2004，《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生智文化出版，頁 74。

<sup>275</sup> 同上註，頁 74-76。

<sup>276</sup> 劉宜友，2005，〈論中共「和平崛起」對區域強權之影響〉，《中共研究》，第 39 卷，第 7 期，頁 90。

<sup>277</sup> 同註 274，頁 93-97。

<sup>278</sup> 蔡瑋主編，2005，中國和平發展與亞太安全。台北：政大國關中心，頁 47-67。

<sup>279</sup> 同註 276。



理論的談話與釋義。

大國崛起往往對國際環境造成衝擊，使得「中國崛起」備受關注。根據上海博士課程的學生對四十個崛起強權案例所進行研究，他們研究結論為：「走一條依靠發動侵略戰爭打破原有國際體系，實行對外擴張以爭奪霸權道路」的後興大國，最終都以失敗告終。<sup>280</sup>對此，前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於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三日在博鰲亞洲論壇上以「中國的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為題進行演講，根據鄭必堅的詮釋，「和平崛起」的路線有三個重點需被重視：第一，經濟發展要「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脫離」；第二，「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第三，「這是一條奮力崛起而又堅持和平、堅持不爭霸的道路」。<sup>281</sup>同年(2003)十二月，總理溫家寶赴美訪問期間，在哈佛大學以《把目光投向中國》為題進行演講時，首次公開全面性的闡述「和平崛起」理論；<sup>282</sup>隨後胡錦濤兩度在內部會議中闡釋「和平崛起」的概念，並強調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與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sup>283</sup>隔年(2004)，大陸總理溫家寶在第十屆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會上，針對新加坡早報記者的提問時，再度重申和平崛起的五大要義：

第一，中國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時機，努力發展和壯大自己。同時又以自己的發展，維護世界和平。

第二，中國的崛起應把基點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獨立自主、

---

<sup>280</sup> 同註 10，頁 38。

<sup>281</sup> 中國網，2003.11.24，〈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11/24/content\\_5448115.htm](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11/24/content_5448115.htm)。

<sup>282</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12.10.2003，〈溫家寶總理在哈佛大學的演講—把目光投向中國〉，<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vjh/t56075.htm>。

<sup>283</sup> 包含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中的講話。詳見朱奕冰、楊丹志，2004，〈國內外關於中國「崛起」與「和平崛起」研究綜述〉，《甘肅理論學刊》，第4期，頁14。

自力更生，依靠廣闊的國內市場、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雄厚的資金積累，以及改革帶來的機制創新。

第三，中國的崛起離不開世界。中國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國家發展經貿關係。

第四，中國的崛起需要很長的時間，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奮鬥。

第五，中國的崛起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中國現在不稱霸，將來即使強大了也永遠不會稱霸。<sup>284</sup>

## 二〇〇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國防部長曹剛川訪問泰國時指出：

首先，中國擁有崛起的和平環境。世界保持總體和平、穩定的基本態勢沒有改變，為中國和平崛起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戰略迴旋餘地。

其次，中國決心以和平的手段完成崛起。把發展的基本立足點放在國內，對外則以合作方式獲取共贏。

其三，中國的和平崛起離不開世界。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上一切友好國家發展關係。

其四，中國崛起的最終目標是和平。中國的發展是和平力量的增長，不僅沒有損害包括周邊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的利益，而且還會使他們從中不同程度獲益，是對世界的又一貢獻。一個穩定和發展的中國，將有利於本地區的穩定與繁榮。<sup>285</sup>

---

<sup>284</sup> 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東盟國家近年來和中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東盟國家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自己從中國龐大的市場中受益。但是按照中國現在的發展模式，作為本區域最大的經濟體，我們也看到中國對原料的需求是很龐大的。長遠而言，在中國和平崛起之後，中國和本區域國家的關係會發生怎樣的轉變？」詳見人民網，2004.03.14，《十屆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會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會見中外記者答問實錄》，

<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8198/31983/32191/2390058.html>。

<sup>285</sup> 中國網，2004.04.06，〈曹剛川在泰國演講：中國決心以和平手段完成崛起〉，

[http://big5.china.cn/zhuantixi2005/txt/2004-04/06/content\\_5531266.htm](http://big5.china.cn/zhuantixi2005/txt/2004-04/06/content_5531266.htm)。曹剛川簡歷：2002年至2003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2003年3月至2007年10月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詳見：人民網，〈中國機構及領導人資料庫—曹剛川同志簡歷〉，<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shizheng/252/9667/9683/6591723.html>。

北京外交學院秦亞青副院長認為中國大陸由一體系外國家轉為體系內負責任大國、主張使用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對使用武力方面採高度的自我克制等面向，證明中國大陸可以和平崛起。<sup>286</sup>

學者于有慧便歸納出幾項北京外交政策轉向的主要原因，包含：第一，北京對自身國力上升而感到自信的表現，因而由「和平發展」轉向「和平崛起」；第二，其目的在於消弭「中國威脅論」，如溫家寶在演講中所強調「中國的崛起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可見北京提出「和平崛起」所強調的是「和平」，然而一般人卻著眼於「崛起」，使得各界依然將其綜合國力的增強視為未來潛在威脅；第三，北京瞭解歷史上國家崛起必然對國際體系之現狀造成影響，故強調「和平」是國家戰略布局的理性選擇，除一面消弭「中國威脅論」外，亦提供中國大陸持續穩定發展的外部環境。<sup>287</sup>

然而，此一理論一提出，正中西方世界「中國威脅論」的指控，甚至連大陸學者也對「和平崛起」理論提出批評。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龐中英認為「『和平』是中國崛起為世界大國的根本手段，中國的崛起除了走和平道路，並沒有其它道路；同時，『和平』也是中國崛起的根本目地。」<sup>288</sup>但是，龐中英同時表示，「『和平崛起』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矛盾性的概念」，他緊接著說：「和平崛起並不是放棄國防和國防現代化」、「和平崛起是在不發生大戰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包括軍事現代化的全面崛起」。<sup>289</sup>另外，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更認為「和平崛起」是不對的，他指出既然「崛起」，那麼歷史案例顯示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在和平中崛起；同時，

<sup>286</sup> 秦亞青，2004，〈世界格局與中國的和平崛起〉，《黨建》，頁 11-12。

<sup>287</sup> 同註 278，頁 52-54。

<sup>288</sup> 龐中英，2004，〈中國崛起的「和平性」判讀－關於「和平崛起」的理論問題〉，《國際關係》，第 3 期，頁 2。

<sup>289</sup> 同上註，頁 3。

他進一步表示：「和平崛起的論述多半集中於中共本身如何避免使用武力，而他關心的反而是其他國家面對中共的崛起會不會使用武力？如果他們使用武力則我們該如何反應？」<sup>290</sup>「如果將崛起視為目的，而和平視為手段，那麼如果和平的手段無法實現崛起的目標，我們是否為了堅持這種手段而放棄崛起的目的呢？還是為了實現崛起的目的，而不得已採取其他的形式？」<sup>290</sup>最後，「和平崛起」是否等於「告訴台灣他們可以宣布獨立，而我們不會攻打他們。」閻學通強調，儘管中國大陸應該盡可能避免戰爭，但是只要北京不放棄統一目標，他擔心海峽兩岸終將一戰。<sup>291</sup>由此可見，「和平崛起」不僅在理論層面上充滿挑戰，而在實務上由於北京對若干主權主張尚未完全放棄以武力解決的前提下，使得其他國家依然對中國大陸綜合實力持續提升感到擔憂。由於「和平崛起」理論飽受各方批評，後來中國大陸官方說法再度轉回「和平發展」或轉用「和諧世界」。<sup>292</sup>但是，和平崛起概念的提出已對西方造成衝擊，使得在二〇〇三年起再度掀起一波中國威脅論的浪潮。<sup>293</sup>

---

<sup>290</sup> 閻學通，2004，〈對和平崛起的理解〉，《教學與研究》，第4期，頁5-6。

<sup>291</sup> 同註10，頁118。

<sup>292</sup> 北京提出和諧世界的理論，同樣是希望說服國際社會，中國大陸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同時也願意與既存的國際體系合作。但是，和諧世界觀與國際現實間依然存在許多困局與問題。國內學者趙建民與許志嘉便指出：第一，和諧世界強調的國際關係民主化是植基於建構主義的共享文化。但是，北京所倡議的社會主義民主與當前國際社會的主流民主價值存有相當大的差異，且並未說明如何解決這些差異與矛盾。第二，和諧世界觀強調透過協商解決爭端，並強調多邊外交的重要性。然而，當前國際社會重要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等，依然存在現實主義的考量，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便不符合北京的國際關係民主化觀點。第三，和諧世界觀並不意味著中國大陸未來不會挑戰美國的霸權。一旦中國大陸國家能力強大到足以與美國抗衡，或國際情勢出現變化時，其對美政策及對外政策也可能有所不同。詳見趙建民、許志嘉，2009，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和諧世界觀」：理論與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0卷，第1期，頁30-31。

<sup>293</sup> 關於「中國威脅論」的分期並學者的觀點不盡相同，大陸學者朱奕冰、楊丹志文章中分為四個時期，包含一九九二年孟儒《正在覺醒的龍—亞洲真正的危險來自中國》文章出現後為第一次被廣泛的討論；第二次是一九九七年由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與孟儒(Ross H. Munro)所著的《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再度掀起一波熱潮；第三次為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間所公佈的《考克斯報告》與「李文和事件」等；第四次是二〇〇二年美國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及《中國軍事力量年度評估報告》使「中國威脅論」再度受到矚目。詳見朱奕冰、楊丹志，2004，〈國內外關於中國「崛起」與「和平崛起」研究綜述〉，《甘肅理論學刊》，第四期，頁16-17。

## 肆、中國大陸在東南亞推行的外交政策

### 一、新安全觀

在傳統的安全觀下，國家為最重要的安全主體，國際關係中的安全便是指國家安全，而且安全的主要內涵為領土、人口、資源與政治主權，而安全便是保障領土不受侵犯、國家統一、自然資源的排他佔有及政治獨立與主權的完整。<sup>294</sup>傳統安全觀下強調世界秩序處於無政府的自然狀態下，使得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成為維護國家安全最重要的根基；同時，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安全關係是零和關係，即對手越安全便使自己處於不安全的狀態。在此一思維下，國家安全戰略的方向將導向國家本身越強大安全便越有保障，自身安全的實現以制約和壓倒對手為基礎，<sup>295</sup>國家對外政策的便是透過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以實踐國家安全目標。

然而，傳統安全觀的主張在全球化時代下逐漸受到挑戰，布贊(Barry Buzan)便對此提出質疑和挑戰，「他認為安全研究的主旨是追求免於威脅的一種自由，如果將此主旨置於國際體系的架構下，則安全是指一個國家或社會的能力，藉此能力維繫其獨立自主和功能的完整性。」<sup>296</sup>即安全要素趨向多元化的發展，安全層面除傳統軍事層面外還包含經濟、社會、文化、科技與環境等領域；換言之，威脅來源也朝多元化發展。同時，經濟、社會、外來文化的威脅、跨國犯罪、能源短缺與環境惡化等因素已逐漸超越傳統領土、人口、資源與主權等傳統安全的因素，甚至各項安全因素間存在相互的關聯性。同時，還包含轉型中的地區與全球

<sup>294</sup> 翁明賢，2003，《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台北：創世文化事業出版社，頁 59。轉引自樊勇明，2001，《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293。

<sup>295</sup> 同上註。

<sup>296</sup> 同上註，頁 76-77。

安全體制，以及冷戰後大國關係全面和緩與經濟相互依賴不斷增強的環境下，<sup>297</sup>安全範圍與領域逐漸超越傳統安全的範疇，使軍事能力已非維繫國家安全的唯一屏障，<sup>298</sup>而是仰賴各種手段的綜合運用才能滿足國家安全需求，尤其是有賴於國家間透過相互合作以維繫共同安全才能創造安全的環境。<sup>299</sup>在此一思維下，國家間應建立平等、全方位、多層次、多樣化的合作關係新模式，以經濟與科技合作為重點，擴大彼此間經貿、科技合作與金融等領域的合作，實現共存共榮的國家安全目標。<sup>300</sup>

在安全觀念轉變的背景下，北京認識到軍事實力的增加往往構成軍備競賽，故增加軍事實力或國家結盟並非獲得國家安全的最佳途徑，反而是尋求共同的安全利益使雙方獲得合作的基礎才是國家安全的最佳保障。<sup>301</sup>另一方面，當與其他國家產生爭端與糾紛時，若以武力作為解決方式，往往導致戰爭消滅戰爭的後果，而且不平等的條約必然帶來新的糾紛和爭執。因此，唯有將和平解決視為處理爭端的基本原則，並強調國家彼此間相互尊重主權下進行平等協商，才是確保國家獲得長久安全的最佳方式。<sup>302</sup>

在具體實踐方面，北京於一九九八年七月廿七日首度發表「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亦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公佈國防白皮書。該文主要說明中國大陸國防軍事概況，尤其是對外說明其軍事預算概況，以免除外界「中國威脅論」的擔憂；另外，此一國防白皮書中受到矚目的便是中國大陸提出新安全觀的概念：

---

<sup>297</sup> 朱鋒，2007，《國際關係理論與東亞安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10。

<sup>298</sup> 王逸舟，2003，《全球政治和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7-8。

<sup>299</sup> 于有慧，2001，〈後冷戰時代中共新安全觀的實踐與挑戰〉，《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2期，頁67。

<sup>300</sup> 王崑義，2002，《全球化與台灣—陳水扁時代的主權、人權與安全》。台北：創世文化事業出版社，頁39。轉引自俞正梁等著，1998，《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俄、歐與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頁8-9。

<sup>301</sup> 閻學通，1997，〈中國的新安全觀與安全合作構想〉，《現代國際關係》，第11期，頁29。

<sup>302</sup> 同上註，頁31。

「經濟安全在國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亞洲金融危機使經濟安全問題更爲突出，提出了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各國政府加強協調、共迎挑戰的新課題。」

「歷史證明，冷戰時期以軍事聯盟爲基礎、以增加軍備爲手段的安全觀念和體制不能營造和平。」「通過對話增進信任，通過合作謀求安全，相互尊重主權，和平解決爭端，謀求共同發展。要爭取持久和平，必須摒棄冷戰思維，培育新型的安全觀念，尋求維護和平的新方式。」<sup>303</sup>

而時任外交部長的唐家璇亦曾對新安全觀的核心概念作一闡述，強調北京與周邊國家是立基於互信、互利、平等與協作的基礎上進行交往，顯示北京拋棄冷戰思維與強權政治的心態，強調各國之間應相互尊重，在實現自身國家利益時，應避免損及他國的利益，並透過多方面的對話避免彼此做出錯誤的解讀與判斷，亦可針對共同關注的安全問題進行合作，藉此達到共存共榮的目標。<sup>304</sup>

由中國大陸公佈的國防白皮書，以及針對新安全所提出的核心概念來看，顯示北京對安全理論已有異於以往的認知，即安全內涵以及實現安全的途徑與冷戰時期的思維已大不相同。在內容方面，主張綜合安全，將安全的認識從傳統的軍事領域擴展到非軍事領域，範圍亦從國家延伸至整個國際社會。<sup>305</sup>途徑方面，主張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對話取代對抗、以和平談判取代衝突、以互諒互讓取代爭奪。<sup>306</sup>同時，在對話與談判上強調彼此相互尊重、

---

<sup>303</sup> 新華網資料，1998，〈中國政府白皮書—中國的國防(199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10/26/content\\_3685106.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10/26/content_3685106.htm)。

<sup>304</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2.7.31，〈中國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

<sup>305</sup> 張景台，2006，〈試論中共新安全觀的理論與實踐〉，《聖約翰學報》，第23期，頁330。

<sup>306</sup> 同上註。

相互信任以及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使彼此能夠實現共同的安全目標，並有效維繫國家的安全。

此外，自一九九七年年年初以來，中國大陸的外交與國防官員頻頻出訪周邊國家並積極宣揚此一非傳統的新安全觀念。例如：一九九七年三月，中國大陸在與菲律賓共同主辦的東協區域論壇信心建立措施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適合冷戰後亞太地區各國維護安全的新概念。<sup>307</sup>一九九七年四月，江澤民與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在高峰會結束後發表聯合聲明，再度強調必須拋棄冷戰思維，反對集團政治與使用武力解決紛爭，應以對話協商增加信任，並透過雙邊與多邊合作尋求和平與安全。<sup>308</sup>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在東協地區論壇中，以《發展合作才能獲得和平與繁榮》為題進行演講，其中包含闡述北京新安全觀念與維護和平的新途徑：「在政治戰略方面，強調國家間的關係建立在和平共處五原則上，這是全球和地區安全的政治基礎和前提；在經濟戰略方面，強調各國應在經濟領域加強合作，縮小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並共同防範國際游資的投機衝擊，創造穩定與安全的經濟環境；在軍事戰略方面，強調加強對話與合作，增進信任與瞭解，並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和爭端，確保國家的安全與區域的穩定。」<sup>309</sup>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江澤民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的講話中，再度提到：「以軍事聯盟為基礎、以加強軍備為手段的舊安全觀，無助於保障國際安全，更不能營造世界的持久和平。這就要求必須建立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安全觀，並積極探索維護和平與安全的新途徑。」<sup>310</sup>

<sup>307</sup> 邱坤玄，2004，〈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東亞研究》，第35卷，第2期，頁1-32。

<sup>308</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1997.4.23，《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mfa.gov.cn/chn/pds/ziliao/1179/t6801.htm>。

<sup>309</sup> 趙崇明，1999，〈中共當前國際戰略指導原則之探討—「新安全觀」決策的環境因素〉，《共黨問題研究》，第25卷，第9期，頁5。

<sup>310</sup> 新華網，1999.03.26，〈江澤民主席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的講話〉，



根據上述文獻，北京所提倡的新安全觀對中國大陸具有多元的意義，北京除強調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外交關係之外，亦尋求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加強軍控及裁軍，且反對進行軍事聯盟對抗的軍事結盟，避免週邊國家聯合美國或加入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聯盟；同時，強調國家間可以在非傳統安全層面加強合作，增進中國大陸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以突破美國獨霸世界的局勢。

然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劉勝湘對新安全觀卻有不同的見解，並針對新安全觀提出多項批評：第一，由於各國發展的程度不同，戰略目標各異，共同利益很難持久，即使存在共同利益，國家間的互信也不太可能長期維持；第二，在解決全球問題的過程中，由於各國受威脅程度不同，各國政策和態度勢必產生巨大的差異，尤其涉及國家根本利益衝突時，各國要達成妥協便更加困難，任何安全措施都不能消除有關國家的不信任感；<sup>311</sup>第三，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安全問題，主要是非軍事政治的威脅，使得國家間的競爭，由軍事領域轉向經濟與科技領域。<sup>312</sup>此外，新安全觀依然面臨許多現實環境的挑戰：第一，儘管冷戰結束後，但美國依舊強調它的軍事實力、地緣政治優勢等傳統安全目標，尤其是美國在全球各區域建立聯盟與盟邦國家謀求自身的絕對安全，此舉卻損及其他國家的安全。例如：美國在布希政府時期，倡議建構戰區飛彈防禦體系(TMD)與全國飛彈防禦體系(NMD)兩大防衛系統，以及東亞地區存在美日聯盟等，皆為中國大陸國家安全造成影響。<sup>313</sup>第二，冷戰後軍事安全一度淹沒於綜合安全中，但是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持續提升與穩定後，各國再度掀起一波軍

---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0/content\\_685655.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0/content_685655.htm)。

<sup>311</sup> 劉勝湘，2004，〈國家安全觀的終結？—新安全觀的質疑〉，《歐洲研究》，第1期，頁12-15。

<sup>312</sup> 王崑義，2002，《全球化與台灣—陳水扁時代的主權、人權與安全》。台北：創世文化事業出版社，頁38。

<sup>313</sup> 同註299，頁70-71。

備競賽。尤其是中國大陸軍事預算亦逐年增加，顯示軍事安全在後冷戰時代依然占據不可忽視的國家安全要素。第三，各地區主要的衝突地帶仍舊戰火頻仍或是依舊存在爆發戰爭的危機，使得新安全觀難以獲得落實。<sup>314</sup>因此，在這些外部環境的挑戰之下，北京一面加強與俄羅斯的關係，也一面加強自身的軍事能力，確保國家安全免於受到衝擊與挑戰。如此看來，中國大陸依然無法跳脫現實主義的支配，使得新安全觀的理念似乎淪為口號，未來仍需要持續觀察其外交動向。

整體而言，北京外交戰略確實已從大國戰略向全球化戰略移轉，前者所隱含的價值取向乃是以維護主權為主軸，故強調國際安全與軍事安全；後者則是著重在經濟領域上與各國進行全球的競爭與合作關係，轉而突顯經濟安全的重要性。<sup>315</sup>中國大陸提出新安全概念使其得以透過多邊主義的外交型態，與東協國家加強經濟合作以及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中拓展合作的範圍與深度；這與美國依然維持雙邊安全聯盟以穩定區域秩序的主張顯然不同。同時，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初以反恐為導向的外交政策使東南亞國家感到相當不安，因為東南亞國家認為反恐僅為安全層面中的一部分，安全範圍應包含經濟或是其他層面等都是構成安全的重要支柱，<sup>316</sup>這是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自九〇年代末以來雙邊關係突破的重要因素。

## 二、從睦鄰到睦鄰、安鄰、富鄰

冷戰初期，大陸共產黨對外關係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獲得國

---

<sup>314</sup> 同註 311，頁 13-15。

<sup>315</sup> 同註 312，頁 38。

<sup>316</sup> William T. Tow, "America's Asia-Pacific Strategy," *Current History*, Vol.106, Issue 701, 2007, p. 284-285.

際社會的支持以及尋求與周邊國家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首先，冷戰時期的睦鄰外交政策，主要目的在於消除周邊國家對新中國所抱有的疑慮和恐懼，使新中國可以和這些周邊國家建立正常的交往關係；其次，雙邊在此一政策背景下共同解決邊界問題外，也有助於北京在處理華人問題以及發展同周邊國家在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上作出增信釋疑、促進友好的工作；<sup>317</sup>最後，新中國與周邊民族主義國家皆曾遭受殖民主義侵略的歷史記憶，又共同面臨著發展民族經濟的挑戰，即強調北京與這些國家站在同一立場，避免他國對北京採取敵視的態度及增加合作的可能性。具體外交行為與成果，包含一九六〇年代裡，北京陸續與緬甸、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周邊國家解決彼此間的邊界問題，這是此一時期睦鄰外交具體落實的表現。然而，睦鄰外交在不同的時期卻存在些微差異，隨著時代的更替其具體內容與意義也隨之變化。

和平共處五原則是毛澤東時期睦鄰外交的重要方針。<sup>318</sup>和平共處為列寧首度提出，在一九一七年爆發十月革命後，面對內外交迫的環境之下，列寧提出：「希望同各國和平共處，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來進行國內建設。」<sup>319</sup>的外交指導方針提出後，使得蘇聯擺脫建國以來孤立的狀態，並為經濟復甦與發展創造了和平的國際環境。<sup>320</sup>一九五三年，周恩來在會見印度代表團時，首度提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於一九五五年雙方所簽署的《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及交通協定》文件裡，亦將和

---

<sup>317</sup> 王光厚，2007，〈從「睦鄰」到「睦鄰、安鄰、富鄰」—試析中國周邊外交政策的轉變〉，《外交評論》，總第96期，頁39。

<sup>318</sup> 錢健，2009，〈建國初毛澤東睦鄰外交思想及其在東南亞的實踐〉，《黑河學刊》，第3期，頁55。

<sup>319</sup> 路本龍，2004，〈和平共處五原則與中國外交〉，《長白學刊》，第1期，頁29。

<sup>320</sup> 郭繼文、莊仕文，2010，〈從列寧的和平共處到「和諧世界」〉，《荷譯學院學報》，第32卷，第3期，頁18-20。

平共處五項原則寫入序言。隨後，更在國際場合中宣揚此一理念，並獲得廣大亞非國家的支持，使北京此時期在外交上有突破性的發展，其邦交國家增加到四十九個國家。<sup>321</sup>

改革開放後，大陸的周邊外交政策經歷一段由「睦鄰」到「睦鄰、安鄰、富鄰」的過程，隨著和平共處在九〇年代全面落實，北京與東南亞國家皆建立外交關係，而北京也認為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額增加速度非常快速，佔對外貿易總額百分之六十以上，且這些國家亦是外資的重要來源；加上與周邊國家建立友好緊密的關係有助於邊疆地區的穩定。<sup>322</sup>因此，北京積極做好敦親睦鄰的外交工作，創造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將使中國大陸可專注於國內的發展與建設。

大陸暨南大學教授曹雲華指出，中共十四大至十六大歷次的政治報告裡，皆提到「要堅持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顯示冷戰後北京睦鄰外交政策保持持續的一貫性。如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八日，江澤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世界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提出「繼續加強睦鄰友好，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加強區域合作，把同周邊國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的水平」。<sup>323</sup>但是，其中又存在著細微的變化，曹雲華認為：「中國的睦鄰外交政策已經從原來的簡單地與鄰國保持和睦友好的關係，上升到要通過開展區域合作來促進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原來只是提出要與鄰國和睦相處，而現在則要將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提升到一個新的階段，那就是

---

<sup>321</sup> 陳理，1998，〈從「一邊倒」到「和平共處五原則」—試析建國初期我國對外政策的調整〉，《黨的文獻》，第6期，頁73。

<sup>322</sup> 馬小紅、白蘊芳，2004，〈試論我國「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第3期，頁35-36。

<sup>323</sup> 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2002，《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世界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44/4429116.html>。

區域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階段。」<sup>324</sup>如二〇〇三年十月七日溫家寶出席東協商業與投資峰會時以《中國的發展與亞洲的振興》為題進行演講時，他提到「積極促進亞洲的發展振興與和平穩定，是中國的既定國策。新形勢下中國的周邊外交方針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加強睦鄰友好，加強區域合作，把同周邊國家的交流與合作推向新水平。」<sup>325</sup>

北京對周邊國家採取的外交政策由「睦鄰」到「睦鄰、安鄰、富鄰」的變化，具備多項重要的戰略意義：第一，透過睦鄰友好穩定周邊，使北京能將重心置於國家內部的經濟建設，而且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貿易合作，亦利於邊疆地區經貿的發展。第二，北京一方面在存有爭議的地區強調和平解決爭端，使雙邊在其他方面的交流可以持續而不受阻礙；二方面在存有共同安全利益的面向上，北京積極參與地區安全合作機制的建立，不僅建立北京為一接受現有規範與秩序的良好形象，並奠定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新框架。第三，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在許多重大國際問題的立場有越來越多的共同點，包含在國家發展問題上認為國家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前提，雙方也反對西方國家利用人權問題干涉他國內政，使雙方在許多議題上能共同合作抵禦西方國家的批評與干預。<sup>326</sup>另外，面對當前國際政治秩序存在的不合理的態勢下，強調北京與周邊國家立場相同，並「主張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sup>327</sup>以尋求其他國家的支持與合作。同時，北京一再

<sup>324</sup> 曹雲華、徐善寶，2004，〈睦鄰外交政策與中國東盟關係〉，《當代亞太》，第2期，頁53。

<sup>325</sup> 三鄰的概念：「『睦鄰』，就是繼續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親仁善鄰、以和為貴的哲學思想，在堅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與周邊國家彼此和睦的原則下，共築本地區穩定、和諧的國家關係結構。『安鄰』，就是積極維護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合作增進互信，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分歧，為亞洲的發展營造和平安定的地區環境。『富鄰』，就是加強與鄰國的互利合作，深化區域和次區域合作，積極推進地區經濟一體化，與亞洲各國實現共同發展。」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3，《中國的發展與亞洲的振興》，<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yjh/t27173.htm>。

<sup>326</sup> 同註 232，頁 307。

<sup>327</sup> 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2002，《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世界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44/4429116.html>。

強調中國大陸發展強大，將帶給亞洲各國發展機遇與實質利益，為亞洲的和平與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並強調中國大陸發展強大不會走向霸權主義，也不會採取擴張主義的政策來安撫周邊國家。

## 第二節 從「中國威脅論」到「中國機會論」

面對美國在東亞地區不可動搖的地位，許多大陸學者對此感到憂慮，擔心中國大陸崛起與美國間的關係將使得國際環境陷入不穩定的狀態中。北京瞭解歷史上大國崛起常常對現有秩序造成衝擊，例如第一、二次大戰前的德國以及日本，皆在國家實力獲得提升後進而挑戰現存的國際秩序，而這些歷史案例中，其他國家將結為同盟共同對抗崛起的國家，並將之摧毀。<sup>328</sup>在面對此一憂慮下，如何抹除「中國威脅論」，以及避免周遭國家與美國聯合起來對中國大陸進行圍堵，便成為外交政策中一重要的議題。

### 壹、中國威脅論

中國威脅論受到關注是起源於幾位學者在學術界掀起波瀾，進而有研究者將中國威脅論按照各種方式做出區分，一般以經濟、軍事與意識形態三個面向為主；另外，亦存在其它對中國威脅論的分析方式，大陸學者陳應成綜觀各種形式的中國威脅論，按其提出主體、目的與動機、輿論依據與涉及內容等進行劃分，一類是以美日為主體的發達國家所鼓吹的中國威脅論，另一類是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國家所提出的中國威脅論。<sup>329</sup>儘管各種形式的中國威脅論皆以現實主義為基礎，但是隨著主體的差異可以發

---

<sup>328</sup> Robert Sutter, "Asia in the Balance: America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 *Current History*, Vol. 103, Issue 674, 2004, p. 286.

<sup>329</sup> 陳應成，2010，〈兩類中國威脅論的比較及方法論意涵〉，《蘭州學報》，第4期，總第199期，頁15-17。

現各個區域與國家對中國威脅論的感受程度明顯不同，亦可以觀察出他們回應中國威脅的不同方式。據此，可以瞭解到為什麼中國威脅論在某些方面對東南亞國家有效，但是某些方面他們卻不受影響。

一九九二年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的主任孟儒於《政策研究》(Policy Review)發表一篇題為《正在覺醒的龍—亞洲真正的危險來自中國》(Awakening Dragon—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在文中首次出現「中國威脅論」。<sup>330</sup>而在一九九七年二月，他又出版一本名為《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認為中國大陸作為正在崛起的亞洲霸主，企圖取代美國在亞洲的統治地位，中國大陸肯定不會成為美國的戰略夥伴，中美之間肯定爆發衝突，而且衝突即將到來。<sup>331</sup>一九九五年七月美國的《時代》雜誌發表《為什麼我們必須圍堵中國》(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主張崛起中的中國大陸是極具威脅性的，因為它仍是共產主義的極權體制，企圖對外侵略與擴張，所以美國必須聯合亞洲國家對中國大陸進行圍堵。<sup>332</sup>

從美國的視角來看中國威脅論，即以現實主義為研究基礎。自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持續兩位數的成長，而且在經濟力量逐漸壯大之餘，其軍事預算亦不斷攀升，美國參議員薩班斯(Paul Sarbanes)便曾對此表示，中國大陸在與美國貿易中所享有的鉅額順差，其中一部分可能是被用來增加軍隊的實力與現代化。<sup>333</sup>而冷戰結束初期的美國正陷入經濟成長的障

---

<sup>330</sup> Ross H. Munro, op. cit., pp.10-16.

<sup>331</sup> 同註 111。

<sup>332</sup> Charles Krauthammer, July 31, 1995, 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 *Time*, p. 72.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83245,00.html>.

<sup>333</sup> William W. Keller and Thomas G. Rawski, 2007, "China's Rise and the Balance of Influence in Asi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p. 146.

礙以及透過刪減軍事預算改善政府赤字的敏感時刻，使中國威脅論受到大家的矚目。儘管有學者認為蘇聯瓦解後使美國成為唯一的超強國家，但是美國超強國家的地位能持續多久，則在冷戰時期便已廣為學者討論。樂觀者如威廉·沃爾佛斯(William C. Wohlforth)，他觀察十九世紀以來歷史上曾經主宰世界的國家，以國內生產毛額、國防支出與傳統權力等多項指標對這些國家進行比較，發現冷戰後美國所擁有的優勢明顯優於歷史上其他的強國。另外，他更強調美國在冷戰後所擁有的高科技產業、高科技的研發支出總額、軍事研發支出與發明專利等多項指標裡，美國皆遠遠超越其他國家，而且享有優越的地理優勢。<sup>334</sup>因此，他認為在實力落差如此懸殊的情況下，美國是後冷戰時代裡唯一的超級強權，而在此一美國單極體系下，各國家將採取追隨而非制衡。

335

但是，上述觀點卻遭受許多人的批評。最早是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強權興衰史一書的出版，引發一陣對美國實力逐漸削弱而感到擔憂。<sup>336</sup>另外，他在觀察日本與德國的崛起案例，發現大國的崛起常常打破當時環境的均勢狀態，而且大國的崛起速度都非常快速，他對德國崛起描述道：「德國的成長與發展只經過一個人的一生的時間，德國就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而且仍然處於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中。」這用來觀察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同樣令人感到驚訝。<sup>337</sup>杭亭頓則認為，冷戰後美國處理國際事務的態度常常令其他國家認為美國是在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且美國時常向其他國家推銷自身的價

---

<sup>334</sup> William C. Wohlforth, 1999,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1, pp. 15-19.

<sup>335</sup> *Ibid.*, pp. 5-41.

<sup>336</sup> Paul Kennedy,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19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sup>337</sup> 朱鋒、羅伯特·羅斯(Robert Rose)主編，《中國崛起：理論與政策的視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44-145。



值與觀念，使其他國家反而受到威脅，而這些區域性的大國將有能力對美國這些行為進行反對。<sup>338</sup> 由此可見，美國國內對中國威脅論的觀點，部份是對中國大陸綜合實力逐漸增加而感到恐懼，也顯示美國對自身國力日漸消融的背景下而備感壓力。

而在中國威脅論的軍事面向裡，中國大陸的軍費在國家經濟不斷成長下亦不斷增加，使周邊國家與美國對此感到擔憂；同時，北京對於軍事預算持續增加一直沒能給予外界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儘管官方表示軍費增加多半是人事費用負擔增加之故。但是，一般外界認為其每年公布的軍事預算，僅佔實際支出的一小部分，有些軍費項目甚至完全不見於官方數字之中，因此中國大陸的軍事支出應遠高於公布的數字。畢新格便指出北京當局所公佈的的預算數字中未公開的開支，包括：研發費用、武器進口、人民武裝警備部隊和民兵與後備部隊的經費、軍事工業複合體所接受的國家補助、人民解放軍經營事業的營收等。<sup>339</sup> 因此，美國前國務卿萊斯即主張中國大陸伴隨經濟崛起之際，亦可能將成為軍事強權，並且對美國構成挑戰。<sup>340</sup>

東南亞國家所關注的「中國威脅」又與美國的擔憂存在某些差異。在中國威脅論中的軍事面向，東南亞國家的認知可以區分為兩個面向，對於中國大陸軍備現代化以及海空軍戰力不斷提升，東南亞國家接受北京的說辭：此行為乃針對台海問題，而且他們也不認為中國大陸隨著軍事力量上升後會出現擴張領土的行為。但是，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並未就此一帆風順，因為在整個九〇年代裡，雙邊關係陷入緊張的來源在於南海主權問

---

<sup>338</sup> Samuel P. Huntington, 1999,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pp. 35-49.

<sup>339</sup> 方淑惠、余佳玲翻譯，佛蘭納根(Stephen J. Flanagan)與馬提(Michael E. Marti)主編，2005，〈人民解放軍與變動的中國〉(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 in Transition)。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頁 246-247。

<sup>340</sup> Condoleezza Rice, 2000, op. cit., pp. 45-62.

題。儘管中國大陸於二〇〇二年與東協簽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sup>341</sup>，可是在事實上並未能有效解決此一問題，因此本文也認為南海問題將是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間最大的障礙，即此一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則東南亞國家便對中國大陸有所擔憂，而此一問題亦使得美國有介入的藉口。

中國威脅論中的經濟面向裡，中國大陸的高經濟成長究竟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產生什麼影響？其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是否損害東南亞國家的利益？其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出口市場的擴大是否排擠東南亞國家的出口？在貿易方面，約翰·雷文修(John Ravenhill)以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對日本及美國市場中五項重要出口商品（包含辦公設備、電子設備、電信與音響設備、服飾、鞋類）的變化，觀察東南亞國家是否受到中國大陸加入世貿組織而損失。研究結果顯示，東南亞國家僅在對日本出口電子設備項目中，同時占有出口總額上升與市場佔有比例上升的優勢；在電信與音響設備以及服飾類方面，僅出口總額上升但是市場佔有比率在中國大陸的影響下而逐漸減少；在辦公設備與鞋類出口方面，東協國家不僅市場佔有比例下降，而且出口總額亦下降。<sup>342</sup>此一事實顯示，就東協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所受到的影響，現實情況甚至比早期的預測更加嚴重，顯示中國大陸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確實對東協國家對外出口產生負面影響。

在一九八〇年代，東亞地區的貿易呈現一個三角貿易模式。

---

<sup>341</sup>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002.11.04, <http://www.aseansec.org/13163.htm>。

<sup>342</sup> John Ravenhill, 2006, "Is China An Economic Threat to Southeast Asia?" *Asian Survey*, Vol. 46, Issue 5, pp. 664-669.

由東北亞國家出口零組件到東南亞國家，隨後東南亞國家將產品組裝並出口到已開發國家；而在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新的三角貿易模式已經取代一九八〇年代舊的三角貿易模式。在新的三角貿易模式裡，東亞國家出口零組件至中國大陸，隨後由中國大陸將產品組裝並出口至已開發國家。但是得益的國家僅包含香港、日本、南韓與台灣，這四個經濟體佔據中國大陸進口半成品總額的三分之二。日本對中國大陸出口的百分之四十屬於半成品，而香港、韓國與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中的百分之六十亦為半成品。<sup>343</sup>從這裡可以看見東協國家必須在新的三角貿易模式中尋找生存的空間，一方面是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間在經濟上缺乏互補性，二方面是雙方在面對其他國家的出口上亦呈現競爭關係，這對未來雙方的關係可能產生負面影響與衝擊。<sup>344</sup>

儘管從九〇年代至今，中國大陸與東協間貿易額呈現倍數的成長，可是仔細觀察雙邊貿易結構時，還是可以發現其中的變化。主要轉變是從一九九〇年代以來，東協對中國大陸出口品中製成品所佔比例逐漸增加，在一九九八年時已達到百分之五十，而這一比例在二〇〇五年時已達到所有出口商品的三分之二。但是，東協國家自中國大陸進口增加的額度與比率更是快速，所有東協國家對中國大陸的出口總額佔其國家整體出口總額的比例都明顯偏低。<sup>345</sup>而本文第五章亦蒐集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六國間自一九九三年至二〇〇九年間貿易數據，此一數據亦顯示部分國家對中國大陸的貿易存在大幅逆差，且就東協十國整體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數據亦為逆差。

另外，加州大學教授貝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與童

---

<sup>343</sup> Ibid., pp. 669-670.

<sup>344</sup> Ibid., p. 508.

<sup>345</sup> Ibid., pp. 670-671.

輝(Tong Hui)，以一九九〇至二〇〇三年中國大陸與亞洲國家的經貿關係為基礎，其研究結果指出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對東亞地區產生正反兩面的影響。首先，中國大陸對第三方市場的出口對其他亞洲國家具有排擠效果，尤其是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低收入國家，正面臨中國大陸的強烈的挑戰與競爭；其次，出口機械設備的高收入國家儘管受到中國大陸的挑戰與影響，但是此一負面影響因中國大陸本身國內龐大市場的需求而抵消。<sup>346</sup>而在中國大陸吸引外資對其他國家是否產生負面影響？其結果亦顯示，反而是高收入國家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額有正面影響；然而，對那些與中國大陸對三方貿易存在競爭關係的國家則正面效果極弱。<sup>347</sup>上述研究結果皆顯示，中國大陸加入現有的國際貿易中確實對東協國家產生許多負面的影響與衝擊。

## 貳、中國機會論

雷文修首先批評現有的研究成果都沒有使用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數據進行分析，因此先前的研究成果多半屬於預測性質，而他的文章便是根據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四年來的數據，來觀察對東南亞國家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在外國直接投資部分，中國大陸所接受外國直接投資額的增加幅度確實較東南亞國家成長的速度快，使得東南亞國家或是部分學者有所疑慮，認為東南亞國家接受外國直接投資額的減少，主要影響因素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加入。<sup>348</sup>蕭耿(Geng Xiao)認為中國大陸統計外國直接投資額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來自於「返

---

<sup>346</sup> Barry Eichengreen, Tong Hui, 2006, "How China is Reorganizing the World,"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Vol. 1, No. 1, pp. 75-79.

<sup>347</sup> *Ibid.*, pp. 80-82.

<sup>348</sup> John Wong and Sarah Chan, 2003, "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Shaping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43, Issue 3, p. 523.

程投資」(round-tripping)所致。首先，他指出這些外資中可能有許多是中國大陸國內的資金，為了享有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因而將資金匯出後再重新匯入，使其亦可享有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其次，至二〇〇二年底，中國大陸累積已註冊的424196家外資企業中，已有百分之四十八宣告倒閉。<sup>349</sup>顯示這些到中國大陸投資的眾多外資企業中，它們通常僅存在幾年的時間，隨著優惠政策的結束而離開，甚至將資金匯出後再重新匯入，或者更改公司行號等，使其繼續享有政府所提供的優惠政策。因此，東南亞國家並未因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中蒙受損失。

中國大陸官方、輿論與中國大陸學者亦不斷強調，中國大陸持續經濟擴張，可促使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在貿易往來、吸引外資、經濟合作等方面的互補性發展，反而可促進東協國家的經濟發展與整合，同時，東協國家的華人跨國集團對於投資中國大陸具有相當的貢獻，這對於促進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的經濟整合與產業分工過程中亦十分重要。<sup>350</sup>我國學者吳德美、曾聖文的研究的實證估計結果顯示，東協國家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有助於自身經濟成長、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有益於東協國家經濟成長、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也有益於東協國家出口成長、以及「東協六國」對中國大陸外國直接投資，對「東協六國」的出口成長有正向影響。<sup>351</sup>究其原因，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擴大其內需市場需求，而其廣大的市場需求不但有助於東協國家的出口擴張，並吸引「東協六國」

---

<sup>349</sup> Geng Xiao, 2004,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Round-Tripping FDI: Scale,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ADB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4, pp. 1-48, [http://scholar.google.com.tw/scholar?hl=zh-TW&q=eople%E2%80%99s+Republic+of+China%E2%80%99s+Round-Tripping+FDI%3A+Scale%2C+Causes%2C+and+Implications&btnG=%E6%90%9C%E5%B0%8B&lr=&as\\_vlo=&as\\_vis=0](http://scholar.google.com.tw/scholar?hl=zh-TW&q=eople%E2%80%99s+Republic+of+China%E2%80%99s+Round-Tripping+FDI%3A+Scale%2C+Causes%2C+and+Implications&btnG=%E6%90%9C%E5%B0%8B&lr=&as_vlo=&as_vis=0).

<sup>350</sup> 吳德美、曾聖文，2005，〈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對東協經濟發展影響〉，《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3期，頁66。例如：謝志鵬、郭曉合、李東與巒雅鈞、高尚全、以及田中青、王偉君與鍾乃儀等之研究。

<sup>351</sup> 這裡的東協六國是指：新加坡、汶萊、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與印尼。

跨國集團對於中國大陸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並且帶動其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成長。<sup>352</sup>

除了經貿層面的觀點外，中國大陸崛起為一不可忽視的強權，與其交往與合作有助於中國大陸融入現有秩序，避免其成為一非理性的崛起強權；同時，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大陸享有相似的政治與社會文化，面對美國後冷戰時期人權與民主的主張，彼此處於同一陣營，可共同針對美國提出的要求與施加的壓力加以拒絕，避免國內事務受到外部的干預。

### 第三節 冷戰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雙邊關係之發展

#### 壹、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六國關係變化

北京與新加坡自冷戰時雙邊便存在非正式關係，鄧小平還曾於一九七八年訪問新加坡，他對當時新加坡的經濟策略感到佩服，因為新加坡經濟成長迅速且國家維持嚴格的政府管控，他認為這種策略可以作為中國大陸國家發展的學習對象。雙方直至一九九〇年才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新加坡亦是東協成員中與北京最晚建交的國家。前總理李光耀認為中國大陸是重要的國家，有必要將它納入亞洲的權力體系中，他認為對中國大陸的應採取交往策略，一面協助中國大陸參與國際秩序，又一方面也塑造其他國家對中國大陸政策的共識，避免冷戰在亞洲重新復甦。然而，新加坡並非全然地擁抱中國大陸的崛起，一旦中國大陸以武力手段處理外交事務或從中獲取國家利益時，新加坡可能倒向美國與

---

<sup>352</sup> 同註 350，頁 81。

美國的聯盟共同遏制中國大陸。<sup>353</sup>

北京與馬尼拉在九〇年代裡曾因美濟礁島事件使關係一度緊張，雙方甚至屢屢為南中國海主權問題發生齟齬，其中又以漁民誤闖海域事件最為頻繁。二〇〇二年九月菲律賓司法部長裴瑞斯(Hernanado B. Perez)因中國大陸駐菲律賓大使王春貴出言不遜，且就一百二十二名大陸漁民被扣問題恫嚇他，因此要求菲律賓外交部將王春貴列為不受歡迎人物，<sup>354</sup>使雙方關係再度受到挫折。然而，鑑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機遇，羅慕斯在任內曾下令取消菲律賓對大陸貿易歧視措施，雙方經貿關係自此走上正軌。尤其是一九九六菲律賓作為亞太經合會主辦國，江澤民前往菲律賓參加非正式領袖高峰會並進行國事訪問，與菲律賓總統羅慕兩人同意建立中菲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睦鄰互信合作關係，並就南海問題上強調「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達成共識和諒解。二〇〇〇年，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菲律賓共和國政府關於二十一世紀雙邊合作框架的聯合聲明》，確定在睦鄰合作、互信互利的基礎上建立長期穩定的關係。<sup>355</sup>

一九九〇年，中國大陸與越南兩國為恢復關係正常化而展開一系列外交秘密行動，越共總書記阮文靈與部長會議主席杜梅於九月至四川成都，會見時任總書記江澤民與國務院總理李鵬，雙方本著「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向前看的態度，簽署了「會談紀要」。隔年(1991)十一月，越共總書記杜梅訪華並發表聯合公報，宣布中越關係邁入正常化。此後，雙方高層接連互訪，並就邊界領土問題著手和平談判協商，雙方先後簽署《中國和越南陸地邊

<sup>353</sup> 同註 18，頁 270-271。

<sup>354</sup> 邱稔壤，〈從博鰲亞洲論壇看菲律賓與中共雙邊關係之發展〉。蔡瑋主編，2005，《中國和平發展與亞太安全》。台北：政大國關中心，頁 126。

<sup>355</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0，《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菲律賓共和國政府關於 21 世紀雙邊合作框架的聯合聲明》，<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

界條約》、《兩國在北部灣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界協定》，解決阻礙雙邊已久的邊界問題。越南總理阮晉勇於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至二十五日期間，到中國大陸進行正式訪問並出席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阮晉勇總理與多位北京領導人舉行晤談，並於北京發表聯合聲明，建立中越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雙方承諾高層會談將更加密集，以尋求在更多領域中加強雙邊的合作。<sup>356</sup>而在南海主權爭端中，越南為東協國家中佔據最多島嶼的國家，該國為擁有主權的合法性，除積極鼓勵移民屯墾之外，亦將這些島嶼納入鄰近越南本土的省籍政府中來管轄，更於二〇〇七年進行國會議員改選之際，為這些島嶼設置議席代表，企圖建立主權的合法基礎。

印尼認同其他東協國家的觀點，即應付中國大陸最適當的方式，就是試著根據共同的國際行為規範，將其納入區域秩序。儘管冷戰時期雅加達與華府維持著緊密的關係，且北京與雅加達的關係於冷戰後才改善，然而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後，由於經濟大幅衰退，使印尼國防預算被迫大幅刪減；另外，雅加達與華府間又因人權問題困擾著印尼，使華府一度暫停與雅加達間的軍事交流與軍事武器採購計畫，導致印尼瓦希德政府為減輕對西方國家的依賴，而轉向莫斯科或北京採購軍事武器，尤其是在面對美國人權批評上，北京與雅加達是站在同一立場。在雙邊經貿上，印尼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而中國大陸由於經濟發展的需要，雙邊的貿易關係迅速提升，尤其在石油與天然氣方面，使得印尼成為中國大陸重要的供應來源國之一。<sup>357</sup>此外，雅加達似乎感受不到中國大陸的威脅，一方面是雙方距離較遠，二方面是雙方在南

<sup>356</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2008，《中越聯合聲明》，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mfa.gov.cn/chn/pds/ziliao/1179/t519489.htm>。

<sup>357</sup> 余忠勇等翻譯，理查·艾林斯(Richard J. Ellings)、阿隆·佛瑞柏格(Aaron Friedberg) 編，2002，《2001-02 戰略亞洲》。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頁 377。



海問題上並無明顯主權爭議，唯一令雅加達所擔心的可能是納土納島(Natuna Besar)的問題，據中國大陸地圖顯示，北京將整個南海地區納入其管轄範圍，<sup>358</sup>北京認為其擁有該島東北方一百八十公里處有一座天然氣油田，但此舉與印尼自該島延伸而出的專屬經濟區有所衝突，故印尼為加強對納土納島的主權宣示，屢屢在該島附近舉行軍事演練。上述資料顯示印尼在不放棄與中國大陸從事建設性交往下，另一方面又以行動表示出其對北京的警戒心態。

馬來西亞於一九七四年便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也是東協創始會員國中第一個與中國大陸邁向關係正常化的國家。雖然就經貿面向及美國人權批評等問題上，北京與吉隆坡存在較多的共識，同時也批評美國干預他國內政的行為。對此，前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曾表示：「美國說我們正受到中國大陸的威脅，但是我不認為中國大陸的威脅會比美國的威脅還來得嚴重。」<sup>359</sup>尤其在經貿領域裡，馬哈地在中國大陸前總理李鵬於一九九〇訪問馬來西亞時，馬哈地在吉隆坡提出東亞經濟論壇倡議，儘管北京方面在一開始態度相當保留，但隨後便給予充分的支持。然而，馬來西亞內部對中國大陸的態度其實存在某些分歧，如外交部與馬哈地本人往往比軍方更為樂觀，「一九九五年外交部長阿布杜拉·巴達威曾發言反對『根據能力而非合作潛能』看待他人的『冷戰心態』。他否認權力平衡是維持穩定的條件。」(Wayne Bert, 2005)另一方面，軍方的態度為「馬來西亞的國防規畫者直率地表達美國勢力存在的必要性，而且對中國大陸未來意圖持保留的態度。馬來西亞三軍情報機構(Armed Forces Intelligence)的領導人直言不諱地評估那些危險可能需要美國的協助，並且明確表示維持權力平

---

<sup>358</sup> 同註 18，頁 276-277。

<sup>359</sup> 同上註，頁 280、286。

衡的必要性並未被區域機制或其它的極體協定所取代。(Wayne Bert, 2005)」<sup>360</sup>顯見馬來西亞對中國大陸崛起的態度依然有所保留，尤其是馬來西亞傳統上強調不結盟的外交政策；但是，一九九〇年代馬來西亞還是提供美國一處軍事補給與維修的合作。

北京與曼谷的關係始與一九七〇年代後期，起初為因應越南在柬埔寨的擴張行為，曼谷向北京靠攏以對抗越南與蘇聯的影響力，而且曼谷是東協國家中最早向北京採購軍事武器的國家，亦成為中國大陸武器留向柬埔寨反韓森軍隊的重要管道。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後，中南半島的情勢也隨之穩定，使得東南亞地區安全的焦點轉移至南中國海問題上；但是，泰國對南沙群島並沒有主權主張，泰國認為在南海問題上北京並沒有對曼谷產生威脅。然而，中國大陸與緬甸緊密的關係卻對泰國國內安全造成威脅，主要是緬甸政府所默許的瓦邦聯合軍(United Wa State Army)在泰緬邊境生產非法毒品，其延伸出來的毒品交易已經成為泰國國家安全首要問題之一。二〇〇一年二月時，還曾發生緬甸一支軍隊進入泰國的事件，引發雙邊緊張的關係。<sup>361</sup>由於北京在緬甸的影響力及其對緬甸輸出軍事武器，使得曼谷在此一問題上對北京保持警戒。

## 貳、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國協關係變化

中國大陸於一九七九年便實施改革開放，且越南的擴張問題使北京與東南亞國家找到共同合作的立基點，但是冷戰期間中國大陸對於東南亞地區的關注主要為越南擴張行為，使得此一時期中國大陸與各國的關係主要著重在政治層面而較少涉及經濟與安

---

<sup>360</sup> 同上註，頁 286。

<sup>361</sup> 同註 357，頁 380-382。

全面向的合作。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合作範圍日漸廣闊且逐漸加深，在政治上，中國和東協國家在人權與民主議題上站在同一陣線，共同反對西方藉此議題干預他們的國家內政；在安全上，北京透過參與東協區域論壇，並著重於發展非傳統安全之戰略合作，如海盜猖獗、環境汙染與跨國犯罪，尤其是人口販賣與毒品走私查緝與疾病管制等；在軍事上，目前主要是雙邊軍方領導人互訪為主。這些議題對國家主權或領土皆不構成危害，且一旦問題獲得解決，所有關係者將互蒙其利。<sup>362</sup>

雙方合作的範圍漸廣且深，包含中國大陸於一九九四年參與「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雙方於二〇〇二年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二〇〇三年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TAC)<sup>363</sup>、二〇〇三年中國東協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協國家領導人聯合宣言—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Heads of State/Governm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sup>364</sup>等。經貿上，中國大陸與東協於二〇〇二年正式啟動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國與東協在寮國首都永珍簽署「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朝推動成立自由貿易協議區的方向推進。而「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亦於今年(2010)正式成立，雙方的貿易總額亦逐年增加，雙方皆為彼此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

---

<sup>362</sup> Chung, Chien-peng, 2004, "Southeast Asia-China Relations: Dialectics of "Hedging" and "Counter-Hedging"," *Southeast Asia Affairs*, Vol. 2004, p. 46.

<sup>363</sup>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Indonesia, 1976.020.24, <http://www.aseansec.org/1217.htm>。

<sup>364</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3.10.10，〈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協國家領導人聯合宣言—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27721.htm>。東南亞國家協會，<http://www.aseansec.org/15265.htm>。

雙方關係在冷戰結束後的變化與發展，對北京而言，其與東協國家加強政治、經濟、安全與軍事等各方面的合作，主要考量因素包含：第一，突破美國圍堵：就國際大環境而言，冷戰期間中國大陸先後遭受美國與東亞國家、蘇聯與越南的包圍，即使冷戰已經結束且整體大環境較以往安定，東面依然存在「美日安保條約」的圍堵、西向的俄羅斯與印度；<sup>365</sup>同時，中國大陸對美國在此區域的聯盟與共同軍事演習也懷有疑慮。第二，防止日本成為經濟強權甚至是區域強權：二次大戰後，日本經濟迅速復甦引發大家的關注，尤其是一九七〇、八〇年代時，美國國內更掀起一波日本經濟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疑慮；另一方面，冷戰結束後，東亞國家對美國撤軍的計畫，擔心東亞其他大國可能填補此一權力真空，<sup>366</sup>而這些國家對日本二次大戰時的行為記憶猶存，故頗為擔心日本未來在東亞地區所扮演的角色。對中國大陸而言，日本經濟實力對東亞地區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故原先東協國家所倡議的東亞經濟圈亦積極希望日本能擔負重任；但是，在日本遲遲沒有立即表態的背景下，而北京亦擔憂日本以經濟開發的名義，壟斷東南亞地區的資源，增添其成為區域霸權的能力，故在防範日本的考慮下，對東協國家的倡議改採積極參與和合作。第三，南中國海主權爭端懸而未決的背景下，北京一面強調「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降低雙方發生武力衝突的可能性，並積極宣揚睦鄰政策加強雙邊關係，藉此對外擴張影響力，對於南海、東沙等未開發石油資源，亦可能進展成實質的經營權，進而掌握東南亞地區的自然資源。第四，配合中國大陸國家發展戰略：與東南亞國家加強經貿關係，不僅符合北京朝向經濟成長與繁榮的策略，有利於雙方建立穩定互信的關係，亦有助於發展周邊國家的經濟，藉此鞏固周邊安全以創造和平穩定的區域秩序，

<sup>365</sup> 劉二龍，2002，〈經濟與政治的接軌—由東協自由貿易區看中共區域版圖的擴張〉，《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8期，頁61、63。

<sup>366</sup> 徐景芳，1993，〈東盟國家防務淺析〉，《東南亞研究》，第4期，頁33-34。

而穩定的區域環境亦有利於中國大陸持續發展經濟的國家戰略。

367

另一方面，東協國家考量中國大陸經貿崛起的威脅面向與機會面向後，依然與其建立多方位的互動與合作，東協國家主要考量因素為：第一，東南亞國家皆認同中國大陸是不容忽視的大國，為維護地區形勢的安全與和平，不能將其排在外，更應鼓勵其參與區域合作，加強彼此間的互信與互賴，才是穩定區域秩序的重要關鍵。第二，拒絕受大國干預並力圖維持國家自主權。蘇聯瓦解後九〇年代裡，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國家，時而運用各種方式壓迫其他國家滿足其國家利益，故東協國家與中國大陸積極交往的意義，如同香港學者鮑紹霖(Danny Paau)所談到的，「顯然亞洲國家樂見美國單邊主義受到挑戰，也藉機對超級大國的傲慢表示不滿。」<sup>368</sup>而且雙方在面對西方人權與民主觀念上立場一致，可共同抵抗西方國家的施壓。第三，對「潛在威脅」持續戒備。此一威脅又可以分為國內與國外兩部分，部分東南亞國家內部存在分離主義運動，以及恐怖主義組織時常對國內秩序造成衝擊，為免除國家再度陷入動盪，他們認為經濟發展將是國家穩定的重要關鍵，而經濟成長迅速的中國大陸便成為東協國家合作的對象；國際環境部分，東南亞地區在後冷戰時期依然存在著危及和平和安全的不利因素，包含對「力量真空」以及擔憂具備強大經濟與軍事力量的日本可能進行填補、大國干預的現象依舊頻仍、中國大陸崛起且未來意圖並不可測、加上歷史遺留下來的領土糾紛和領海爭端，可能成為未來此區域的熱點。<sup>369</sup>因此，東協國家自九〇年代起，便積極倡議在東協的基礎上成立若干機制與組

<sup>367</sup> 張惠玲，2002，〈中共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之戰略考量評析〉，《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7期，頁9-10。

<sup>368</sup> 同註278，頁129。

<sup>369</sup> 同註366。

織，並邀請大國參與，而崛起中的中國大陸自然成為邀請對象之一。第四，東協組織重要性日漸提升。冷戰結束後東協國家綜合實力不斷提升，加上各大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爭奪，使得東協得以巧妙地利用大國間的矛盾為自己提生在亞太地區的地位服務，這些國家才能以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並拒絕出現一個擁有能力支配此一區域的潛在霸權。

由此可見，東南亞國家依然將維持國家獨立、外交政策的自主性、區域和平與經濟成長視為最主要的國家戰略目標。如同上文馬哈地對美中兩國的看法，顯然美國並無法滿足東南亞國家所有的安全需求，甚至有時是威脅的來源，故東協國家加強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可在許多議題上避免美國直接的干預，確保東南亞國家主權的完整性。然而，上述的考量亦針對中國大陸的崛起而來，東協國家瞭解到傳統維護國家安全的方式可能造成安全困境，故藉由經濟的相互依賴與安全上的多邊合作避免現實主義中自我實現的困境；同時，東協國家亦積極維持與美國的關係，避免未來中國大陸出現任何破壞現狀行為時，東協國家能有安全上的依靠。<sup>370</sup>學者將東協國家此一行為視為避險策略。

### 參、東協國家的避險策略與中國大陸的反避險策略

然而，學者對於避險策略的意義卻存有分歧，如羅伊將「避險」視為一種低度的制衡，即該國家一面與華盛頓採取同樣的策略制衡中國大陸，另一面努力與北京維持穩定與友好的關係。<sup>371</sup>但是，他也指出避險可能並不包含制衡的面向，它可能是指國家對未來情勢發展感到不確定，因而採取避險的策略，使自己能保有

---

<sup>370</sup> Evan S. Medeiros, op. cit., p. 146.

<sup>371</sup> Denny Roy, op. cit., pp. 305-306.

自有選擇的彈性。吳翠玲則認為避險所指的意涵為：「避免國家落於必須作出選擇制衡或扈從的境地」。避險策略並非捨棄交往而單純以圍堵或制衡作為單一的戰略取向，避險策略其實同時包含上述兩個面向。此一策略主要作為應付現在或未來意圖並不確定的崛起中國家，使中小型國家或周邊國家可以在交往過程中提供保障。他更指出，其實在冷戰時期的兩極體系時代裡，當美蘇雙方在一九七〇年代步入低盪時期時，避險策略便已出現。<sup>372</sup>尤其是冷戰時代結束後，大部分國家都採行此一策略，唯獨美國至近期才提出此一策略。上述兩位學者的主張顯示，面對中國大陸未來角色和意圖不明的情況下，避險行為使東協國家追求經濟利益時，將使安全上的風險化為最小，以回應其所處的不穩定環境。<sup>373</sup>

但是，東協國家避險行為對中國大陸的國家安全造成何種影響？在北京與華府間缺乏戰略互信，且存在一些根本性矛盾的背景下，尤其是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增強在亞太地區軍事部署，這在客觀上已形成預防性的戰略包圍。<sup>374</sup>此外，美國與東協國家的雙邊與多邊軍事合作，尤其是軍事演習，不僅對北京能源供應與管道安全構成威脅，同時也為這些國家在南中國海主權爭端上壯膽，增加解決南海主權爭端的難度。<sup>375</sup>因此，東協國家避險行為中，與美國加強安全合作的面向，對北京周邊安全環境已造成威脅。

針對東協國家避險行為上，北京亦瞭解到美國與東南亞國家間也存在許多分歧，這限制了美國與東南亞國家安全合作的範圍

---

<sup>372</sup> Evelyn Goh, 2006, "Understanding "hedging" in Asia-Pacific Security," CSIS PacNet, Number 43, pp. 1-2.

<sup>373</sup> Cgung, Chien-peng, op. cit., pp. 35-36.

<sup>374</sup> 從慧，2005，〈美國反恐戰略及其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第5期，頁106-111。

<sup>375</sup> 同註216，頁277。

與深度；同時，利用東南亞遏制北京的戰略意圖是美國人的想法，而此一想法未必完全獲得東南亞國家的支持。<sup>376</sup>因此，中國大陸對東協國家採取的避險政策採取「反避險」(counter-hedging)策略，欲降低東南亞與美國間的依賴關係，此一策略包含：南沙爭端上，北京希望沒有涉及主權爭議的國家不要涉入此問題；推行一個中國政策，避免台灣運用經濟能力改變現狀；加強北京與東南亞國家在政治、經濟的連結；由於中國大陸經濟穩定地快速成長並成為亞洲經濟的動力來源，且積極透過財政上的支援以力支持此區域中若干組織與計畫。<sup>377</sup>藉此弱化美國與東協國家間的關係，甚至有助於破解美國的圍堵，並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加強中國大陸在此區域的影響力，使其有機會成為亞洲的領導國家。<sup>378</sup>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長期以來主張多極化的國際格局，認為此一主張較兩極化更有助於世界和平、穩定與繁榮。因此，在一九九七年九月召開的十五大裡，將推動國際多極化、大國外交、睦鄰友好政策，列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隨後更將其與東協或東南亞各國關係提升至大國外交的層級，尋求雙方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以示北京對東協與東南亞各國的重視；此舉亦顯示北京正由原來適應多極化的趨勢轉為積極促進多極化的發展。<sup>379</sup>然而，吾人必須注意此一戰略夥伴關係的意涵，如前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便認為戰略夥伴的意義是指：「雙方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尋求合作，在具有歧異之處尋求解決之道。」<sup>380</sup>而勿將此一關係視為傳統現實主義中的聯盟關係。大陸學者曹雲華觀察一九九〇年代末期至今，中國大陸先後與許多國家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其所共

---

<sup>376</sup> 同上註，頁 278-279。

<sup>377</sup> Cgung, Chien-peng, op. cit., pp. 37-38.

<sup>378</sup> 同註 216，頁 280-281。

<sup>379</sup> 邱坤玄，1999，〈中共高層領導出訪的意義與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 12 卷，第 12 期，頁 10。

<sup>380</sup> 鄭玉瑞，1999，〈美中（共）戰略夥伴關係與中共軍事現代化的威脅〉，《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1 期，頁 68。



有的特點包含非結盟性、非軍事性與非排他性，<sup>381</sup>這種合作關係被視為是對冷戰時期結盟、敵視、對抗的國家關係的否定，<sup>382</sup>透過國家之間的頻密交往，積極拓展合作領域的範圍與深度，並藉由建立夥伴關係加強彼此間互信、友好關係，為中國大陸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

## 第四節 冷戰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六國關係之挑戰

已有學者開始著墨未來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大陸採取扈從的可能性，但由文中資料來看，東南亞國家是趨向避險策略發展。其主要因素便是懸而未決的南海主權爭端，尤其在中國大陸海洋戰略與海軍戰略的驅使下，顯示北京有意成為海上強權與世界強權的決心。因此，未來北京如何處理南海主權爭端，可能成為未來東南亞國家採取制衡或扈從的關鍵因素。

我國東亞問題研究的專家陳鴻瑜教授與中國大陸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指出南中國海主權問題中，南沙問題為主要的爭端來源，而此一爭端的起源有以下因素所構成：

第一，就地緣戰略而言，南沙群島分布位置從東南向西北伸展一千公里，南海擁有世界上最重要戰略航線的地位，通過南海空中或海上航線基本上都要通過南沙群島。因此，佔領這些

---

<sup>381</sup> 大陸學者曹雲華與唐翀針對戰略夥伴關係於其書中作出以下說明：「『非結盟性』：戰略夥伴關係並不同於傳統的聯盟，傳統的聯盟理論認為國家之間的結盟行為乃是針對某一共同敵人或威脅的正式或非正式安排，以增進彼此的安全。另一方面，中國與東協國家間並不存在共同的威脅。因此，戰略夥伴的關係不能與傳統的聯盟劃上等號。『非軍事性』：建立此一關係乃雙方有意願加強政治、經濟與安全等多元領域的合作，既沒有軍事目的，亦不真對第三者。『非排他性』：中國與東協國家建立此一關係並不阻礙東協國家與其他國家建立此一關係，亦不損及其他國家的利益。」詳見曹雲華，唐翀，2005，《新中國—東盟關係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44。

<sup>382</sup> 楊玲玲，2000，〈構築新型國家關係維護中國國家利益〉，《團結》，第2期，頁28。

島礁便控制從馬六甲海峽到日本，甚至是從東亞到西亞、非洲和歐洲的多數海上航道。<sup>383</sup>正是此一重要的戰略意義，使得此地區在冷戰時期便受到美蘇兩大強權重視，分別在蘇比克灣與金蘭灣建立軍事基地以佔據此一重要的戰略要地。

第二，此地區自然資源豐富，包含漁產資源、天然肥料甚至是石油與天然氣皆極為豐沛，尤其是一九七〇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使各國立法宣佈其主權範圍，並進行探勘與開發，這些天然資源對開發國的出口造成相當大的正面影響。

第三，國際海洋法的影響。一九五八年聯合國召開第一次海洋法會議通過《領海及毗連區公約》、《公海公約》、《捕魚與養護公海生物資源公約》及《大陸架公約》，確立領海的地位與增加專屬經濟海域的範圍，賦予各國擁有領海與專屬經濟區的範圍。此舉不僅侵犯原擁有主權的國家，且所延伸出來的海域可能與其他國家主權範圍重疊等因素，使海域範圍或島嶼主權爭端頻仍。

第四，殖民主義侵略和大國爭霸也對南沙主權爭議造成影響，因為部分周邊國家主張其主權繼承自過去的殖民國家。<sup>384</sup>而其他未涉及主權爭端的大國，覬覦此地區所佔據的戰略意義，以及對中國大陸崛起的擔憂，紛紛尋求與周邊國家尋求合作的可能性，使得這些區域外的大國亦可能對此地區主權爭端造成影響，而這些涉入此一主權爭端的大國亦對中國大陸收復主權帶來挑戰。

---

<sup>383</sup> 陳鴻瑜，1987，《南海諸島主權與國際衝突》。台北：幼獅文化，頁 7-10。

<sup>384</sup> 同上註，頁 119。

第五，南沙群島按地理型態可分為暗灘、暗沙、暗礁、沙洲與沙島五種類型，且南海潮差可達半米，有的島嶼在海水漲潮時便幾乎被淹沒，僅有少數幾個島嶼擁有淡水資源，使得任何一個聲稱擁有主權的國家都難以對其維持持續且有效的占領。<sup>385</sup>

由於上述因素引發周邊國家的主權爭端，而目前各國的主權主張，主要基於以下幾項理由：第一，以日本、法國「放棄」為由主張「繼承」南海諸島的主權。越南與菲律賓認為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對日和約》中，規定日本放棄南沙群島等，但未規定交還給誰。因此，越南追溯至法國殖民時期，於一九三二年曾經對外宣稱擁有西沙群島與南沙群島，並以武力佔據部分島嶼，而越南獨立後理應繼承法國殖民時期所留下的主權範圍主張。菲律賓則認為，美國軍隊曾控制的島嶼，在菲律賓獨立後美國亦將此歸為菲律賓所有，認為這是菲律賓由美國繼承主權的說法。<sup>386</sup>第二，以「無主地」為由從事佔領行為。如一九四七年菲律賓人克洛馬，宣稱其在中國南沙群島地區發現一群無人島嶼，並將這些無人島稱為「自由地」，強調基於「發現與佔領之權利」擁有該區域，並且致信菲律賓政府要求承認。菲律賓政府對此回應：「只要菲國民依法行事的話，菲政府不會不關心他們在這些無人居住和未被佔領的群島上的經濟開發和定居的問題。」<sup>387</sup>第三，國際海洋法的適用，使鄰國紛紛頒布法律明定該國經濟海域範圍而造成衝突。如一九七七年五月，越南發布《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關於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聲明》；<sup>388</sup>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一日，菲律賓頒布第一五九九號總統法令，宣布建立二百海浬專

<sup>385</sup> 吳士存，2010，《南沙爭端的起源與發展》。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頁4-5。

<sup>386</sup> 同上註，頁71-75。

<sup>387</sup> 同上註，頁71-75。

<sup>388</sup> 陳鴻瑜編譯，1997，《東南亞各國海域法律及條約彙編》。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頁239-240。

屬經濟區；<sup>389</sup>馬來西亞亦將將南樂暗沙、校尉暗沙、司令礁、破浪礁、南海礁、安波沙洲一線以南的南沙群島的地區劃入馬來西亞版圖。<sup>390</sup>

另外，各國亦積極透過各種方式鞏固其主權主張，方式包含：第一，主權宣示。越南方面，南越政府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公佈第 143 號總統令，將南沙群島劃為福綏省；一九七九年九月，越南政府發表《越南對於黃沙和長沙群島的主權》白皮書等。菲律賓方面，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一日，菲律賓頒布第一五九六號總統法令，將南沙群島附近海域提出管轄權的主張。另外，菲律賓亦於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及在一九八四年五月八日批准《聯合國海洋公約》。馬來西亞方面，一九六八年，馬來西亞政府開始將中國南沙群島範圍內八萬多平方公里的區域劃為礦區等。第二，軍事占領或軍事演練，甚至與區域外國家加強軍事合作。一九八三年，馬來西亞發表聲明，五國協防條約國將在南海進行為期一周的海軍演習，馬來西亞在軍演結束後，佔據南沙群島中的島嶼—彈丸礁。而菲律賓與越南雙邊亦曾於存在主權爭端的島嶼上，透過軍事人員共同舉辦運動會達到交流的目的等。馬來西亞雖然不斷鼓吹不結盟政策，但是一九九二年馬來西亞依舊提供盧密海軍基地給美國軍艦使用其維修與供應設施。第三，加速資源開發、引進外國石油公司探勘石油。如馬來西亞便對外開放其所擁有主權的島嶼，並規劃成旅遊度假中心。正是上述行為，使得南中國海主權問題成為此地區的安全疑慮。

美國在南海地區領土歸屬問題上，一再聲稱持中立態度，不

---

<sup>389</sup> 同上註，頁 69-71。

<sup>390</sup> 同上註，頁 208-222。

支持任何一方的要求。但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北京政府對西沙群島採取軍事行動時，北京收復金銀、珊瑚與甘泉等島嶼以及若干名俘虜，其中還包含一名美國情報官員；<sup>391</sup>同時，美國海軍亦協助南越軍撤往南沙群島。<sup>392</sup>另外，一九九二年美國克里斯通公司從北京得到了萬安北海區的探勘和約，由於此一探勘範圍是中越雙方有主權爭議的區域。不久後，以美孚公司為首的一個國際財團又從越南得到一個緊靠萬安北探勘區的合作合同。吳士存認為「此時美越雙方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而且美國正對越南採取貿易禁運，此一合同沒有得到政府的私下認可是不可能的。」<sup>393</sup>同時，面對各國在南海問題上的主權訴求，儘管美國政府依然表示其不支持任一方之要求，及保持中立立場外，更鼓勵各方和平解決糾紛。但是，美國在某些情況卻屢屢對某些國家有所偏袒，甚至美國反而將中國大陸視為南海爭端中主要問題來源。

目前普遍認為中國大陸在軍事上還未有能力控制南中國海，在現階段北京不想刺激美國在東南亞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也不希望其採取強硬手段令東協國家更靠近美國。因此，中國大陸在因應南海問題上，亦採取多重策略：第一，與東協簽署南海行為準則宣言，並與東協或東協各國研議相關守則。東協於一九九二年制定有關南中國海問題的東協宣言，呼籲各國約束這些引發爭議的主權訴求；而中國大陸則於二〇〇二年簽署此一宣言。第二，對於中國大陸與周邊國家所涉及的領土或領海主權爭端問題，鄧小平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思想，即雙方「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但是，「先不談主權」絕非「不談主權」，而是靜待時機的成熟與到來。<sup>394</sup>第三，以蠶食方式逐步佔領各島

---

<sup>391</sup> 同註 385，頁 163。

<sup>392</sup> 同註 383，頁 76。

<sup>393</sup> 同註 385，頁 164-165。

<sup>394</sup> 周忠強，2002，〈論鄧小平的對外戰略思想〉，《中共太原市委黨校學報》，第 1 期，頁 45。

礁，並在已控制的島礁上進行工程建設。如北京魚一九九五年佔領美濟礁島，並逐步在菲律賓周邊島礁上樹立界標。<sup>395</sup>第四，在爭議區內部署漁船，宣示主權。並且避免派遣解放軍艦艇在爭議區內驅趕其他國家船隻，而是派遣漁政船以平和方式宣示國家主權海域。

儘管中國大陸目前無法完全掌控宣稱其所擁有南沙群島的全部主權，但此現狀是否將隨著其軍力增強而轉變還有待觀察。由於東南亞國家的軍力不敵中國大陸，故大部分東南亞國家皆歡迎美國海空軍於此地區活動，以保護海上交通線的安全，並防範北京企圖以武力解決南沙群島歸屬問題。未來東南亞的穩定主要視北京是否訴諸武力解決南海問題，如果雙方持續透過多邊機制相互討論與互動，以及透過雙邊互動對問題的釐清，則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將持續深化，並且範圍將更將廣闊。可以確定的是，北京在短期內將避免針對敏感議題去刺激東協國家，並持續強化其於南中國海的主權宣示，同時將逐步設法削弱美國於此一次區域的權力與影響力。<sup>396</sup>下文中將透過各種數據指標，觀察美國與中國大陸間經濟與軍事實力發展的概況做一比較，並針對美國、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六國經貿關係、軍事安全層面的互動作一觀察。

---

<sup>395</sup> 同註 357，頁 394-396。

<sup>396</sup> 同註 173，頁 42。

# 第五章 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東南亞的競逐 與勢力消長

## 第一節 美國與中國大陸經濟與軍事實力比較

本文針對下述指標作一觀察：經濟成長率、全國購買力指數、全國購買力指數佔世界比重、人均購買力指數、軍費支出、軍費支出佔國民生產毛額比重、政府收入佔國民生產總額比重、政府負債佔國民生產總額比重。其實，能衡量觀察的指標甚多，但是許多觀察指標測量困難，故本文僅以近期受矚目的指標為主。

### 一、經濟成長率

由圖 5-1 美國與中國大陸逐年經濟成長率來看，美國經濟每況愈下，在一九九〇年代末遭遇網路科技泡沫，以及在二〇〇七年房地產所引起的泡沫危機，皆使美國經濟遭到劇烈的衝擊。儘管美國已逐漸邁向經濟復甦的道路，但是已開發國家的特徵之一便是經濟成長已無法快速成長，僅能緩步增加；相較之下，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每年皆維持在百分之八的高成長，經濟成長率最低時也保持在百分之七以上的成長。同時，下文中將觀察美國、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狀況，在中國大陸經濟迅速成長的前景下，可以預期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間貿易關係將持續增加；而美國與東南亞國家貿易關係增加速度將趨緩，在佔東南亞國家或東協對外貿易比重上呈現逐步衰退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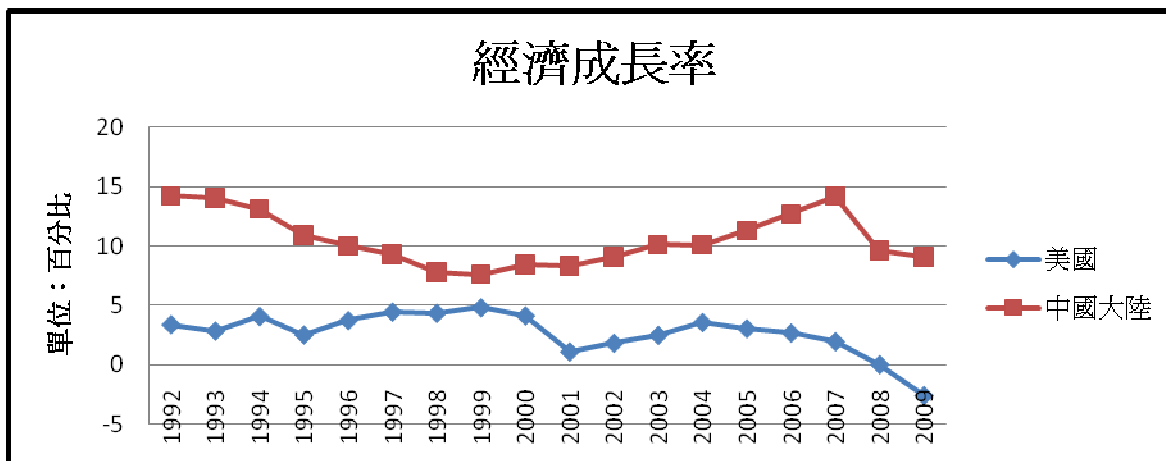


圖 5-1：美國與中國大陸逐年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圖為筆者自行繪製。

註：美國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九年逐年成長率為：3.393, 2.852, 4.074, 2.515, 3.741, 4.457, 4.355, 4.826, 4.139, 1.08, 1.814, 2.49, 3.573, 3.054, 2.673, 1.947, 0, -2.633。中國大陸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九年逐年成長率為：14.195, 14.003, 13.099, 10.9, 10, 9.3, 7.801, 7.599, 8.399, 8.292, 9.101, 10.101, 10.091, 11.29, 12.692, 14.191, 9.595, 9.096。(單位：百分比)

## 二、全國購買力指數

一般國民生產毛額或國民所得並未考量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影響和衝擊，而且國家內部經濟情況未必相同，故採用全國購買力指數作為觀察指標。此一指標已衡量國內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情況，較能比較兩國國民在同樣貨幣值基礎下誰能獲得較多的商品和服務，並從中獲知生活水平概況。在圖 5-2 全國購買力指數(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的指標裡，美中兩國皆逐年增加，就成長速度來看，美國與中國大陸皆增加，美國二〇〇九年為一九九二年的 2.2 倍，而中國大陸則為 7.5 倍。由此可見，中國大陸整體經濟成長非常快速，而且國民整體平均生活水平亦獲得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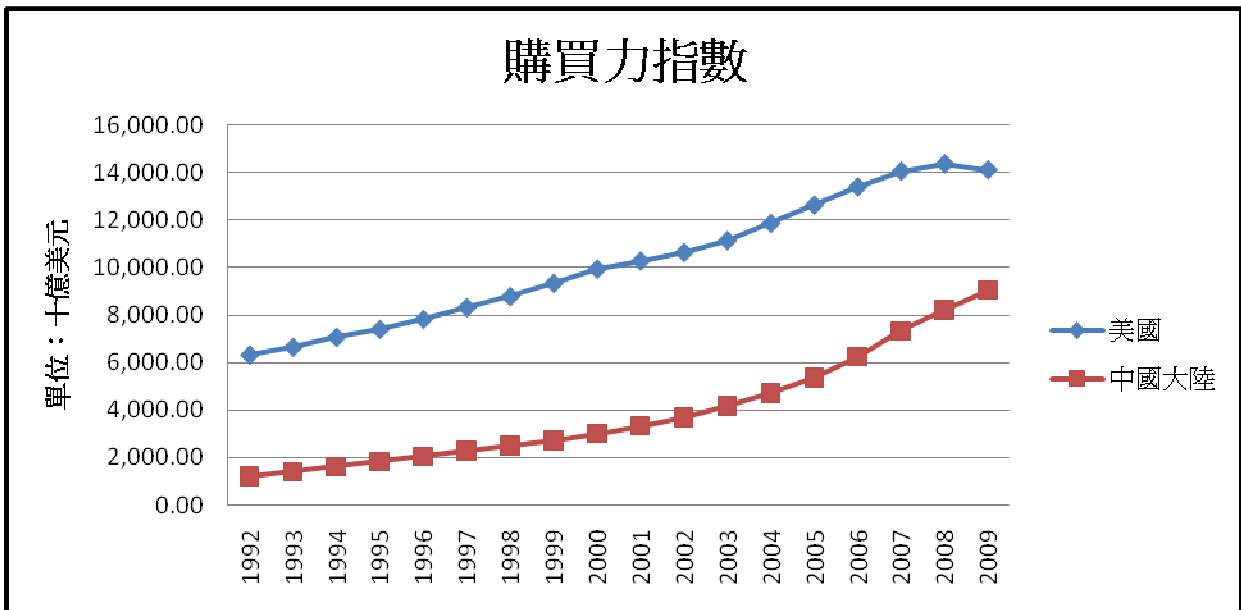


圖 5-2：美國與中國大陸全國購買力指數圖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圖為筆者自行繪製。

註：美國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九年逐年全國購買力指數為：6,342.30，6,667.33，7,085.15，7,414.63，7,838.48，8,332.35，8,793.48，9,353.50，9,951.48，10,286.18，10,642.30，11,142.18，11,867.75，12,638.38，13,398.93，14,061.80，14,369.08，14,119.05。中國大陸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九年逐年全國購買力指數為：1,202.62，1,401.32，1,618.26，1,832.04，2,053.61，2,284.23，2,490.23，2,718.90，3,011.07，3,334.42，3,696.78，4,157.82，4,697.90，5,364.26，6,242.02，7,337.64，8,217.40，9,046.99。(單位：十億美元)

### 三、全國購買力指數佔世界比重

以圖 5-4 全國購買力指數佔世界比重來看，美國(22.806%)在一九九二年所佔的比重約為中國大陸(4.327%)的 5.3 倍；但是，美國(20.422%)在二〇〇九年所佔比重與中國大陸(12.556%)的差距已降為 1.6 倍。透過此一指標可以清楚看見美國全國購買力指數佔世界的比重正逐漸下滑，而中國大陸全國購買力指數佔世界的比重正逐漸增加，可預見中國大陸經濟崛起下將持續對全球經貿造成極大的影響。在人民所得持續提高的前景下，各國政府與企業

積極爭取和中國大陸建立頻密的經貿關係，以分食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所帶動的龐大經濟利益。然而，亦有論點認為中國大陸人民生活水準持續改善後，將加大對天然資源與農漁牧產品的需求，使得其他國家民眾將面臨通膨的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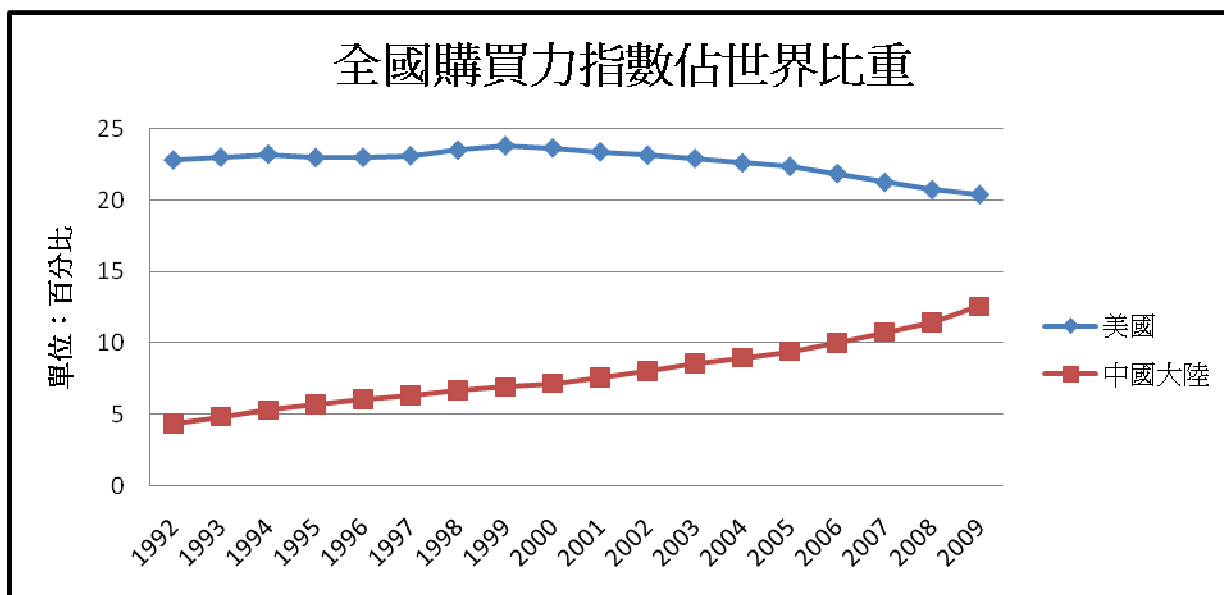


圖 5-4：美國與中國大陸全國購買力指數佔世界比重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圖表為筆者自行繪製。

註：美國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九年逐年全國購買力指數佔世界比重為：23.198，22.966，22.986，23.094，23.492，23.781，23.627，23.365，23.137，22.907，22.607，22.367，21.876，21.269，20.758，20.422。中國大陸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九年逐年全國購買力指數佔世界比重為：4.327，4.835，5.301，5.679，6.026，6.335，6.657，6.918，7.154，7.581，8.044，8.548，8.949，9.405，9.999，10.756，11.451，12.556。(單位：百分比)

#### 四、人均購買力指數

以圖 5-3 來看，美國人均購買力指數在一九九二年時為 24,699.63 美元，而中國大陸為 1,026.38 美元，雙方在一般民眾的生活水平尚差距高達 24 倍；至二〇〇九年時，美國人均購買力指

數為 45,934.47 美元，而中國大陸為 6,778.09 美元，雙方差距縮小為約 6.7 倍。若以各國狀況來看，美國二〇〇九年較一九九二年成長約 1.9 倍，而中國大陸則成長約 6.6 倍，顯示中國大陸人均購買力迅速改善與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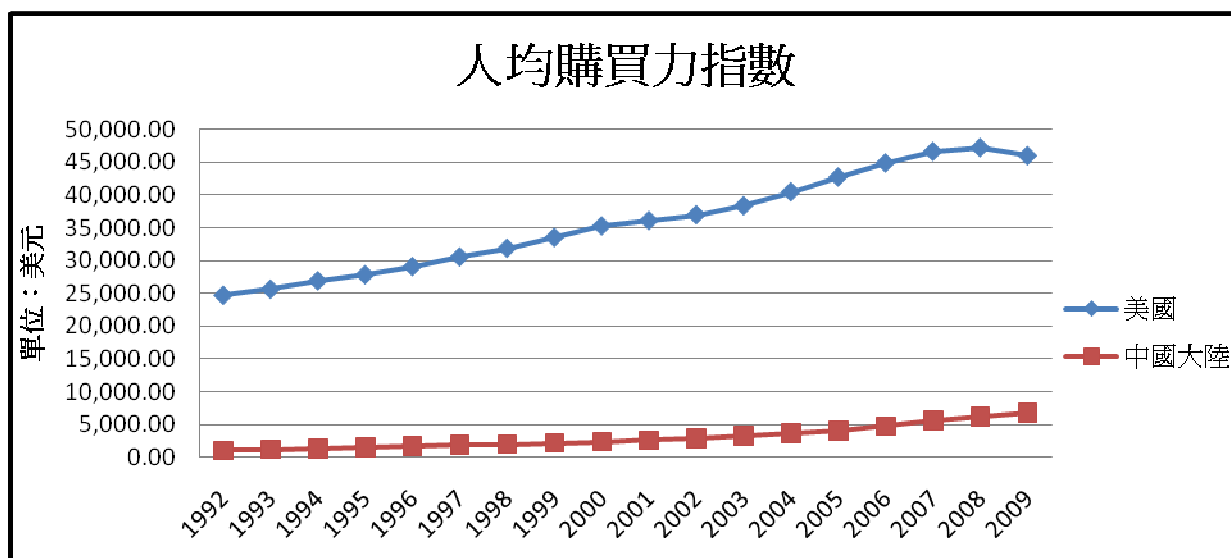


圖 5-3：美國與中國大陸人均購買力指數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圖表為筆者自行繪製。

註：美國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九年逐年人均購買力指數為：24,699.63，25,629.13，26,906.53，27,826.60，29,076.55，30,541.33，31,857.84，33,501.68，35,251.93，36,064.52，36,949.99，38,324.38，40,450.62，42,680.64，44,822.96，46,577.19，47,155.32，45,934.47。中國大陸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九年逐年人均購買力指數為：1,026.38，1,182.38，1,350.24，1,512.57，1,677.94，1,847.69，1,996.00，2,161.52，2,375.73，2,612.63，2,877.93，3,217.46，3,614.10，4,102.50，4,748.66，5,553.39，6,187.71，6,778.09。(單位：美元)

## 五、軍費支出

以圖 5-5 來看，在一九九二年時美國一年軍事支出約為 4682 億美元，中國大陸為 220 億美元，雙方差距約為 21 倍；至二〇〇

八年時，美國 6160 億美元，中國大陸為 862 億美元，雙方差距縮小為 7 倍。若以各國情況來看，美國在冷戰後軍費支出逐年下滑，直至九一一事件後為打擊恐怖主義再度逐年增加軍費支出。但是，二〇〇九年較一九九二年成長約 1.3 倍。反觀中國大陸，此一期間軍費支出成長約四倍，使美國與周邊國家在其未來意圖不明確的情況下，對其軍費迅速增加感受到壓力和不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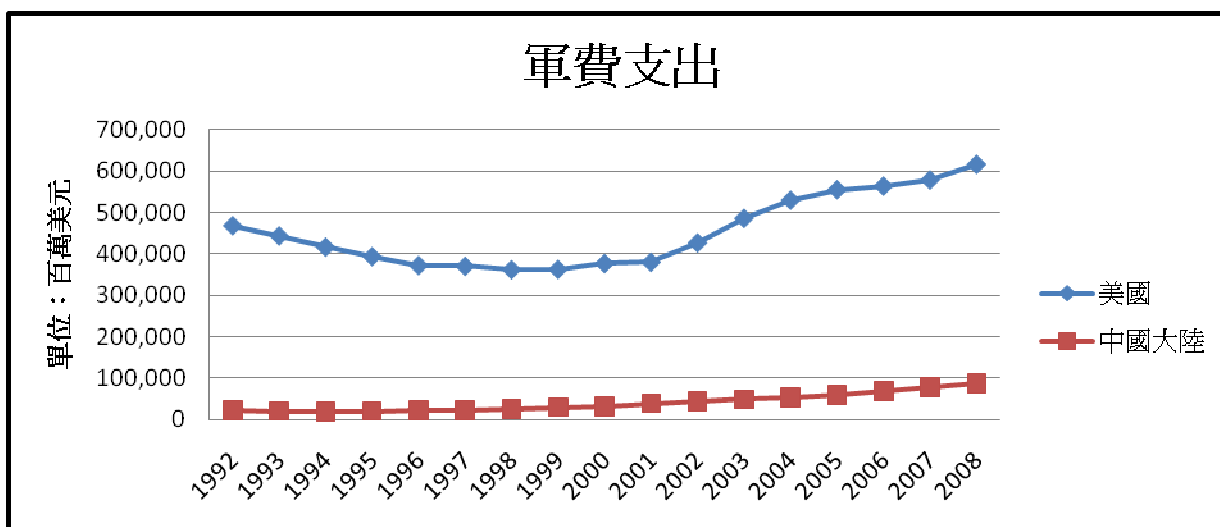


圖 5-5：美國與中國大陸軍費支出

資料來源：斯德哥爾摩和平中心，圖表為筆者自行繪製。

註：美國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九年逐年軍費支出為：468,216，443,598，416,580，393,996，372,569，370,627，362,277，363,170，377,228，380,271，426,982，485,975，529,673，554,930，563,549，578,340，616,073。中國大陸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九年逐年軍費支出為：22,000，20,400，19,400，19,900，22,000，22,600，25,900，29,400，31,200，38,400，44,400，48,500，53,100，59,000，68,800，77,900，86,200。(單位：百萬美元)

## 六、軍費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比重

以圖 5-6 來看，可以觀察到美國在冷戰結束後確實減少軍事支出佔國內生產總額的負擔，但是在九一一事件後在伊拉克戰爭、

阿富汗反恐戰爭以及與世界各國反恐的合作，使其軍事支出佔國內生產總額的比重再度增加；而中國大陸則是在冷戰結束後，便減少軍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額的比重，並且約維持在百分之二的水準。同本文第四章中所提及的「中國威脅論」所指出的，北京極大的軍費支出亦是威脅層面之一，但是若由軍費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比重來看，另一派主張中國大陸軍力成長乃是伴隨整體國力提升而改善。若以軍費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比重來看，年年維持在百分之二的情況下，並不足以說明中國大陸具備以軍事武力改變現狀的動機。然而，美國經濟成長率平緩，一旦增加軍費支出，勢必將其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增加；反觀經濟成長迅速的中國大陸，儘管軍費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比重約維持在百分之二的水平，然經濟持續成長的使國內生產毛額亦持續增加，未來北京即使維持百分之二的軍事支出，每年的實質軍事支出額亦將持續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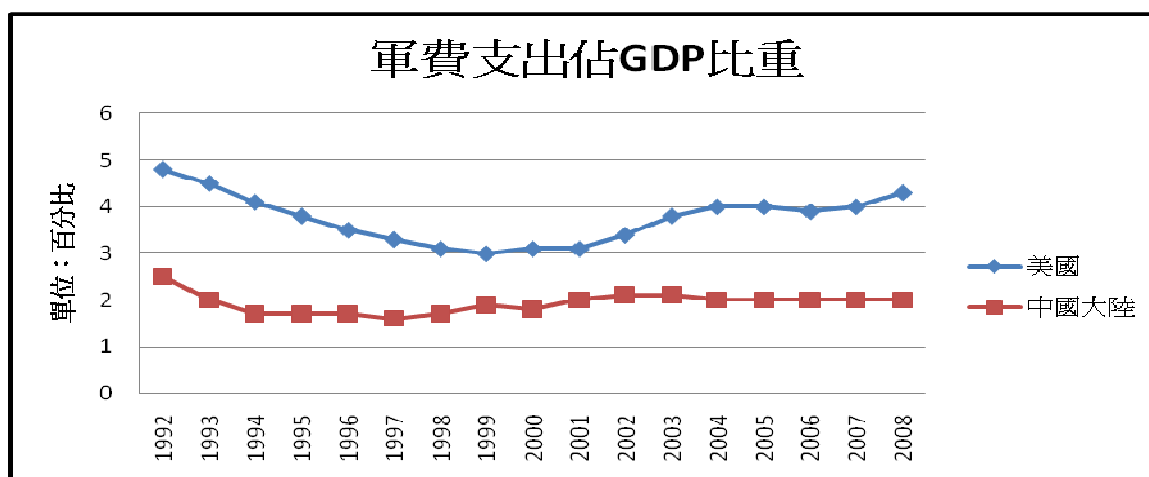


圖 5-6：美國與中國大陸軍費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比重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圖表為筆者自行繪製。

註：美國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九年逐年軍費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比重為：4.8，4.5，4.1，3.8，3.5，3.3，3.1，3，3.1，3.1，3.4，3.8，4，4，3.9，4，4.3。中國大陸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九年逐年軍費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比重為：2.5，2，1.7，1.7，1.7，1.6，1.7，1.9，1.8，2，2.1，2.1，2，2，2，2，2，2。(單位：百分比)

## 七、政府負債佔國內生產總額比重

以圖 5-7 來看，可以看見美國聯邦政府債務持續增加，尤其是在經濟成長趨緩甚至負成長以及政府稅收持續萎縮的情況下，加上九一一事件後大幅增加軍事支出對美國政府的財政亦是一項沉重的負擔；相較之下，中國大陸中央政府負債維持在一定的水準，並沒有大幅波動的情況發生。對於中國大陸的崛起，美國未來如將持續對中國大陸採取遏制的政策，則美國政府能否負擔如此龐大的軍事費用一直為各界所質疑，而歐巴馬上台為減輕政府赤字負擔，亦展開軍事預算的刪減；但是，在此一時刻裡，東亞地區依然存在許多危機，尤其是朝鮮半島才發生天安艦事件，以及中國大陸匿蹤戰機現身等事件，再度引發美國國內的關注，掀起一波美國是否應該刪減軍事預算的爭論，值得未來持續關注。此外，在美國聯邦政府債台高築的背景下，屢屢透過印鈔拯救國內經濟的行為，使握有大量美元儲備的世界各國對持續貶值的美元資產感到相當不滿，紛紛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聲音。尤其是中國大陸領導人更屢次提出此一觀點，甚至同其他新興大國表達此一看法。因此，以美元為首的國際貨幣體系能否持續或受到衝擊，對美國國際政治影響力將有劇烈的影響，故值得吾人持續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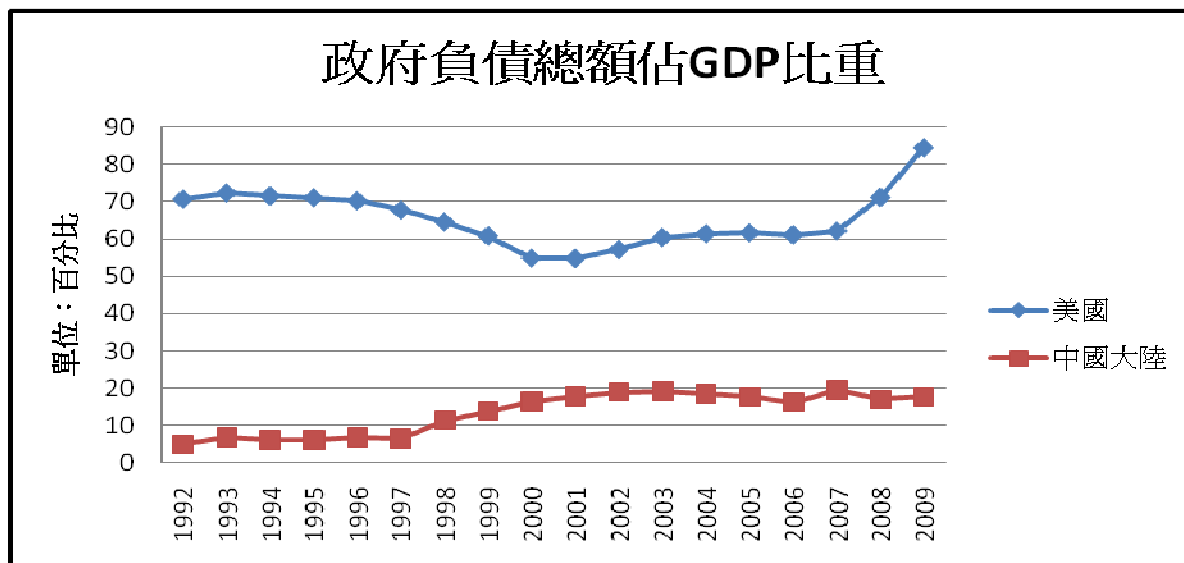


圖 5-7：美國與中國大陸政府負債佔國內生產總額比重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圖表為筆者自行繪製。

註：美國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九年逐年聯邦政府負債佔國內生產總額比重為：70.736，72.417，71.583，71.115，70.299，67.795，64.573，60.843，54.835，54.748，57.119，60.426，61.421，61.654，61.122，62.159，71.222，84.577。中國大陸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九年逐年中央政府負債佔國內生產總額比重為：4.981，6.713，6.137，6.137，6.787，6.553，11.401，13.812，16.445，17.711，18.937，19.245，18.535，17.635，16.187，19.591，16.963，17.67。  
(單位：百分比)

由上述七項指標來看，兩國經濟實力上，美國相對下滑而中國大陸則相對提升；兩國在軍事力量方面，美國依然較中國大陸佔據較多的優勢，但是在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負債的背景下，可能對高昂的軍費支出造成衝擊；而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則無此一負擔，並且在整體國內生產毛額持續增加的前景下，軍費支出維持約百分之二的國內生產毛額亦將持續增加。

## 第二節 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東南亞的經貿與軍事力量消長

本節依據郭清水將「避險」視為「制衡」至「扈從」光譜中三項指標為參考基礎，並藉由郭清水所訂立的標準以觀察自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九年止，美國與東南亞六國、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六國關係之變化。東南亞六國分別為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六國。

由制衡至扈從的光譜依序為：經濟層面的考量、束縛與交往、有限度的扈從、拒絕受支配與間接的平衡等五項。其中，各有代表性的觀察指標：在經濟層面的考量方面，郭清水指出東南亞國家在經濟的自利考量下，中國大陸為一發展快速的經濟體，兩者間的貿易往來將使雙方獲益；因此，在此一條件下雙邊可以擱置其他尚未完善處理之安全或政治議題，而在經濟層面上尋求共同合作以滿足雙邊的經濟需求。郭清水文中提及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所簽署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而此一協定亦於今年(2010)啟動，是大家所關注的重要議題。而美國與東南亞六國方面，雙邊經貿關係自冷戰以來便相當緊密，但美國自九〇代起開始要求這些國家改善對美貿易大幅順差的情況，而且九七金融風暴後雙邊經貿關係亦大受影響，故美國與東南亞六國的經貿關係在面臨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加強關係之下，美國與東南亞六國貿易佔東南亞六國對外貿易比重相對下降，而中國大陸則持續增加。本文同時蒐集美國與東南亞六國、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六國之進出口貿易額、貿易平衡狀況、直接投資等作為觀察。

第二，間接的平衡的指標中，觀察指標包含東南亞六國軍事支出是否增加，以及東南亞六國是否參與美國的軍事演練行動與



計劃或東南亞六國是否與中國大陸共同進行軍事演練。同時，筆者亦在軍事支出的數據外，增加軍事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之比例，以及東南亞六國在軍事武器進口之金額變化作更完整說明。

第三，郭清水在有限度的扈從中，明確指出雙邊是否簽署政治夥伴關係為一觀察項目，同時他將政治夥伴關係視為彼此在某些議題上尋求共同合作，而非接受大國的支配。同時，他在文中提到新加坡與印尼為拒絕「有限度的扈從」的代表性國家；但是，印尼卻與中國大陸簽署戰略夥伴關係，顯然與前文相抵觸。然而，就印尼與美國的關係作觀察，或許可以補充上述的缺陷，即印尼自二戰後便與美國維持緊密的關係，儘管在九〇年代受到印尼諸多國內問題而使雙邊關係一度受到阻礙，但是在小布希總統上任後以及九一一事件後雙邊關係已獲得改善與加強合作，這可能是印尼為一拒絕接受對中國大陸採「有限度的扈從」的國家。

## 壹、經濟層面的考量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業已成立，雙邊貿易往來將近百分之九十的商品為零關稅，這有助於雙方貿易額持續增加，而下文中所整理的數據亦可以看出此一趨勢。

首先，美國、中國大陸佔東南亞六國對外貿易比重之變化。除越南之外，其他五個國家自一九九二年以來便與美國保持較緊密的貿易關係，但是這五個國家中在二〇〇〇年後與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亦增加迅速，尤其是中國大陸佔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與泰國對外貿易比重分別在二〇〇五年、二〇〇七年、二〇〇五年、二〇〇七年、二〇〇七年，超越了此五個國家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比重（見圖 5-8、5-9、5-10、5-11、5-12、5-13）。根

據二〇〇九年最新資料顯示，美國佔印尼對外貿易比重為 8.5%，中國大陸則為 13.4%；美國佔馬來西亞對外貿易比重為 12%，中國大陸則為 18.5%；美國佔菲律賓對外貿易比重為 14.9%，中國大陸則為 24.4%；美國佔新加坡對外貿易比重為 7.4%，中國大陸則為 9.3%；美國佔泰國對外貿易比重為 9.1%，中國大陸則為 13.3%。

而越南在冷戰期間與美國並無貿易往來，冷戰結束後美國與越南之間在一九九二年與一九九三年時依然未開放對越南進口，而美國對越南之出口額分別約為五百萬美元與七百萬美元，由於雙方貿易額佔越南對外貿易比例非常小，據統計結果不到百分之零點一，然本文以 0.1% 作表示，顯示雙方貿易金額狹小，但依然有微小的貿易額存在。美國與越南自一九九四年起，貿易金額便開始迅速增加。而中國大陸與越南在一九九二年時，佔其對外貿易比例為 3.5%，為六國中比例最高的國家。而中國大陸佔越南的對外貿易比重在二〇〇四年起，也逐漸超越美國佔越南的對外貿易比重。整體而言，在東南亞六國對外貿易的比重上，美國佔東南亞六國的貿易比重正逐年下降，而中國大陸佔東南亞六國的貿易比重正逐年上升中。另外，根據附錄三資料顯示，就整個東協十國而言，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八年在對外國或地區的出口與進口中，對中國大陸的出口貿易每年成長率為 24.11%，而美國僅為 7.81%；對中國大陸的進口貿易每年成長率為 28.46%，而美國僅為 10.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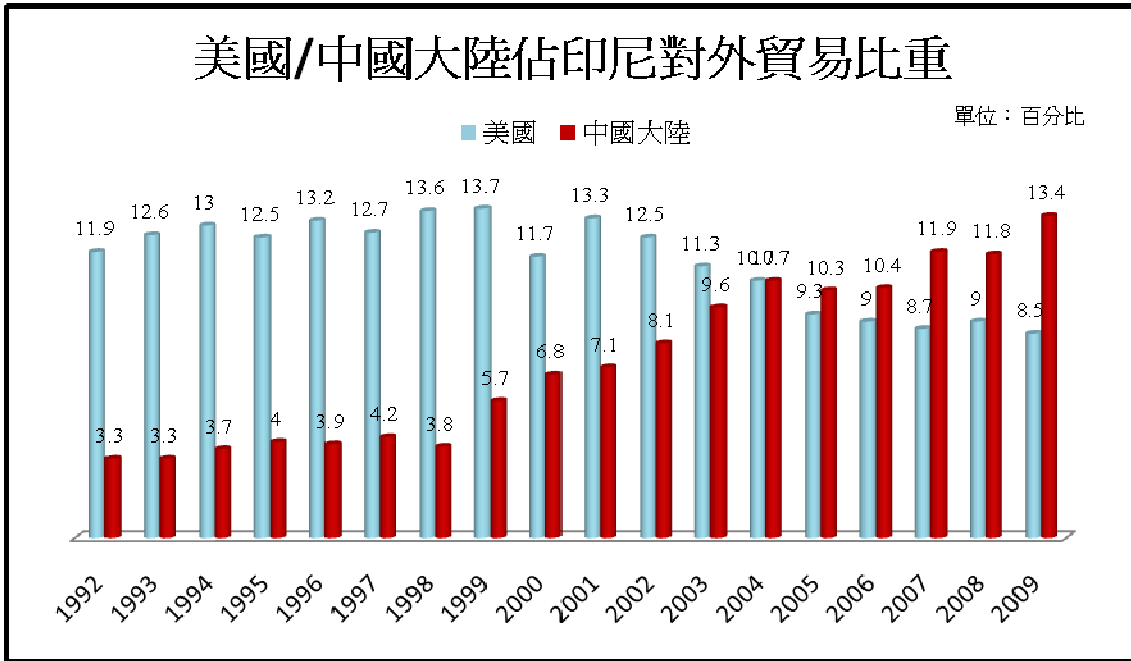


圖 5-8：美國與中國大陸佔印尼對外貿易比重

資料來源：美國與印尼貿易數據來自美國統計署(U.S. Census Bureau)，中國大陸與印尼貿易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鑑。詳細數據請見附錄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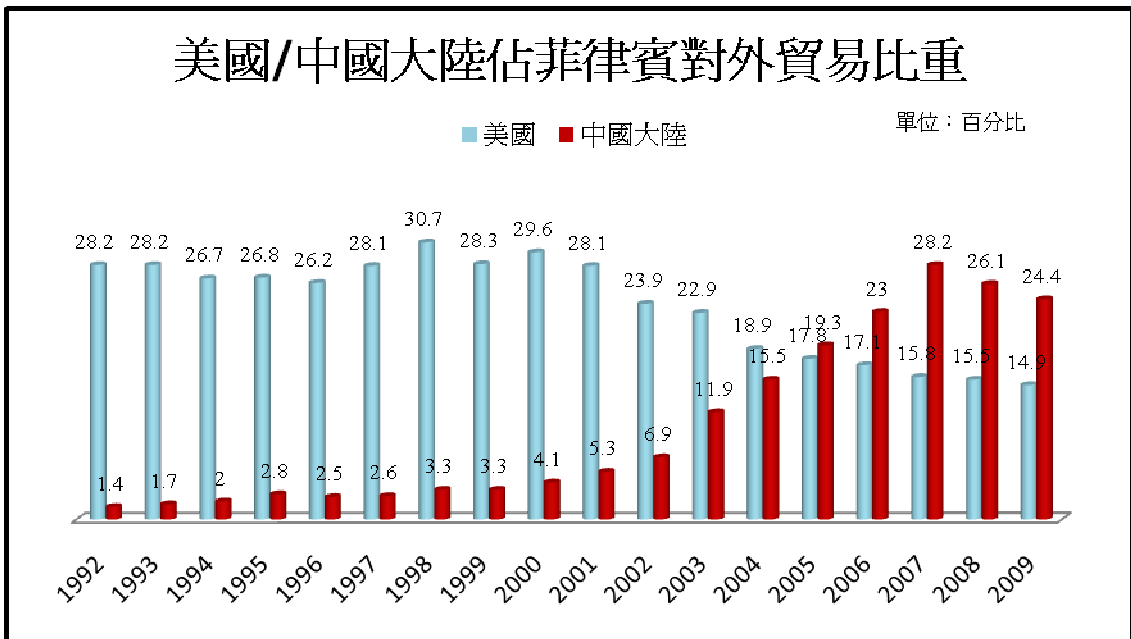


圖 5-9：美國與中國大陸佔菲律賓對外貿易比重

資料來源：美國與菲律賓貿易數據來自美國統計署(U.S. Census Bureau)，中國大陸與菲律賓貿易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鑑。詳細數據請見附錄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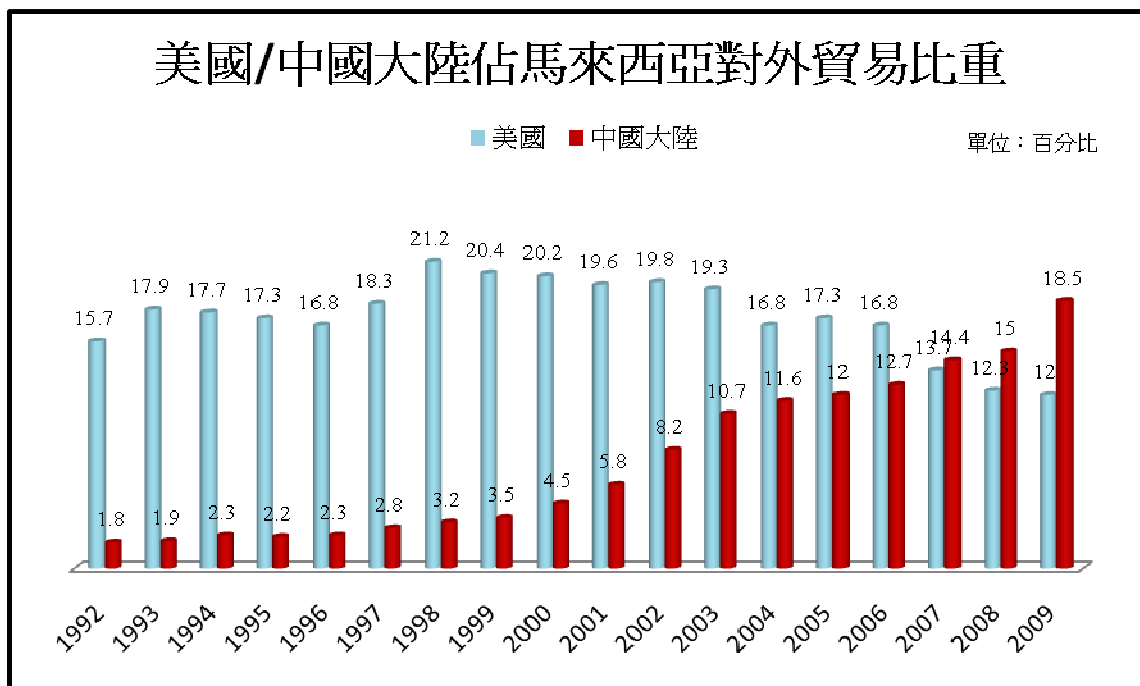


圖 5-10：美國與中國大陸佔馬來西亞對外貿易比重

資料來源：美國與馬來西亞貿易數據來自美國統計署(U.S. Census Bureau)，中國大陸與馬來西亞貿易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鑑。詳細數據請見附錄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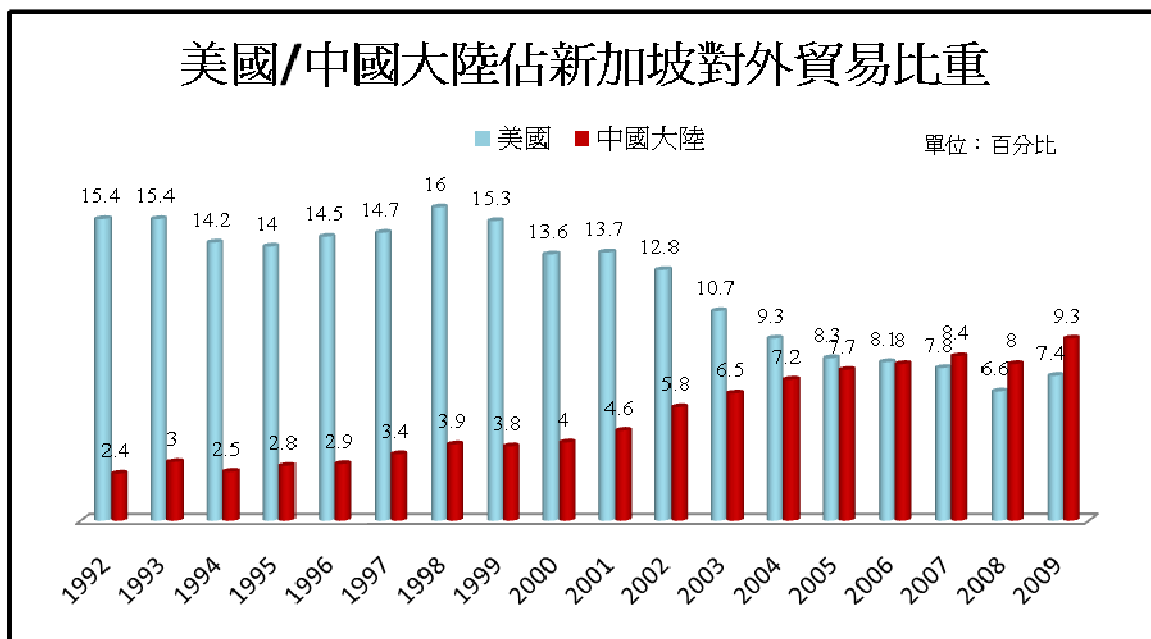


圖 5-11：美國與中國大陸佔新加坡對外貿易比重

資料來源：美國與新加坡貿易數據來自美國統計署(U.S. Census Bureau)，中國大陸與新加坡貿易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鑑。詳細數據請見附錄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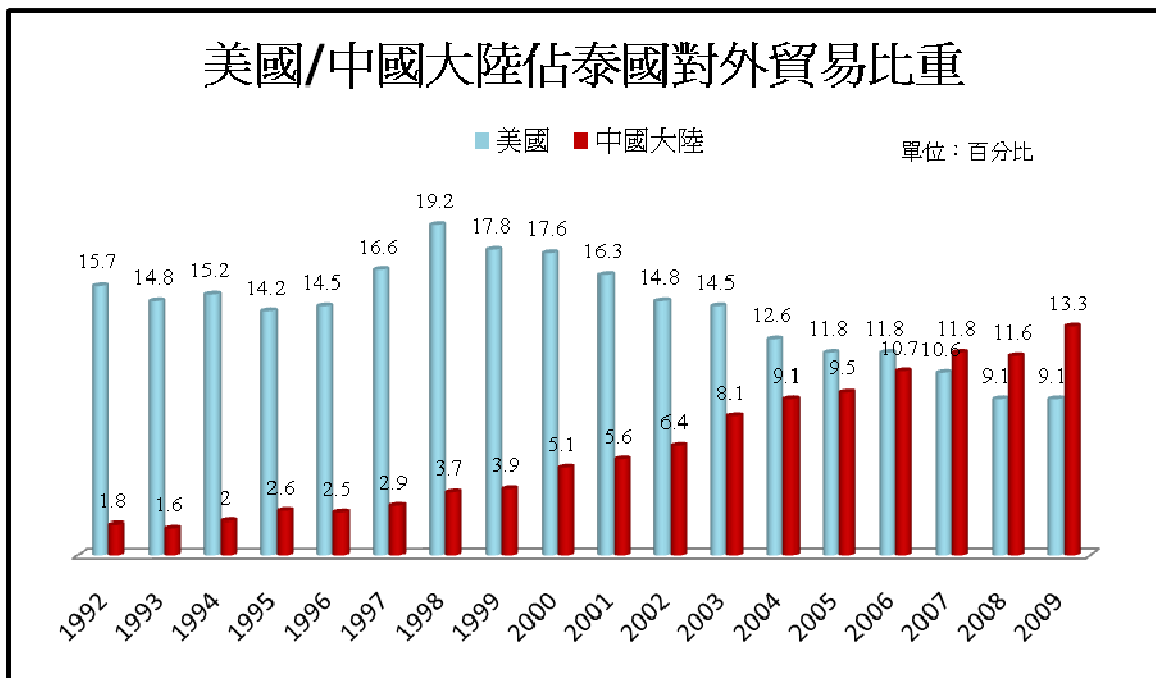


圖 5-12：美國與中國大陸佔泰國對外貿易比重

資料來源：美國與泰國貿易數據來自美國統計署(U.S. Census Bureau)，中國大陸與泰國貿易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鑑。詳細數據請見附錄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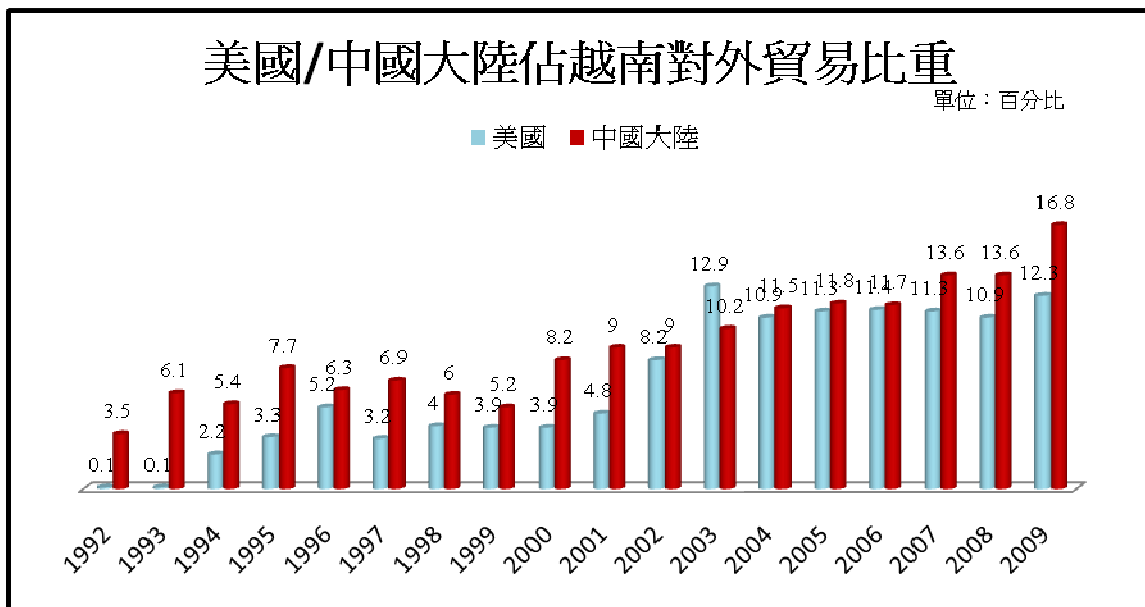


圖 5-13：美國與中國大陸佔越南對外貿易比重

資料來源：美國與越南貿易數據來自美國統計署(U.S. Census Bureau)，中國大陸與越南貿易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鑑。詳細數據請見附錄二。

其次，貿易平衡方面，美國對東南亞六國的貿易中（圖 5-14），在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〇年間，除對越南於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六年擁有貿易盈餘外，美國對東南亞六國皆為貿易赤字，即東南亞六國對美國擁有貿易順差，而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九年止，美國僅對新加坡享有貿易順差，其它國家為逆差；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六國的貿易中（圖 5-15），自二〇〇二年起中國大陸對菲律賓、泰國和馬來西亞的貿易逆差逐漸擴大，對新加坡與越南則自二〇〇〇五年起貿易順差逐漸擴大，而對印尼則於二〇〇七年起由逆差轉為順差。即菲律賓、泰國與馬來西亞三國對中國大陸享有貿易順差。

根據附錄四，就整個東協十國而言，自一九九五年至二〇〇八年止，東協十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逐年增加，而對中國大陸的貿易赤字亦逐年增加；在二〇〇八年時，東協十國除對美國享有兩百一十七億美元的順差外，同時東協十國也是最大的順差來源國；同樣為二〇〇八年，東協十國對中國大陸的逆差為兩百一十四億美元，亦為東協十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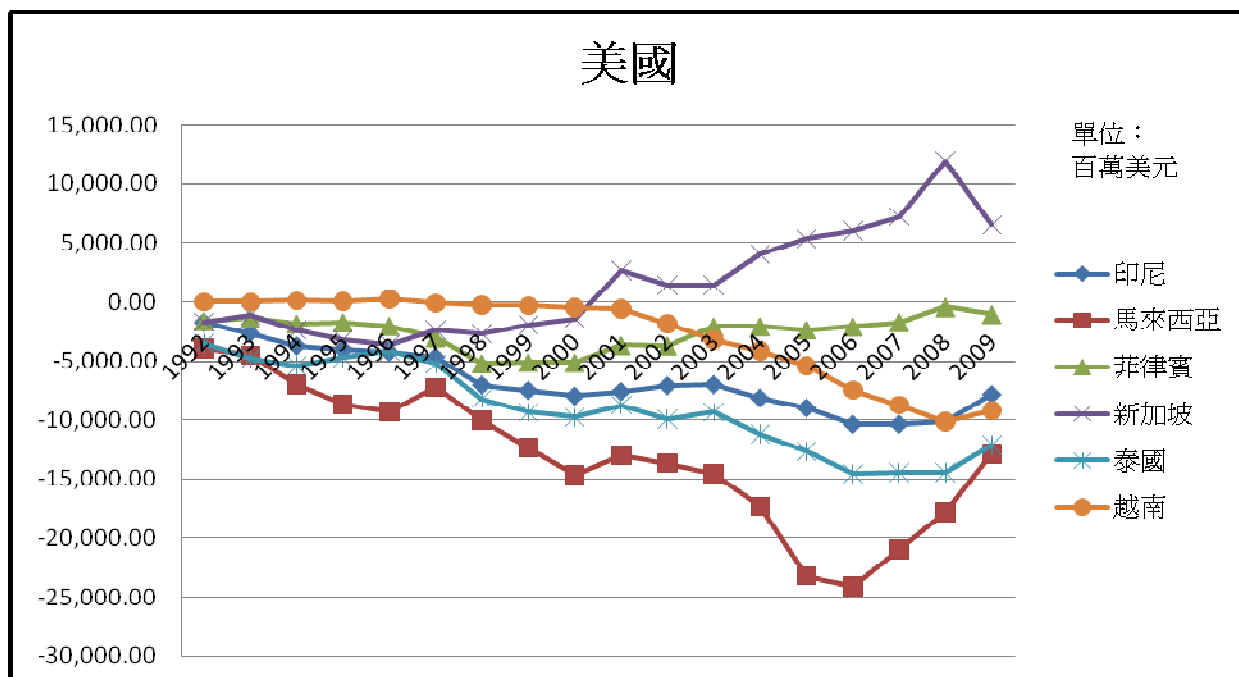


圖 5-14：美國對東南亞六國貿易平衡圖

資料來源：根據製作圖 5-8 至圖 5-13 所蒐集的數據中，由出口減進口求得此一數據，圖由筆者自行繪製。詳見附錄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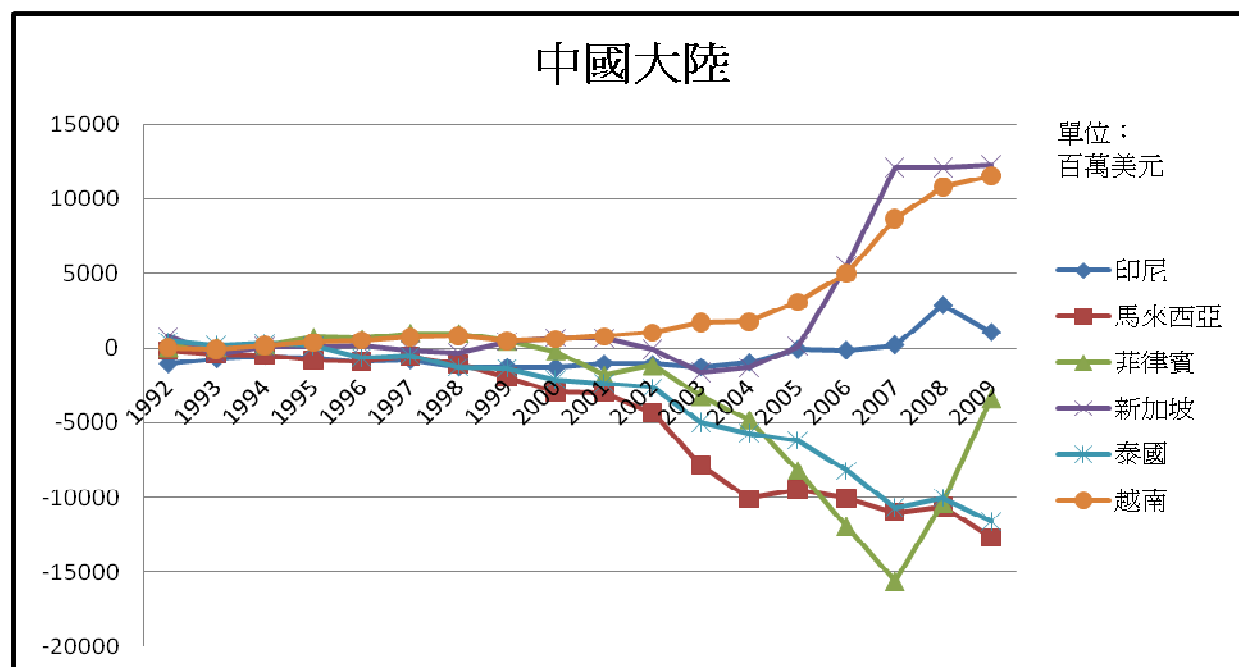


圖 5-15：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六國貿易平衡圖

資料來源：根據製作圖 5-8 至圖 5-13 所蒐集的數據中，由出口減進口求得此一數據，圖由筆者自行繪製。詳見附錄二。

最後，圖 5-16 和圖 5-17 為美國與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六國的直接投資額變化圖。一九九五至二〇〇八年，美國對東南亞六國的累積投資額由高至低排列分別為新加坡約兩百四十七億美元、馬來西亞約一百三十五億美元、泰國約五十六億美元、菲律賓約四十四億美元、印尼約二十五億美元、越南約二十二億美元；一九九五至二〇〇八年，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六國的累積投資額由高至低排列分別為新加坡約二十一億美元、印尼約十二億美元、越南約六億美元、菲律賓約三億美元、泰國約二點五億美元、馬來西亞約一點四億美元。由以上數據來看，美國依然是東南亞六國重要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國，而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六國的直接投資則顯得較少；然而，就圖 5-17、圖 5-18 可以看出，中國大陸自二〇〇三年起對東南亞六國的直接投資額正緩步增加中。

整體而言，即便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在經貿關係上快速增加，使彼此關係更加緊密，但相較於東協國家和美國在經貿層面的關係，儘管東協在貿易比重上呈現與中國大陸日趨緊密，而美國相對減弱的情況，東協國家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多為逆差，與美國的貿易則出現盈餘；再以外國直接投資額來看，雖然中國大陸對此地的投資額逐漸增加，但相較於美國歷年的金額，則依然存有相當大的落差。因此，吾人無法在經貿上說明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的關係獲得加強後，將有利於中國大陸對東協國家施加更多的影響力，甚至迫使他們採取扈從的外交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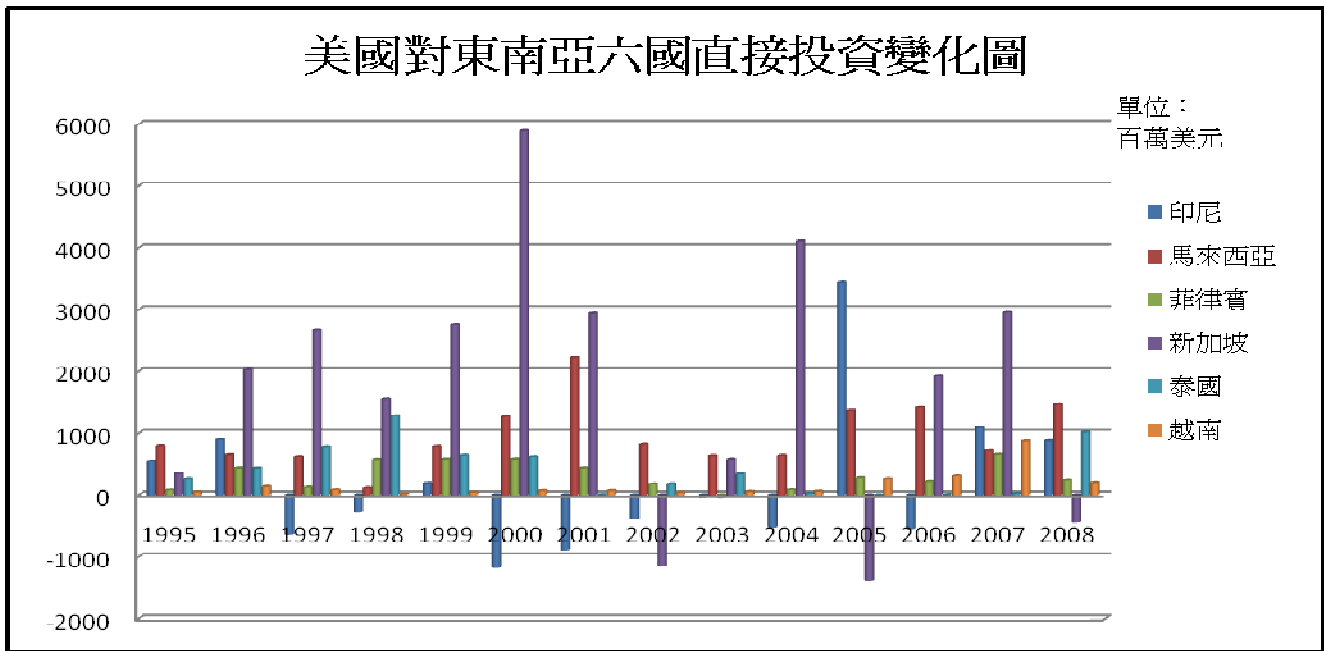


圖 5-16：美國對東南亞六國直接投資變化圖

資料來源：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3,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 <http://www.aseansec.org/22109.htm>. 圖由筆者自行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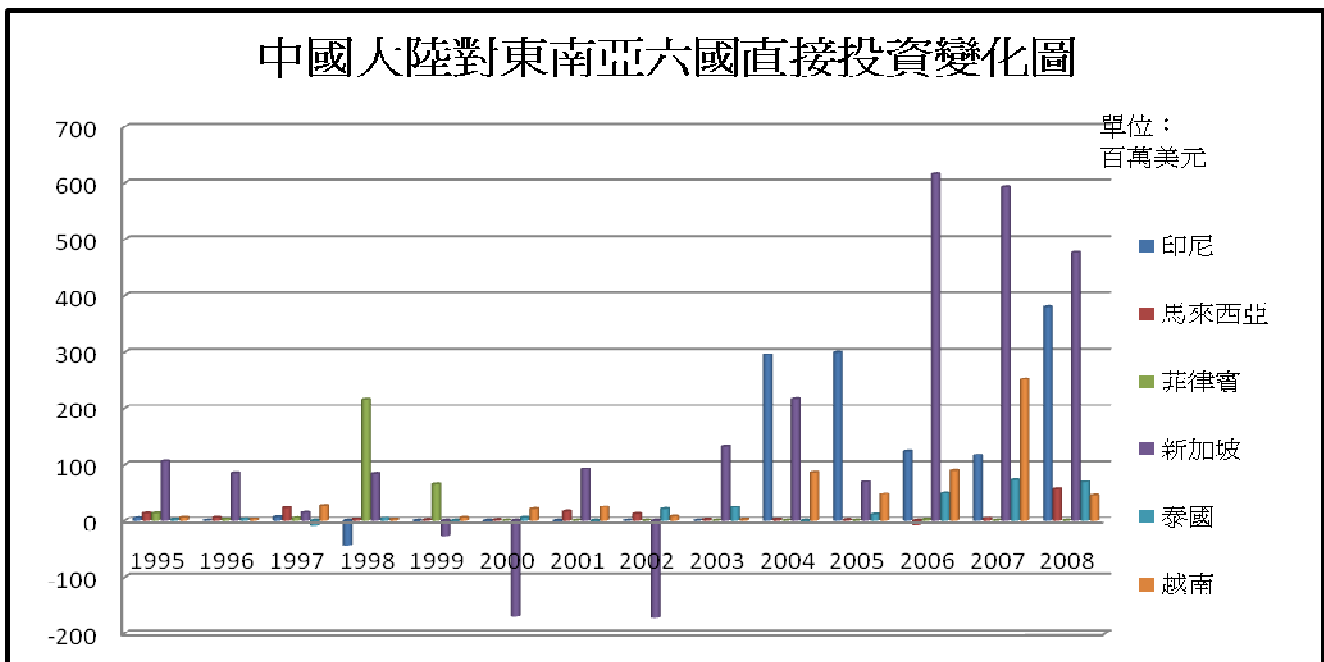


圖 5-17：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六國直接投資變化圖

資料來源：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3,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 <http://www.aseansec.org/22109.htm>. 圖由筆者自行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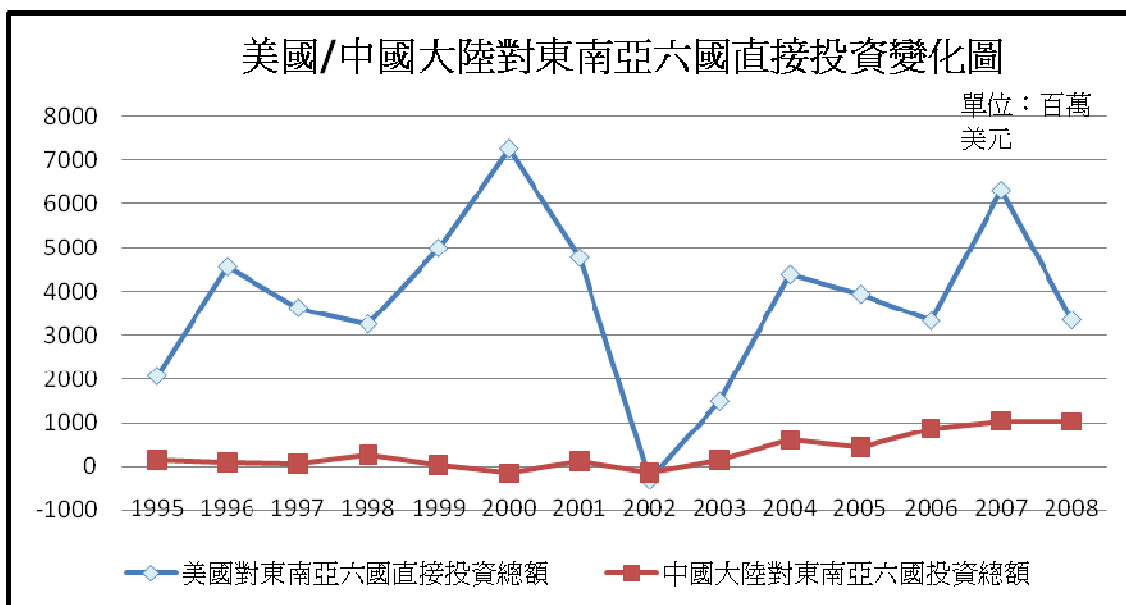


圖 5-18：美國與東國大陸對東南亞六國直接投資變化圖

資料來源：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3,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 <http://www.aseansec.org/22109.htm>。圖由筆者自行繪製。

另一方面，面對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在經貿層面的關係越趨緊密，美國二〇〇二年以「東協企業方案」(Enterprise for ASEAN Initiative, EAI)作為回應，<sup>397</sup>希望與東協各國各別進行雙邊會談，並透過「美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設立的「資源整合方案」(Integrated Sourcing Initiative, ISI)機制，以確保美國在此地區的政經利益。「東協企業方案」的倡議存在幾項前提：首先，目標國必須是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其次，必須先與美國簽署「貿易與投資架構協定」(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TIFA)；再次，簽署「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最後才是自由貿易區的簽署。<sup>398</sup>目前，美國與東協已於二〇〇六年進入「貿易與投資架構協定」的階段。另外一項受各界矚目的便是，美國於二〇〇八年宣示加入「跨太平洋策略性經濟夥伴協定」

<sup>397</sup> 其目標在於拉近美國與此次區域組織的關係，特別是提供以經濟改革與開放為主的雙邊協定自由貿易協定的願景，並企圖增進雙邊貿易與投資。

<sup>398</sup> 洪財隆，2007，〈兩種 FTA：美國與中國 FTA 政策之初步比較〉。收入於江啟臣主編，《強權關係與亞太區域發展》。台北：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頁 49。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P)的談判，該協定是目前唯一結合泛太平洋國家簽署的跨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其原本是紐西蘭、智利、新加坡、汶萊四個亞太經合會成員間的自由貿易協定，而在美國表達參加意願後，已激起其他亞太經合會成員陸續表達加入意願，也為未來亞太地區的政經情勢帶來重大變動，<sup>399</sup>且可能對東協與亞太經合會在領導區域經濟整合上造成衝擊。<sup>400</sup>

## 貳、間接的平衡

首先，多數學者指出東南亞地區在冷戰結束後此地區各國軍事支出不減反增，使得東南亞地區的安全受到各方的重視。根據圖 5-19 顯示，東南亞六國確實在冷戰後軍事支出是逐漸增加的，東南亞六國在九七金融風暴期間以及稍後幾年中減少或減緩軍事支出的速度，而在二〇〇八年再度遭受全球金融風暴的衝擊，除新加坡與泰國明顯增加外，其它國家皆為減緩或減少開支。比較東南亞六國在二〇〇九年與一九九二年的軍事支出數據，印尼約增加 1.6 倍、馬來西亞約增加 1.9 倍、菲律賓約增加 1.4 倍、新加坡約增加 2.3 倍、泰國約增加 1.2 倍、越南約增加 3 倍（越南自一九九五至二〇〇二年無數據）。

---

<sup>399</sup> 張心怡，2010，〈「東協+3」v.s.「跨太平洋策略性經濟夥伴協定+N」：亞太經濟整合的擴大及其效應〉。《國際關係學報》，第 29 期，頁 131-168。

<sup>400</sup> 許峻賓、蔡靜怡，2010，〈泛太平洋戰略夥伴關係(TPP)之進展〉，《APEC 通訊》，第 131 期，頁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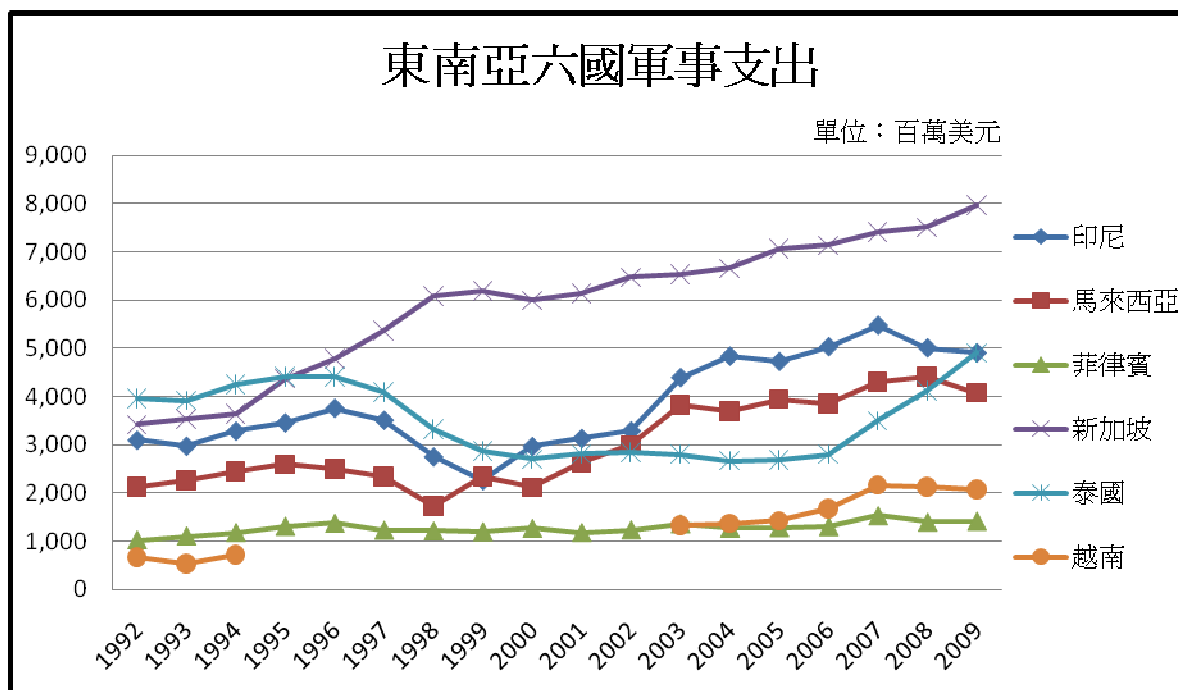


圖 5-19：東南亞六國軍事支出概況

資料來源：斯德哥爾摩和平中心，<http://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越南一九九五年至二〇〇二年無數據記載。圖由筆者自行繪製。

其次，就圖 5-20 軍事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比重作觀察（一九九〇至二〇〇八年），可以發現此一指標與單就軍事支出方面得出令人意外的結果－東南亞六國軍事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自一九九〇年至二〇〇九年，呈現緩步下滑的情況。自二〇〇〇年起，印尼軍事支出排除經濟危機的影響，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約為 1.2% 至 1.4% 之間；馬來西亞約為 2.1% 至 2.6% 之間；菲律賓約為 0.9% 至 1% 之間；泰國約為 1.2% 至 1.4%；越南為降幅最大的國家，在二〇〇〇年後維持在 1.8% 至 2% 之間；新加坡則為東南亞六國中唯一維持軍事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最高比重的國家，即使在九七金融風暴後亦無下降，約為 4% 至 5% 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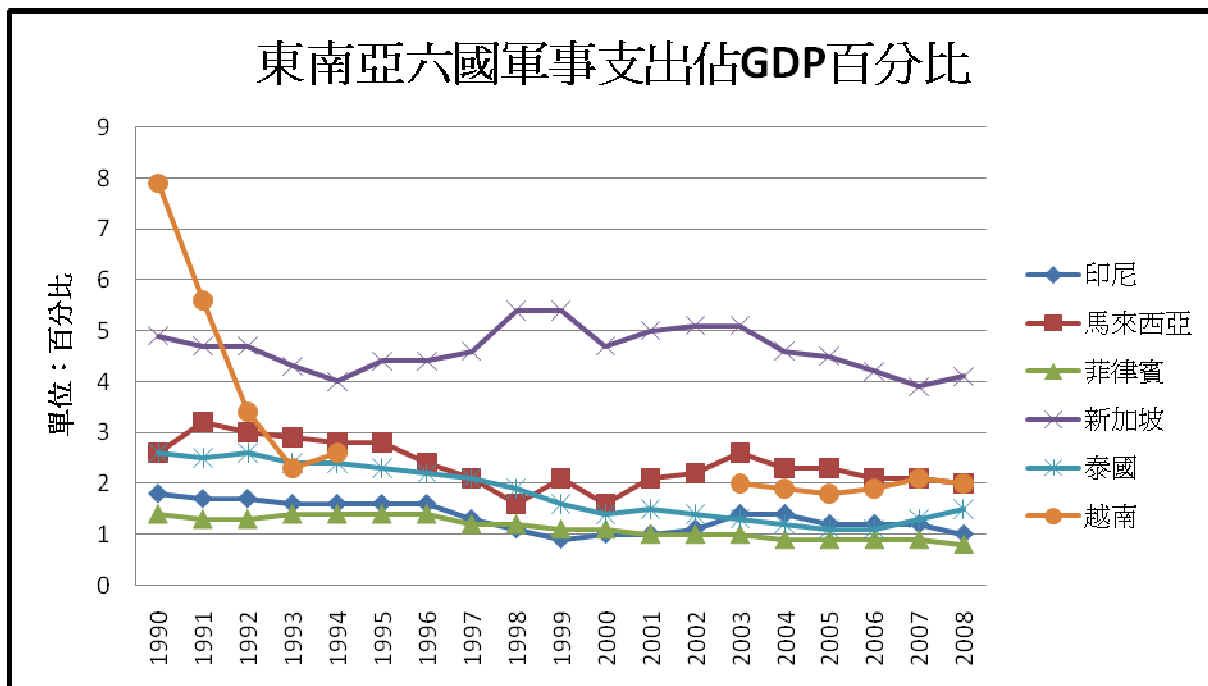


圖 5-20：東南亞六國軍事支出佔國內生產總額比重

資料來源：斯德哥爾摩和平中心，<http://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越南一九九五年至二〇〇二年無數據記載。圖由筆者自行繪製。

再次，就東南亞六國軍事武器進口的變化作觀察（一九九二至二〇〇九年）。就圖 5-21 來看，東南亞六國在九七金融風暴後在軍事武器的採購上確實受到影響；而二〇〇六年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皆呈現較大的增加幅度。以一九九二至二〇〇九年軍事武器進口累積總額作比較，按增加軍事武器採購由大至小排列為新加坡約八十一億美元、馬來西亞約六十億美元、泰國約四十三億美元、印尼約四十一億美元、越南約二十二億美元、菲律賓約五億美元；但是，此表並未包含其他國家的軍事援助。最後，就武器採購來源而言，美國依然是此地區軍火市場的重要供應者，東南亞六國中除越南之外皆曾向美國購買軍事武器；中國大陸近幾年陸續拓展軍火市場，但是在東南亞六國中僅印尼與泰國曾向北京採購軍事武器，其中又以泰國的累積採購金額為最多。<sup>401</sup>

<sup>401</sup> 自一九八九至二〇〇九間，緬甸為東南亞地區中對中國大陸軍事武器採購金額累積最多的國家，金額約為十八億美元。而泰國此期間累積採購金額約十二億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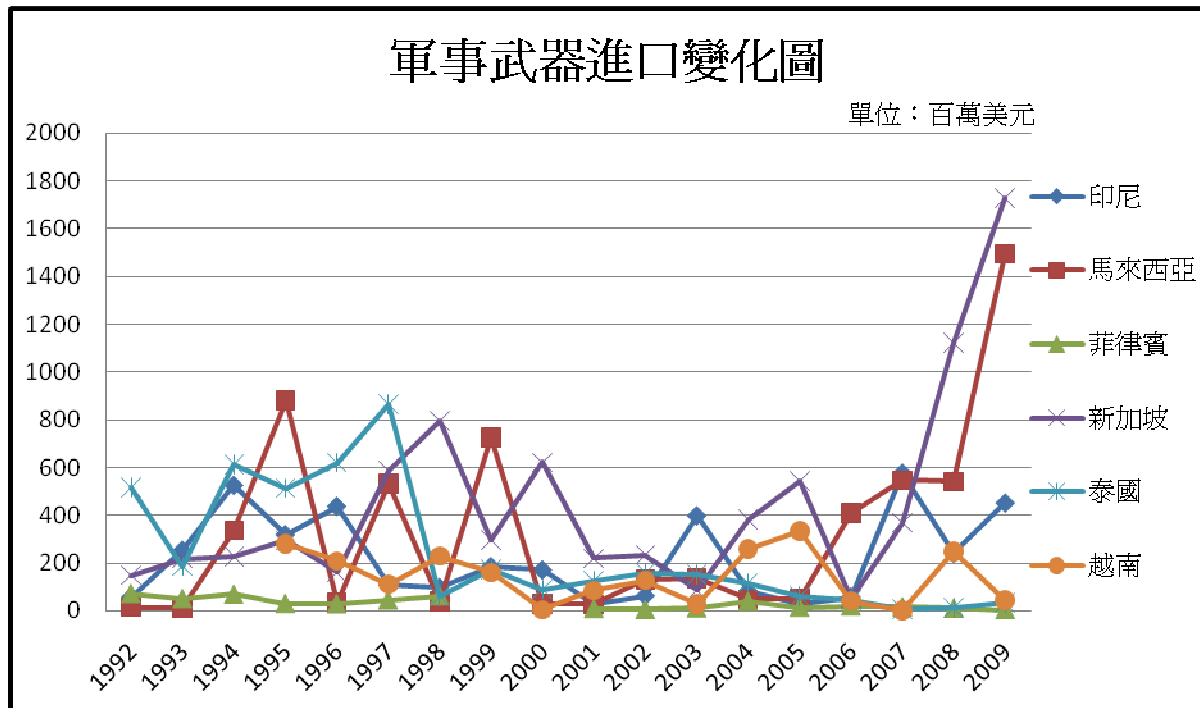


圖 5-21：東南亞六國軍事武器進口逐年變化圖

資料來源：斯德哥爾摩和平中心，<http://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越南一九九五年至二〇〇二年無數據記載。圖由筆者自行繪製。

由上述三指標來看（圖 5-19、5-20、5-21），研究者常以軍費支出總額增加來論斷東南亞國家對其國家安全環境感到疑慮；但是，若以軍費支出額佔國內生產毛額的變化來看，其結果與前者的主張將有所不同。然而，此一結果可能使研究者認為東南亞國家軍費支出額佔國內生產毛額沒有伴隨中國大陸的崛起而增加，正是因為東南亞國家並不認為它的崛起將成為威脅。但是，若以現實主義的視角來看，正是美國在此地區提供安全的保障，使東南亞國家即便對外部環境感到憂慮，亦毋須透過大幅增加軍費支出以增加自己的安全。另外，以本文第三章提到的案例裡，美國在後冷戰時期依然對部分東南亞國家提供軍事上的援助，而此一援助通常為數據所忽視，包含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國防部對菲律賓提供軍事武器，以及美國曾經在九七金融風暴後轉移軍事武器給泰國等事例來看，美國確實在軍事安全上對東南亞地區產生重要

影響。

最後，觀察東南亞六國是否參與美國或中國大陸的共同演習。東南亞六國中越南、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與中國大陸之間沒有共同軍事演練，泰國與中國大陸每年皆有「突擊」的陸地軍事演練、「中泰友誼」的海上搜救演練，而新加坡則自二〇〇九年起與中國大陸進行「合作」為名的聯合訓練活動。<sup>402</sup>相對地，東南亞六國與美國之間則存在較多的共同軍事演練。因此，東南亞國家皆傾向採取間接平衡的外交政策；若以強弱關係來看，新加坡軍費支出最高，且在冷戰結束後最慢與北京建交、又是最早表達意願提供美國軍事基地的國家，顯示新加坡對中國大陸最傾向採取間接平衡的政策；而泰國不僅與美中兩國皆存在軍事演練，泰國亦是東南亞六國中最早向中國大陸採購軍事武器的國家，故泰國對美中兩國皆採取間接平衡的政策，使得此一關係獲得抵消。

### 參、有限度的扈從

首先，在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上，關於戰略夥伴關係的性質，前國務院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謝淑麗認為：「戰略夥伴關係是指外交政策上的共同合作，但並非軍事上的結盟。因此，『戰略』一詞其實是在外交政策意涵上的戰略，而非軍事意涵上的戰略關係」因此，「戰略夥伴」並不同於「戰略聯盟」。<sup>403</sup>中國大陸與東協整體在二〇〇三年雙方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協國家領導人聯合宣言—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即中國大陸與東協的關係獲得更進一步的加強。二〇〇五年中國大陸與印尼簽署建

---

<sup>402</sup> 新華網資料，〈中國軍隊參加的主要中外反恐聯合訓練和演習〉，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9-07/20/content\\_11737557\\_4.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9-07/20/content_11737557_4.htm)。

<sup>403</sup> 同註 112。

立戰略夥伴關係、二〇〇五年中國大陸與菲律賓決定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戰略性合作關係、二〇〇八年中國大陸與越南簽署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以此一標準來看，上述三國對中國大陸主要採取有限度的扈從，並與美國維持緊密的關係，確保自身國家行為的自主性。以郭清水的標準來檢視東協六國和中國大陸的關係，說明東協國家採取有限度的扈從，並且傾向採取扈從；但是，筆者則持相異的看法，更詳細的論述留待結論作討論。

### 第三節 美國歐巴馬政府上任後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

#### 壹、美國歐巴馬政府的東南亞政策

二〇〇九年三月八日在海南島南方約六十五海哩處，中國大陸船隻驅離美國「無暇號」事件，以及雙方處理後續相關事宜所引發的緊張態勢，使南中國海主權問題再度躍升檯面。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麥克·馬倫對此表示：「中方認為此事發生地屬於中國專屬經濟區所規定的 200 海里內區域，但美國有權力進入這片水域，『這裡不是領海，領海只有 12 海里，經濟專屬區有 200 海里，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權力進入這裡。』」<sup>404</sup>美國太平洋美軍司令基廷亦於十九日表示，無瑕號事件顯示北京不願遵守目前的行為標準與規範，且以一種挑釁與令人不安的方式行事。<sup>405</sup>針對美國對此一事件的主張，中國大陸外交部與國防部則認為「美方有關說法嚴重違背事實，中方不能接受，關於外國船隻在中國專屬

---

<sup>404</sup> 中國評論新聞，2009.03.26，〈社評：中美南海戰略尖銳衝突 令人憂心〉，<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1/7/2/100917276.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0917276>。

<sup>405</sup> 中國評論新聞，2009.03.20，〈基廷就南海摩擦強硬表態 稱中國行為挑釁〉，<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1/8/7/100918781.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0918781>。



經濟區活動問題，《聯合國海洋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海洋科學研究管理規定》均有明確規定。<sup>406</sup>中國政府一貫嚴格按照上述規定處理此類活動。美軍監測船『無暇號』違背有關國際法和中國法律法規的規定，未經中方許可在南海中國專屬經濟區活動，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我們要求美方採取有效措施避免再次發生類似事件。」<sup>407</sup>此一事件可從幾個方面來觀察，第一，12海里領海與200海里專屬經濟區主權爭議再度躍上檯面，早在二〇〇一年軍機擦撞事件亦觸及此一問題，但是在國際法無明確規範或準則可以定奪，最後乃得依賴雙方政治上的溝通予以解決；第二，此一事件發生在歐巴馬政府上任之初，美中關係在短期間的負面影響是否影響未來的雙邊關係或東亞安全依然有待觀察；第三，南中國海的主權爭議再度躍上國際新聞版面，而美國在此一問題上的態

<sup>406</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中諸如第五條、第七條與第九條中，規定任何國際組織、外國組織或者個人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從事漁業活動、自然資源進行勘查、開發活動和進行海洋科學研究，必須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機關批准，並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法規。第十一條任何國家在遵守國際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屬經濟區享有航行、飛越的自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享有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的自由，以及與上述自由有關的其他合法使用海洋的便利。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的路線，必須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機關同意。第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行使勘查、開發、養護和管理專屬經濟區的生物資源的主權權利時，為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法規得到遵守，可以採取登臨、檢查、逮捕、扣留和進行司法程序等必要的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在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法規的行為，有權採取必要的措施，依法追究法律責任，並可以行使緊追權。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iliao/flfg/2005-09/12/content\\_31086.htm](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iliao/flfg/2005-09/12/content_31086.htm)。此處僅引述與此事件相關之法律文件與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海洋科學研究管理規定》中第二條 本規定適用於國際組織、外國的組織和個人（以下簡稱外方）為和平目的，單獨或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組織（以下簡稱中方）合作，使用船舶或者其他運載工具、設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海、領海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其他海域內進行的對海洋環境和海洋資源等的調查研究活動。但是，海洋礦產資源（包括海洋石油資源）勘查、海洋漁業資源調查和國家重點保護的海洋野生動物考察等活動，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第四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海、領海內，外方進行海洋科學研究活動，應當採用與中方合作的方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其他海域內，外方可以單獨或者與中方合作進行海洋科學研究活動。外方單獨或者與中方合作進行海洋科學研究活動，須經國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門批准或者由國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門報請國務院批准，並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法律、法規。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海洋科學研究管理規定〉，[http://big5.mlr.gov.cn/zwgk/flfg/hyglflfg/200406/t20040625\\_570268.htm](http://big5.mlr.gov.cn/zwgk/flfg/hyglflfg/200406/t20040625_570268.htm)。此處僅引述與此事件相關之法律文件與條文。

<sup>407</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9.03.11，〈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就美海軍監測船在中國專屬經濟區活動事答記者問〉，<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541674.htm>。新華網，2009.03.11，〈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就美國海軍監測船在中國專屬經濟區活動事答記者問〉，[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03/11/content\\_10995832.htm](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03/11/content_10995832.htm)。

度備受關注，亦成為美國在此地區積極與東南亞國家交往的背景之一。

根據一九五八年《領海及毗連區公約》明確規定，國家主權擴展於其領海。領海是沿著國家的海岸、受國家主權支配和管轄的海水帶，國家享有的領海主權及於領海的水域、上空、底床及底土。<sup>408</sup>關於外國軍用船舶通過領海的制度，是由各主權國家自行確定的；目前，有些國家實行外國軍艦無害通過的制度，有些國家要求外國軍艦通過其領海得經過事先許可或者事先通知。<sup>409</sup>領海寬度為 12 海里已為世界各國所接受；但是，200 海里的專屬經濟區則存在爭議。專屬經濟區不是公海，而是國家管轄範圍內的海域；然而，專屬經濟區又不同於領海，它不屬於沿海國國家領土的組成部分，沿海國僅對專屬經濟區內的生物資源擁有所有權，並對該區域內的捕魚作業和防止汙染等行使管轄權。<sup>410</sup>外國在專屬經濟區內享有船舶航行、飛機飛越和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的自由，行使這項權利時，須遵守沿海國的法律。<sup>411</sup>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沒有在聯合國一九八二年規定「專屬經濟區」的《海洋法公約》簽字，所以不承認各國的 200 海里專屬經濟區權利。這是美中雙方對發生在專屬經濟區內的無暇號事件中，雙方認知與看法不同的主要因素。

我國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宋燕輝博士曾針對二〇〇一年美中軍機擦撞事件撰文作一詳盡探究，該文結論中指出「外國偵察機在沿海國的專屬經濟海域上空行使飛越自由時進行電子偵查活動的確被沿海國家視為不友好的行動。但要找到法律權威

<sup>408</sup> 王鐵崖編，1995，《國際法》。台北：五南出版社，頁 206。

<sup>409</sup> 同上註，頁 210。

<sup>410</sup> 同上註，頁 222。

<sup>411</sup> 同上註，頁 221-222。

文件或論述去支持上述『不友好』的國家實踐已違反國際法，因此應被禁止，目前仍有困難。」<sup>412</sup>在無暇號事件中，中國大陸方面認為美國在專屬經濟區中進行情報蒐集，尤其事發地點鄰近海南島玉林亞龍灣海軍基地，使大陸方面感到不滿而進行驅離；然而，美方卻也表示過去派遣若干船隻進入中方專屬經濟區卻沒有被驅離，而無暇號卻掀起波瀾，事件又發生於新任政府上台之初，可能是中方在向美方傳遞若干訊號，即中方可能表達其利益範圍或為美方軍事行為劃出行為底線，並使雙方能夠進行軍事安全層面的對話。如大陸南海研究院國際經濟研究所李建偉副所長便表示：「聯合國海洋公約法中對專屬經濟區所做出的法律說明，只是強調了模稜兩可的合法性以及戰略性的差異。因此，應盡快建立一種可以阻止這些事件在未來可能會惡化的機制。中美兩國二軌磋商會的建立，有利於協助中美雙方建立互信加深理解。」<sup>413</sup>顯示國際法無法有效解決的背景下，未來依然存在發生類似事件的可能性，事件能否和平落幕端視雙方透過政治層面的對話來加以解決。

除此之外，中國大陸近期演習頻繁，且範圍亦逐漸擴大，使其軍事能力再度引起關注。包含北海艦隊跨過宮古海峽，穿越巴士海峽，抵臨馬六甲海峽以東海域，在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展開軍事演練；另外，東海艦隊穿過沖繩群島和宮古海峽，到達西太平洋衝之鳥礁附近海域進行演習。<sup>414</sup>此舉不僅顯示中國大陸海軍已具備突破第一島鏈的能力，也展現出解放軍有決心「阻絕」美

---

<sup>412</sup> 宋燕輝，2006，美國與中共在南海上空軍機擦撞所引發國際法爭議之研究。宋燕輝主編，《中美關係專題研究 2001-2003》。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出版，63-64。

<sup>413</sup> 中國評論新聞，2010.03.24，〈中美海軍能否避免衝突？兩國學者激辯〉，<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2/6/8/6/101268608.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1268608>。

<sup>414</sup> 中國評論新聞，2010.08.19，〈港媒：中國高調捍衛海洋利益 面臨兩大挑戰〉，<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1/9/4/101419454.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1419454>。

軍靠近或介入這些敏感的核心利益海域。<sup>415</sup> 由此可見，北京正積極實踐其海軍戰略的目標，使北京更能維持其所主張的國家主權與國家利益範圍。

若觀察由美方公布的重要政府資訊，以美國國防部所公布「2010年中國軍力報告」為例，該報告認為解放軍的主要軍事戰略，仍以積極防禦為主，但作戰性質則越來越朝向攻勢化，並著手發展多種不同運用層次的攻擊武器及多軍種協調作戰能力，以實現其「反介入」(anti-access)和「區域拒止」(area denial)兩項主要作戰。<sup>416</sup> 尤其是解放軍正在發展射程超過一千五百公里的反艦彈道飛彈，如果與適當的指揮控制系統結合，解放軍將能攻擊遠在西太平洋的航空母艦，<sup>417</sup> 達到嚇阻美軍的軍事目標。該報告書中更指出，在保衛海上航道、捍衛遠洋利益以及南海爭端中提供軍事力量能夠有效投射的目標下，解放軍許多發展中的裝備並不僅以台灣為目標，而是以能夠支援在第二島鏈範圍外的「延伸作戰能力」(Extended Operational Reach)為主要目的。<sup>418</sup> 另外，美國國防部亦於二〇一〇年公布歐巴馬政府第一份的「國防總檢」報告，文中指出美國依然對中國大陸軍事不透明的情況感到擔憂，尤其是中國大陸積極發展海空實力背景下，這些軍事現代化行為以及戰略架構可能對美國海空軍介入或部署形成挑戰。因此，該報告中指出美國應積極發展空海一體的概念，以戰勝擁有尖端反進入與區域拒止能力在內的所有對手。<sup>419</sup> 相較於小布希政府內任的國防總檢報告，儘管沒有將中國大陸視為一戰略競爭者，但是

---

<sup>415</sup> 楊志恆，2010，〈美軍 2010 環太聯合軍演與東亞安全〉，《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8 期，頁 20。

<sup>416</sup> 丁樹範、王俊評，2010，〈美國《2010 年中共軍力報告書》〉，《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9 期，頁 17。「反介入」(anti-access)和「區域拒止」(area denial)兩項概念亦出現於 2010 國防總檢報告中。

<sup>417</sup> 陳一新，2010.08.19，〈美國自利 我軍購更費力〉，《國政評論》，<http://www.npf.org.tw/post/1/7965>。

<sup>418</sup> 同註 416，頁 18。

<sup>419</sup>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0, *Quadrennial Defense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pp. 31-32, <http://www.defense.gov/qdr/qdr%20as%20of%2029jan10%201600.pdf>.

並未就此鬆懈對中國大陸的防範，美國依然持續關注中國大陸的軍事動向，並在報告中強調與傳統盟邦間友誼的重要性，甚至應加強與其他非傳統盟邦國家的關係，維持美國在此地區的國家利益與國家影響力。

在中國大陸海軍實力逐漸提升以及在無暇號事件的背景下，甚至朝鮮半島天安艦事件後美國是否派遣航空母艦進入東海進行演練，受到各界關注，尤其是爭論的過程裡，中國大陸透過軍事演練使吾人認識到其反介入軍事裝備持續現代化的成果，使學界對美中雙方在西太平洋的互動與發展予以關注。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與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於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一日至十二日聯合舉辦「中美海上戰略對話」中，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餘萬里副教授在會議中的談話，顯示北京發展海軍現代化的兩難困境：「一種認為，中國應該盡快加速中國海軍的現代化，從而保護中國擴張的國家利益，另外一種則認為這樣的擴張會加劇國際上的緊張局勢，從而最終損害中國地緣戰略的地位。」<sup>420</sup>針對第二種觀點，新自由主義者期盼雙邊經貿互賴以減低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但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中國海事研究所主任金萊爾(Lyle Goldstein)則持另一種觀點：「十九世紀美德之間的海上軍備競賽足以說明，單單憑借經濟的相互依存並不能夠有效地解決不斷變化的『安全困境』，政治力量的介入是必需的。」<sup>421</sup>然而，政治層面甚至是拓展至軍事安全層面的對話與協商能否解決此一困境亦受到其他學者的質疑。閻學通教授便認為未來大國戰略關係的發展方向，將可能從減少衝突增加合作向名為合作實為競爭的方向轉化，所謂戰略夥伴關係將有名無實。<sup>422</sup>同時，王緝思教授與大陸海軍少將楊毅也認為，「在傳統軍事安全領域方面，無論是出於地

---

<sup>420</sup> 同註 413。

<sup>421</sup> 同上註。

<sup>422</sup> 閻學通，2008，〈世界格局走向及中國的機遇〉，《當代亞太》，第 5 期，頁 9-11。

緣戰略、軍事能力平衡變化、武器裝備研發、軍事力量部署調整，還是軍事戰略和軍事理論的調整，雙方都相互關注對方的動向，相互猜疑依然很重，缺乏戰略互信。」<sup>423</sup>

針對中國大陸整體軍事實力的提升，以及中國大陸在東亞地區影響力日漸提升的背景下，美國亦在政治與軍事安全層面上予以回應。尤其是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一日在夏威夷海域舉行「環太平洋演習 2010(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2010)」參演的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荷蘭、秘魯、韓國、新加坡、美國，以及今年新加入的哥倫比亞、法國、馬來西亞、泰國，觀察員有巴西、印度、紐西蘭，演習規模一年較一年盛大，<sup>424</sup>各界認為這是美國個針對中國大陸所建立的「C 型圍堵網」。除此之外，如同國防總檢報告中強調美國將持續加強與亞太地區的同盟關係外，並朝向建立新的夥伴關係發展，下文中將焦點置於歐巴馬政府時期東南亞情勢的變化中，觀察美中雙方在此地區的互動與角力。

## 貳、歐巴馬政府時期美中雙方在東南亞地區的競爭

歐巴馬上台後，將焦點由中東轉至東亞地區，尤其是國務卿希拉蕊更於上台後立即展開亞洲行，並且一改過去國務卿上任後訪問歐洲或中東的傳統，而是出訪日本、印尼、南韓與中國大陸。她在出訪前的演講中表示，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相較之下，歐巴馬政府上台後經濟問題亦是新政府的重要

---

<sup>423</sup> 中國評論新聞，2010.08.09，〈王緝思：中美重大戰略較量難以避免〉，<http://www.zhghpl.com/doc/1014/0/9/0/10140901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409018&mdate=0809155741>。楊毅在文中表示：「在傳統軍事安全領域方面，無論是出於地緣戰略、軍事能力平衡變化、武器裝備研發、軍事力量部署調整，還是軍事戰略和軍事理論的調整，雙方都相互關注對方的對象，相互猜疑依然很重，缺乏戰略互信。」詳見楊毅（中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2010，〈淺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際展望》，第4期，頁20。

<sup>424</sup> 同註415，頁16。

挑戰，各界亦對美國國力逐漸消融的擔憂。同時，華府與北京之間不管是貿易上或貨幣政策上更是充滿矛盾。但是，她認為美國依舊是最重要的國家，也是不可或缺的國家，並表達美國依舊存在領導世界的意願。<sup>425</sup>另外，二〇一〇年美國國防部公布的「四年國防總檢」報告中將菲律賓與泰國視為「正式盟友」；新加坡等國家為「戰略伙伴」；包括印尼、馬來西亞和越南等為「可預期的戰略伙伴」。報告中亦表示，美國有意加強與馬尼拉及曼谷的聯盟關係，並深化與新加坡的合作，針對雅加達、吉隆坡和河內朝向「發展新的戰略關係」。<sup>426</sup>整體而言，歐巴馬政府的東南亞政策作出若干調整，包含積極參與東協多邊組織；鞏固傳統盟邦關係外，更積極拓展與其他國家的關係；較布希政府更重視經濟發展問題；在民主人權問題上採取更加靈活的政策。<sup>427</sup>大陸學者認為美國重返東南亞具有幾項戰略意圖包含，謀求地區主導權；維護地區戰略利益，獲取經濟利益；保持前沿存在，提高危機反應能力；遏制中國大陸崛起，構築全球型包圍圈。<sup>428</sup>

在具體實踐方面，歐巴馬於新加坡參加亞太經合會非正式會議期間，參加於新加坡香格里拉(Shangrila)酒店所舉行的東協高峰會，成為首次參與東協高峰會的美國總統；另外，美國與東協亦於二〇〇九年開始雙邊的峰會交流，此一峰會為每年召開一次，二〇一〇年的會議於紐約召開，且緬甸政府亦派員參加。除此之外，美國也表達參與東亞峰會的意願，二〇一〇年十月東協首腦會議亦同意美國與俄羅斯將於今年(2011)參加東亞峰會。

---

<sup>425</sup> Hillary Rodham Clinton, February 13, 2009, "U.S. and Asia: Two Transatlantic and Transpacific Powers," Asia Society, New York,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7333.htm>.

<sup>426</sup> 中國評論新聞，2010.09.25，〈美國東盟峰會召開 南海問題或在議題之中〉，<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5/6/3/101456398.html?coluid=70&kindid=1853&docid=101456398&mdate=0925094131>。

<sup>427</sup> 幫助泰國與印尼鞏固民主，推動越南的民主化，通過多邊主義推動緬甸的民主進程。李益波，2009，〈淺析奧巴馬政府的東南亞外交〉，《東南亞研究》，第6期，頁57。

<sup>428</sup> 喻波，2004，〈試析美軍重返東南亞的戰略意圖〉，《雲南財貿學院學報》，第19卷，第6期，頁36-37。

針對峰會成員的擴大，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就東亞峰會擴員事宜答記者問中表示：「中方一貫主張東亞合作是開放的、包容的。對東亞峰會擴員事宜，我們重視並尊重東協共識，願繼續同各方保持溝通，以最終達成協商一致。」同時還表示：「演變中的地區架構應該堅持東協的主導作用。」<sup>429</sup>大陸學者針對中國大陸外交部此一表態主要考慮到三項因素：一，東亞峰會成員的改變並非峰會性質的改變，東亞峰會依舊朝著東亞一體化進程的目標邁進，並以東亞國家為主體，重點在討論東亞地區內部的事務；二，成員國的增加，將使地區競爭更為激烈，但此舉亦使成員國間交流合作更為密切、共同利益也增多，相互制衡狀態會更加明顯，這也有利於地區的穩定與發展。<sup>430</sup>同時，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張錫鎮教授也認為「東協主導就避免了其他任何大國搶佔這個主導位置」，可防止美國憑藉自身實力操縱峰會，把峰會變為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推行霸權的工具。<sup>431</sup>

然而，相較於上述觀點，中國外交學院戰略與衝突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蘇浩卻認為，「即便東協加三領導人已將建設東亞共同體做為長期目標，但是各方對於共同體的內容依舊未能達成共識，使得建設東亞共同體的目標可能會虛化。同時，又開放區域外國家的參與，將更進一步弱化東亞國家內部的凝聚力，而美國的參與可能使區域合作回到由美國主導的泛亞太框架中。」<sup>432</sup>同時，國立成功大學宋鎮照教授更強調「美國的加入讓此一原先的構想遭受破壞，也搗碎北京主導東亞高峰會的美夢。」<sup>433</sup>由此可見，

---

<sup>429</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0，〈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就東亞峰會擴員事宜答記者問〉，<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718653.htm>。

<sup>430</sup> 王欣，2010，〈美國加入東亞峰會之後的中國東南亞外交政策的幾點思考〉，《政治研究》，總第236期，頁94。

<sup>431</sup> 張錫鎮，2003，〈東盟實施大國平衡戰略的新進展〉，《東南亞研究》，第3期，頁20。

<sup>432</sup> 蘇浩，2010，〈東亞區域合作的雙層構架分析〉，張蘊嶺、沈銘輝主編，《東亞、亞太區域合作模式與利益博弈》。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頁46-47。

<sup>433</sup> 原先構想是指「東亞國家自己的會議」。詳見宋鎮照，2010，〈東協、中國和美國的東亞新三角競逐關係--從東亞高峰會談起〉，《海峽評論》，第240期，頁16-21。



美國的參與不僅提升其在此區域的影響力，對東亞峰會未來能否朝向由東協或東亞國家主導東亞一體化的發展蒙上一層陰影。

美國與東南亞個別國家的關係上，以美國與越南關係為例，雙方關係隨著南海問題增溫之際亦逐漸緊密，國務卿希拉蕊於受邀二〇一〇年十月東亞峰會時曾表示：「南中國海問題與美國的利益有著直接的聯繫」，<sup>434</sup>此一言論引發北京的高度關注。對此，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張鐵根在其文中指出：「根據媒體透露，越南在河內同美國舉行雙邊會晤時，越方向美方提出，希望希拉蕊在會上談談南海問題。所以希拉蕊南海談話應是美越合謀的結果。」<sup>435</sup>在此一背景之下，美越雙方皆認為雙邊關係處於最佳時刻，雙方更於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一日在南海舉行為期一周的海上聯合軍事演習，美國航空母艦「喬治·華盛頓」號(George Washington, CVN-73)在經過越南外海時，於距離南峴港外三百多公里處停泊，越南政府更派代表登船訪問。<sup>436</sup>未來值得觀察的焦點是美國是否租借金蘭灣，此處具備遏制南中國海咽喉的戰略要地，一旦越南租借金蘭灣給美國，便對中國大陸在海南島的軍事基地構成最有效的軍事制衡。針對此一議題，美方部分官員表示目前沒有意願，且越南亦表示不願再將金蘭灣租借給其他國家；但是，美國第七艦隊已證實二〇一〇年三月底美軍一艘彈藥船在越南雲峰灣進行了十六天的維修，而此處離金蘭灣並不遠。<sup>437</sup>值得注意的是，冷戰結束後美國在東南亞維持軍事合作的方式已由租借軍事基地，改為透過建立燃料庫及取得休養與修護設施的使

---

<sup>434</sup> 中國評論新聞，2010.07.27，〈南中國海主權問題或成中美「新爭端」〉，<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3/9/3/9/101393908.html?coluid=59&kindid=0&docid=101393908&mdate=0727101021>。

<sup>435</sup> 張鐵根，2010，〈東亞峰會吸收美俄參加及其影響〉，《亞非縱橫》，第5期，頁9-10。

<sup>436</sup> 中國評論新聞，2010.08.27，〈越南國防部副部長稱永遠不做美國的軍事同盟〉，<http://www.zhgp.com/doc/1014/2/7/9/101427992.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1427992>。

<sup>437</sup> 新華網，2010.10.08，〈美俄競逐金蘭灣基地？南海或再起波瀾〉，[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10-10/08/c\\_12635525\\_5.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10-10/08/c_12635525_5.htm)。

用權，而此一方式屬於商業性用途。目前美國與東南亞國家中的泰國、馬來西亞、汶萊、印尼與菲律賓皆採取此一模式，因此未來美越雙方是否朝向此一方向發展，值得吾人關注。

另外，儘管本文未將緬甸列為觀察範圍中，但是歐巴馬政府與緬甸關係逐漸改善下，其背後動機與意義值得關注。首先，自從一九八八年九月緬甸軍政府上台後，美國歷屆政府與緬甸的關係均處於緊張狀態，美國政府更於一九八九年一月宣布對緬甸實施經濟制裁。同時，緬甸的民主問題不僅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美國對緬甸內政的批評也成為美國與東協間的矛盾之一；然而，歐巴馬政府上任後一改過去小布希政府斷絕往來的手段，而是強調接觸與制裁雙管齊下，期望能改善彼此間的關係。二〇〇八年緬甸風災嚴重，美國向緬甸提供七千五百萬美元的援助，使美國成為緬甸二〇〇八年風災受難者捐贈最多的國家；<sup>438</sup>二〇〇九年八月美國參議員訪問緬甸，並與緬甸軍人領袖丹瑞(Than Shwe)會面，美緬關係出現解凍的跡象；<sup>439</sup>同年(2009)九月，希拉蕊表示美國政府決定將與緬甸軍政府直接接觸，並放寬對緬甸高官入境美國的限制，雙方並於十月進行首次的高級別會談。<sup>440</sup>其次，美國改善與緬甸的關係所涵蓋的意義，一方面美國過去制裁的目的不僅希望緬甸成立一個親西方的政府，此舉亦有益於對中國大陸崛起形成壓力；然而，制裁的外交手段並沒有產生作用，反而使美國與緬甸的關係日漸疏遠、中國大陸與緬甸卻日趨緊密，而歐巴馬政府在緬甸問題上改採接觸政策，使雙方關係出現扭動的跡象。二方面是美國處理緬甸問題所採用的外交政策亦對其他東協國家釋放出訊息，歐巴馬政府一改過去對非民主政權的批評與制

<sup>438</sup> 林錫星，2009，〈美緬關係的趨緩與緬甸政治生態探析〉，《東南亞研究》，第6期，頁50。

<sup>439</sup> 同上註，頁46。

<sup>440</sup> 袁徵（簡體字為「征」），2010，〈「重返世界」—奧巴馬政府東亞政策評析〉，《當代世界》，第1期，頁52。

裁，而是改採接觸與對話的方式，不僅降低對這些國家內部的批評與干預，亦使得這些國家可以減少擔憂來自於美國的威脅。

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北京簽署南海行為準則宣言為建立朝向和平解決爭端發展；但是從簽署至今，各方依然透過各種方式占據島嶼或宣示主權，而加劇此一爭端爆發危機的可能性。目前，東南亞各國主張制定一個更正式且具法律約束力的行為規範，而大陸亦有學者支持此一看法。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查道炯教授便認為南海行為準則宣言對任何違反宣言的行為沒有做出懲處說明。「因此，當前要不斷完善 DOC（南海行為準則宣言）並促進各方互信的建立。終極目標應是將各方在南中國海的關係引入正軌。」<sup>441</sup>然而，無論是強化宣言或建立具法律約束力的行為規範，美國能否參加亦值得吾人持續觀察。尤其是歐巴馬上台後，美國對南海的態度漸由「消極中立」轉向「積極介入」，<sup>442</sup>如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河內參加東協區域論壇時，更公開表示確保南海航運和自由貿易暢通攸關美國國家利益；希拉蕊在今年(2011)三月與菲律賓外交部長的談話中，強調彼此認同簽署一項具有約束力地區性行為準則有利於亞太地區的海洋安全，美國更表示要成為這條多邊協議的簽署國之一。<sup>443</sup>相較於美國積極表態，北京在面對東南亞國家建立具法律約束力的行為規範的主張時，目前僅表示中國大陸將持續遵守南海行為準則宣言中的規範，並未公開表示其是否願意採行東南亞國家的主張。筆者認為北京可能擔憂若美國亦參與此一具約束力的行為規範，故使北京收復主權的目標更難實踐。由美國一連串積極的外交行為中，可以觀察出歐巴馬政府不僅於政策宣示上加強與東協國家的關係，在實際外交作為上亦

---

<sup>441</sup> 同註 413。

<sup>442</sup> 同註 428，頁 37。

<sup>443</sup> 商報，2011.03.15，〈菲美認同南海需簽署具約束力行為準則〉，  
<http://www.phshangbao.com/show.aspx?id=59405&cid=4>。

積極參與。整體而言，歐巴馬政府的東亞戰略架構已從「以往以中國為核心的對話合作夥伴戰略模式，轉向到結合和強化傳統同盟國家的外交關係，來壓制中國在東亞區域的企圖心。」<sup>444</sup>

---

<sup>444</sup> 宋鎮照，2010，〈美國勢力重返東南亞對區域權力秩序的衝擊〉，《海峽評論》，<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237-7954.html>。

## 第六章 結論

本文結論分為兩部分，首先是研究發現，針對本文研究過程與結果，比較本文與學者或文獻中部份觀念所產生的歧異與不同；其次，針對本文理論層面、美國與中國大陸務關係層面、美中與東南亞六國關係作回顧。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在避險策略上，本文採用郭清水的研究作為基礎，但是本文結論與其研究結果卻出現分歧。郭清水將避險策略視為由制衡到扈從的光譜，期間包含間接制衡、交往與束縛、有限度的扈從等層面，而本文在有限度的扈從與扈從定義運用上與郭清水有不同的看法：

1. 郭清水文章中的定義與說明中，他指出扈從是指雙方存在政治或軍事的結盟關係或接受超強的支配和安全上的守護，而有限度的扈從指雙方存在戰略夥伴關係或國家保持自身的自主性。與大國的關係上，扈從指大國雙方關係為零和遊戲，即小國對一國採扈從則對另一方為疏遠，有限度的扈從則是小國對崛起大國採取交往，同時維持與現存霸權的關係。
2. 在郭清水的文章中，指出馬來西亞與泰國採取有限度的扈從，而新加坡與印尼則沒有採取有限度的扈從。但是，四國中印尼與中國大陸簽有戰略夥伴關係，四國皆與現存霸權國家與崛起中國家維持外交關係，四國亦沒有尋求中國大陸在安全層面上的保護，而是追求國家自主性。以此觀之，印尼應列為有限度扈從的國家，而其他國家則不存在此一層面的關係。

3. 以郭清水文章意涵來看，在制衡與扈從的光譜中，採取有限度的扈從是偏向扈從的那一端，而沒有採取此一行為即往制衡的一端靠近。但是，文章中的定義與說明確是拿有限度的扈從與扈從作比較，故筆者推論郭清水認為採取有限度的扈從應視為抗拒扈從的政策，而沒有採取有限度的扈從政策的國家即傾向扈從。
  
4. 若以本文第四章中引述若干學者對戰略夥伴關係的定義來看，其意涵是指雙邊存有歧異的背景下，尋求共同合作的可能性。再以第四章第一節中冷戰時期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的互動來看，泰國較其他東南亞國家更早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並且最早存在軍事武器裝備的交易，可見雙方友好關係的基礎較其他國家更廣泛。然而，中國大陸卻未與泰國簽署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觀察東南亞國家時，吾人亦能發現與中國大陸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國家，通常雙方在早期曾存在較多的歧異，且現在依然存在無法解決的問題。大陸學者更將中國大陸戰略夥伴關係作一分類，包含關係較為緊密者、合作中有鬥爭者、可進一步合作者、針對周邊鄰近國家等，<sup>445</sup>可見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端視各國處在中國大陸外交戰略棋盤上的位置與意義而定，不同層次的夥伴關係彼此合作範圍與深度亦存在差異，吾人不能輕易將與中國大陸建立此一夥伴關係的國家視為較親近中國大陸的國家。

因此，本文脫離郭清水從制衡到扈從光譜的束縛，認為採取有限度的扈從的國家是在避免採取扈從政策，而為採取有限度的扈從的國家則存在扈從的可能性。回到郭清水的圖表中，馬來西亞與泰國較偏向扈從，而新加坡與印尼相較於前兩者則未偏向扈從，

---

<sup>445</sup> 秦邦九，1999，〈中共推動「多極化」世界格局與「夥伴外交」之研究〉，《共黨問題研究》，第25卷，第9期，頁43-44。

而是偏向制衡。

最後，本文透過第二章理論分析中，針對三位學者理論與著作的回顧以及本文論述內容來看，發現一些有趣的研究成果：

第一，過去許多研究中國大陸崛起的文獻裡，以吉爾平或金德爾柏格的霸權穩定論為途徑，但是現在已有許多文獻分別在經濟層面或軍事安全層面上對霸權穩定論提出批判。<sup>446</sup>華茲在書中便指出美國和蘇聯或許才是最需要被管理的國家。<sup>447</sup>而吉爾平亦認為體系中實際上不存在完全由某一國家或群體國家所控制的體系，因為政治、經濟與技術力量在國家間的分配是不平均的。更重要的是，如果存在一個國家或群體掌控的體系，則社會將失去變革的動力。吉爾平此一主張便提出霸權國家維持此一狀態所面臨的挑戰。因此，霸權國之所以願意提供公共產品，是因為它可以從中獲取超過其他國家的利益，<sup>448</sup>史蒂芬·克拉斯納(Stephen Krasner)甚至認為霸權雖然以貿易方式獲取自己的利益，但不一定會給他國帶來好處。<sup>449</sup>這在美國九〇年代後的外交政策中相當明顯，由於美國已成為世界唯一超強，只要他願意做任何事都將不受任何限制，甚至美國在自身實力相對衰退的情況下，已經沒有足以擔當一個提供公共財的霸權國家，它一系列的政策明顯出自於自身利益的考量。因此，霸權國所關注的焦點是維持其與挑戰國或者競爭國間權力的比

---

<sup>446</sup> 中國大陸外交學院秦亞青教授在其著作《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美國在國際武裝衝突中的支持行為(1945-1988)》，他首先引出霸權穩定論認為霸權國家有必要維持國際秩序的和平與穩定，但是為什麼美國在冷戰時期對所有國際衝突的態度存在差異？即美國並不是對所有衝突皆試圖緩和衝突或維持國際和平，甚至美國認為可以從衝突中獲得利益。詳見秦亞青，1999，《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美國在國際武裝衝突中的支持行為(1945-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sup>447</sup> 同註 71，頁 272。

<sup>448</sup> 阮宗澤，2007，《中國崛起與東亞國際秩序的轉型：共有利益的塑造與拓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143。

<sup>449</sup> 宋興洲，2005，《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台北：鼎茂圖書，頁 45。

較優勢。<sup>450</sup>

第二，由大國競爭與小國的互動更能清楚的驗證上一主張：華茲認為在兩極體系下，美蘇兩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應付對方，而不是滿足其他國家的需求。<sup>451</sup>對此，吉爾平指出大國對中等國家或不發達國家的財政與技術援助，通常不是接受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常常是大國本身政治與軍事的考量。<sup>452</sup>回到本文來看，中國大陸崛起過程中針對周邊國家提出許多外交政策，但是這些政策可以視為對美國亞太政策的回應，達到反制衡或反圍堵的戰略目標。另外，南海問題再度發酵，使東南亞國家在兩強間如何行為又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而其中一種看法便認為，美國正積極運用某些爭端離間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它在亞太地區的行為都是為其自身做考量，因此要東南亞國家必須更加戒慎。

第三，許多研究將研究焦點置於國家面對強權崛起將如何回應，但是存在大國競爭的環境與條件下，對小國外交行為不必然產生限制：摩根索便認為在競爭模式之下，小國可能成為中立國或緩衝國，這與華茲國際政治理論中對於國家選擇的二分法明顯不同——國家不是選擇抗衡便是扈從。但是，華茲也曾表示當兩個強國僵持不下的時候，其他次要國家會有較多的行動自由，弱國在權力平衡的情況下有很多渾水摸魚的機會。<sup>453</sup>東南亞國家在美中之間並沒有直接抗衡的行為出現，一般以為領土征服已不再是國際政治中的重點，甚至認為是東南亞國家所倡導的多邊制度有關。然而，根據現實主義的觀點，東南亞國家

---

<sup>450</sup> 同註 448，頁 143-144。

<sup>451</sup> 同註 71，頁 220。

<sup>452</sup> Robert Gilpin, *op. cit.*, pp. 142.

<sup>453</sup> 同註 71，頁 236。



之所以存在自主性乃是他們介於兩強之間，使得他們存在發揮的空間。另外，蘭德爾·施韋勒(Randall L. Schweller)認為回應強國崛起的政策有六種，包含預防性戰爭、制衡(圍堵)、追隨(bandwagoning)、束縛(binding)、交往、推卸責任(distancing or buckpassing)；<sup>454</sup>但是，他強調國家很少採取單一的政策，而是採取複合政策做為回應。台灣大學張亞中教授也主張「現有霸權國家絕不會以單一的模式對新興的霸權國家進行防堵，它們通常是採取混合的戰略模式因應新興強權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挑戰；而新興霸權國家也將以混合的戰略來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sup>455</sup>而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亦曾表示，當今大量的中小國家成功地推行不結盟或中立主義政策，即不需要盟友便可以持護自身安全的現象，乃是國際體系中存在的總體均勢，而此一均勢並非中小國家所維持，而是在大國權力均勢之下所構成。<sup>456</sup>

第四，權力要素或霸權國家基礎的轉變牽動東亞權力結構的變遷與發展。國內學者蔡東杰對東亞霸權結構的變遷進行分析，他指出霸權模式由過去古典型霸權、經歷歐洲型霸權、至現代型霸權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他們涉及權力基礎的變遷：由過去傳統的軍事力量轉為強調經濟等非軍事力量的重要性。<sup>457</sup>如莫德爾斯基和湯普森在研究過去五個世紀裡的「世界霸主」時，明顯地注重軍事層面上的實力—特別是海軍力量—指標；<sup>458</sup>而伊曼紐·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強調霸權和軍事力量的作用，十七世紀荷蘭的經濟霸權並不是被世界市場體系的運作

---

<sup>454</sup> Randall L. Schweller, op. cit., pp. 8-17.

<sup>455</sup> 張亞中，2003，《全球化與兩岸統合》。台北：聯經出版社，頁96。

<sup>456</sup> Hedley Bull, 2002, *The Anarchical Society: The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95.

<sup>457</sup> 蔡東杰，2005，〈當前東亞霸權結構的變遷發展與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9期，頁101-122。

<sup>458</sup> 郝名瑋譯，安德烈·岡德·佛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巴里·吉爾斯(Barry K. Gills)著，2004，《世界體系：500年還是500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135。

或者資本主義的矛盾所毀滅的，而是被英國和法國的軍事力量所毀滅。<sup>459</sup>而現在的權力構成因素的轉變，包含摩根索提出的九項因素，吉爾平更加進國家威望作為考量、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即認為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競爭正在取代傳統的軍事武力競賽，而成為國際競爭中的主要內容，並決定國家在國際間地位的主要因素。<sup>460</sup>另一方面，美國在軍事上依然是最強大的國家，但它在經濟成長上卻步履蹣跚；相較之下，中國大陸軍事力量儘管增加速度快速，但在整體軍事開支上依然落後美國，而中國大陸引以為傲的經濟成長儘管在未來將逐漸減緩，但確實較美國更有能力帶動亞洲經濟的繁榮。在九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中國大陸與東南亞之間關係的變化，也隨著美中兩國權力要素的轉變而變化，亦有學者將此一現象以美國的不完全霸權謂之。

## 第二節 研究期許與建議

在理論層面上：第一，面對後冷戰的國際局勢，研究者面對經濟互賴等全球化問題下，為尋求對諸多國際事務的解釋，紛紛轉往新自由主義或新自由制度主義尋求解釋。但是，現實主義本身已經相當豐富，本文透過對現實主義主要流派作一回顧，其豐富的內涵依然提供吾人許多建議。同時，傳統國家安全依然佔據重要的地位，而美中關係是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絕非單純經濟層面等多方面互動便能解決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尋求國家安全與權力的動機。第二，國家權力來源逐漸多元化，權力的衡量指標也異於以往，但是研究者所關注的焦點時常存在分歧，除了舉第二章摩根索、第四章沃爾佛斯所提出的要素之外，其他諸如米

---

<sup>459</sup> Robert Keohane,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42.

<sup>460</sup> Samuel Huntington, 1993, "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p. 73.

爾斯海默以軍隊數量、國民生產毛額與該國家財富佔據世界的比例作為觀察。批評者認為這些數據到底何者佔據重要的影響因素，即便大家皆認同國家財富是潛在的因素之一，但這些財富如何在必要時刻有效地轉化為軍事力量則打上問號。然而，如同米爾斯海默所強調的，研究者該關注國家的潛在實力，唯有具備若干實力才具有挑戰現狀的能力。

第三，摩根索主張國家追求權力，而華茲主張國家追求安全；前者認為當所有國家都追求權力時，體系將處於均衡的狀態，後者則認為國家無止盡的追求權力，可能致使其他國家對該國採取制衡，反而使國家陷入不安全的境地。但是，米爾斯海默認為國家無法得知其他國家意圖，更不清楚自己該擁有多少的權力才能保有安全，所以他主張國家將最大化自己的權力才能獲致安全。若以本文來看，美中兩國對兩者並沒有清楚的劃分，甚至時常將兩者混為一談。第四，新興強權隨著實力的增加，他將受到誘惑而產生對周邊國家進行控制的企圖，甚至謀取成為區域的霸權國家；但是，為什麼有些案例顯示新興強權沒有立即追求權力的行為？這亦是研究中國大陸崛起的文獻所關注的問題。以第二章引述吉爾平的假定來看，中國大陸可能在現狀環境下所獲取的利益遠大於改變現狀，因此吾人並不能將目前中國大陸所推行的睦鄰友好與和諧發展政策，而認為中國大陸未來不會改變現狀。吉爾平與米爾斯海默便認為新興強權可能在等待機會的窗口，現在和善的外交政策並不能對未來提供任何保障。

第五，關於戰爭的原因，米爾斯海默提到無政府狀態持續存在但是戰爭卻不必然發生，他認為戰爭與否的關鍵在於大國之間的能力分配狀態。然而，他並不認為這是經貿關係相互依賴或越來越多的國家走向民主的貢獻，除了提到第二次大戰前歐洲的依賴程度已相當高之外，還引述蘭尼的文章指出，歷史上四次民主國家趨向戰爭的危機中，佔據重要關鍵因素的並非他們都是民主

國家，而是此一體系中大國能力分配的狀況佔據更多的影響力。相較於本文所引述的現實主義者，皆以體系結構中權力分配的狀態來討論大國間爆發戰爭的原因，斯奈德(Jack Snyder)則在《帝國的迷思－國內政治與對外擴張》一書中，主張國家採取擴張的原因來自於國內特殊利益團體為實踐個人利益或獲得權威而發動戰爭。這本書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研究國內政治如何影響國家的對外行為，甚至是何種型態的國內政治將導致擴張或溫和的外交政策，<sup>461</sup>這是新現實主義者所忽視的視角，亦為本文不足之處。

第六，在避險問題上，研究者將研究對象聚焦在以理性途徑觀察國家外交政策的選擇上；但是，同本文第二章理論的回顧，大國間能力的分配才是真正具備影響力的重要因素，而非單純國家在制衡與扈從中選擇。第七，面對中國大陸重新崛起，為什麼亞洲國家並沒有採取明確的制衡行為？布贊在其書中指出幾項可能因素：<sup>462</sup>

1. 可能是北京對周邊國家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獲致成功的結果，致使那些涉及主權爭端的國家對北京在主權爭議上的堅持以及挑釁的舉動採取姑息(appeasement)的立場；
2. 另一種可能是過去以歐洲為基礎的威斯特伐利亞模式在東亞地區可能不適用，即西方認為面對強權崛起弱國將採取制衡的行為，將由東亞地區傳統上採取扈從的行為取代，包含費正清、杭亭頓以及本文第二章引述的部份學者們亦

---

<sup>461</sup> 于鐵軍等譯，傑克·斯奈德(Jack Snyder)，2007，《帝國的迷思－國內政治與對外擴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332-333。于鐵軍在譯序中提到史奈德早期的研究，發現當一個國家不具備朝向民主制度成功過渡時，民主化反而激發民族主義狂熱，並引發民族衝突。由此顯示民主和平論的主張受到挑戰，研究者還得注意國家民主化的程度(頁 5-6)。另外，卡普蘭也在書中提到，如果今天俄羅斯正在崛起，它實行民主體制的事實並沒有多大的意義，考慮到俄羅斯民主結構的脆弱性質，似乎很難預言該國十年或十五年後的體制形式。卡普蘭的主張詳見黃福武譯，戴爾·卡普蘭(Dale C. Copeland)，2008，《大戰的起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342。

<sup>462</sup> Barry Buzan and Ole Waver, 2003, *Regional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80-182.

採取此一觀點，認為亞洲國家面對中國大陸的重新崛起，將採取扈從而非制衡的行為。然而，布贊則認為此一可能性應是建立在美國退出此一地區才可能發生。而此一觀念的另一層意涵是，如果階層(hierarchical)秩序是對的，即暗示著美國的退出將促使此一秩序在亞洲地區重現，並使成為中國大陸躍升為世界強權的基礎；

3. 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參予說明為什麼制衡作用不明顯，布贊指出亞洲國家認為制衡一個區域強權是美國的責任。然而，美國在亞洲地區的角色已由冷戰時期積極的(more committed)的保護者轉變為後冷戰時期較不積極(less committed)的平衡者，此一轉變重要的影響是，美國希望盟邦也負擔防衛與維持和平所需要的軍事費用，並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前沿駐軍給予支援。<sup>463</sup>此舉將賦予美國在外交決策與軍事戰略上極大的彈性，使亞太國家擔憂美國冷戰後的安全承諾是否同冷戰時期一樣的穩固；而亞太國家面對美國要求負擔與支援防衛任務的支援是否將給予支持，或同本文第二章所引述學者的說法，這些國家將轉向對中國大陸採取扈從。目前，許多國家對於美國此項要求時，經常採取推卸責任的行為，而成為美國所提供的安全保障下的搭便車者。<sup>464</sup>

同本文第二章引述專家學者的觀點來看，大國之間並不存在立即步入衝突與戰爭的危險性，而是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使國家之間沒有陷入選邊站的境地。另一方面，即便冷戰結束後國家間已建立多維層面的往來與互動，但是依然沒有完全消弭或改變國家對安全的需求與渴望，使得避險行為（或譯作防範行為）成為常態。

---

<sup>463</sup> Ibid., p. 178.

<sup>464</sup> Ibid., p. 163. 布贊認為美國退出亞洲，將使亞洲地區陷入衝突。

就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層面而言，雙方立場與目標不同考量下，本文認為：第一，華府與北京雙方存在戰略利益的衝突，是天生的戰略競爭者。因此，藍普頓便指出未來雙方關係能否穩定，端視雙方領導人在執行政策時是否讓對方有迴旋的空間，並考慮對方執政者所處的政治氣氛與國內環境，應避免柯林頓政府時期在最惠國待遇問題上，以強硬的態度逼對方作出選擇，且一旦北京做出華府不滿意的選擇，則華府將尋求報復的心態。<sup>465</sup>第二，美國必須接受自身國際影響力逐漸消融的事實，在許多國際問題上需要崛起中的中國大陸支持和合作，一旦雙方關係產生困境，不僅是美中雙方的問題，更成為美國在全球尋求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的阻礙。然而，如同希拉蕊曾經指出美中雙方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彼此應當同舟共濟，可見當美國在國際政治經濟上需要中國大陸協助之際，尤其是華府單方面無法處理與面對時，則雙方關係似乎較為和緩，即雙邊可於存在共同威脅下共同合作，但是如果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趨向穩定，則美中雙邊關係是否可以避免走向競爭，其所牽動的東南亞區域安全是否也將產生負面影響，這是許多研究者擔憂之處。

第三，美中雙方逐漸展開政府高層的對話，此一發展當然有助於雙方相互瞭解與雙邊關係的穩定；但是，交往與對話依然存在限制，如美方便透露中國大陸拒絕美方與其戰略核子武器管理者或相關人士進行對話。因此，在彼此未完全信賴的背景下，交往與對話並不能保證雙邊關係即可穩定發展。第四，本文第三章中引述四年國防總檢報告及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皆強調美國承平時在亞太地區的前沿駐軍對此區域的穩定與美國國家安全存有重要貢獻，未來美國不僅有意願維繫此一狀態，並積極擴大與各國在安全層面上的合作範圍；然而，同本文第四章指出北京海洋戰略所涉及的廣泛利益，以及北京海軍戰略目標漸趨落實的背

---

<sup>465</sup> 同註 229，頁 432-433。

景下，未來將對中國大陸周邊國家的安全以及美國國家利益產生衝擊。

以美中兩國與東南亞六國關係來看：第一，有許多研究東協或東南亞國家外交政策的取向，認為這些國家在大國環伺的環境下，採取大國平衡的策略，使東協及東南亞各國能夠獲取國家自主性的獨立。但是，本文認為小國對國際政治影響極微薄弱，而是主張由國際層面來觀察此一問題，東南亞國家之所以能採取此一策略，乃是立基於強國之間沒有立即性的潛在衝突與危機，沒有迫切要求小國在大國之間選擇制衡或是扈從。以美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為例，在許多國際議題上美國若即若離的態度是否代表其大國平衡政策失敗？如果東南亞國家具備此一能力，則東南亞國家毋須在過去二十年裡屢屢抱怨美國作的不夠多或作的不夠好。學者艾利斯便表示，美國為世界性大國，國家利益涵蓋範圍相當廣闊，當美國面臨各地區重要事件或政策抉擇時，美國將針對其自身所處的環境來認定何者為首要關鍵議題，當它認為某區域存在比東南亞地區更重要的事務時，美國便將重心移往其他地區；唯有美國認為東南亞事務牽涉到美國所關注的重要議題時，美國才予以關注。<sup>466</sup>

第二，各界對於避險策略已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和定義，但是企圖將東南亞國家避險策略更細緻的劃分依然存在限制，即便研究者針對此一策略作出研究設計，但是研究者時而跳脫架構和框架，沒有按照研究所設計的指標作一致性的研究，將使研究結果遭到挑戰。另一方面，吾人若將東南亞國家與大國之間關係視為採取等距外交亦有所不妥，東南亞各國對周遭大國的態度確實存在落差，故針對避險策略做更細部的劃分有其研究的意義和價值。未來研究者的挑戰將是如何設計整齊劃一的觀察指標，並且

---

<sup>466</sup> Alice Ba, 2009, "Systemic Neglect? A Reconsideration of US-Southeast Asia Polic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1, No. 3, p. 371.

按照此一觀察指標作研究，將成為此一領域研究者的挑戰。

第三，本文第二章引述吳玉山教授針對前蘇聯國家獨立後對俄羅斯採取抗衡或扈從的態度作研究，他指出西方的接納程度亦是國家選擇抗衡或扈從的重要因素。以此一指標觀察東南亞國家在美中國間互動來看，以南中國海問題為例，舉凡越南、菲律賓等涉及南海主權爭端的國家在軍事武力上皆無法與中國大陸匹敵，而美國的支持便成為至關重要的因素。以菲律賓為例，該國每年軍事預算皆非常低，軍事武器設備亦老舊，但馬尼拉在南海主權爭端裡卻未對北京採取扈從，而美國時常提供菲律賓許多軍事上的援助與訓練，可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第四，吳玉山教授的研究亦指出，「前蘇聯共和國在獨立後仍舊在經濟依賴俄羅斯的國家中，他們面對俄羅斯採取抗衡或扈從的政策間為負相關。」「對那些經濟發展程度高的國家而言，由於生產技術和產業組織都較為成熟，本國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也較強，因此轉移貿易夥伴以減少依賴的能力也較大。」那麼東亞國家與中國大陸是否呈現此一現象？然而，筆者研究的東南亞六國中僅新加坡發展程度高，其他國家發展程度相近，無法作此一觀察。但是，往後的研究可嘗試作觀察，而本文第四章所引述的資料中亦指出，真正能從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獲利的是那些工業程度較高的國家，包含日本與韓國皆能從中獲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可以預期兩國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相較於和美國的關係將顯得更緊密；但是，研究者若據此主張他們將對北京採取扈從而非制衡，顯然將遭到挑戰。

第五，懸而未解的南中國海主權問題未來如何發展，值得吾人持續關注，包含未來南海行為準則宣言是否由「宣言」轉向具有約束力的「準則」；美國是否參與此一準則；華府與北京在經濟專屬區主張看法不同下，是否成為潛在的危機等因素，都是影響



未來整個東南亞地區安全與穩定的重要關鍵因素。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報告便指出，北京與東協簽署的任何宣言或條約只是緩兵之計，到二〇一〇至二〇二〇時，大陸海軍在南海增加軍事部署後，這些協定都將在軍事實力做後盾之下失去意義。<sup>467</sup>因此，本文認為在雙方利益糾葛的背景下，未來西太平洋地區可能時常出現美中海軍對峙的場景。

---

<sup>467</sup> 同註 273，頁 81。



# 參考書目

## 壹、中文部分

### 一、書籍

- 于鐵軍等譯，傑克·斯奈德原著(Jack Snyder)，2007，《帝國的迷思－國內政治與對外擴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方淑惠、余佳玲翻譯，佛蘭納根(Stephen J. Flanagan)、馬提(Michael E. Marti)主編，2005，《人民解放軍與變動的中國》。台北：史政編譯室。
- 王良能，2000，《中共崛起的國際戰略環境》。台北：唐山出版社。
- 王崑義，2002，《全球化與台灣－陳水扁時代的主權、人權與安全》。台北：創世文化事業出版社。
- 王逸舟，2003，《全球政治和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王鐵崖編，1995，《國際法》。台北：五南出版社。
- 朱蔭貴、歐陽菲、虞和平等譯，濱下武志著，1999，《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制度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朱鋒，2007，《國際關係理論與東亞安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_\_\_\_\_、羅伯特·羅斯主編，2008，《中國崛起：理論與政策的視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朱聽昌主編，宋德星、汪偉民副主編，2002，《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與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
- 江啟臣主編，2007，《強權關係與亞太區域發展》。台北：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

- 何大明譯，黎安友(Andrew J. Nathan)、陸伯彬(Robert S. Ross)原著，1998，《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尋求安全的戰略》。台北：麥田出版。
- 余忠勇等翻譯，理查·艾林斯(Richard J. Ellings)、阿隆·佛瑞柏格(Aaron Friedberg)主編，2002，《2001-02 戰略亞洲》。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 吳士存，2010，《南沙爭端的起源與發展》。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 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台北：正中。
- 宋國誠主編，王瑞琦、耿曙副主編，《21世紀中國(卷二)－全球化與中國之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宋燕輝主編，《中美關係專題研究 2001-2003》。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出版。
- 宋興洲，2005，《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台北：鼎茂圖書。
- 李文志，1997，《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從扇形戰略到新太平洋共同體》。台北：憬藝出版。
- 阮宗澤，2007，《中國崛起與東亞國際秩序的轉型：共有利益的塑造與拓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周煦，1999，《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生智出版社。
- 林芳燕翻譯，維尼·伯特原著(Wayne Bert)，2003，《孰者勝出－美國與中國在東南亞之爭》(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A Changing of the Guard?)。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 林雨蓓譯，馬克·里歐納德原著，2008，《中國怎麼想？》。台北市：行人出版社。
- 門洪華譯，約翰·伊肯伯里原著(G. John Ikenberry)，2008，《大戰

- 勝利之後—制度、戰略約術與戰後秩序重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 胡祖慶，1989，《國際政治理論解析》。台北：五南。
- 計秋楓譯，藍普頓原著(David M. Lampton)，2003，《同床異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秦亞青，1999，《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美國在國際武裝衝突中的支持行為(1945-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翁明賢，2003，《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台北：創世文化事業出版社。
- 翁知銘，2009，《話中有劃—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出版。
- 郝名瑋譯，安德烈·岡德·佛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巴里·吉爾斯原著(Barry K. Gills)，2004，《世界體系：500年還是500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高一中翻譯，威廉·陶原著(William T. Tow)，2003，《亞太戰略關係尋求整合安全》(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 張亞中，2003，《全球化與兩岸統合》。台北：聯經出版社。
- \_\_\_\_\_、孫國祥，1999，《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台北：生智出版。
- 張蘊嶺主編，2003，《未來 10-15 年中國在亞太地區面臨的國際環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_\_\_\_\_、沈銘輝主編，2010，《東亞、亞太區域合作模式與利益博弈》。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 曹雄源，2009，《戰略解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佈局》。台北：五南。
- \_\_\_\_\_、黃文啟，2008，《布希政府時期：國家安全戰略》。桃園：國防大學。

- \_\_\_\_\_、廖舜右，2008，《柯林頓政府時期：接觸與擴大的國家安全戰略》。桃園：國防大學。
- 許志嘉，2004，《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生智文化出版。
- 許綏南譯，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孟儒原著(Ross H. Munro)，1997，《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台北：麥田出版。
- 郭耀華，2004，《北京大學中觀天下(上)》。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
- 陳志奇，1993，《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台北：中華日報社。
- 陳俐雯譯，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原著(Clyde Prestowitz)，2006，《全球經濟新霸主—30 億人正在創造經濟強權新勢力》。台北：商智文化。
- 陳奕平，2006，《依賴與抗爭—冷戰後東盟國家對美國戰略》。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陳鴻瑜，1987，《南海諸島主權與國際衝突》。台北：幼獅文化。
- \_\_\_\_\_編譯，1997，《東南亞各國海域法律及條約彙編》。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頁 239-240。
- 黃福武譯，戴爾·卡普蘭(Dale C. Copeland)，2008，《大戰的起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楊紫函等翻譯，克里斯多夫·麥納利(Christopher A. McNally)、查理斯·摩利森(Charles E. Morrison)主編，2002，《亞太安全觀》。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101。
- 溫洽溢譯，謝淑麗原著(Susan Shrink)，2008，《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台北：遠流出版。
- 葉自成，2001，《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外交思想比較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蔡瑋主編，2005，《中國和平發展與亞太安全》。台北：政大國關中心，頁 47-67。

- 蕭志強，2005，《從地圖看世界紛爭》。台北：世潮出版。
- 閻學通、孫學峰，2007，《國際關係研究實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
- 關中，2005，《意識形態和美國外交政策》。台北：台灣商務。

## 二、期刊

- 丁樹範、王俊評，2010，〈美國《2010年中共軍力報告書》〉，《展望與探索》，第8卷，第9期，頁16-21。
- 于有慧，2001，〈後冷戰時代中共新安全觀的實踐與挑戰〉，《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2期，頁57-76。
- \_\_\_\_\_，2004，〈中共外交政策走向與選擇〉，《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1期，頁105-124。
- 毛鑄倫，2001，〈中、美軍機擦撞事件解讀〉，《海峽評論》，第125期，頁16-17。
- 王大虎，2006，〈中國學者對中國古代朝貢體系研究回顧〉，《徐州教育學院學報》，第21卷，第1期，頁66-68。
- 王光厚，2007，〈從「睦鄰」到「睦鄰、安鄰、富鄰」—試析中國周邊外交政策的轉變〉，《外交評論》，第3期，頁38-43。
- 王昌沛，2007，〈毛澤東、赫魯雪夫的個人衝突與中蘇關係破裂〉，《燕山大學學報》，第8卷，第4期，頁83-86。
- 王欣，2010，〈美國加入東亞峰會之後的中國東南亞外交政策的幾點思考〉，《政治研究》，總第236期，頁94-95。
- 王崑義，2010，〈三個海洋的戰爭：中共海洋戰略的轉向與美中碰撞〉，《探索與展望》，第8卷，第10期，頁6-11。
- 布蘭登·何奧(Brendan Mark George Howe)，2004，〈小布希與東方巨龍：布希主義之戰略意涵與中國之崛起〉，《國防政策評論》，第4卷，第3期，頁32-69。

- 向駿，1996，〈「中國威脅論」及「新圍堵」〉，《美歐月刊》，第 11 卷，第 5 期，頁 25-38。
- 朱奕冰、楊丹志，2004，〈國內外關於中國「崛起」與「和平崛起」研究綜述〉，《甘肅理論學刊》，第 4 期，頁 14-17。
- 何一成、黃愛英，2006，〈再論中蘇論戰的歷史原因〉，《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35 卷，第 4 期，頁 51-52。
- 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抉擇（下）」〉，《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3 期，頁 61-80。
- \_\_\_\_\_，1997，〈「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抉擇（上）」〉，《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2 期，頁 1-32。
- 吳玲君，1998，〈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與區域安全〉，《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11 期，頁 1-14。
- \_\_\_\_\_，1998，〈美國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係〉，《美歐月刊》，第 10 卷，第 7 期，頁 40-52。
- 吳德美、曾聖文，2005，〈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對東協經濟發展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3 期，頁 57-92。
- 宋學文、黃子哲，2002，〈從東帝汶獨立運動探討美國的干預主義：一個霸權穩定論的觀點〉，《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3 期，頁 83-106。
- 宋鎮照，2010，〈東協、中國和美國的東亞新三角競逐關係--從東亞高峰會談起〉，《海峽評論》，第 240 期，頁 16-21。
- 李丹慧，2007，〈政治鬥士與敵手：一九六〇年代中蘇邊界關係一對中蘇邊界問題的歷史考察之二〉，《社會科學》，第 2 期，頁 146-167。
- 李文志，1996，〈「中國威脅」與美國的對策：介入？圍堵？〉，《國家政策雙周刊》，第 129 期，頁 12-16。
- 李益波，2009，〈淺析奧巴馬政府的東南亞外交〉，《東南亞研究》，第 6 期，頁 54-59。



- 李瓊莉，1999，〈經濟安全概念在亞太地區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2期，頁39-54。
- 周忠強，2002，〈論鄧小平的對外戰略思想〉，《中共太原市委黨校學報》，第1期，頁44-47。
- 林正義，2001，〈中美關係進入考驗期〉，《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3期，頁110-112。
- 林錫星，2009，〈美緬關係的趨緩與緬甸政治生態探析〉，《東南亞研究》，第6期，頁46-53。
- 邱坤玄，1999，〈中共高層領導出訪的意義與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12卷，第12期，頁9-11。
- 邱坤玄，2004，〈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東亞研究》，第35卷，第2期，頁1-32。
- 金榮勇，2001，〈布希政府的東南亞政策與挑戰〉，《問題與研究》，第40卷，第6期，頁53-67。
- 柳德軍，2007，〈再論中蘇關係惡化之起因〉，《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第9卷，第5期，頁333-334。
- 胡清暉，2002，〈中共海軍現代化及其海全戰略的發展〉，《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7期，頁43-54。
- 胡聲平，2004，〈東亞區域整合與中國之立場及策略研究〉，《全球政治評論》，第7期，頁47-66。
- 唐仁俊，2001，〈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東協外交政策之分析〉，《共黨問題研究》，第27卷，第12期，頁83-94。
- 徐景芳，1993，〈東盟國家防務淺析〉，《東南亞研究》，第4期，頁33-37。
- 秦邦九，1999，〈中共推動「多極化」世界格局與「夥伴外交」之研究〉，《共黨問題研究》，第25卷，第9期，頁40-47。
- 秦亞青，2004，〈世界格局與中國的和平崛起〉，《黨建》，第5期，頁11-12。

- 翁明賢，2001，〈戰區飛彈防禦系統對兩岸與亞太安全的影響〉，《國防政策評論》，第1卷，第3期，頁7-41。
- 袁徵（簡體字為「征」），2010，〈「重返世界」—奧巴馬政府東亞政策評析〉，《當代世界》，第1期，頁49-52。
- 馬小紅、白蘊芳，2004，〈試論我國「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第3期，頁35-36。
- 張心怡，2010，〈「東協+3」v.s.「跨太平洋策略性經濟夥伴協定+N」：亞太經濟整合的擴大及其效應〉，《國際關係學報》，第29期，頁131-168。
- 張茂明，2000，〈試析鄧小平國家利益觀〉，《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報》，第5期，頁22-25。
- 張惠玲，2002，〈中共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之戰略考量評析〉，《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7期，頁4-16。
- 張景台，2006，〈試論中共新安全觀的理論與實踐〉，《聖約翰學報》，第23期，頁323-340。
- 張錫鎮，2003，〈東盟實施大國平衡戰略的新進展〉，《東南亞研究》，第3期，頁20-25。
- 張鐵根，2010，〈東亞峰會吸收美俄參加及其影響〉，《亞非縱橫》，第5期，頁7-11。
- 從慧，2005，〈美國反恐戰略及其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第5期，頁109-110。
- 曹雲華、徐善寶，2004，〈睦鄰外交政策與中國東盟關係〉，《當代亞太》，第2期，頁52-59。
- 莫大華，1997，〈東帝汶獨立運動的緣起與困境〉，《問題與研究》，第36卷，第2期，頁70-86。
- \_\_\_\_\_，2010，〈美國亞太區域海洋安全合作的「自願聯盟」—「防止擴散安全倡議」、「區域海洋安全倡議」與「全球海洋夥伴倡議」之比較分析〉，《國際關係學報》，第29期，頁69-100。

- 莊國土，2005，〈略論朝貢制度的虛幻：以古代中國與東南亞的朝貢關係為例〉，第3期，頁數1-8。
- 許志嘉，2004，〈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對中共政策的調整〉，《問題與研究》，第42卷，第3期，頁79-102。
- 許峻賓、蔡靜怡，2010，〈泛太平洋戰略夥伴關係(TPP)之進展〉，《APEC 通訊》，第131期，頁6-7。
- 郭良品，2008，〈華夷體系與集體安全體系的比較〉，《哈爾濱學院學報》，第1期，頁數41-44。
- 郭繼文、莊仕文，2010，〈從列寧的和平共處到「和諧世界」〉，《荷譯學院學報》，第32卷，第3期，頁18-20。
- 陳友武、倪耿，2003，〈探索軍備失落的環節：科技建軍、開創新猶〉，《台灣綜合展望》，第7期，頁117-131。
- 陳永康、翟文中，1997，〈中共海軍戰略演進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40卷，第9期，頁7-20。
- 陳欣之，2007，〈國際體系層級的建構與霸權統治〉，《問題與研究》，第46卷，第2期，頁23-52。
- 陳亮智，2009，〈尋找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驅動力量：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移？〉，《中國大陸研究》，第52卷，第1期，頁82-124。
- 陳威之、石之瑜，2009，〈從亞洲認識中國：濱下武志研究「朝貢體系」之研究〉，《政治科學論叢》，第39期，頁55-84。
- 陳理，1998，〈從「一邊倒」到「和平共處五原則」—試析建國初期我國對外政策的調整〉，《黨的文獻》，第6期，頁69-74。
- 陳應成，2010，〈兩類中國威脅論的比較及方法論意涵〉，《蘭州學報》，第4期，總第199期，頁15-17。
- 喻常森，2000，〈試論朝貢制度的演變〉，《南洋問題研究》，第1期，頁數55-65。
- 覃鑄，1995，〈中共對南海主權爭議基本立場剖析〉，《中共研究》，

- 第 29 卷，第 5 期，頁 79-88。
- 楊永明，2000，〈亞太安全環境對台灣安全的衝擊〉，《遠景季刊》，第 1 卷，第 2 期，頁 1-30。
- 楊志恆，2004，〈中共東南沿海軍事集結對東亞安全之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第 5 期，頁 77-91。
- \_\_\_\_\_，2010，〈美軍 2010 環太聯合軍演與東亞安全〉，《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8 期，頁 16-20。
- 楊念祖，2000，〈中共海軍現代化兵力建設對台海安全的影響〉，《中共研究》，第 34 卷，第 5 期，頁 70-81。
- 楊玲玲，2000，〈構築新型國家關係維護中國國家利益〉，《團結》，第 2 期，頁 28-31。
- 楊毅，2010，〈淺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際展望》，第 4 期，頁 18-22。
- 萬文豪，2004，〈中共海軍戰略演進之研究〉，《國防雜誌》，第 19 卷，第 9 期，頁 58-69。
- 路本龍，2004，〈和平共處五原則與中國外交〉，《長白學刊》，第 1 期，頁 29-32。
- 廖文中，2000，〈中共廿一世紀海軍戰略對亞太區域安全之影響〉，《中共研究》，第 34 卷，第 6 期，頁 66-76。
- 趙建民、許志嘉，2009，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和諧世界觀」：理論與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0 卷，第 1 期，頁 1-44。
- 趙崇明，1999，〈中共當前國際戰略指導原則之探討—「新安全觀」決策的環境因素〉，《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9 期，頁 4-17。
- 趙豔霞，2003，〈近年我國學術界對中蘇關係惡化原因研究綜述〉，《株洲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8 卷，第 6 期，頁 73-74。
- 劉二龍，2002，〈經濟與政治的接軌—由東協自由貿易區看中共區域版圖的擴張〉，《共黨問題研究》，第 28 卷，第 8 期，頁 58-71。

- 劉宜友，2005，〈論中共「和平崛起」對區域強權之影響〉，《中共研究》，第39卷，第7期，頁75-90。
- 劉勝湘，2004，〈國家安全觀的終結？—新安全觀的質疑〉，《歐洲研究》，第1期，頁1-16。
- 潘世勇，2008，〈就地緣戰略看中共海軍未來發展〉，《國防雜誌》，第23卷，第3期，頁105-117。
- 蔡明彥，2009，〈美國與中國軍事交流之發展與限制（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七年）〉，《歐美研究》，第39卷，第3期，頁533-566。
- 蔡東杰，2005，〈當前東亞霸權結構的變遷發展與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9期，頁101-122。
- \_\_\_\_\_、洪銘德，2008，〈新世紀以來美國對東南亞軍事戰略之分析〉，《亞太研究論壇》，頁33-52。
- 鄭玉瑞，1999，〈美中（共）戰略夥伴關係與中共軍事現代化的威脅〉，《共黨問題研究》，第25卷，第1期，頁67-71。
- 蕭全政，1991，〈亞太經濟合作的發展〉，《政治科學論叢》，第三期，頁65-82。
- 蕭朝琴，1999，〈後冷戰時期中共對亞太軍事威脅—南沙領土爭議〉，《共黨問題研究》，第25卷，第2期，頁55-61。
- \_\_\_\_\_，1999，〈中共發展海權戰略對臺安全之威脅〉，《共黨問題研究》，第25卷，第12期，頁72-80。
- 錢健，2009，〈建國初毛澤東睦鄰外交思想及其在東南亞的實踐〉，《黑河學刊》，第3期，頁54-57。
- 閻學通，1997，〈中國的新安全觀與安全合作構想〉，《現代國際關係》，第11期，頁28-32。
- \_\_\_\_\_，2004，〈對和平崛起的理解〉，《教學與研究》，第4期，頁5-6。
- \_\_\_\_\_，2008，〈世界格局走向及中國的機遇〉，《當代亞太》，第5期，頁7-13。

謝奕旭，2004，〈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台灣的角色〉，《復興崗學報》，第 80 期，頁 249-272。

龐中英，2004，〈中國崛起的「和平性」判讀－關於「和平崛起」的理論問題〉，《國際關係》，第三期，頁 1-8。

顧長永，1990，〈論美軍在菲律賓的去留〉，《問題與研究》，第 29 卷，第 15 期，頁 67-86。

喻波，2004，〈試析美軍重返東南亞的戰略意圖〉，《雲南財貿學院學報》，第 19 卷，第 6 期，頁 36-38。

### 三、碩博士論文

田漢宇，2008，〈「九一一」後美國與印尼反恐合作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

李宜倫，2004，《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反恐戰略對東南亞安全的影響》。南投：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 四、報紙新聞

王景弘，1990.04.21，〈美國防部報告 軍事威脅減低 政治動盪不安 美將削減在亞太兵力〉，《聯合報》，03 版。

\_\_\_\_\_，1993.05.20，〈美最終盤算 維持亞太安定 如果柯林頓擴大亞太經合會功能,對台港意義非凡〉，《聯合報》，09 版。

\_\_\_\_\_，1993.01.15，〈克里斯多福：亞洲政策 沒有大改變 美將繼續維持韓日駐軍〉，《聯合報》，09 版。

周嘉川，1993.10.06，〈美仍不支持東亞經濟會議 貿易代表卡西迪表示 不願東亞經濟會議損害亞太經合會議〉，《聯合報》，09 版。

孫揚明，1995.12.15，〈亞太集體安全 美意，不算善意。「亞太經

合會應擴張成一個集體安全機構」，美國防部長培里此言表面上正合台北意，然而背後的意義更值得思量〉，《聯合報》，39版。

翁台生，1999.05.17，〈從美國人再見到再見美國人 越南爭取最惠國待遇，但又害怕資本主義顛覆政權，心態矛盾〉，《聯合報》10版。

陳世昌、王淑珍，1993.07.08，〈柯林頓在東京呼籲優先建立 新太平洋共同體〉，《聯合報》，01版。

程榕寧，1992.06.20，〈總理不在拒作正面反應 整軍經武展示軍事實力〉，《聯合報》，08版。

\_\_\_\_\_，1994.05.24，〈亞太經合會 應否制度化 馬哈迪：吾從眾〉，《聯合報》，09版。

\_\_\_\_\_，1994.11.05，〈馬哈迪反對領袖會議正常化〉，《聯合報》，07版。

楊振富，1989.01.04，〈蘇聯「老大哥」外交轉向 越南向昔日「美帝」示好〉，《聯合報》，11版。

劉其筠，1990.02.08，〈布希總統經濟報告 因應亞太邊緣國家出口擴張 可朝向發展專精商品勞務〉，《聯合報》，06版。

\_\_\_\_\_，1994.01.29，〈美參院通過決議 促請撤銷對越貿易禁令〉，《聯合報》，09版。

\_\_\_\_\_，1996.11.15，〈自由化行動綱領、資訊產品零關稅 美國提出 APEC 兩大目標〉，《聯合報》，19版。

## 五、其他網路資料

人民網，2004.03.14，〈十屆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會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會見中外記者答問實錄〉，

<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8198/31983/32191/239>

0058.html。

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2002，《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世界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44/4429116.html>。

中國評論新聞，2009.03.20，〈基廷就南海摩擦強硬表態 稱中國行為挑釁〉，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1/8/7/100918781.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0918781>。

\_\_\_\_\_，2009.03.26，〈社評：中美南海戰略尖銳衝突 令人憂心〉，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1/7/2/100917276.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0917276>。

\_\_\_\_\_，2010.01.13，〈美國「重返東南亞」中國不必擔心〉，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9/6/2/101196263.html?coluid=70&kindid=1850&docid=101196263&mdate=0113000955>。

\_\_\_\_\_，2010.03.24，〈中美海軍能否避免衝突？兩國學者激辯〉，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2/6/8/6/101268608.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1268608>。

\_\_\_\_\_，2010.07.27，〈南中國海主權問題或成中美「新爭端」〉，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3/9/3/9/101393908.html?coluid=59&kindid=0&docid=101393908&mdate=0727101021>。

\_\_\_\_\_，2010.08.09，〈王緝思：中美重大战略较量难以避免〉，

<http://www.zhgp.com/doc/1014/0/9/0/10140901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409018&mdate=0809155741>。

\_\_\_\_\_，2010.08.19，〈港媒：中國高調捍衛海洋利益 面臨兩大



挑戰〉，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1/9/4/101419454.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1419454>。

\_\_\_\_\_，2010.08.27，〈越南國防部副部長稱永遠不做美國的軍事同盟〉，

<http://www.zhgp.com/doc/1014/2/7/9/101427992.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1427992>。

\_\_\_\_\_，2010.09.25，〈美國東盟峰會召開 南海問題或在議題之中〉，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5/6/3/101456398.html?coluid=70&kindid=1853&docid=101456398&mdate=0925094131>。

中國網，2003.11.24，〈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11/24/content\\_5448115.htm](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11/24/content_5448115.htm)。

\_\_\_\_\_，2004.04.06，〈曹剛川在泰國演講：中國決心以和平手段完成崛起〉，

[http://big5.china.cn/zhuanti2005/txt/2004-04/06/content\\_5531266.htm](http://big5.china.cn/zhuanti2005/txt/2004-04/06/content_5531266.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1998.06.26，〈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iliao/flfg/2005-09/12/content\\_31086.htm](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iliao/flfg/2005-09/12/content_31086.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1997.4.23，《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mfa.gov.cn/chn/pds/ziliao/1179/t6801.htm>。

- \_\_\_\_\_，2000，《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菲律賓共和國政府關於 21 世紀雙邊合作框架的聯合聲明》，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
- \_\_\_\_\_，2002.7.31，《中國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
- \_\_\_\_\_，2003.10.07，《中國的發展與亞洲的振興》，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yjh/t27173.htm>。
- \_\_\_\_\_，2003.10.10，〈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協國家領導人聯合宣言—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27721.htm>。
- \_\_\_\_\_，2003.12.10，《溫家寶總理在哈佛大學的演講—把目光投向中國》，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yjh/t56075.htm>。
- \_\_\_\_\_，2006.9.20，《中美關於啟動兩國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的共同聲明》，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mfa.gov.cn/chn/pds/ziliao/1179/t272867.htm>。
- \_\_\_\_\_，2008，〈中越聯合聲明〉，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mfa.gov.cn/chn/pds/ziliao/1179/t519489.htm>。
- \_\_\_\_\_，2009.03.11，〈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就美海軍監測船在中國專屬經濟區活動事答記者問〉，  
<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541674.htm>。
- \_\_\_\_\_，2010.07.22，〈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就東亞峰會擴員事宜答記者問〉，  
<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718653.htm>。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1996.06.18，〈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海洋科學研究管理規定〉，

[http://big5.mlr.gov.cn/zwgk/flfg/hyglflfg/200406/t20040625\\_570268.htm](http://big5.mlr.gov.cn/zwgk/flfg/hyglflfg/200406/t20040625_570268.htm)。

宋鎮照，2010.09，〈美國勢力重返東南亞對區域權力秩序的衝擊〉，  
《海峽評論》，

<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237-7954.html>。

林若雲、吳玲君，2005.10.01，〈亦敵亦友？—美國與馬來西亞雙邊關係之研究(1997-2004)〉，《2005 中國政治學會暨學術研討會：多元社會、和解政治與共識民主》，頁 9，

<http://capstaipei.org.tw/2005/2005%E8%AD%B0%E7%A8%8B.htm>。

商報，2011.03.15，〈菲美認同南海需簽署具約束力行為準則〉，

<http://www.phshangbao.com/show.aspx?id=59405&cid=4>。

陳一新，2010.08.19，〈美國自利 我軍購更費力〉，《國政評論》，

<http://www.npf.org.tw/post/1/7965>。

陳治翰，2005.05.01，〈後冷戰時代美國「擴展市場民主」的社會建構〉，《2005 中國政治學會暨學術研討會：多元社會、和解政治與共識民主》，頁 12，

<http://capstaipei.org.tw/2005/2005%E8%AD%B0%E7%A8%8B.htm>。

陸委會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8138&ctNode=5841&mp=4>。

華夏經緯，11.21.2005，〈外交部：美國總統布希訪華取得重要成果〉，<http://big5.huaxia.com/zt/tbgz/05-095/515796.html>。

新華網，1999.03.26，〈江澤民主席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的講話〉，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0/content\\_685655.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0/content_685655.htm)。

\_\_\_\_\_，2009.03.11，〈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就美國海軍監測船在中國專屬經濟區活動事答記者問〉，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03/11/content\\_10995832.htm](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03/11/content_10995832.htm)。

\_\_\_\_\_，2010.10.08，〈美俄競逐金蘭灣基地？ 南海或再起波瀾〉，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10-10/08/c\\_12635525\\_5.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10-10/08/c_12635525_5.htm)。

新華網資料，〈中國軍隊參加的主要中外反恐聯合訓練和演習〉，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9-07/20/content\\_11737557\\_4.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9-07/20/content_11737557_4.htm)。

\_\_\_\_\_，1998，〈中國政府白皮書－中國的國防(199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10/26/content\\_3685106.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10/26/content_3685106.htm)。

## 貳、英文部分

### (I)Books

Bull, Hedley, 2002,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uzan, Barry and Ole Wæver, 2003,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rdon, Robert J., 2006, *Macroeconomics*(Tenth Edition), Boston: Pearson Addison Wesley.

Ikenberry, G. Joh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200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im, Rolfe, 2004, *The Asia-Pacific: A Region in Transition*, Honolulu: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Johnston, Alastair Iain and Robert S. Ross, 1999,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Kang, David, 2007, *China Rising-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eller, William W. and Thomas G. Rawski, 2007, *China's Rise and the Balance of Influence in Asi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Kennedy, Paul,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19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Keohane, Robert,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ska, George, 1962,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Mohan, C. Raja v Tommy Koh & Han Sung-Joo eds., 2008, *America's Role in Asia: Asian and American Views*. San Francisco, CA: The Asia Foundation.

Morgenthau, Hans J., 1967,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Rothstein, Robert L., 1968,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uh, J. J. v Peter J. Katzenstein & Allen Carlson, 2004,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alt, Stephen M., 1990,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II)Periodicals

Acharya, Amitav, 2003/04,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pp. 149-164.

Ba, Alice, 2009, "Systemic Neglect? A Reconsideration of US-Southeast Asia Polic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1, No. 3, pp. 369-98.

- Baker, James A., 1991/1992,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pp. 1-17.
- Beeson, Mark, 2006, "American Hegemony and Regionalism: The Rise of East Asia and the End of the Asia-Pacific," *Geopolitics*, Vol. 11, Issue 4, pp. 541-560.
- \_\_\_\_\_, 2009, "Hegemonic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pow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No. 1, pp. 95-112.
- Chung, chien-peng, 2004, "Southeast Asia-China Relations: Dialectics of "Hedging" and "Counter-Hedging","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 2004, pp. 35-53.
- Christensen, Thomas J., 2006,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pp. 81-126.
- Dittmer, Lowell, 2008, "American Asia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Election," *Orbis*, Vol. 52, No. 4, pp. 670-688.
- Eichengreen, Barry, Tong Hui, 2006, "How China is Reorganizing the World,"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Vol. 1, No. 1, pp. 80-82.
- Friedberg, Aaron L., 1993/94, "Ripe for Rivalry —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pp. 5-33.
- Goh, Evelyn, 2006, "Understanding "Hedging" in Asia-Pacific Security," CSIS PacNet, Number 43, pp. 1-2.
- \_\_\_\_\_, 2007/08,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 pp. 113-157.
- Harris, Stuart, 2005, "China's regional policies: how much

- hegemony? ”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9, No. 4, pp. 481-492.
- Hungtington, Samuel P., 1993, “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pp. 68-83.
- \_\_\_\_\_, 1999,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2, pp. 35-49.
- Ikenberry, G. John, 2008,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Issue 1, pp. 23-37.
- Khoo, Nicholas 、 Michael L.R. Smith & David Shambaugh, 2005, “China Engages Asia? Caveat Lect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pp. 196-213.
- Kuik, cheng chwee, 2008,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2, pp. 159-185.
- Kurlantzick, Joshua, 2010, “The New Schizophrenia Asia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Isolation,” *Current History*, Vol. 109, Issue 723, pp. 24-30.
- Lake, Anthony, 1993, “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4, No. 39, pp. 658-664.
- Lampton, David M., 2007, “Th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1, pp. 115-127.
- Mearsheimer, John J., 2006, “China’s Un-peaceful Rice,” *Current History*, Vol. 105, No. 60, pp. 160-162.
- Medeiros, Evan S., 2005,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 pp. 145-167.
- Munro, Ross H. 1992,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 62, pp. 10-16.
- Posen, Barry R., 2001/2002,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Grand Strategy, Strategy, and Tac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pp. 39-55
- Ravenhill, John, 2006, “Is China An Economic Threat to Southeast Asia ? ” *Asian Survey*, Vol. 46, Issue 5, pp. 653-674.
- Rice, Condoleezza,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1, pp. 45-62.
- Ross, Robert S., 2006,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pp. 355-395.
- Roy, Denny, 2005,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 2, pp. 305-322.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pp. 72-107.
- Shambaugh, David, 2002,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September 11: Can the New Stability Last? ,” *Current History*, Vol. 101, No. 656, pp. 243- 249.
- \_\_\_\_\_, 2004/2005,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pp. 64-99.
- \_\_\_\_\_, 2006, “Asia in Transition: The Evolving Regional Order,” *Current History*, Vol. 105, No. 690, pp. 153-159.
- Solomon, Richard, 1990, “Asian Security in the 1990s: Integration in Economics, Diversity in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1, Issue 10, pp. 243-249.
- Sutter, Robert, 2004, “Asia in the Balance: America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 *Current History*, Vol. 103, Issue 674, pp. 284-289.

Tow, William T., 2007, “America’s Asia-Pacific Strategy,” *Current History*, Vol.106, Issue 701, pp. 284-285.

Wohlforth, William C., 1999,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1, pp. 5-41 .

Wong, John and Chan, Sarah, 2003, “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Shaping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43, Issue 3, pp. 507-526.

### (III)Internet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3,  
<http://www.aseansec.org/22109.htm>.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  
<http://www.aseansec.org/22109.htm>.

Bush, George W., 1999, “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Simi Valley, California,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bush/wspeech.htm>.

Clinton, Hillary, February 13, 2009, “U.S. and Asia: Two  
Transatlantic and Transpacific Powers,” Asia Society, New York,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7333.htm>.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002.11.04, <http://www.aseansec.org/13163.htm>.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1, *Quadrennial Defense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qdr2001.pdf>.

\_\_\_\_\_, 2010, *Quadrennial Defense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qdr/qdr%20as%20of%2029jan10%201600.pd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www.imf.org/external/index.htm>.

Krauthammer, Charles, July 31, 1995, "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 *Time*,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83245,00.html>.

Li, Mingjiang, 2008,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s

Balancing Act and New Regional Dynamics,"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Singapore),

<https://dr.ntu.edu.sg/bitstream/handle/10220/5934/rsisc005-08.pdf?sequence=1>.

Restall, Hugo, 2007, China's Bid for Asian Hegemon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70, Issue 4, pp. 11-14,

<http://web.rollins.edu/~tlairson/easia/chihegemon.pdf>.

Rice, Condoleezza, 27 June, 2008, "Remarks Upon Arrival in Kyoto, Japan,"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8/06/106270.htm>.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http://www.aseansec.org/15265.htm>.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Indonesia,

1976.02.24, <http://www.aseansec.org/1217.htm>.

U.S. Census Bureau, <http://www.census.gov/>.

Xiao, Geng, 2004,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Round-Tripping FDI:

Scale,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ADB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4, pp. 1-48,

[http://scholar.google.com.tw/scholar?hl=zh-TW&q=eople%E2%80%99s+Republic+of+China%E2%80%99s+Round-Tripping+FDI%3A+Scale%2C+Causes%2C+and+Implications&btnG=%E6%90%9C%E5%B0%8B&lr=&as\\_ylo=&as\\_vis=0](http://scholar.google.com.tw/scholar?hl=zh-TW&q=eople%E2%80%99s+Republic+of+China%E2%80%99s+Round-Tripping+FDI%3A+Scale%2C+Causes%2C+and+Implications&btnG=%E6%90%9C%E5%B0%8B&lr=&as_ylo=&as_vis=0).

Yeo, George (楊榮文), Oct. 22. 2007, “Can China Emerge Peacefully?” *Straits Times*,  
[http://www.viet-studies.info/kinhte/can\\_china\\_emerge\\_peacefully.htm](http://www.viet-studies.info/kinhte/can_china_emerge_peacefully.htm).

Zoellick, Robert B.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2005,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on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ncuscr.org/files/2005Gala\\_RobertZoellick\\_Whither\\_China1.pdf](http://www.ncuscr.org/files/2005Gala_RobertZoellick_Whither_China1.pdf).

# 附錄一、美國進出口商品與服務貿易國際收支表(1960-2009)

Period	Balance			Exports			Imports		
	Total	Goods BOP	Services	Total	Goods BOP	Services	Total	Goods BOP	Services
1960	3,508	4,892	-1,384	25,940	19,650	6,290	22,432	14,758	7,674
1961	4,195	5,571	-1,376	26,403	20,108	6,295	22,208	14,537	7,671
1962	3,370	4,521	-1,151	27,722	20,781	6,941	24,352	16,260	8,092
1963	4,210	5,224	-1,014	29,620	22,272	7,348	25,410	17,048	8,362
1964	6,022	6,801	-779	33,341	25,501	7,840	27,319	18,700	8,619
1965	4,664	4,951	-287	35,285	26,461	8,824	30,621	21,510	9,111
1966	2,939	3,817	-878	38,926	29,310	9,616	35,987	25,493	10,494
1967	2,604	3,800	-1,196	41,333	30,666	10,667	38,729	26,866	11,863
1968	250	635	-385	45,543	33,626	11,917	45,293	32,991	12,302
1969	91	607	-516	49,220	36,414	12,806	49,129	35,807	13,322
1970	2,254	2,603	-349	56,640	42,469	14,171	54,386	39,866	14,520
1971	-1,302	-2,260	958	59,677	43,319	16,358	60,979	45,579	15,400
1972	-5,443	-6,416	973	67,222	49,381	17,841	72,665	55,797	16,868
1973	1,900	911	989	91,242	71,410	19,832	89,342	70,499	18,843
1974	-4,293	-5,505	1,212	120,897	98,306	22,591	125,190	103,811	21,379
1975	12,404	8,903	3,501	132,585	107,088	25,497	120,181	98,185	21,996
1976	-6,082	-9,483	3,401	142,716	114,745	27,971	148,798	124,228	24,570
1977	-27,246	-31,091	3,845	152,301	120,816	31,485	179,547	151,907	27,640
1978	-29,763	-33,927	4,164	178,428	142,075	36,353	208,191	176,002	32,189
1979	-24,565	-27,568	3,003	224,131	184,439	39,692	248,696	212,007	36,689
1980	-19,407	-25,500	6,093	271,834	224,250	47,584	291,241	249,750	41,491
1981	-16,172	-28,023	11,851	294,398	237,044	57,354	310,570	265,067	45,503
1982	-24,156	-36,485	12,329	275,236	211,157	64,079	299,391	247,642	51,749
1983	-57,767	-67,102	9,335	266,106	201,799	64,307	323,874	268,901	54,973
1984	-109,072	-112,492	3,420	291,094	219,926	71,168	400,166	332,418	67,748
1985	-121,880	-122,173	294	289,070	215,915	73,155	410,950	338,088	72,862
1986	-138,538	-145,081	6,543	310,033	223,344	86,689	448,572	368,425	80,147
1987	-151,684	-159,557	7,874	348,869	250,208	98,661	500,552	409,765	90,787
1988	-114,566	-126,959	12,393	431,149	320,230	110,919	545,715	447,189	98,526
1989	-93,141	-117,749	24,607	487,003	359,916	127,087	580,144	477,665	102,479
1990	-80,864	-111,037	30,173	535,233	387,401	147,832	616,097	498,438	117,659
1991	-31,135	-76,937	45,802	578,344	414,083	164,261	609,479	491,020	118,459
1992	-39,212	-96,897	57,685	616,882	439,631	177,251	656,094	536,528	119,566
1993	-70,311	-132,451	62,141	642,863	456,943	185,920	713,174	589,394	123,780
1994	-98,493	-165,831	67,338	703,254	502,859	200,395	801,747	668,690	133,057
1995	-96,384	-174,170	77,786	794,387	575,204	219,183	890,771	749,374	141,397
1996	-104,065	-191,000	86,935	851,602	612,113	239,489	955,667	803,113	152,554
1997	-108,273	-198,428	90,155	934,453	678,366	256,087	1,042,726	876,794	165,932
1998	-166,140	-248,221	82,081	933,174	670,416	262,758	1,099,314	918,637	180,677
1999	-264,239	-336,310	72,072	965,885	698,034	267,850	1,230,123	1,034,345	195,779
2000	-378,780	-446,233	67,453	1,070,597	784,181	286,416	1,449,377	1,230,413	218,964
2001	-364,393	-421,980	57,586	1,004,896	730,277	274,618	1,369,289	1,152,257	217,032
2002	-420,524	-475,345	54,821	977,470	696,268	281,202	1,397,994	1,171,613	226,381
2003	-494,183	-541,544	47,361	1,019,897	728,258	291,639	1,514,080	1,269,802	244,278
2004	-609,345	-665,631	56,286	1,158,576	819,870	338,707	1,767,921	1,485,501	282,420
2005	-714,176	-783,801	69,625	1,281,186	909,016	372,171	1,995,362	1,692,817	302,546
2006	-759,240	-839,456	80,216	1,452,783	1,035,868	416,916	2,212,023	1,875,324	336,700
2007	-702,099	-823,192	121,093	1,648,665	1,160,366	488,299	2,350,763	1,983,558	367,206
2008	-698,802	-834,652	135,850	1,839,012	1,304,896	534,116	2,537,814	2,139,548	398,266
2009	-374,908	-506,944	132,036	1,570,797	1,068,499	502,298	1,945,705	1,575,443	370,262

U.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Division.

NOTE: (1) Data presented on a Balance of Payment (BOP) basis. Information on data sources and methodology are available at [www.census.gov/foreign-trade/www/press.html](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www/press.html).

資料來源：<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tistics/historical/gands.pdf>。

## 附錄二、美國、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六國貿易關係表

### 壹、印尼與美國貿易關係表

指標 年份	印尼與美國 貿易平衡狀 況(單位： 百萬美元)	美國出口到 印尼 (單位： 百萬美元)	印尼出口到 美國 (單位： 百萬美元)	印尼對外貿 易總額 (單位： 百萬美元)	美國佔印尼 對外貿易重 (單位： 百分比)
1992	-1,750.1	2,779	4,530	61,247	11.9
1993	-2,665.1	2,770	5,436	65,151	12.6
1994	-3,738.1	2,809	6,547	72,038	13
1995	-4,075.7	3,360	7,435	86,047	12.5
1996	-4,273.2	3,977	8,250	92,743	13.2
1997	-4,666.1	4,522	9,188	107,602	12.7
1998	-7,041.6	2,299	9,341	85,650	13.6
1999	-7,487.1	2,038	9,526	84,564	13.7
2000	-7,965.2	2,402	10,367	108,998	11.7
2001	-7,583.0	2,521	10,104	94,895	13.3
2002	-7,087.6	2,556	9,643	97,506	12.5
2003	-6,998.7	2,516	9,515	106,304	11.3
2004	-8,139.1	2,671	10,811	125,643	10.7
2005	-8,960.4	3,054	12,014	162,528	9.3
2006	-10,346.2	3,079	13,425	183,873	9
2007	-10,331.6	3,970	14,301	210,790	8.7
2008	-10,154.7	5,645	15,800	266,556	9
2009	-7,831.6	5,107	12,939	211,496	8.5

資料來源：美國與印尼進出口額來自美國統計署(U.S. Census Bureau)，印尼對外貿易總額數據來自亞洲開發銀行。

註：貿易平衡與對外貿易比重為筆者自行整理，算至小數點第一位，第二位四捨五入。

## 貳、馬來西亞與美國貿易關係表

指標 年份	馬來西亞與 美國貿易平 衡狀況(單 位：百萬美 元)	美國出口到 馬來西亞 (單位： 百萬美元)	馬來西亞出 口到美國 (單位： 百萬美元)	馬來西亞對 外貿易總額 (單位： 百萬美元)	美國佔馬來 西亞對外貿 易重(單 位： 百分比)
1992	-3,931.3	4,363	8,294	80627	15.7
1993	-4,498.6	6,064	10,563	92781	17.9
1994	-7,012.5	6,969	13,982	118444	17.7
1995	-8,638.8	8,816	17,455	151605	17.3
1996	-9,282.5	8,546	17,829	156745	16.8
1997	-7,246.9	10,780	18,027	157770	18.3
1998	-10,043.0	8,957	19,000	131624	21.2
1999	-12,364.5	9,060	21,425	149421	20.4
2000	-14,630.9	10,937	25,568	180192	20.2
2001	-12,982.6	9,358	22,340	161871	19.6
2002	-13,665.3	10,344	24,009	173927	19.8
2003	-14,526.1	10,914	25,440	188005	19.3
2004	-17,328.7	10,850	28,179	231793	16.8
2005	-23,224.3	10,461	33,685	255605	17.3
2006	-24,089.1	12,444	36,533	291828	16.8
2007	-20,948.3	11,680	32,629	323193	13.7
2008	-17,786.6	12,950	30,736	356411	12.3
2009	-12,879.3	10,403	23,283	281264	12

資料來源：美國與馬來西亞進出口額來自美國統計署(U.S. Census Bureau)，馬來西  
亞對外貿易總額數據來自亞洲開發銀行。

註：貿易平衡與對外貿易比重為筆者自行整理，算至小數點第一位，第二位四捨  
五入。

### 參、菲律賓與美國貿易關係表

指標 年份	菲律賓與美國貿易平衡狀況 (單位：百萬美元)	美國出口到菲律賓 (單位：百萬美元)	菲律賓出口到美國 (單位：百萬美元)	菲律賓對外貿易總額 (單位：百萬美元)	美國佔菲律賓對外貿易比重 (單位：百分比)
1992	-1,596.2	2,759	4,355	25216	28.2
1993	-1,364.4	3,529	4,894	29901	28.2
1994	-1,832.9	3,886	5,719	35945	26.7
1995	-1,711.7	5,295	7,007	45843	26.8
1996	-2,019.0	6,142	8,161	54534	26.2
1997	-3,027.5	7,417	10,445	63504	28.1
1998	-5,210.8	6,737	11,947	60910	30.7
1999	-5,130.7	7,222	12,353	69144	28.3
2000	-5,135.5	8,799	13,935	76810	29.6
2001	-3,665.5	7,660	11,326	67585	28.1
2002	-3,703.7	7,276	10,980	76300	23.9
2003	-2,071.7	7,987	10,059	78807	22.9
2004	-2,049.7	7,087	9,137	85783	18.9
2005	-2,355.0	6,895	9,250	90742	17.8
2006	-2,077.4	7,617	9,694	101488	17.1
2007	-1,695.9	7,712	9,408	108461	15.8
2008	-418.5	8,295	8,713	109497	15.5
2009	-1,027.7	5,766	6,794	84137	14.9

資料來源：美國與菲律賓進出口額來自美國統計署(U.S. Census Bureau)，菲律賓對外貿易總額數據來自亞洲開發銀行。

註：貿易平衡與對外貿易比重為筆者自行整理，算至小數點第一位，第二位四捨五入。



## 肆、新加坡與美國貿易關係表

指標 年份	新加坡與美國貿易平衡狀況 (單位：百萬美元)	美國出口到新加坡 (單位：百萬美元)	新加坡出口到美國 (單位：百萬美元)	新加坡對外貿易總額 (單位：百萬美元)	美國佔新加坡對外貿易重 (單位：百分比)
1992	-1,686.8	9,626	11,313	135643	15.4
1993	-1,120.2	11,678	12,798	159246	15.4
1994	-2,337.8	13,020	15,358	199495	14.2
1995	-3,227.4	15,333	18,560	242775	14
1996	-3,623.1	16,720.	20,343	256352	14.5
1997	-2,378.4	17,696	20,075	257422	14.7
1998	-2,662.1	15,694	18,356	211627	16
1999	-1,944.0	16,247	18,191	225740	15.3
2000	-1,372.0	17,806	19,178	272349	13.6
2001	2,651.8	17,652	15,000	237751	13.7
2002	1,415.5	16,218	14,802	241618	12.8
2003	1,422.4	16,560	15,138	296120	10.7
2004	4,027.0	19,397	15,370	372236	9.3
2005	5,356.0	20,466	15,110	429696	8.3
2006	6,057.5	23,826	17,768	510517	8.1
2007	7,224.9	25,619	18,394	562463	7.8
2008	11,968.7	27,854	15,885	657956	6.6
2009	6,526.9	22,232	15,705	515617	7.4

資料來源：美國與新加坡進出口額來自美國統計署(U.S. Census Bureau)，新加坡對外貿易總額數據來自亞洲開發銀行。

註：貿易平衡與對外貿易比重為筆者自行整理，算至小數點第一位，第二位四捨五入。

## 伍、泰國與美國貿易關係表

指標 年份	泰國與美國 貿易平衡狀 況 (單位： 百萬美元)	美國出口到 泰國 (單位： 百萬美元)	泰國出口到 美國 (單位： 百萬美元)	泰國對外貿 易總額 (單位： 百萬美元)	美國佔泰國 對外貿易重 (單位： 百分比)
1992	-3,539.9	3,989	7,529	73158	15.7
1993	-4,775.5	3,766	8,542	83046	14.8
1994	-5,440.8	4,865	10,306	99720	15.2
1995	-4,683.1	6,665	11,348	127225	14.2
1996	-4,138.5	7,198	11,336	128053	14.5
1997	-5,251.9	7,350	12,601	120228	16.6
1998	-8,197.6	5,239	13,436	97427	19.2
1999	-9,345.5	4,985	14,330	108782	17.8
2000	-9,768.1	6,617	16,385	130981	17.6
2001	-8,737.6	5,989	14,727	126930	16.3
2002	-9,932.7	4,860	14,793	132753	14.8
2003	-9,343.2	5,835	15,179	156148	14.5
2004	-11,210.5	6,368	17,579	190658	12.6
2005	-12,633.1	7,257	19,890	229114	11.8
2006	-14,550.9	7,915	22,466	258495	11.8
2007	-14,418.2	8,336	22,755	293833	10.6
2008	-14,471.7	9,067	23,538	356524	9.1
2009	-12,164.1	6,918	19,083	286299	9.1

資料來源：美國與泰國進出口額來自美國統計署(U.S. Census Bureau)，泰國對外貿易總額數據來自亞洲開發銀行。

註：貿易平衡與對外貿易比重為筆者自行整理，算至小數點第一位，第二位四捨五入。

## 陸、越南與美國貿易關係表

指標 年份	越南與美國 貿易平衡狀 況 (單位：百 萬美元)	美國出口到 越南 (單位： 百萬美元)	越南出口到 美國 (單位： 百萬美元)	越南對外貿 易總額 (單位： 百萬美元)	美國佔越南 對外貿易重 (單位： 百分比)
1992	4.6	5	0	5121	0.1
1993	7.0	7	0	6517	0.1
1994	122.4	173	51	9880	2.2
1995	53.3	252	199	13604	3.3
1996	284.8	617	332	18399	5.2
1997	-101.7	287	388	20777	3.2
1998	-280.2	274	554	20861	4
1999	-316.9	292	608	23283	3.9
2000	-453.8	368	821	30121	3.9
2001	-592.8	460	1,053	31247	4.8
2002	-1,814.8	580	2,395	36452	8.2
2003	-3,231.1	1,324	4,555	45405	12.9
2004	-4,169.8	1,106	5,275	58454	10.9
2005	-5,438.0	1,193	6,631	69203	11.3
2006	-7,466.4	1,100	8,567	84717	11.4
2007	-8,729.8	1,903	10,633	111326	11.3
2008	-10,111.6	2,789	12,901	143399	10.9
2009	-9,190.6	3,097	12,288	125510	12.3

資料來源：美國與越南進出口額來自美國統計署(U.S. Census Bureau)，越南對外貿易總額數據來自亞洲開發銀行。

註：貿易平衡與對外貿易比重為筆者自行整理，算至小數點第一位，第二位四捨五入。

## 柒、印尼與中國大陸貿易關係表

指標 年份	印尼與中國大陸貿易平衡狀況 (單位：百萬美元)	中國大陸出口到印尼 (單位：百萬美元)	印尼出口到中國大陸 (單位：百萬美元)	印尼對外貿易總額 (單位：百萬美元)	中國大陸佔印尼對外貿易重 (單位：百分比)
1992	-1083	471	1554	61,247	3.3
1993	-759	692	1451	65,151	3.3
1994	-538	1051	1589	72,038	3.7
1995	-614	1438	2052	86,047	4
1996	-852	1428	2280	92,743	3.9
1997	-834	1840	2674	107,602	4.2
1998	-1286	1171	2457	85,650	3.8
1999	-1271	1779	3050	84,564	5.7
2000	-1340	3061	4401	108,998	6.8
2001	-1052	2836	3888	94,895	7.1
2002	-1082	3426	4508	97,506	8.1
2003	-1265	4482	5747	106,304	9.6
2004	-959	6256	7215	125,643	10.7
2005	-86	8350	8436	162,528	10.3
2006	-156	9449	9605	183,873	10.4
2007	206	12601	12395	210,790	11.9
2008	2871	17193	14322	266,556	11.8
2009	1057	14721	13664	211,496	13.4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與印尼進出口額與貿易平衡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鑑 (1992-2009)，印尼對外貿易總額數據來自亞洲開發銀行。

註：貿易比重為筆者自行整理，算至小數點第一位，第二位四捨五入。

## 捌、馬來西亞與中國大陸貿易關係表

指標 年份	馬來西亞與 中國大陸貿易 平衡狀況 (單位：百 萬美元)	中國大陸出 口到馬來西 亞 (單位： 百萬美元)	馬來西亞出 口到中國大 陸 (單位： 百萬美元)	馬來西亞對 外貿易總額 (單位： 百萬美元)	中國大陸佔 馬來西亞對 外貿易重 (單位： 百分比)
1992	645	-185	830	80627	1.8
1993	704	-380	1084	92781	1.9
1994	1118	-504	1622	118444	2.3
1995	1281	-790	2071	151605	2.2
1996	1371	-872	2243	156745	2.3
1997	1922	-573	2495	157770	2.8
1998	1596	-1072	2668	131624	3.2
1999	1674	-1932	3606	149421	3.5
2000	2565	-2915	5480	180192	4.5
2001	3221	-2983	6204	161871	5.8
2002	4974	-4322	9296	173927	8.2
2003	6141	-7845	13986	188005	10.7
2004	8086	-10089	18175	231793	11.6
2005	10606	-9487	20093	255605	12
2006	13537	-10035	23572	291828	12.7
2007	17689	-11008	28697	323193	14.4
2008	21455	-10646	32101	356411	15
2009	19632	-12699	32331	281264	18.5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與馬來西亞進出口額與貿易平衡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鑑  
(1992-2009)，馬來西亞對外貿易總額數據來自亞洲開發銀行。

註：貿易比重為筆者自行整理，算至小數點第一位，第二位四捨五入。

## 玖、菲律賓印與中國大陸貿易關係表

指標 年份	菲律賓與中 國大陸貿易 平衡狀況 (單位：百 萬美元)	中國大陸出 口到菲律賓 (單位： 百萬美元)	菲律賓出口 到中國大陸 (單位： 百萬美元)	菲律賓對外 貿易總額 (單位： 百萬美元)	中國大陸佔 菲律賓對外 貿易重(單 位： 百分比)
1992	55	210	155	25216	1.4
1993	69	282	213	29901	1.7
1994	204	476	272	35945	2
1995	754	1030	276	45843	2.8
1996	643	1015	372	54534	2.5
1997	1013	1340	327	63504	2.6
1998	989	1501	512	60910	3.3
1999	471	1379	908	69144	3.3
2000	-213	1464	1677	76810	4.1
2001	-1826	1619	1945	67585	5.3
2002	-1175	2042	3217	76300	6.9
2003	-3214	3093	6307	78807	11.9
2004	-4790	4269	9059	85783	15.5
2005	-8179	4688	12867	90742	19.3
2006	-11937	5738	17675	101488	23
2007	-15620	7498	23118	108461	28.2
2008	55	9132	19505	109497	26.1
2009	69	8585	11947	84137	24.4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與印尼進出口額與貿易平衡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鑑  
(1992-2009)，印尼對外貿易總額數據來自亞洲開發銀行。

註：貿易比重為筆者自行整理，算至小數點第一位，第二位四捨五入。

## 拾、新加坡與中國大陸貿易關係表

指標 年份	新加坡與中 國大陸貿易 平衡狀況 (單位：百 萬美元)	中國大陸出 口到新加坡 (單位： 百萬美元)	新加坡出口 到中國大陸 (單位： 百萬美元)	新加坡對外 貿易總額 (單位： 百萬美元)	中國大陸佔 新加坡對外 貿易重(單 位： 百分比)
1992	795	2031	1236	135643	2.4
1993	-401	2245	2646	159246	3
1994	66	2558	2492	199495	2.5
1995	103	3501	3398	242775	2.8
1996	148	3749	3601	256352	2.9
1997	-142	4323	4465	257422	3.4
1998	-294	3930	4224	211627	3.9
1999	441	4502	4061	225740	3.8
2000	701	5761	5060	272349	4
2001	662	5790	5128	237751	4.6
2002	-63	6984	7047	241618	5.8
2003	-1621	8864	10485	296120	6.5
2004	-1306	12688	13994	372236	7.2
2005	117	16632	16515	429696	7.7
2006	5512	23185	17673	510517	8
2007	12096	29620	17524	562463	8.4
2008	12135	32306	20171	657956	8
2009	12269	30066	17797	515617	9.3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與新加坡進出口額與貿易平衡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鑑  
(1992-2009)，新加坡對外貿易總額數據來自亞洲開發銀行。

註：貿易比重為筆者自行整理，算至小數點第一位，第二位四捨五入。

## 拾壹、泰國與中國大陸貿易關係表

指標 年份	泰國與中國 大陸貿易平 衡狀況（單 位：百萬美 元）	中國大陸出 口到泰國 （單位： 百萬美元）	泰國出口到 中國大陸 （單位： 百萬美元）	泰國對外貿 易總額 （單位： 百萬美元）	中國大陸佔 泰國對外貿 易重（單 位： 百分比）
1992	470	895	425	73158	1.8
1993	149	750	601	83046	1.6
1994	295	1159	864	99720	2
1995	141	1752	1611	127225	2.6
1996	-635	1255	1890	128053	2.5
1997	-513	1501	2014	120228	2.9
1998	-1265	1148	2413	97427	3.7
1999	-1345	1435	2780	108782	3.9
2000	-2138	2243	4381	130981	5.1
2001	-2377	2337	4714	126930	5.6
2002	-2643	2957	5600	132753	6.4
2003	-4999	3828	8827	156148	8.1
2004	-5739	5802	11541	190658	9.1
2005	-6173	7819	13992	229114	9.5
2006	-8198	9764	17962	258495	10.7
2007	-10692	11973	22665	293833	11.8
2008	-10021	15636	25657	356524	11.6
2009	-11588	13309	24897	286299	13.3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與泰國進出口額與貿易平衡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鑑

(1992-2009)，泰國對外貿易總額數據來自亞洲開發銀行。

註：貿易比重為筆者自行整理，算至小數點第一位，第二位四捨五入。



## 拾貳、越南與中國大陸貿易關係表

指標 年份	越南與中國 大陸貿易平 衡狀況（單 位：百萬美 元）	中國大陸出 口到越南 （單位： 百萬美元）	越南出口到 中國大陸 （單位： 百萬美元）	越南對外貿 易總額 （單位： 百萬美元）	中國大陸佔 越南對外貿 易重（單 位： 百分比）
1992	33	106	73	5121	3.5
1993	-96	276	123	6517	6.1
1994	151	342	191	9880	5.4
1995	388	720	332	13604	7.7
1996	534	842	308	18399	6.3
1997	722	1079	357	20777	6.9
1998	811	1028	217	20861	6
1999	510	864	354	23283	5.2
2000	608	1537	929	30121	8.2
2001	787	1798	1011	31247	9
2002	1032	2148	1116	36452	9
2003	1726	3183	1457	45405	10.2
2004	1778	4260	2482	58454	11.5
2005	3091	5644	2553	69203	11.8
2006	4977	7463	2486	84717	11.7
2007	8665	11891	3226	111326	13.6
2008	10786	15122	4336	143399	13.6
2009	11554	16301	4747	125510	16.8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與越南進出口額與貿易平衡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鑑

(1992-2009)，越南對外貿易總額數據來自亞洲開發銀行。

註：貿易比重為筆者自行整理，算至小數點第一位，第二位四捨五入。

## 附錄三、東協對各地區進出口貿易變化

Table V.15. Rate of Growth of ASEAN Exports and

Country of Destination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1)	(2)	(3)	(4)	(5)	(6)	(7)
<b>EXPORT</b>						
ASEAN	15.38	5.41	-18.79	8.07	24.67	-11.46
Major Trading Partner	7.01	6.16	-3.88	7.91	18.68	-9.18
Australia	17.90	5.12	10.93	10.44	13.09	-4.29
Canada	-11.23	-5.35	23.00	-2.69	20.18	60.91
China	20.53	22.66	0.38	4.22	47.84	2.38
EU:						
EU-15	5.96	-1.79	4.48	15.74	12.87	-9.88
EU-25	6.83	-1.05	4.09	15.76	12.34	-9.58
Hong Kong	-	89.85	-19.47	4.47	30.69	-7.88
India	31.97	20.16	16.65	10.40	11.92	-3.66
Japan	1.10	-2.65	-17.36	8.56	34.16	-4.57
New Zealand	6.59	-4.76	-2.12	17.84	35.97	-18.69
Pakistan	18.82	40.91	-26.64	-9.24	173.75	-64.86
Republic of Korea	10.17	12.93	-26.76	39.39	32.72	1.94
Russia	273.14	-72.36	-46.06	-52.62	45.98	17.25
Taiwan **)	29.17	12.30	-46.49	31.37	15.30	-15.54
USA	8.22	17.67	-7.73	8.45	5.26	-14.95
Rest of The World	-24.03	-18.84	41.96	-9.15	18.30	-12.67
<b>Total*)</b>	<b>8.99</b>	<b>5.97</b>	<b>-7.59</b>	<b>7.95</b>	<b>19.99</b>	<b>-9.70</b>
<b>IMPORT</b>						
ASEAN	19.79	0.64	-20.14	11.95	27.17	-7.93
Major Trading Partner	8.09	1.73	-28.66	7.56	23.22	-8.17
Australia	21.12	-8.34	-28.40	6.86	42.70	9.26
Canada	6.76	5.01	-31.21	17.64	2.30	-21.13
China	29.28	46.27	-16.85	9.99	47.08	-4.07
EU:						
EU-15	23.68	-11.10	-32.56	0.90	12.62	1.50
EU-25	25.22	-10.78	-33.30	0.93	12.55	1.47
Hong Kong	-	61.90	-26.34	10.89	18.87	-13.79
India	54.69	54.56	-60.18	25.34	46.29	14.41
Japan	-6.65	-2.79	-34.48	10.22	27.52	-18.85
New Zealand	32.90	12.71	-33.43	-12.95	37.67	20.21
Pakistan	48.20	-28.28	-11.50	-1.34	27.27	26.26
Republic of Korea	17.18	11.76	-37.62	32.49	23.64	-11.35
Russia	88.32	-45.34	-49.55	26.88	46.81	2.97
Taiwan	13.84	14.14	-59.11	24.39	16.57	-20.26
USA	14.16	16.38	-17.43	-9.72	5.34	-5.84
Rest of The World	-13.09	-14.70	-14.50	25.41	38.20	-6.57
<b>Total*)</b>	<b>10.06</b>	<b>1.53</b>	<b>-27.11</b>	<b>8.44</b>	<b>24.03</b>	<b>-8.12</b>

Source:  
Computed from Table V.14

**Note:**

\*) Exclude Lao PDR (prior to 2003) and Viet Nam (prior to 2004), as well as Cambodia (prior to 2000) and Myanmar (prior to 1999);  
 \*\*) Preliminary: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rade with Taiwan for 2007 and Singapore trade with Taiwan 2008 were suppressed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p) preliminary with Cambodia being estimated using trade growth as used in World Bank World Bank Economic update for the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April 2009 (www.worldbank.org)

**Imports by Country of Destination, 1996-2008**

(%)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sup>p)</sup>	Average Annual Growth 2003-2008
	(8)	(9)	(10)	(11)	(12)	(13)	(14)	(15)
	4.87	33.32	22.07	16.12	15.45	14.88	11.56	15.97
	3.29	13.40	27.06	13.12	15.95	14.41	-0.90	13.57
	12.59	24.82	35.40	21.29	17.83	18.51	22.78	23.00
	-30.25	-9.45	17.16	-2.54	24.69	34.69	0.41	14.00
<b>China</b>	34.66	48.66	42.30	26.37	24.40	19.90	9.77	24.11
	-4.06	6.96	26.17	6.60	15.73	12.08	5.68	13.01
	-2.22	7.29	26.57	6.26	16.77	14.39	4.59	13.44
	9.99	29.73	4.35	16.97	15.97	38.15	-70.99	-10.72
	35.54	0.41	29.42	37.56	25.78	31.23	21.11	28.90
	-7.77	19.54	26.37	8.22	11.72	4.74	23.18	14.54
	10.29	35.11	43.84	24.52	14.63	17.66	17.16	23.13
	25.09	18.15	3.15	25.00	39.37	26.69	15.95	21.42
	6.57	7.89	16.93	22.97	11.55	8.50	18.49	15.58
	37.45	71.74	27.74	27.11	7.78	31.18	30.18	24.48
	113.37	-17.00	13.87	-1.70	7.38	-75.41	116.13	-8.58
<b>USA</b>	-1.89	13.19	15.05	15.95	4.31	9.73	-4.62	7.81
	-11.91	4.38	65.97	6.73	29.76	28.42	-15.84	19.96
	3.64	17.90	25.78	13.86	15.82	14.53	2.25	14.20
	8.22	24.49	31.22	17.94	16.00	12.83	16.79	18.79
	1.49	9.38	36.29	13.83	12.58	15.47	8.70	17.00
	-23.85	0.01	26.44	26.72	14.40	9.55	23.25	19.87
	18.32	-6.21	30.18	16.95	4.85	42.20	21.43	22.48
<b>China</b>	33.41	31.73	56.05	28.13	22.60	24.31	14.82	28.46
	0.91	0.28	34.85	7.52	10.34	19.04	13.46	16.66
	2.95	0.54	34.44	7.09	11.00	19.42	13.75	16.77
	13.48	2.98	6.19	8.81	7.18	9.51	-19.87	1.68
	0.66	9.83	65.77	18.17	22.91	26.81	39.81	33.68
	-0.33	13.41	26.30	6.63	-0.72	9.23	21.83	12.21
	-22.28	19.04	17.35	7.81	5.18	46.53	45.39	23.17
	-18.76	-19.90	-26.43	1.78	64.37	15.55	34.46	13.84
	10.20	11.97	24.85	13.87	21.84	10.19	28.67	19.69
	41.21	-2.09	52.46	42.15	-12.17	16.92	108.03	35.86
	83.67	6.97	45.64	18.32	20.24	-79.01	139.20	0.80
<b>USA</b>	-4.87	11.09	15.55	9.46	5.37	13.14	9.69	10.59
	-13.77	2.99	66.11	16.81	19.90	38.29	-20.70	20.60
	2.91	12.73	35.05	14.81	13.41	14.81	10.69	17.45

p) preliminary with Cambodia being estimated using trade growth as used in World Bank  
World Bank Economic update for the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April 2009 ([www.worldbank.org](http://www.worldbank.org))

資料來源：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 <http://www.aseansec.org/22109.htm>.

## 附錄四、東協對各地區貿易平衡變化

Table V.16. ASEAN Balance of Trade

Country of Destination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1)	(2)	(3)	(4)	(5)	(6)	(7)
<b>Trade Balance (X-M)</b>						
<b>ASEAN</b>	<b>16,576.8</b>	<b>16,762.5</b>	<b>20,730.6</b>	<b>17,708.0</b>	<b>17,132.5</b>	<b>19,914.0</b>
<b>Major Trading Partner</b>	<b>-38,434.9</b>	<b>-44,007.4</b>	<b>-34,032.2</b>	<b>39,485.9</b>	<b>43,333.3</b>	<b>41,266.4</b>
Australia	-1,994.4	-2,582.8	-1,545.5	1,418.2	1,770.4	198.1
Canada	-51.0	-457.4	-686.1	548.1	174.1	580.8
China	-928.8	-1,743.5	-4,315.0	-2,008.9	-2,740.9	-3,958.1
EU:						
EU-15	-2,106.8	-10,454.5	-4,923.1	13,751.2	21,018.6	23,811.2
EU-25	-2,106.8	-10,780.9	-5,013.2	14,160.1	21,518.2	24,103.2
Hong Kong	-	-	-	9,775.7	9,802.6	13,648.2
India	982.6	879.0	77.7	3,467.5	3,566.4	3,237.2
Japan	-35,854.5	-30,159.7	-29,255.6	-11,976.9	-13,778.9	-15,071.0
New Zealand	-103.6	-338.3	-523.3	-106.1	140.9	178.7
Pakistan	800.7	878.5	1,492.1	1,054.7	938.8	2,907.1
Republic of Korea	-2,771.2	-3,847.7	-4,189.6	-1,454.4	-1,387.1	-726.8
Russia	-234.4	1,128.4	-239.5	-90.3	-490.3	-721.6
Taiwan **)	-2,479.7	-1,479.8	-1,897.1	827.0	1,503.3	1,638.5
USA	8,558.6	6,504.1	8,335.3	13,677.8	24,090.3	25,321.6
Rest of The World	-2,252.4	-7,222.2	-7,670.5	10,193.5	-1,774.3	-10,069.4
<b>Total*)</b>	<b>-21,858.1</b>	<b>-27,244.9</b>	<b>-13,301.6</b>	<b>57,193.9</b>	<b>60,465.8</b>	<b>61,180.4</b>

Source:  
ASEAN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Notes:**

\*) Exclude Lao PDR (prior to 2003) and Viet Nam (prior to 2004), as well as Cambodia (prior to 2000) and Myanmar (prior to 1999);

\*\*) Preliminary: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rade with Taiwan for 2007 and Singapore trade with Taiwan 2008 were suppressed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p) preliminary with Cambodia being estimated using trade growth as used in World Bank : World Bank Economic update for the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April 2009 ([www.worldbank.org](http://www.worldbank.org))

by Country of Destination, 1995-2008

(US \$ Million)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sup>pl</sup>
(8)	(9)	(10)	(11)	(12)	(13)	(14)	(15)
15,041.2	13,504.4	24,470.4	21,535.1	22,831.7	25,582.3	32,748.1	26,880.5
34,679.6	40,387.0	56,104.7	45,337.7	48,573.0	71,027.4	76,072.0	21,032.9
-988.4	2,349.0	4,726.9	7,048.7	8,052.7	9,885.7	12,904.4	15,774.4
2,678.8	1,054.0	890.3	800.9	308.2	946.1	1,051.4	167.8
<b>China</b> -2,883.2	-3,664.7	-1,517.1	-6,362.4	-8,878.5	-9,940.8	-15,227.7	-21,420.0
17,008.7	14,344.5	18,019.0	19,246.3	20,017.1	26,305.3	25,013.8	20,481.3
17,451.0	15,002.6	18,869.0	20,632.3	21,458.4	28,484.6	29,264.4	23,393.7
13,070.6	14,123.6	20,525.2	21,261.5	25,604.0	30,553.2	45,216.4	7,239.0
2,538.9	4,721.8	4,392.7	4,209.6	7,095.9	9,153.5	12,444.8	12,753.7
-5,008.5	-8,580.3	-7,004.6	-8,807.8	-8,321.6	789.2	-2,785.8	-2,244.6
-257.2	121.5	319.5	764.5	1,177.5	1,487.4	1,307.9	899.0
754.6	1,106.1	1,421.1	1,537.1	1,962.4	2,690.1	3,440.9	3,926.3
1,276.8	871.9	335.5	-922.1	752.8	-1,589.4	-2,211.0	-5,846.4
-696.4	-997.8	-588.0	-1,120.2	-1,766.1	-1,258.1	-1,245.1	-4,206.8
1,792.6	5,876.6	1,836.8	-2,218.8	-6,137.8	-9,598.3	-1,349.4	-4,277.9
<b>USA</b> 17,122.6	18,159.7	21,462.7	24,451.0	31,965.5	32,691.0	33,683.8	21,721.7
-12,172.7	-9,757.0	-9,565.3	-15,936.6	-24,700.4	-23,266.8	-40,423.0	-26,846.9
<b>49,720.7</b>	<b>53,891.4</b>	<b>80,575.1</b>	<b>66,872.8</b>	<b>71,404.7</b>	<b>96,609.7</b>	<b>108,820.1</b>	<b>47,913.5</b>

資料來源：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 <http://www.aseansec.org/22109.htm>.